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二十三 2022.11

答案在风中飘荡

李明洁

在场《硝烟散尽之后，黎巴嫩漫长的公民抵抗》 | 生活亲历者

黄菊《此里卓玛：阿觉娃的故事》 | 生活亲历者

罗恩·拉什《我的父亲像一条河》 | 故事群岛





小 说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3 几碎片 李浩然
故事群岛 | P7 我的父亲像一条河 罗恩·拉什
P11 一个女人，年轻而衰老 格蕾丝·佩雷
发现经典 | P17 时震 /
P23 五号屠场 库尔特·冯内古特

非虚构

非虚构图书馆 | P29 答案在风中飘荡 /
P37 纽约的残冬漫长 /
P45 2020 纽约：正确与不正确的一百天 李明洁
生活亲历者 | P55 烟硝散尽之后，黎巴嫩漫长的公民抵抗 在場
P63 此里卓玛：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①～② 黄菊
小鸟文摘 | P73 在埃及拒绝沉默 乌苏拉·林赛
发现经典 | P79“值得爱的一定不止死亡” /
P83 2004 年 11 月 11 日，我满八十二岁 库尔特·冯内古特

档 案

小鸟访谈 | P87 如何理解棱镜一般的苏珊·桑塔格？曾梦龙
Newsletter | P95 芯片将如何影响地缘政治？曾梦龙
P101 一本政治讽刺小说，得了 2022 年的布克奖 黄璐
P109 “这些年轻女性不害怕死亡” Snufkin
P113 马斯克入主推特，带来了什么？张依依

专 栏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 P117 2020 街路笔记：总算是唏嘘多于欢笑 伊险峰



电影《美国往事》(1984)剧照

小鸟问答 Vol.23

小鸟 | 小鸟问答

其实生活不是给你调整到遗忘模式，
而是把你拨向“习惯”模式。

在 2018 年到 2022 年间，李明洁十几次往返于纽约与上海之间。在纽约，她见识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几乎所有的问题看起来都是新问题，对于纽约本地人、政客、社会活动家和社会观察者都一样，对于大多数身陷其中的人来说更是如此，都没有答案。她想到鲍勃·迪伦的那首歌，用作她这段纽约时间记录的名字。

补记中，她说她 4 月 2 日回上海，入境隔离之后，回家——“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万籁俱寂，只听到扑打翅膀的声音，接下来好像与纽约再无关系，所有问题似乎也湮没于静寂之中。

李明洁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偏重文化认知和社会记忆。她对纽约的观察，以及对当地流行思潮的兴趣，最终汇集成了系列文章，它们可能代表了这样一种态度：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特的，记录自己的方式往往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是一个提出问题的过程，每个人都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带来持续的思考。为这些经历和变化思考，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人提出问题，也需要为更多后续提出问题的人提供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就好像乌克兰作家奥列克桑德尔·麦赫德说的，在入侵的那一刻，他意识到：“你不能用你的诗歌保护你的家人免受步枪的袭击。你不能用书打人，你可以试试，但这对来自莫斯科的疯狂占领者不起作用。我对文化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对阅读失去了兴趣。”

因此他报名参加了武装部队。“在战争的第七天——这听起来几乎像圣经故事——一枚俄罗斯炮弹摧毁了我们的家”，他感觉自己人生全被毁了。然而，很快，他又开始写作了。“我开始写纪实日记，成为事件的见证者。这是艺术的一种原始功能……更多有才华的下一代作家将利用这种原材料，写出一部美丽的小说。但身处飓风中心，你只想抓住自己悲伤的最微小时刻，抓住自己尖叫的最微小时刻。”

我们知道，在我们这里，大部分时候我们对眼下困境的思索和记录，都会被当成“应激反应”——有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这么想。在事过境迁之后，哪怕是稍有缓解之后，很多人会调整到遗忘模式：“生活总是向前”，有什么过不去的呢？何况我们还得忙于处理新的问题。

不。

在写这篇问答的时候，办公室的对面总能传来一个高音喇叭女声。“长乐路 339 号的居民请尽快下楼做核酸。”

这个老女人呆板的声音从 4 月开始就一直存在。每次响起来的时候，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前两天突然意识到，4 月的时候，尽管那时候悲观得死去活来，但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 10 月底的时候还在听这个老女人的声音。

生活不是给你调整到遗忘模式，而是把你拨向“习惯”模式。

前几天和人聊起“政治抑郁”，得到了几个似乎也在意料之中的回答。有一个人说，“要

是目前生存堪忧，我可能也会政治抑郁，但现在我还好”。另一个人说，“我工作室黄了，光搬场理货就让我没空政治抑郁”，还有一个善意地拍一拍我，说，“不要总是想太多”。“政治抑郁”不是公民责任，自然也不能看作某种优越感的基础，但这样的对话还是让人忧虑。

我们说，为我们的经历和变化思考。即使没办法改变，也不能丧失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且它几乎肯定会把你拖入痛苦当中。

但是，如果没有思考，我们离“解决每个人的自身困境”就会越来越远，不止是个人的，是某个共同体，或者说是人类的命运——就像在纽约，李明洁的那些问题和思考最后总是指向文明的核心。

前一段与人感慨，你看这几年乱相不止，仿佛层出不穷新问题，每个人，包括发出公共声音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是一样都有点慌乱的样子。有时，甚至感觉他们口不择言。而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一代公共知识分子渐次凋零，难得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如果你细细观察，你会发现公共舆论场在 2008 年之后——对西方世界来说是面对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真正开始塑造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诸多社会问题因而凸显和放大之后……你还是会看到知识界持续的思考，即使在相对滞后的中文出版界，也能看到相应的一些成果。他们各自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分析社会问题所在，比如蒂莫西·斯奈德从地方报纸的没落解释极化政治，福山用身份政治来分析当下的各式新共同体，保罗·科利尔也不放弃机会表明他对这个新世界的见解和主张——正义与伦理，始终是这个世界里活跃的头脑须臾不可放弃要研究要琢磨的东西。

李明洁老师的几篇作品，价值即在于此：她的所有问题都与正义和伦理有关。这本来就是写作的使命。

我们同时把李老师的文章编入非虚构图书馆中。

i

本卷有什么。

小鸟收到一份口述投稿，非常长，有 3.4 万字。这份口述来自一位叫做卓玛的藏族女性，她于 1981 年出生于云南德钦。卓玛的口述非凡凡响，不在于她的人生有多么跌宕起伏——你的确会感觉到不同，但那可能形容为“异域文化差异带来的新奇感”更合适——而在于其完整性。卓玛有惊人的讲述能力，就好像口述最后附上她二十多岁根据自己村子里的事写下的小故事们，其质感会让人想起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我们会分四次刊登卓玛的故事，正如她自己所说，“这就是我的故事。虽然并没有希望自己被那么多人知道，但如果用，我还是愿意分享的。退一步，其实也只是茫茫人海中某一个人的故事而已。对于读者而言，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人这么活过。”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这一卷不写上海了，写书里遇到的各种人的各种城市。

本卷会继续刊登非虚构写作平台“在场”获奖作品，这篇叫做《硝烟散尽之后，黎巴嫩漫长的公民抵抗》的文章用冷静而不失乐观记录了一系列缺乏政治共识的人们作为公民的社会行动。

11 月 11 日是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 130 周年诞辰，本卷“再读经典”栏目将以此为主题。虚构作品依然还有“24 小时文学聚会”和“故事群岛”。

ii

本卷封面。

知更鸟。还有一条蛇。

iii

“你最近在做什么？”

小鸟在考虑一个小对话栏目。它希望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人和有意思的事。对一些人而言，或许这个项目能让他们知道，还有有意思的人存在，还有有意思的事在进行，也许这会让人觉得安慰和踏实。这个小栏目可能叫“你最近在做什么。”

我们目前在做前期的筹备，包括仔细考虑“怎么才叫有意思”，以及如何才能尽可能广泛地去发现不同的“有意思”。按照我们最初的想法，有意思的东西通常都和主流维持了某种距离，当然，这就涉及到你如何看待主流。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寻求发现和启发的栏目。如果你身边有有意思的人，请简单向我们说说 Ta 都在干什么。联系方式见下。

iv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Anna Tsukanova on Unsplash

小说

几碎片

李浩然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决定孤注一掷，将肉身投入文池鼎，
希望锻造出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先从托尼·玛德赛说起

托尼·玛德赛（1946—2012），土耳其诗人、作家。

他的所有资料来自《译桥》杂志的零星片段，整理如下。

1、托尼·玛德赛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哪怕在他的故乡土耳其也算不上知名。他的一生是穷困潦倒的一生，同时是传奇的一生。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兄弟姊妹四个，他行三，高中辍学，原因是家里负担不起私立学校的高额学费，辍学后自学摩托车和自行车维修技术，以补胎维生。文学是他最大的热爱，补胎之余坚持阅读和创作，三十年间在各类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和诗歌计十五万字，无甚波澜，六十六岁时自杀身亡。这些作品在他死后得以结集出版，书名叫做《跑马集》，销量惨淡。这个结果可能背离了托尼·玛德赛自杀的初衷。本期我们推介的作品是托尼·玛德赛的处女作，《最后一枪》，讲述的是“我”幼年时和舅舅去河边猎水鸟的故事。译者李明照。（原载《译桥》2013年第1期。）

2、上期刊登了托尼·玛德赛的作品后，很多读者朋友致电本刊编辑部，对托尼·玛德赛其人，特别是他的自杀表现出了浓厚兴趣。故本期继续刊登托尼·玛德赛作品，并对他的自杀做出更详尽阐述。

2012年12月21日凌晨，托尼·玛德赛用卡车载着一只类似中国香炉或者鼎的容器来到土耳其首都伊斯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门前，将大鼎挪下车，又从车厢内取出一桶汽油，自己爬进鼎内，盘膝而坐，打开汽油桶，举过头顶，倒置，汽油倾泻而下，浇满全身。然后他划着火柴，点了根烟。

那天他故意穿了很厚的棉衣棉裤，好让火烧得旺一点，他得偿所愿。圣索菲亚大教堂在火光里呈现出五彩斑斓的梦幻色彩。天色将明时，火势逐渐平息，托尼·玛德赛的一颗金牙在余烬里熠熠生辉。

很多艺术家会因为创作遇到瓶颈而选择自杀，但像托尼·玛德赛这样富有创意，又充满仪式感的自杀绝无仅有。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从他的行为中还原他的真实意图，只能通过揣测，将他的自杀与其他艺术家的自杀等同视之。虽然每个人选择自杀都有其独特的理由，但无疑都具备一两个共同的特征，比如失意和不得志。（原载《译桥》2013年第2期。）

3、以下文字来自托尼·玛德赛的国内唯一译者李明照。

托尼·玛德赛印象

最早接触托尼·玛德赛是在2010年，当时我已经大学毕业，每天窝在不足五十平的出租屋里写小说，笔耕不辍，却无一发表。一天，一名文友找到我，说给我介绍一位土耳其的作家兼诗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因语言不通，在旧货市场被当成小偷扭送

进了派出所，路上还被见义勇为的群众揍了一顿，鼻子都打歪了。好在此人性格宽厚，没有将个人矛盾激化成国际争端。我朋友问我能不能给托尼·玛德赛当翻译和导游，“我知道你懂土耳其语，又是写小说的，给你个接触大师的机会。”他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可是在此之前，我连托尼·玛德赛是谁都不知道，只觉得这名字像在骂人。当时我的一篇小说刚刚进入高潮，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谓事情上，直到朋友说“有报酬的，一天一百美元”，我才勉强答应下来。

托尼·玛德赛是一个白人老头儿，伸直了至少一米九，驼背让他的身高打折，是真的“折”，只还有一米六。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身体几乎呈一个7字形。头发稀落，脸上皱纹纵横，看起来少说七十岁，实际上只有六十出头。

见过面之后，他跟我讲起此行的目的，不是观光游览，而是要铸一口鼎。我的任务就是找到合适的工匠，进行沟通和监工。我问什么鼎，他甩给我一张图纸，上面从六个角度展现了这口鼎的不同侧面。鼎的主体呈正方形，上面两个犄角，下面四只脚，高一米半，宽一米半，四面刻着不同的图案，细看是八卦，一面是震卦，一面是坎卦，一面是震卦，一面是兑卦。怪不得他来中国，这活儿只有中国人能干。我很好奇他为什么要铸这样一口鼎，不等我发问，他说，听说你也写小说，那么这口鼎对你和对我的意义同样重要。之后他跟我详细介绍起这口被他称为文池的鼎。

简单说，就是把自己不满意的手稿放在鼎里焚毁，从而锻造出一篇绝世好文或者好诗。听他讲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外国老头肯定是被算卦的坑了。大概在土耳其叫占卜师。去年我也有类似经历，当时我被满满一邮箱的退稿信搞得意志消沉，恰巧在路边看到算卦的，于是上前让他卜了一卦，他告诉我，你一直向南走就能转运。我说走到哪里。他说有多远走多远。于是我想到海南岛。“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一张到海南岛的票，到了郑州，下车厕所的当儿，钱包被人掏了，掏就掏吧，裤子还给我划道口子，内裤都露出来了。那以后我再也不信算卦的说的半个字。

我有个朋友，大学学的冶金，现在在炼钢厂烧锅炉。我骑自行车载着托尼·玛德赛去找我这位朋友。托尼·玛德赛身形奇特，他坐在后座上，脑袋顶着我的腰，让我觉得好像被人胁迫。他时不时跟我闲聊两句，说他对中文也很感兴趣，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李白，最喜欢一句诗是“水从三千尺高空坠下，好像天上的银河洒落。”我一琢磨，知道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烧锅炉的朋友带我们找到厂长，鉴于托尼·玛德赛出手阔绰，事情办得很顺利。厂长留下图纸，答复我半月后交工。回来时，托尼·玛德赛好像意识到他的体型给我带来的困扰，执意骑车。他卖力蹬着自行车，样子滑稽，他的身子前倾，脊背在车梁上凸起如同山峰，下巴几乎触到车把，因此他不得不用力扬起头，好观察路况。一路摇摆，到了家，停好自行车，他说，朋友，你的车子刹车有问题，把也歪了。我说是有点毛病，一直懒得修。他说，那怎么行，我绝不能容忍我的朋友骑有问题的自行车。问我有没有改锥，我取来改锥，他蹲在地上，修起了自行车。从结果来看，他的修车技艺高超。之后半个月，托尼·玛德赛住在我家里（他说自己所有的钱都用来造鼎和支付我的酬劳了），吃饭的时候我们讨论文学，饭后各写各自的，写完一篇，他会拿给我看，我很喜欢，不吝溢美。但是他对自己的作品好像不太满意，说已经两年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了，自己也意识到很难再进一步，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文池鼎。

半个月后，鼎造出来，和图纸上分毫不差，托尼·玛德赛很兴奋，围着鼎转了好几圈，不停用手摩挲，还说，中国制造，Nice。临行前，他再三叮嘱我，如果写不出东西了，一定要造一口一模一样的鼎。我答应着，和他告别。

两年后，我收到托尼·玛德赛的来信，信里说，他对自己极度失望，一定是写得太垃圾，所以文池鼎效力全无，他考虑良久，决定孤注一掷，将肉身投入文池鼎，希望锻造出一个更优秀的自己。

那一刻，我知道，一切都晚了，我很后悔，我应该早点告诉他，占卜师的话靠不住。（原载《译桥》2014年第5期。）

再说那个写材料的

毕业后他进入当地税务局，负责写材料和领导发言稿，白天扛着相机跟在领导屁股后面录像，晚上从录像里摘抄出领导的重要发言，再加以润色，使之成为一篇激昂饱满的通讯稿。半年里他对那辆黑色帕萨特的性能摸得门清，尤其副驾驶座椅的舒适度。有一次车子刚刚发动，他就对司机说，不太对，要不要检查一下？司机没听他的，跑到半路抛了锚，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就是听声音比以往沉闷些。经常出入宣传部，提交材料或者取红头文件，结识了个朋友，比他大两岁，稍带娘娘腔。

工作之余，他把所有精力投入到阅读和写作当中，开了三个长篇的头，全部夭折，最长的一部写了三万六千字，在剧情陷入俗套之前停笔。完成了几个短篇，其中一篇较为满意，请宣传部朋友看过，朋友赞赏有加，答应推荐给省刊杂志社，当晚两人在税务局外的小酒馆喝酒，干了一瓶二锅头，又喝了几瓶啤酒，直到凌晨一点方才尽兴。朋友说宣传部宿舍楼进不去了，便和他一同返回他的宿舍。朋友上了趟厕所，大概吐了，出来之后，裤腰带松着，挨着他坐在床上，请他帮忙弄一下。他果断拒绝，朋友谆谆劝慰，他再难忍，一脚将朋友踹下床，朋友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坐起来，茫然看着他，他说，给我滚。朋友提上裤子，走了。第二天他就辞职了。

下面说那个业务员

他并不适合做这行。他性格木讷，嘴又笨，一激动就说不出话，他更擅长把语言转化成文字，或者说，用文字代替说话。辞职之后，他满世界找工作，招聘网站，中介公司，路边的小广告，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出现招聘信息的角落。甚至一度想去某酒店探究一下月薪过万的男公关究竟公的是什么关。哪怕应聘不成，也能获得一些独特的写作素材。他守在电线杆下，打了个电话，对方问了几个问题，年龄，身高，婚否，是否健身。他一一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是，能喝酒吗？他说，啤酒两瓶，白酒一两。对方说，另谋高就吧。挂了。

这个工作说起来也和酒有关，啤酒厂的业务员，不过对酒量没有硬性要求。他去应聘，接待他的人事经理是个女的。过程有些磕绊，问题出在他身上，第一是脸红，第二是

说话磕巴。人事经理说，你不用紧张，这又不是高考。他说，不紧张，主要是太香了。经理问，什么？他说，你太香了。这样，他神奇地通过了面试，人事经理大概把他的直言不讳当成了拍马屁。业务员不能不会拍马屁。

他被分配到隔壁市办事处。一共六个人，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四个业务员。平时的工作是帮助经销商铺货和开户，偶尔也会客串装卸工。没事的时候几个人聚在办事处喝酒打牌，酒他可以喝一点，打牌从不参与，自己躲在宿舍里写小说。后来换了个不打牌的主任，爱唱歌，喝点酒就拉着大伙去歌厅，一人点一个陪唱。陪唱都穿着低胸衬衣，超短裙，黑丝或者肉丝。他开始拿捏着，次数多了，逐渐放开。跟一个叫阿丽的姑娘熟络，每去必点她，俩人牵着手唱《萍聚》，唱《当爱已成往事》，唱《稳定的幸福》，他唱不好，她更差。陪唱却不会唱歌，有点稀奇。更稀奇的是别人穿一条丝袜，她穿两条，黑丝套肉丝。说是怕冷。他问她为什么不是肉丝套黑丝，她诧异地看着他，随后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傻不傻？那成啥了。

她说她是附近学校的艺术生，学舞蹈的，干这个就为了赚学费。他不关心真假，也不去深究。俩人偶尔会聊到文学，她说她有一本《平凡的世界》，走到哪带到哪，现在就在宿舍枕头下面压着，看了很多遍，书皮都掉了，拿胶带粘着。他说他也写小说。她问发表在哪里。他不好意思起来，说还没有发表过。于是她抱住他，说，一定能发表的。他有些感动。

后来，临近夏天，他终于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他一个人跑到外面，喝了点酒，把自己灌晕了，去了歌厅，没看到阿丽。借着酒劲，问领班，领班说，辞职了。他说，为什么？领班说，毕业了吧，也许是回家结婚了，谁知道呢。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阿丽。

接下来说那个卖肉夹馍的

女儿断奶之后，妻子提议辞职干个体，他向来对妻子言听计从，倒不是怕她，只觉得一切都无所谓。妻子经过一番考量，决定开小吃店，理由是“只要肯干，稳赚不赔”。他对麻辣烫比较感兴趣，妻子看上了肉夹馍，那就肉夹馍。

家乡的肉夹馍没有店面，都是路边摊，旁边支个炉子，上面炖着一锅五花肉。馍可以夹肉，也可以夹火腿，还能夹土豆丝，夹榨菜，夹你想夹的一切。肉炖得烂，烧饼很厚，上面裹一层油。味道一般。他们在省城吃过店里的肉夹馍，陕西老字号腊汁肉夹馍，馍和肉都有些不同，吃完后口腔里的香味萦绕，半日不绝。

他在网上查询腊汁肉夹馍的信息，跳出来一整页广告，祖传秘方，三十天包教包会；老潼关腊汁肉夹馍，点击下方链接免费加盟……左挑右选选中一家，只因它的图片更多一些。

于是出发。带了两套衣服，两本书，一本王小波的《青铜时代》，一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均看了很多遍，随便翻开一页，总有新感悟。坐了一天一夜火车，半天公交车，一个小时摩的，到了目的地。放眼一派荒凉，以及无数困在红圈里的拆字。迎接他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自称是公司的接待员，将他领进一处沿街二层楼，捧出一摞合同给他看，山西的陈某某，河北的刘某某，还有广东的黄某某，我们的学员遍地开花。我们每个月开一次班，来得晚了只能等下一期，恰好，本月还差一个名额，就等你了。签了合同，领他到二楼住宿，一个单间，只有一张床，一个洗脸盆。洗漱出门左拐，上厕所到一楼，厕所门坏了，关不严，里面有把破凳子，不是让你坐的，顶门用。

安置好，俩人去公司，经过一条像是遭遇空袭般劫后余生的柏油路，到了一家店，没招牌，门口左边立着大炉子，右边竖着一个铁架子，上面蒙着红色喷绘布，上书“樊氏腊汁肉夹馍”几个隶书大字，进门一股草药味混合着肉香结结实实拍他脸上，他回味了一下，跟省城那家店里的味道非常接近。里面摆了几张原木桌，各配四把凳子。一男一女围着中间一张桌子嗑瓜子，男的三十来岁，胖，模样像是《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和珅，女的白发苍苍，两手不停哆嗦，似乎得了帕金森。接待员介绍说，这是我老公，这是我婆婆。和珅捧了一把瓜子给他，他没接，说，公司就三个人？和珅说，名头说大点，好招人，见笑了，主要是祖传的手艺假不了。他问，你姓樊？和珅指着老太太，说，我妈姓樊。他又问，学员呢？和珅说，刚毕业一批。他说，不是就差一个名额？怎么就我自己？和珅说，给你一对一授课，你还不认便宜？

好在肉夹馍和凉皮味道正宗。

领了一本教材，A4纸打印的，十几页，封皮上写着“仅供内部学习，禁止外传”，翻开，里面详细介绍了肉夹馍制作流程，凉皮制作流程，最后一页是料包配方，密密麻麻罗列了十几种调味料，还有几味药材。

晚上打电话汇报情况，妻子嘱托，好好学，咱发家致富都指望你了。又说，脑子别光放在小说上。他说，好。挂了电话，开始写小说。

第二天先学发面，酵母按比例掺进面里（他问为什么不用发酵粉，和珅说要节约成本），兑水，揉，发12个小时，再揉，醒一个小时。第三天学打烧饼。第四天学打烧饼。第五天学打烧饼。饼总也擀不圆。和珅说，慢慢练吧，先教你炖肉，咱这肉，香飘十里，不用招牌，客人捂着味就来了。

一个月出师，回到家，妻子早已看好房子，在小吃一条街，位置绝佳，房租自然高，几乎花光了他们所有积蓄，接下来装修买设备置办桌椅，钱不够了，又借了父母一些。门店开起来，起名“李记腊汁肉夹馍”。晚上炖好一锅肉，指望它香飘十里，香味却在左边过桥米线和右边螺蛳粉的夹击下溃不成军。不由埋怨妻子，地方都不会选。妻子说，吃米线和螺蛳粉的极有可能整个肉夹馍。他想想，觉得有道理。前几天生意还好，后来客人渐少，听人反馈，都说馍太硬。他强调，硬的才有嚼头。自己尝一口，确实硬。琢磨好久，调整了和面时水的比例，有效果，不硬了，反而皮，咬不断，要用撕的。再研究，发现是漏掉了一个小细节，面里要加浮在肉汤表面的猪油。这次肉香馍脆，一向挑嘴的妻子都赞不绝口。

生意却不见好转。每天稀稀拉拉十几拨顾客，有的甚至问问价钱就走了。总结原因，只有一个，太贵。外面肉夹馍两块一个，你卖三块五，有人吃才怪。咱也降价？那就亏了。要我说你就傻，人家肉里面搁辣椒搁香菜，菜比肉还多，你倒好，有客人要辣椒香菜你都不给人放，说破坏肉的香味。确实破坏香味。人家爱吃，你管它破坏不破坏。

好，听你的。

每次都是听妻子的（除了写作）。价格降下来，生意有所好转，不太明显。坚持了四个月，贴上了转让的告示。没几天，房东来了，说你转让怎么不知会我？妻子说，哎呀，我们年轻，考虑的事少，您多担待。他不喜欢这个一脸市侩的房东，就坐在柜台里，没起身，也没打招呼。房东转了一圈，最后指出有一块窗玻璃裂了一条缝，搬走之前要换好。妻子满口应承着。他想说玻璃在他们来时就是坏的，又不太确定，就忍住了，没说。房子没转出去，妻子买了水果纯牛奶去看望房东，退回来半年房租。他把桌椅卖给了二手家具回收商，卖的钱雇了辆三轮，把锅碗瓢盆拉回了家里。

最后说说李明照

李明照（1985—），河北狮城人，土耳其作家托尼·玛德赛在国内的推介者和唯一译者。也写小说，创作颇丰，发表寥寥。最近搞翻译和创作之余，在滨河公园门口摆地摊儿，卖儿童玩具，被城管抄过两回，不像别的同行会撒泼耍赖，所以损失惨重。营业三个月，目前仍是亏损状态。

卖得最多的是一种小型飞行器，带夜光，造型多样，诸如花仙子，机器猫，头上顶个螺旋桨，打开开关，螺旋桨飞速运转，一松手，便飞到半空，靠自身重量坠着，飞两三米高后自然下落。质量不一，质量不好的会落下来，质量好的直接飞走了。优劣比例1:1。而几乎每个孩子在购买前都要求试飞，他眼睁睁看着机器猫飞过树梢，飞过屋顶，消失在视线之外，只好再打开一个。

妻子劝他改行，他不听，之前他对妻子言听计从，这次想自己做主。他在税务局写过材料，当过啤酒业务员，卖过肉夹馍，都不如意，摆地摊反而让他精神前所未有的放松，最重要的是，不会影响写作。

周一到周五晚上摆摊，周六日全天。他每天六点起床，做好早饭，等妻子和女儿吃过之后一个去上班一个去上学，他打开电脑，开始写小说。偶尔点开邮箱，看看有没有新的用稿或者退稿信，后者居多，多得多。退稿意见大同小异，说他翻译腔过重，或者脱离现实。有一篇写小时候和舅舅去河边猎野鸭子的，他很满意，改正了翻译腔，也接地气，过了初审，终审被毙，退稿意见是持枪违法，打鸟更要不得。后来专注翻译托尼·玛德赛作品，均发表于《译桥》杂志。

他坐在狮城福康家园85平米的两居室里，灵魂穿越十五英寸笔记本电脑屏幕来到2012年的土耳其，已是午夜，圣索菲亚大教堂空无一人。一口方形大鼎立在他的面前。他手撑鼎沿，翻身跃进鼎内，盘膝坐下，往身上浇满汽油，然后划着火柴，点了根烟。大火燃炽，托尼·玛德赛从鼎里爬了出来。



李浩然

一个在海上写小说的。

24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24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Kamil Pomykala](#) on Unsplash

小说

我的父亲像一条河

罗恩·拉什 | 故事群岛

“他没事，”父亲用沙哑的嗓音说道，“这是最重要的事。”

十一月的下午，弟弟在河中浮起又消失，父亲从沙洲上观望着，而那条河宛如父亲的人生，在朝着错误的方向涌流。距离那个下午，已经过去五十个春秋，也就是半个世纪。那是1962年的秋天。父亲那年三十五岁，和妻子拖着四个孩子，突然间丢了工作。

“我不敢相信他炒了我鱿鱼。”一个月前，父亲在餐桌旁坐下时这么说。他听起来困惑不解——语气中没有怨恨或担心，暂时还没有。我的母亲和我，甚至还有我九岁的弟弟，都没有动盘中的烤牛肉和土豆泥。只有坐在高椅里的双胞胎照吃不误。

“兴许他会重新考虑一下，意识到他犯的错误。”母亲说道。

“不，”父亲答道，“他已经筹谋了好几个礼拜。我就是不愿预见这事。他想要显示管事的人是他，而不是他岳丈大人的幽魂，他利用我来清楚表明这一点。他甚至没有提议让我干回原先的工作。”

父亲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往后推，盘中的食物丝毫未动。

“真希望哈姆里克先生当初把我留在纺织车间。”父亲一边说，一边从前门走出去。

透过用餐室的窗户，我们能望见父亲在院子里，在他点香烟的时候，看见他的打火机亮起火光。父亲伫立在死胡同的边沿，望着路对面的房子，那些房子和我家一样新，一样背着沉重的按揭贷款。这些房子是砖瓦房，和我们以前居住的木屋不一样，那座木屋在一个棉纺村的街道上，父亲正是在同一条街上长大成人。父亲在我们搬家的那天说过，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砖头更加结实。

“你们都要好好吃饭。”母亲告诉我和弟弟。

“饭好凉。”弟弟说。

“无论如何都要吃。”母亲严厉地说道。

“男人不是非得有大学学位才能系领带。”哈姆里克先生曾在棉纺厂的圣诞晚会上这么说道，接着宣布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升职决定，将父亲从纺织工提拔为倒班主管，再升为管理层。“勤奋工作和丰富经验比一张卷起来的学位证书更加重要。”

哈姆里克先生那时向我们招手，让我们到台上来与父亲会合。他亲吻了我母亲的面颊，与我和弟弟握手。

“你们两兄弟应该为你们的老爸感到自豪。”哈姆里克先生那时说道。

然而，哈姆里克先生的人生哲学没有被他女婿认同，两年后，当哈姆里克先生因为心脏病发作而过世后，父亲的升职变成一次自由落体。

父亲遭到解雇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开始寻找工作。等到下午时，他就已经找到一份工作。一个叫克莱德·哈蒙的包工头——父亲从他们一起读一年级时就已经认识他——让父亲加入一支给初中学校重新粉刷的施工队。克莱德告诉父亲，这份差事顶多持续一个月。在那之后，父亲需要另寻别的活计。

就这样，父亲回到了一所他阔别二十年的学校。他不再身着白衬衫系着领带，而是穿着

白色工作服干活，衣服上有干掉的涂料结成的硬皮。和他一起干活的工人是两兄弟，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每周五，当克莱德·哈蒙从口袋里掏出厚厚的一卷十元美钞时，父亲放进钱包的薪水总是比工友少两张。他以前从未刷过墙，所以日复一日，父亲向年纪只有他一半的工友学习细看墙壁的技艺。

那个月里，父亲是我人生中一个赫然耸现的存在——当我换教室上课时，父亲在过道里，高高地立在梯子上，青春期的学生在他底下跑来跑去，或是父亲一边给窗框涂漆，一边窥视我所在的教室。对于一个十四岁大的孩子来说，我唯一自然的做法是装作对父亲视而不见，因为在那个年纪，单单父母亲的现身就能引起窘迫之情，但我确信，父亲认为我目光低垂是由于我觉得丢脸。我俩在上课的日子里看见彼此时，父亲和我一样不自在，我们确认彼此的存在后，就会迅速地转开视线。

父亲这一个月的粉刷工活计干到一半时，特纳房地产公司在我家草坪上竖起一块“此屋出售”的牌子。几乎每天晚上，都有陌生人来窥探打听，有时还进到我家房子里，而我父亲靠打电话或驱车巡弋来寻找一份长久的工作和一座不那么昂贵的房子，等我们卖掉目前的房子后好能搬进去。我们用纸盘当餐盘，很快，我家晚餐氛围变得寂静又紧张。总是有人过来看房子，父亲总是离家去外面，有时假如是要找房子，母亲会和他一起去。他们会把双胞胎绑在后座上，把我和弟弟留在家里，好为房地产经纪人和她最新带来的客户开门。

等到十一月时，再也不需要“此屋出售”的牌子了，我们搬进棉纺村里的一座小木屋，那儿是父亲长大的地方。父亲和他的双亲不一样，假如他能继续还房贷，他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但他怎么能没有察觉到，他回到了十八年前他起步的地方呢？

父亲依然没有找到一份长期工作，而初中的室内粉刷工作都干完了。现在只剩下零碎的活计，比如粉刷旗杆和房门之类。父亲干活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周五的下午，我走出教室来休息，望见父亲在远处攀爬水塔的梯子，一只手抓着油漆桶和刷子，另一只手抓住梯子的金属横档。除了代表校名的褪色黑色字母，整个水塔都是白色的，和那天下午填满天空的白云一样的白。随着父亲往上爬，乍一看像是他能攀入云团一般，但这时父亲停住了，处在地面和天空的半当中，把刷子往油漆桶里蘸了蘸。我看着他举起刷子，沿着褪色的字母，手臂先是向上，再向外移向身侧，仿佛在打旗语。字母慢慢变亮，成了黑色，父亲填满每一个字母的轮廓，就像一个一年级学生在学习字母。

是母亲出了主意，让我们在次日出门钓鱼。或许是她认为，这可以让父亲不去想我们不确定的未来，并给他一个和儿子们相处的机会，在最近一个月里，他没有多少时间是和儿子们一起度过的。父亲抱怨说购买钓鱼证要花八美元，但母亲告诉他，一串鳟鱼会给予我们一顿美味晚餐。母亲往野餐篮里放入三明治、可乐和一条旧棉被。父亲从地下室里收拾出钓竿、卷线器和锈迹斑斑的钓具箱，我和弟弟则在后院里用铲子挖出蚯蚓。我们在莱尼奥体育用品商店稍作停留，父亲从钱包里拿出一张辛苦挣来的十美元钞票，递给店员。店员填写钓鱼证表格时，父亲端详起玻璃柜里面的拟饵。他给钓鱼证签了名，正要把两美元塞回钱包时，突然改变心意，把钞票放回柜台上，手指向柜子里的拉帕拉牌拟饵。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两车道公路行驶了一个小时，才到达沃托加县的北部一角，纽河正是在那儿流入弗吉尼亚州。我的北卡罗来纳州历史课老师曾宣称，纽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河流之一，还向我们指出，纽河不同于其他河流，一路往北流——而不是往南流——到俄亥俄州，之后更宽阔的大河才转弯往南流向墨西哥湾。

我们一进入峡谷，道路就不再有铺面。我们沿着下坡路颠簸地驶向河流，一路上没有遇见其他汽车。在政府买下这片土地之前，早已有生活在这片山谷里，但他们的栖息痕迹只剩下偶尔可见的、躺在腐木和生锈铁罐中的烟囱残体了。

北卡罗来纳州政府在我们停车的桥下放流虹鳟，这些虹鳟和偶尔钓到的瘤头鱼就是我和弟弟在以往的钓鱼之行中的收获。父亲平常也用蚯蚓钓鱼，但这天他往鱼线上系了四英寸长的拉帕拉牌拟饵，而不是10号鱼钩。纽河里有小嘴鲈鱼，有些能达到四磅到五磅重，而有些褐鳟的个头甚至更大。或许，父亲相信钓到一尾小嘴鲈鱼或褐鳟作为战利品的话，会标志着他人生的运势发生改变。

和我们的大多数钓鱼之行一样，父亲几乎没有机会去发现钓没钓到鱼。他每次移往河上游或下游，弟弟和我都会害得他要回到老地方，要么是我们的卷线器鱼线缠绕得像鸟巢，要么是鱼钩勾到石块或水下原木。父亲平常在这些情形下是个耐心的人，但在这天下午，他每次放下钓竿，走过崎岖的河岸，来解开鱼线或走进水中松开鱼钩时，脸色都是黑沉沉的。他的几次抛竿都没有鱼咬钩，甚至连绕圈或跟着鱼饵的鱼都没有。这天以十一月来说算暖和的，但我们是在峡谷的深处。到下午三点时，太阳落到群山背后，空气冷飕飕的。

弟弟抱怨说他觉得冷，想要回家，尽管我什么也没说，但我也准备回家了。钓鱼的收获很少，四小时只钓到三条小虹鳟。我们觉得无聊，也不检查河底的鱼饵有没有被鱼吃掉。父亲没有理会我弟弟，走到下游五十英尺远处的一片沙洲上。父亲流露出我从未见过的专注，全神贯注在钓鱼上，朝着远处的河岸使出一下环状抛竿，改变收线速度，甚至给鱼线加了一个沉子，希望不一样的深度也许能产生奇迹，钓到一尾大鱼永远都是个奇迹。

“我要去汽车那边。”弟弟哀诉道。他从石头上提起钓竿，卷了会儿鱼线，最后鱼线绷紧，钓竿弯了下去。“爸爸，我的鱼线勾住东西了。”弟弟叫道。

“该死的，你自己去解开。”父亲喊话回来。

弟弟犹豫了一下，等待父亲说别的话或做别的事，因为我们都被叮咬过，父亲不在近旁的情况下，永远不要迈进水里。但父亲的全部心思都扑在河上。弟弟的手放在拉紧的鱼线上，顺着鱼线踏进湍急的水流中。他走到水面有他膝盖那么深时，脚下一失稳，整个人就在深水中挣扎起来。

我叫喊起来，父亲转过头看见他的小儿子在水流中时而浮出，时而消失，水流把他推向沙洲，接着又越过了沙洲。我跌跌撞撞地走进浅水中，朝父亲大叫，让他做点什么事。我离得很近，足以看见父亲的眼眸，在那一刻，我相信他将会任由我的弟弟溺水身亡。接着，父亲迈进河中，在岩石嶙峋的浅水处绊了几下，鲜血染红了他的膝盖，然后摆动手臂进入更深的水流中，翻滚转身，朝向下游，逐渐缩短他和我弟弟之间的距离。他抓

住了弟弟，但随着一个陡坡害得他们的脚下突然踩不到河床，他没能继续抓住弟弟。继续往下游漂了二十码的距离后，他再度抓住弟弟的衣领。他们已经被水流冲到更靠近河岸的地方，现在水挺浅了。父亲把我弟弟提起来，让他站住，再扶住他，两个人在原地喘着气，吐出水来。我看到父亲的手缓缓伸向背后，摸到一只空空如也的口袋。现在我来到他们身边，我也抓住弟弟的胳膊，三个人趔趔趄趄地走向河岸。

我们的模样就像船舶失事后的幸存者，每个人身上都在滴水，冷得直哆嗦。父亲把弟弟抱到车上，脱去他的衣服，再脱去我的衣服，把我们裹进棉被里。他把我们放到前座上，发动引擎，把加热器开到最大。“等你和弟弟身子暖和后，就关掉引擎。”父亲吩咐我。他在河边来回走了一小时，眼睛搜寻着浅水处，偶尔涉水进入河中，以便更仔细地查看。等到父亲放弃时，最后一点日光已经完全消失。弟弟已经睡着，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静静地开车回家。汽车停进家门前的车道，弟弟坐在我们中间，依然熟睡着。我的手握住车门把手，但我随即感觉父亲的手放在我的肩上。门廊的灯亮了，我能看见父亲的面庞。他朝着弟弟点点头。

“他没事。”父亲用沙哑的嗓音说道，“这是最重要的事。”

我家在冷得刺骨的日子里过完那年冬天，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每当他们在餐桌旁坐下，决定支付哪些账单，不付哪些账单时，那条河从我们手中夺走的钱一定是个让人切痛不已的记忆。来年一月后，父亲在希科里的舒福德棉纺厂得到一份全职工作。我们在五个月里第二次搬家。尽管父亲会在舒福德棉纺厂工作三十年，但他从来没有佩戴领带，也没有赚到他当经理的那两年拿回家的那么高的薪水。再也没有人告诉他，勤奋工作和丰富经验的意义超过一张卷起来的学位证书。

在我们如何铭记自己的父母方面，我们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记得我的父亲在一个十一月的下午，站在河流正中的一片沙洲上，像是被放逐了一般。我记得他如何看着儿子从旁漂过。我不会——和我在十四岁时一样——擅自推想父亲在那一刻感受到什么，没有感受到什么。相反地，我会铭记父亲如何在那沿着错误方向涌流、承载着我们所有人的生活的水流中，发现一些值得紧抓不放的东西。



罗恩·拉什

美国诗人、小说家，目前在西卡罗来纳大学担任“阿巴拉契亚文化研究”杰出教授。他被视为当代美国南方代表性作家，作品曾获舍伍德·安德森奖，两次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并凭借短篇小说集《化学》和长篇小说《萨琳娜》两度入围福克纳奖决选。2010年，短篇小说集《炽焰燃烧》荣获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

译者：姚人杰

非专业译者，翻译过的内容杂七杂八，从童书到科幻，从侦探小说到科普，但最喜欢的还是构思精巧的短篇小说。个人认为，翻译是一场永远只有更好，而没有最好的探求。

《我的父亲像一条河》“My Father Like a River”，Copyright © 2013 by Ron Rash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Les Anderson](#) on Unsplash

小说

一个女人，年轻而衰老

格蕾丝·佩雷 | 故事群岛

现代生活里不可收拾的一切都是暴力的一部分，
无处不在。

外婆很年轻的时候就生了我妈妈，之后又生了其他孩子，无论男孩女孩，都是外婆给起的名字。这和爱不爱的没多少关系，外婆说，但她从来不会实话实说。她的脑袋里全是天马行空的梦想，整天都在看新闻报道，整晚都在叹息，外公想要接近她，就只能通过那种特殊的媒介。

那只是最基本的麻烦。身边全是弟弟妹妹，这让我妈妈很沮丧，他们没有一个人比她的脾气更好。战争、欺骗、破碎的家庭，现代生活里不可收拾的一切都是暴力的一部分，无处不在。面对麻烦，妈妈放声尖叫。

她发誓说，要是有个属于自己的男人，她就不再尖叫了，但是所有的舅舅和姨妈，无论独居还是成家的，全都吵个不停。我外公不止是吵闹，他还打人，也就是说——打这个家的成员。妈妈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在被他打。要是有人胆敢碰我一根汗毛，我肯定会把他们打翻在地。

外婆把所有的零钱都存下来给了我们。我的约翰逊舅舅在精神病院里。其他人都在这里，莉兹姨妈十七岁，可我妈妈同她说说话时好像完全当她是个成年人。前几天我妈妈对她说，她渴望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她厌倦了在这样一个充满该死的阳具象征的世界里，抚养两个女孩儿。莉兹说是的，她明白那是怎样的，时间白白过去，你所需要的就是在裙摆处有一只强壮而温柔的手。这个牲口棚的声响效果里需要这种。

他们已经对我说了数百次。我的爸爸是个极为出色的拉丁人。为人处世相当机敏，也很有趣，特别上进。他们深深相爱，无法自拔，直到乔安娜和我消除了他们之间的一切。妈妈不想让我觉得我被排斥，可是她也不想觉得她自己被排斥，所以便说我太吵了，每天晚上都在哭。然后乔安娜整天整夜地索要乳头，成了扫兴的最后一击。“……一个妻子，”他说，“在孩子降临之前都是备受宠爱的女主人，孩子出生后呢……”他用法语没有说完的话就那么悬在半空，但是只要听到他说“孩子们”，我就会朝他丢玩具，揣测着他有意的冷落。他又改口用“姑娘们”，但我立刻就发现他这种逃避的小伎俩。我们用噪音和玩具不断侵扰他，但我们的爱成了他的重负。这是妈妈的想法。有一天，他没有回家来吃晚饭。妈妈一边看法国《世界报》一边等他，可是直到夜深他也没有回来同她做爱。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他也没出现。事实是，他现在人在哪儿？在抵抗运动里被杀了，妈妈说。关于这个问题，两周后，一张明信片告诉了她答案，而且每当大家谈及此事时，它也仍然在告诉我们：“过去五年我一直为法兰西而孤独。现在，我余生都一定会为你而孤独。”

“你被骗了，妈妈。”一天准备晚餐时我说道。

“被骗了？”她低声咕哝，“你比我说话还奇怪。你什么都不懂，那时候你都还没出生。你很清楚，抛开不幸，我要再找一个法国人——哦，约瑟芬，”她继续说道，差一点就要破音了，“哦，约瑟芬，对这个可悲的国家那些可恨的人来说，我是他们的笑料，一个真正的笑话。但是在那边，他们了解我。他们只会觉得我是按捺不住要去见他们。即使我的法语法法

很破，什么都不好，但我发誓我能写出莎士比亚的东西。”

我绝望地转过身，觉得自己很想哭。

“别笑，”她说，“总有一天我会乘着法国航空的飞机消失，和一个像你们爸爸一样英俊的卷发的法国人一起，让你们大吃一惊。哦，你该有多爱你的爸爸啊。一个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身边经常出现那样一个男人。你会感谢我的。”

“无论如何都谢谢你，亲爱的妈妈。”我回答，“但是，你把你的喜好留在心里就好。等我和莉兹姨妈一样大时，我可能会喜欢美国士兵，或者海军陆战队的大兵，我觉得。我已经挺喜欢一些军人了，尤其是布朗斯达下士。”

“那就是你心目中的男人吗？”妈妈问道，粗暴而不屑。

随后她重新考虑布朗斯达下士：“好吧，或许你是对的。那些看上去很有力量的长靴……非常有男子气概。”

“哦？”

“我知道，我知道。我像艺术家，有时候会同时抱有两种观点。我发现莉兹在和他约会，所以对他的看法会好一点儿。看看莉兹，你就能看见你爸爸曾经看见的女孩。就像我一样。完美的举止。美妙的肌肉线条。她可以拥有任何她想要的男人。”

“她已经有了她想要的那些男人。”

就在这时，外婆走了进来，这位“银行家”为我们存下了四点六五美金，非常自豪。“哟，真是太暖和了。”她满足地叹了口气，“好了，给你们。现在可以吃顿好饭了，玛尔维娜，我求你了，稍微努力点。乔西，快跑去拿个牛油果，还有，玛尔维娜，拜托用黄油的时候可别小气。还有亲爱的乔西，外面真是太暖和了，你妈妈不会介意的。你已经快成为年轻小姐了，想不想来一口冰啤酒？”

这不就是所谓的尊重吗？为了回应这种恭维，虽然很不喜欢嘶嘶作响的泡沫，我还是喝了半杯啤酒。我们烧烤、蒸煮、切片，将菜剁碎，真是完美的一餐。我负责做菜，妈妈负责调酱汁。我们用另一段更加美味的时光和令人垂涎的记忆赞美她，她心花怒放，结果她把某种酱汁给做多了。我们便用它来吃了椒盐饼干点心，还配了冰牛奶咖啡。在我洗盘子的时候，乔安娜坐在外婆腿上，把自己在夏令营里每天八小时的经历事无巨细地讲给她听，这个漂亮的姑娘是所有人心头肉。

“女人，”外婆赞许道，“一直以来都是我人生的全部快乐与安慰。从一开始我就疼爱所有仰着干净的面庞，竖着耳朵倾听的小女孩……”

“男人和女人大不相同。”乔安娜说，这是整个故事当中她说的唯一一件事情。

“确实，”外婆接道，“给我找麻烦的总是男人。男人和男孩……我大概不懂他们。但不断会想起，一个接一个，约翰逊、雷维尔、德拉蒙德……别忘了，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呢，还不是从我这里吗？可是他们所有人，所有所有所有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走了，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已经永远离开了。”

“啊，外婆，”我说，想要安慰她，“要知道他们的脾气可都差劲极了。我反正一点儿也不想念他们。”

外婆脸上的表情有些凄惨。“每个人的儿子都是这副德行，”她解释说，“先是发脾气，然后离开。”

这番对话之后，她在伤心难过中坐着。乔安娜蜷缩在脚边的坐垫旁，抱着它睡着了。妈妈从钢琴凳里拿出上周的《世界报》，看一篇报道让自己平心静气。事情讲的是一个普罗旺斯的农民强奸了自己的侄女，并且杀死了他的母亲，之后开开心心地过了三十八年，迈入受人敬重的老年，直到爱管闲事的警察局长把他抓捕归案。在我刷碗的时候，她把这则报道翻译成了我们缺乏独创性的母语。

夜晚悄然降临，我们之间的交流终于因为门铃响起而重新启动，这门铃声充满了积极的意味。是莉兹，她还带来了布朗斯达下士。我们派乔安娜出去买啤酒和软饮，舞会当即开始。他配合地同每个人都跳了舞。我飞快地溜回自己的房间，一丝不苟地在大大的嘴巴上涂上厚厚的口红，扣上像大眼白眼睛的胸罩，好让他明白我比乔安娜年纪大。他对我说：“你是蜜桃，你是奶油，总有一天你会出落成姑娘。你是仙境里的爱丽丝。”

“我已经是姑娘了，下士。”

“嗯哼。”他说着捏了一把我的左臂。

莉兹拿来潘趣酒，又拿出乐芝饼干，下士跟我跳舞的时候，她都在跟妈妈和乔安娜跳。她很乐意看见他如此受欢迎，忽然间她才意识到他是唯一在场的男士。夜晚抵达高潮时，他说：“你叫我布朗尼就行。”

之后我们又唱了空军的歌曲，一直玩到凌晨两点钟。外婆说，和她当年经历过的战争岁月相比，这些歌都没多少变化。“虽然士兵们更年轻了，”她说，“孩子，你看起来像是仍需妈妈操心的年纪。”

“没什么好为我担心的，我有的是机会。事实上我一直都在晋升。一直都是。”他说着冲莉兹眨了眨眼。“我挺好的……对了，”他又继续说道，“你们能不能收留我一下？我不介意打地铺。”

“打地铺？”妈妈劝说他，“你疯了吗？你可是共和国的士兵。我的上帝啊！我们有张小床。你知道的……一张行军床。把它支起来，美美地睡一觉，下士。”

“哦，上帝——”外婆打了个哈欠，“说到床——玛尔维娜，你爸爸现在应该已经到家了。我该回去了。”

布朗尼殷勤地决定送莉兹和外婆回家。等他回来的时候，妈妈和乔安娜已经用她们孤独的双臂相互搂抱陷入了梦乡。

我悄悄地看帘布后的他把自己从上到下擦拭干净，非常用力，完全不考虑皮肤。很快，他发着光的裸体整个钻进了床单。

我脱掉鞋子，踮着脚尖去了厨房。我给他倒了一杯冰啤酒，径直走到他面前，在他旁边坐下。“我这儿有美味的啤酒，布朗尼。走了那么久的路，我猜你可能热了。”

“哎呀，谢谢你，爱丽丝宫殿的布丁和馅饼，我正热得受不了了呢。你真贴心。”

他坐了起来，一口把啤酒喝下肚。我看着他，目光一直滑向他的肚脐眼。他把空杯子放在地板上，冲我咧嘴笑了。他开玩笑似的冲我脸上打了个嗝，于是我不得不说实话了。“哦，布朗尼，”我说道，“我好爱你。”我拦腰抱住他，将脸颊贴在他金色的胸毛上。

“嘿，布丁，放轻松。我也很喜欢你。你是个洋娃娃。”

随后我就直直地吻了他的嘴唇。

“约瑟芬，到底是谁教你这个的？”

“我自己教自己的。我用手腕练习，你看见没？”

“约瑟芬！”他又说道，“约瑟芬，你是个骗子。你就是个骗子！”

他的感情热烈起来。他也拥抱了我，吻了我的嘴唇。

“那么，”我开起玩笑，“又是谁教你的呢？莉兹！”

“闭嘴。”他说道，他越是爱我越是不允许交谈的发生。

我躺在他边上，真吃惊一个男人会因为感觉而这样变化。他爱我，这让我狂喜，为了向他表明我懂他的意思，我呢喃道：“布朗尼，你想要什么？布朗尼，你想要做那件事吗？”结果呢！他一下就从床上跳开了，拍着裹在肩膀上的床单哀叹。“哦，基督啊！”他说，“我会被捕的，我会被宪兵揪住，然后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看向我：“天啊，快点扣上你的衣服。你妈妈马上就醒了。”

“布朗尼，怎么了？”

“你还是个孩子，你只想着自己开心。你不明白吗？这种事情会毁掉我的人生。”

“可是，布朗尼……”

“我会有麻烦的！会被降级。你只是个小孩子。对你来说只是个玩笑。一个人可以和像你这样的小孩子结婚，但是把手放在你的肩膀上就是犯罪。可真是好笑啊，哈——哈——哈。”“哦，布朗尼，我真心愿意嫁给你。”

他坐在小床边，把我拉近他的膝盖。“哇，你可真是个好笑的孩子啊。你真有那么喜欢我吗？”

“我爱你。我会成为最好的妻子，布朗尼——你知道是我在照顾这个家吗？我妈妈根本不工作，她把所有时间都花在惦记爸爸上。我才是那个每天给乔安娜梳头的人。我给她熨裙子。我甚至可以为你生个孩子，布朗尼。我知道该怎么——”

“不！哦不。别让任何人有机会让你做这种事。在你十八岁之前都不行。你应当像个洋娃娃一样干干净净地待着，至少在十八岁之前都不能让人碰你。”

“布朗尼，你在军营里不会感到孤单吗？我的意思是，如果莉兹不在你身边，我不在你身边……你不觉得我身材很好吗？”

“哦，我猜……他笑起来，温柔地将手探进我的衣服里。“当然棒极了，何况还没有发育完呢。”我无法压抑自己的欲望，再一次径直吻上了他还在说话的双唇，撞上了他的牙齿。“哦，布朗尼，我会照顾你的。”

“好吧，好吧。他说着亲切地推开了我。“好吧，现在听我说，在生米煮成熟饭之前快去睡觉。去睡觉吧，你是个乖孩子。睡得饱饱的。你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有大呢。连我这样的男人也会感到惊讶。”

“但是我的想法已经很坚定了。”

“去睡觉吧，去睡觉吧。他说着，但仍旧握着我的手，轻轻拍打。“你现在看起来和莉兹差不多。”“哦，可我是不同的。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去睡觉吧，小姑娘。”他最后说了一遍。我拉过他的手，亲吻了每一个棕色的指尖，而后跑回自己的房间，脱掉所有衣服，和我孤独的灵魂一样赤裸，我睡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心情很好。整个周末妈妈都在巴黎之家咖啡馆做女招待，爸爸消失以后她就向那里的服务员学会了说法语。她很幸运，因为她真的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她为顾客、咖啡和咖啡馆里的装饰而疯狂，只有回家后才凄凄惨惨的。

十点钟，我把早餐拿到门廊上给她。乔安娜陪她去搭巴士。“给下士热点冷冻香肠。”她在不远处喊道。

我希望他已醒了，这样我们就能建立更深厚的爱情，但是，莉兹已经走进我们家下陷的门槛。“我过来给布朗尼弄点早餐。”她急匆匆地说。

“哦？”我天真地盯着她的眼睛，“我觉得这件事应该由我来做，莉兹姨妈，因为我们很可能要结婚了。你不觉得应该让我准备早餐吗？”

“什么？说慢点，约瑟芬。”

“你听见我说什么了，莉兹姨妈。”

她穿着紧身少女裙，猛地跌坐在楼梯上“连我都觉得自己年纪太小，还不到结婚的时候呢，圣诞节过后我都已经十七岁了。他真向你求婚了吗？”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说道，说的也都是实话。“我爱上他了，莉兹。”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哦，爱……我从你这么大到现在，已经爱过十二次了。”

“我不会这样的，我认定布朗尼了。我会去找份工作，等他服完兵役就送他去读大学……他很聪明。”

“哦，聪明……人都很聪明。”

“不，他们才不聪明呢。”

她离开后，我亲吻了布朗尼的两只眼睛，就像睡美人里的桥段一样。他伸了个懒腰，在熊熊燃烧的饥饿之火中醒了过来。

“早餐，早餐，早餐。”他咆哮着。

我喂饱了他，他说道：“哇哦，大家真得笑了，我竟然偷到人家摇篮里去了。”

“别这么觉得，我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都特别好，布朗尼。有很多比你年长的男人也都对我有兴趣。”

“哈——哈。”这是他的评论。

我让他不许这样笑，并且用一些亲吻让他清醒，我们拥有了一个愉快的早晨。

“布朗尼，”午餐的时候我说，“我打算告诉妈妈我们要结婚了。”

“她自己的麻烦难道还不够多吗？”

“不，不，”我说，“她心里只有爱情。她为爱疯狂。”

“好吧，再想想，小可爱。要知道，我可能会被送去某个危险的地方，被疯狂的当地人打翻在地。你每天都能读到这种事情。不管怎么说，暂时拥有一份真正的秘密婚约难道不是很有趣吗？怎么样？”

“我不觉得有意思。”我说，想起从莉兹那里听说的一切男人投机取巧的把戏。他们有时候会在表面上善意地奉献自我，睡觉，醒来，真真假假地过三十个日夜，只为了片刻的欢愉。“秘密婚约！也许有人会同意这种计划，但绝对不是我。”

很快我就知道他是喜欢我的，因为他走过桌子，摆弄了我在家里做的卷发一会儿，并向我低声说道：“他们一定会笑我，但我喜欢你。”

很快我又不确定他是否喜欢我，因为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问了那个问题：“莉兹到底在哪儿？”

我得去采购，用天真懵懂的样子同当地的商人周旋，这就是我周六最主要的工作。我一路都在小跑，采购并没有花多少时间，但是当我嘎吱嘎吱上楼梯进到客厅时，我听到了某段对话的重要尾声。布朗尼正在说：“这都是你的错，莉兹。”

“我不应该那么大意的。”她说，“我猜和小孩子胡闹让你得到了某些乐趣吧。”

“哦不是的，你根本不明白……”

“我没办法说我想要明白。”

“该死的，”布朗尼说道，“你根本不听别人说什么。我觉得你太糟糕了。”

“真的吗？”她转身打算离开，一把将纱门打开，迎面看到我，她紫色舞鞋的鞋跟踩在了我的脚背上。

“告诉你妈妈我们会的。”布朗尼看到我后，提高了声音，“她太糟糕了，那个莉兹，该死的。今晚就告诉你妈妈。”

在这个时间过得飞快的午后，我尽我所能让布朗尼更加友善。我坐在他腿上，他则喝着啤酒挠我痒痒。我哈哈大笑。很快我就懂了这游戏怎么玩，最好还要有花样，于是我尖叫着从他身上跑开，再让他在一个舒适的地方捉住我，要么是起居室的沙发，要么就是我的卧室。

“你很不错。”他说，“真的。我为你疯狂，约瑟芬。你实在太有趣了。”

所以那天晚上的九点一刻，当妈妈回到家时，我给她做了冰茶，把她堵在厨房里，锁上了门。

“我想和你说点事儿，是关于我和布朗斯达下士的。先别说话，妈妈。我们要结婚了。”

“什么？”她开口道，“结婚？”她尖叫起来。“你疯了吗？你没有雇佣证书，不能找工作。你这个年纪连雇佣证书都拿不到。你还是个孩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你是我的小鱼儿。你还不到十四岁啊。”

“是这样，我已经决定了，我们可以等到下个月，那时候我就十四岁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不可以，我的上帝啊！没人十四岁就结婚，没人，没人这么干。这样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哦，妈妈，有人十四岁就结婚的，你在报纸上经常看见。最糟糕的情况也不过就是会上报而已。”

“可我不知道你跟他有这么多交往。他不是莉兹的男友吗？那可不好，从她那里把他抢走。这可是非常卑鄙的阴谋诡计。你是个小偷。女人应当相互支持。你从来都没学过这些吗？”

“她根本不想结婚，可是我想。而且对布朗尼来说，结婚是很必要的。他是个生活严谨的男孩，休假结束以后，他不想回到军营跟随军工作的妇女和别人的老婆们混。你得欣赏他这一点，妈妈——这是一种美好的品质。”

“你还是个孩子。”她瓮声瓮气地说，“你是我滑溜溜的小鱼儿。”

布朗尼提前十分钟打开了厨房的球型门把手。

“哦，进来吧。”我说道，有些犯恶心。

“怎么样了？都解决了吗？你怎么说，玛尔维娜？”

“我说去他的吧，下士！莉兹有什么不好？你俩在一起郎才女貌。你们看上去就像是夏日夜空里的双子星。现在我才明白，我没那么喜欢你的长相。你的父母是谁？我都没怎么听你提起他们。我只知道你在阿尔卡特拉斯岛有个叔叔。你的牙齿长得很难看。我还以为军队肯定是很在意这方面的。你在我看来可没那么有魅力。”

“没必要人身攻击，玛尔维娜。”

“可她还是个孩子。万一她怀孕了呢，把身体全都弄坏了呢？这里可不是印度。你有没有读到过，那些印度幼女新娘的体内都发生了什么？”

“哦，他很温柔，妈妈。”

“什么？”她说道，理解成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这场讨论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们喝了一整壶覆盆子冲泡饮料，第二天是乔安娜的十二岁生日，饮料是为此准备的。我们都没钱，也找不到外婆。

过了一会儿，莉兹出现了，恰好是在午夜之前。她身旁陪着个中尉，她说他叫西德，并介绍给了大家认识。不过莉兹并没有将他介绍给布朗尼，因为她一再表示，军官和士兵不应当混在一起。这位中尉握住妈妈的手问候时，我看得出他很震惊。很显然他开始出汗了，汗水顺着后背流出长痕，也在他华达呢制的夏日制服里的腋窝中聚积。妈妈正处在愠怒之中，意兴阑珊，这的确会使某些男人慌乱。她正小心翼翼地思考着我固执的决定，以及我的人生中怎会有如此刺激的源头。

“我是属于法国的。”她对他低声说，“在巴黎、马赛那样的地方，男人喜欢女人，他们不会追求小姑娘。”

“我对这种法国气质很有同感，我确实喜欢真正的女人。”他期待地说。

“光是有同感还不够她的嗓音提高到符合她天生性情的程度我需要的是共情。这些年来，我都不曾感受过来自真正朋友的这种共情。”

“哦是的，我也能够感受到那种共情。”他完全陷入了自己的心理活动，说出的话别人几乎听不到……“我喜欢有些生活阅历的女人，孕育过孩子，感受过分娩的疼痛，了解心爱之人死亡的滋味……”

“……还了解爱情。”她悲伤地补充道，“一个英俊的年轻男人能有这种想法真是不寻常。”

“这不过是自己的特殊偏好。”

莉兹、布朗尼和我向他借了一美元，在他坐在那里还陷在岁月静好般的恍惚中时，我们溜达出去买冰淇淋。我们带上了乔安娜，以表达喝水她生日派对饮料的歉意。当我们带着一瓶黑莓苏打回来时，没看到一个人“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个拉皮条的。”莉兹说。

就这样，妈妈最终点了点头。她的道德败坏转变得如此之快，甚至给我们钱去测梅毒。她给希尔马医生打了电话，告诉他用针的时候温柔一点。“那可是我的小姑娘，医生。是你亲手从我身体里接生出来的小乔西。她实在是太任性了。哦，医生，还记得我和查尔斯吗？她是个粗鲁的小顾客，就像我一样。”

鉴于检测结果，我们无法结婚，这是法律规定，虽然布朗尼不信。外婆基于年龄优势总

是一副哲学家的样子，她说那些放荡不羁到处播种的年轻男子大多都会迅速抽身，而现代科学则迅速让女性团结。哈——哈——哈，我以大笑回应了她。

妈妈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在她那里迅速过去了，因为她自己的生活里有很多大事要处理。当被懊悔及盘尼西林浸透的布朗尼启程回军营时，她给了他一大罐酸味糖球和一罐核桃朗姆口味的烟草。

而后她就一心忙着自己的事情去了。妈妈没有经历我和布朗尼之间的幻想破灭，她和陆军中尉结婚了。我们都很满意，所有人都是，虽然大家都知道她一直都没有和爸爸离婚。结婚证书上与她并排的名字是小西德尼·拉瓦列，美国海军陆战队陆军中尉。更早的、头发更卷的那一代拉瓦列家人是从魁北克来到密歇根的，西德尼可以很熟练地运用妈妈最喜爱的那门语言。

我收到了来自布朗尼的一张卡片。卡片上是密苏里州乔普林城的鸟瞰图。上面写着：“嗨，孩子，振作起来，爱你的布朗尼。P.S. 身体好多了。”

生活在泄气的岔道上，我很乐于听到隔壁房间里持续不断的欢声笑语。我很享受和布朗尼身体相拥，但要说我更想要他，而不是更希望得到普通人的成功，那我自己也不相信。乔安娜搬到了我的房间。虽然她能一直磨牙到天亮，可我还是很感激她的陪伴。因为我已经订过婚了，所以她特别尊重我。她才是真正可爱的女孩子。



格蕾丝·佩雷

格蕾丝·佩雷（1922–2007），美国短篇小说家、诗人和社会运动家。她的短篇小说主要描写日常冲突和城市生活中的心碎故事，带有她在纽约布兰克斯区成长的痕迹。199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选》入围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决选。佩雷也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和反战社会活动家。

译者：姚瑶

写作作者、译者、摄影师。

《一个女人，年轻而衰老》（“A Woman, Young and Old”）选自格蕾丝·佩雷短篇小说集《最后一刻的巨变》（浦睿文化 / 湖南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本文由浦睿文化授权刊登。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Jon Tyson on Unsplash](#)

小说 时震 库尔特·冯内古特 | 发现经典

“你不会相信人类会如此友好，
你也不会相信人类会这般刻薄。”

01

就叫我“小的”吧，我那六个已经成人的孩子都是这样招呼我的。他们中有三个是我收养的外甥，另外三个是我亲生的。他们背后叫我“小的”，还以为我不知道。我在演讲中提到过，艺术家们那勉强称作使命的东西，就是让人们对活着还能感到那么一丁点儿庆幸。随后我被问及是否知道些不负使命的艺术家。我答道：“甲壳虫乐队。”

在我看来，地球进化的最高等生物会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件尴尬的事儿，或者更糟。先不提那些理想主义者被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极端的例子，我生命中的两位重要女性——我母亲和我唯一的姐姐爱丽丝，你也可以叫她爱丽——现在都已不在人世。她们都憎恨生活，嘴上也是这样说的。爱丽会大声嚷道：“我不活了！我不活了！”马克·吐温是他那个时代最幽默的美国人，像我这样年过古稀时，他发现生活对于他和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个负担。于是他写了这样的话：“自我成年以来，我从未期待过任何一位已得解脱的朋友重获新生。”他女儿简突然离世几天前，他曾将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中。在这些他不愿复活的人里，还包括他的另一个女儿苏西，他深爱的妻子，以及他的挚友亨利·罗杰斯。

马克·吐温并未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却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那般沉重。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感叹生活如此不幸，“哀恸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亨利·大卫·梭罗说过一句名言，“多数人在平静而绝望中生活。”

于是，我们污染了水、空气和表层土。在工业和军事上，我们创造出有史以来最诡诈的世界末日装置，这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了。让我们说出心声吧，对于几乎所有人而言，世界末日真是来得太慢了。

我的父亲老库尔特，是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名建筑师。他得了癌症，而他的妻子大约 15 年前就自杀了。他在老家闯红灯被拘留，结果发现他这 20 年竟然都是无证驾驶！

◆ ◆ ◆

你知道他跟拘留他的警察说什么吗？“枪毙我得了。”他说。

美国黑人爵士钢琴家胖子沃勒，在他的演奏达到狂热巅峰的状态时，他经常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句话——“趁我快活时，给我来一枪！”

枪支这玩意儿使用起来像打火机一样容易，跟面包机一样廉价。它能够满足任何人谋杀的幻想，谋杀父亲、胖子沃勒、亚伯拉罕·林肯、约翰·列侬，或者是谋杀马丁·路德·金，甚至是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它足以向世人证明一点，用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的话说，“生活就是一摊屎”。

02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大学以理智的名义抛弃了橄榄球，再将闲置下来的运动场变成一间炸弹制造厂。这可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反倒有几分基尔戈·特劳特的影子。

我指的是我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早在我就读这所大学之前，也就是在 1942 年 12 月，科学家们在斯塔格球场的看台下面，首次完成了人工核裂变的链式反应，其目的是证实原子弹的可行性。那时我们与德国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

53 年后，即 1995 年 8 月 6 日，人们聚集在我母校的附属教堂里，纪念原子弹首次在日本广岛市爆炸 50 周年。我当时也在那儿。

物理学家利奥·塞伦是发言人之一。很久之前，在死气沉沉的运动场上，他参与了首次成功的核实验。但请记住这一点：他为自己当时的行为深感歉意！

我们应该告诉他，在这个连最聪明的动物都觉得生不如死的星球上，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便意味着你永远不必说抱歉。

现在再试想一下，有个人为刚愎自用的苏联制造出了能成功引爆的氢弹，这个人后来还被授予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位真实存在的人物便是已故的物理学家安德雷·萨哈罗夫，他值得成为基尔戈·特劳特笔下的某位主角。

因为他呼吁终止核武器试验，从而在 1975 年获得诺贝尔奖。当然，他已经进行过核试验了。他的妻子还是一名儿科医生！什么样的人能在改进氢弹的同时，跟一名儿童保育专家结了婚？什么样的医生会和一名神经失常的人成为配偶？

“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了吗，亲爱的？”

“是的，我的炸弹破坏力会很大。你那位长水痘的孩子情况怎么样？”

安德雷·萨哈罗夫在 1975 年被称为圣人，但现在“冷战”已经结束，他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他成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呼吁终止发展和试验核武器，提倡给人民真正的自由，后来他被逐出苏联科学院。他被迫离开莫斯科，被流放到永久冻土上一个荒僻的小镇。

苏联当局也不准他前往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便由他那位作为儿科医生的妻子，叶连娜·邦纳代为领奖。但我们现在是时候探讨一下：不管一个人是为了哪个地方的哪个政府，只要他参与了研制氢弹的过程，那么她，或任何儿科医生，或者医务人员不是比那个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

人权？有什么会比氢弹更加漠视所有生命形式的权利？

1987 年 6 月，萨哈罗夫被纽约城市大学史泰登岛学院授予了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次苏联政府也不许他亲自到场，所以，我应邀代他接受这一头衔。

我要做的就是帮他捎个口信。“不要放弃核能。”我像个机器人似的复述道。

我可是极其恭谦有礼！但当时离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才过去一年，那可是这个疯狂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核灾难。这场核泄漏事故会让北欧所有的孩子生病甚至死亡，而且它的这一影响能长达数年。儿科医生可以大展拳脚了！

比起萨哈罗夫那荒诞可笑的讲道词，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消防员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的行为倒更能鼓舞我。我曾经在斯克内克塔迪市工作过，市里的消防员寄了一封信给北欧的同行兄弟，赞扬他们在抢救生命财产时无私无畏的英雄壮举。消防员万岁！

有些人在平时不过是世间的渣滓，但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能变成圣人。

消防员万岁！

03

基尔戈·特劳特在《时震一》中讲述了一个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因为时震，他不得不再次把它写出来。别忘了时震让时光倒流到十年前，因此你、我、他，我们所有人都被迫把从 1991 年 2 月 17 日至 2001 年 2 月 13 日做的所有事情再重複一遍。

特劳特不介意把它重新再写一次。不管历史是否要重来，他活着便是用圆珠笔在黄色便笺簿上手不停毫，只要胡写一通便能把那篇狗屁文章弄出来。

他为这个故事取名为《这不好笑》。但在其他人阅读这个故事之前，他便将它丢弃了。然后一切重新来过，他还得再扔一次。《时震一》的结尾处，在 2001 年夏天的海滨野餐会上，即自由即将再次消亡的时候。特劳特提及那些被他丢弃的故事原稿，他把它们撕成碎片然后从马桶冲走，扔到垃圾堆里，或是采用其他诸如此类的方法。他说道：“它们来得容易去得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月，太平洋的巴那鲁鲁岛上开展了一场针对美国轰炸机“乔伊的骄傲”上所有机组人员的绝密军事审判，《这不好笑》这个名字源自那场审判中某个法官所说的话。

名为“乔伊的骄傲”的轰炸机自然没有过错，它待在巴那鲁鲁岛上的一个飞机棚里。它的名字是为了致敬飞行员的母亲乔伊·彼得森，她在得克萨斯州的科帕斯克里斯蒂市的一家医院当产科护士。“骄傲”一词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自尊自爱，其二是表示狮群的意思。

事情是这样的：我军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接着在长崎掷下第二颗。按照指令，“乔伊的骄傲”接着要在拥有两百万“黄色矮杂种”的横滨投下第三颗原子弹。在那场战争之前我们就把那些黄皮肤的小杂种称为“黄色矮杂种”。按特劳特所述，第三颗原子弹是一个“似中等规模初级中学地下室锅炉般大小的紫色混账东西”。

对于轰炸机的弹舱而言，它实在太大了，所以只能把它吊在机身下面。当“乔伊的骄傲”飞向广阔的蓝天时，它与机场跑道的距离只有一英尺。

轰炸机靠近目标时，飞行员在对讲机里若有所思地高声说，等他们完成了这项任务回归故里，他那位当产科护士的母亲可就成名了。轰炸机“埃诺拉的欢乐”的名字也是为了致敬一个女人，它在广岛投下原子弹后，那个女人变得像电影明星一样有名。而横滨的人口数量是广岛和长崎的人口总数的两倍。

飞行员再三斟酌后越发确信，他那位温柔的寡母永远不可能对记者说——自己儿子的飞机一次性炸死了创纪录的平民人数，为此她感到十分欢喜。

特劳特写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的姑妈，已逝的爱玛·冯内古特，她曾说自己讨厌中国人。她那位已逝的女婿科夫特·斯图亚特，生前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经营一家名为斯图亚特的书店。他劝告她，同时憎恨那么多人未免有些不道德。无所谓。

反正“乔伊的骄傲”上的机组人员用对讲机告诉飞行员，他们也有相同的感觉。他们孤零零地在高空飞行，甚至不需要战斗机掩护，因为日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空中力量。除了一些文字工作外，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在“埃诺拉的欢乐”把广岛烧成灰之前，形势显然已然尘埃落定。

摘引一段基尔戈·特劳特的原话：“这不再算是一场战争，而摧毁长崎也不是因为形势所迫。为了一句‘幸亏有美国佬为这件事画上圆满的句号！’，不过是显摆一番罢了。”

特劳特在《这不好笑》中提到，那位飞行员和他的投弹手在之前的任务中觉得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如“神”一般，当时他们不过是往地面的人投掷燃烧弹和传统的高爆炸药。“但这个‘神’只是‘小神’，”他写道，“他们把自己定义为复仇而歼灭敌人的‘小神’。”但现在他们孤零零地在高空飞行，机身下还吊着那枚紫色的混账东西。他们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上帝本人，而上帝还拥有一个他们之前不曾考虑过的选择——慈悲。

特劳特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作为飞行员参战，他也没去太平洋地区。他曾任欧洲战场上陆军野战炮兵部队的先遣侦察员，是一个随身携带望远镜和报话机的中尉。他一般随步兵部队一起行军，甚至有时会走在他们的前面。他负责将榴霰弹、白磷或其他弹药的最佳落点告诉后方的炮兵部队。

据他本人说，他本身不是一个慈悲心肠的人，也从不觉得自己应该心软。2001年，在作家休养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我问他在场战争中做了些什么，这场被他称为“文明社会第二次自杀未遂”的战争。

他毫无悔意地说：“在战火纷飞中，我把德国兵在被炸开的地面和爆裂的天空间做了三明治。”

高空中，飞行员驾驶着“乔伊的骄傲”掉头返回巴那鲁鲁岛，机身下仍旧悬挂着那枚紫色的混账东西。“他没完成任务便返航了，”特劳特写道，“因为他母亲肯定也希望他这么做。”

在之后的绝密军事法庭上，所有人一度笑得前仰后合。为此法官重重地敲击木槌，他声称正在接受审判的这些人，其所作所为“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检察官在描述空军基地人员的行为时引起了哄堂大笑，按他所言，当“乔伊的骄傲”吊着那枚离地面只有一英尺的紫色混账东西准备着陆时，基地的工作人员纷纷跳窗逃生，都被吓得尿湿了裤裆。

“那儿像是有不同的车辆撞在了一起。”基尔戈·特劳特写道。

但是法官刚刚恢复了法庭秩序，太平洋板块上就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巴那鲁鲁岛、军事法庭、“乔伊的骄傲”，以及那颗未用掉的原子弹等东西瞬间被吞没了。

04

君特·格拉斯是德国杰出的小说家和画家，在知道我生于1922年时对我说：“很难在欧洲遇到一个跟你一般年纪而且还活着的男人了。”我和基尔戈·特劳特参战时，他与埃利·韦瑟尔、杰西·科辛斯基和米洛斯·福尔曼等人还是孩子。作为一名在这边出生的某个中产阶级大家庭里的白种人，即使这个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但我还是比在那边出生的他们要幸运得多，毕竟我的房间里堆满了书籍和图画。这个夏天我参加了诗人罗伯特·普斯基举办的朗诵会。在朗诵会上，他说教般地道了歉，因为他觉得自己拥有一个比普通人要美好得多的人生。我也该这么做。不过在今年的五月，我利用在巴特勒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机会感谢了自己的出生地。我说：“假若我重生了，我还是会选择再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里出生，再次在离这儿约十个街区的北伊利诺大街4365号度过我的童年，再次就读那所城市公立学校。”

“我依旧会在巴特勒大学的暑期学校里选修细菌学和经济学。”

“只要你们肯留心，你们能和我一样在那儿探寻西方文明中最好和最坏的部分：那里有音乐、金融、政治、建筑、法律、雕塑、绘画、历史、医学、体育和各种科学知识，还有书籍、书籍、书籍，以及教师和行为榜样。”

“你不会相信人类会如此聪明，你也不会相信人类会这般愚昧。你不会相信人类会如此友好，你也不会相信人类会这般刻薄。”

我也劝告别人。我说：“我的叔叔亚历克斯·冯内古特教会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住在北宾夕法尼亚大街5033号，是一位保险推销员。他告诉我当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的时候，我们务必要注意它。”

“他不是指那种取得胜利的伟大时刻，而是那些最普通的时刻：或许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当你在树荫下喝柠檬水；又或是当你闻到了附近面包房里传出的香味；也许是当你悠然自得地垂钓时并不在乎是否能钓到鱼；又或是当你听到隔壁房里有人在独奏优美的钢琴曲时。”

“亚历克斯叔叔劝告我在顿悟时一定要高声喊出来：‘生活如此美妙，夫复何求？’我在另一方面也很走运：我33岁前，在报纸书刊上写短故事是美国的一项主要产业。尽管那时我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做了一个很划算的买卖，即从通用电器公司辞职，放弃了有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宣传员的工作。而我只要不断卖小说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科利尔》等周刊，便能挣到更多的钱。这些周刊上满是广告，但每期都会刊登五个短篇故事，以及一部扣人心弦的连载故事。

在愿意购买我劳动成果的买家中，这几个周刊出价最高。另外还有许多期刊杂志在寻求科幻小说，整个小说市场就像一部弹球机。当我把一篇小说邮寄给自己的代理商时，我非常确定哪怕它可能会被人一次又一次地退回来，但终究会有人愿意花小钱买下它。

但我们家刚从纽约的斯克内克塔迪搬到科德角，电视机的出现使我无法再靠玩短

篇小说弹球机来谋生，毕竟电视比期刊杂志更受广告商的青睐。

我开始为一家工业广告代理商工作，不断往返于科德角和波士顿之间。然后我成了一名萨博汽车的经销商，之后我又在一一所为纨绔子弟开办的私立学校里教中学英语。

马克·冯内古特医生是我的儿子，他曾将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快发疯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不错的书，后来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这个夏天，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市举办了一场个人水彩画展。一个记者问他，成长过程中有一个著名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感觉？

马克回答道：“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父亲只是一个无法在科德角专科学校里任职的汽车销售员而已。”

05

我偶尔还是会构思一些短篇小说，仿佛还能从中赚到稿费似的。这也算是旧习难改。人们过去还能通过写作获得一时的名望。文人之间也曾热衷于谈论某部小说，其创作者可能是雷·布雷德伯里，或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约翰·契弗、约翰·考利尔、约翰·奥哈拉、谢莉·杰克逊、弗莱纳里·奥康纳……或者出现在近期期刊杂志上的任何短篇小说。

可一切已时过境迁。

如今，我会先粗略地将短篇小说的构思写下来，再把它们落到基尔戈·特劳特的名字下，放进一本小说里。这儿有一篇从《时震一》的遗骸上胡乱劈下来的名为《B-36姐妹》的小说，它的开头写道：“巨蟹星云里有一个母系星球名为布布星，那儿有以B-36为姓氏的三姐妹。她们的姓氏与地球上某种飞机的姓氏一样——一种专门用来向某个腐败政府领导的平民投掷炸弹的飞机。这肯定只是一个巧合，毕竟地球和布布星相隔甚远，互相之间不可能有交流。”

另外还有一个巧合：布布星人的书面文字类似于地球上的英语，包含了由26个水平排列而成的特殊音符，以及10个数字和8个左右的标点符号。

在特劳特的故事中，三姐妹都长得很漂亮，但其中只有两位姐妹颇受欢迎，她俩一个是画家，一个是短篇小说家。没有人喜欢另一个作为科学家的妹妹，她的话题永远都在热力学上，着实无趣得很。她十分嫉妒其他两个姐妹。所以她私底下有一个目标，她要让自己那两个搞文艺的姐妹体会一种“猫把死老鼠拖进家里的感觉”——这是特劳特最喜爱的表达方式。

依特劳特所言，布布星人是其所在的星系中适应能力最强的生物，因为他们有一颗杰出的大脑袋。什么该做，什么该感觉，这一切都靠大脑来做出规划。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

这一规划不依靠于外科手术或者电力，或是任何神经病学上的入侵。而是在社交中做出这一规划，只需要反复交谈就可以了。当小布布星人流露出恰当的情绪，做出符合理想的行为时，成年布布星人就会夸赞他们。作为回应，小孩子的大脑袋会产生电流，进而体会到文明的乐趣，然后自动规范自己的行为。

这似乎是一个好办法！打个比方，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最小的刺激也能让布布星人获得有益的刺激，例如由26个音符水平排列而成的特殊符号，以及10个数字8个左右的标点符号；又或是涂在边框平整表面上的颜料。

小布布星人在阅读时可能会被成年布布星人打扰，他们根据书本中的内容问他：“这是不是很糟糕？这个小女孩的可爱小狗刚刚被垃圾车轧死了。你是不是都快哭鼻子了？”如果是另一个类别的故事，成年人就会说：“这是不是很有趣？这个自负的阔老头踩到了柠檬皮，然后掉进了没有井盖的下水道口里。你是不是已经笑破肚皮了？”

在布布星球上，柠檬是一种类似香蕉的水果。

当小布布星人被带到美术馆里时，成年人可能会指着一幅画问他：“你觉得这张画上的那个女人是不是在假笑？会不会是她内心其实很难过，只是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你觉得她结婚了吗？她有没有孩子？她是不是个好妈妈？你认为她接下来要去哪儿？她想不想去那儿？”如果这幅画上有一碗水果，成年人或许会问道：“这些柠檬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嗯，真美味！”

这些关于布布星人教育孩子的例子可不是我乱编的，而是摘自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

大部分布布星人的脑袋都能产生电流，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集成电路片，地球人一般将其称为想象力。没错，正是因为大多数布布星人都具有想象力，所以两位身为短篇小说作家和画家的B-36姐妹才会有那么多爱慕者。

诚然，她们的坏妹妹也拥有想象力，但可惜那并不属于艺术鉴赏的领域，她既不爱阅读也不喜欢参观美术馆。童年时，她所有的空余时间都待在隔壁疯人院的花园里。人们相信花园的精神病人并没有恶意，所以她的这一行为被当作一件值得赞赏的慈善活动。不过那些疯子教她学会了热力学和微积分等。

坏妹妹长大成人后，和那些疯子一起精心设计出了电视摄像机、信号发射机和接收器。然后她从自己特别有钱的母亲那里借来资金，开始生产和推销这些邪恶的设备，想象力从而成了多余的存在。这些设备一上市便风靡全球，因为电视机上的节目非常招人喜欢，而且看电视也不需要动脑筋。

她赚了一大笔钱，但真正让她开心的是自己两个姐姐开始体会到了一种猫把死老鼠拖进家里的感觉。年轻的布布星人认为没必要再继续发挥想象力，反正他们只要打开开关就能看到各种花哨的垃圾节目。他们的目光再转向书本和图画时，只会好奇怎么会有人从这些单调乏味的事物中体会到快乐。

这位坏妹妹的名字叫柠檬。她父母在帮她取名时，也没有料想到她将来会变得这般不讨喜。连电视机都比她可爱得多！她还是跟过去一样不受欢迎，因为她还是那般无趣。于此她又发明了汽车、电脑、铁丝网、轰炸机、地雷、机枪等诸如此类的事物。她就是这般可恶。

毫无想象力的新一代布布星人也长大成人了。柠檬销售的那些狗屁东西成了他们

最能消磨时光的娱乐工具。有何不可呢？见鬼！

可是，失去了想象力，他们便无法像祖先一样从别人脸上阅读出某个有趣且感人的故事。因此，据基尔戈·特劳特所诉，“布布星人变成了他们星系中最残忍无情的生物”。



本文摘自《时震》，注释从略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刘勇军 译

九天译文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6月



库尔特·冯内古特

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猫的摇篮》《五号屠场》《冠军早餐》《时震》《囚鸟》等。他的作品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冯内古特的文学创作，不少灵感正是来自于在二战战俘营的经历。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从50年代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60年代起开始出版长篇。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湮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Bianca Fazacas on Unsplash](#)

非虚构 五号屠场

库尔特·冯内古特 | 发现经典

大屠杀以后一切都趋于无声，
永久沉默，只有鸟儿还在啼叫。

故事中的所有一切，或多或少都发生过。至少，关于战争的部分是相当真实的。我认识的一个家伙真的因为拿了一只不属于他的茶壶，在德累斯顿被枪决。另一个我认识的家伙真的威胁说战争结束后要雇杀手除掉他的仇人。如此等等。我只不过都没用真实姓名。

我也真的在 1967 年获得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真是天大的好事），重返德累斯顿。德累斯顿看上去很像俄亥俄州的戴顿，但比起戴顿，城市中有更多的空间。地下一定埋着数以吨计的人骨肥料。

与我同往的是一个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我们重访了夜间关押我们战俘的那个屠宰场，与带着我们前往的出租车司机交上了朋友。他的名字叫格哈特·米勒。他告诉我们他曾一度是美军的俘虏。我们问他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如何，他说开始非常糟糕，因为每个人不得不辛苦工作，因为当时住的、吃的、穿的都十分稀缺。但现在情况好多了，他有了舒适的小套间，女儿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的那场空袭中葬身火海，事情就是这样。

他在圣诞节给奥黑尔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这么写着：

“我祝愿你和你家人及你的朋友圣诞快乐新年好，还希望我们如果机会巧了，还能在一个和平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见。”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说法：“如果机会巧了。”

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这本倒霉的小书耗费了我多少钱和时间，带来了多少烦恼。二十三年前，当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到家中时，我本以为，写一些关于德累斯顿大毁灭的文字，对于我而言轻而易举，因为我只需报道我所目睹的一切即可。而且我还认为，由于主题如此重大，这将成为一部传世杰作，或者至少可以为我挣得可观的经济收益。但那时我头脑中挤不出多少关于德累斯顿的文字——无论如何不足以凑成一本书。直到今天，儿子们都已长大成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老家伙，沉湎于回忆旧事、打打门球，时过境迁，但我头脑中出现的文字仍然非常有限。我感到自己记忆中关于德累斯顿的部分全然于事无补，然而德累斯顿又极具诱惑，让我难以搁放。我想起了一首著名的五行幽默打油诗：

伊斯坦布尔有个小青年，
对着自己的家伙开了言：
“你毁掉了我的健康，
你花光了我的金钱，
现在还不尿，你这个老混蛋。”

我还想起了一首歌，是这样的：

我的名叫扬·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木材场里我工作。
遇到路人来打听，
“你叫什么名和姓？”
我答道，
“我的名叫扬·扬逊，
工作就在威斯康星……”

循环往复，永不止步。

这些年来我遇见的人常常问我在干些什么，我往往回答他们说主要的事情是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有一次，我就是这么对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说的，他扬起眉毛问道“是一本反战作品？”“是的，”我说，“我觉得是。”

“听到有人写反战作品，你知道我会怎么对他们说吗？”

“不知道。你究竟会怎么说，哈里森·斯塔尔？”

“我会说：‘你为什么不写一本反冰川作品呢？’”

当然，他的意思是，战争不可避免，试图阻止战争就像去阻挡冰川形成那样徒劳无功。这一点我也同意。而且，即使战争不像冰川那样应时而来，衰老和死亡仍然不可避免。

我还比较年轻，还在写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时，我问一个名叫伯纳德·维·奥黑尔的战时老伙伴，是不是可以去拜访他。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地方检察官。我成了一名作家，家住科德角。战争期间我们都是当兵的，是步兵侦察。那时我们从未指望战争结束后能挣到钱，但我俩都干得不错。

我通过贝尔电话公司的帮助找到了他。在这方面他们非常出色。有时候在深夜，我会得一种毛病，与酒精和电话有关。我喝醉酒，呼出的口气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体，将我的妻子熏走，然后对着电话用凝重而优雅的声音，请求接线员帮我与多年没有音讯的这个或那个朋友连线。

用这种方法我与奥黑尔通上了电话。他是个矮个子我个子很高，就像战争中的默特和杰夫。我俩在战争中一起被俘。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是谁。对此他毫不怀疑。他还没睡，在看书。屋子里其他人都已入睡。

“听我说，”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我想让你帮着回忆过去的事情。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过来见你，我们可以一起喝酒、聊天，谈谈往事。”

他热情不高，他说他记不起太多东西。但他还是跟我说让我过去。

“我觉得书的高潮将是处决可怜的老埃德加·德比，”我说，“真是巨大的讽刺。整座城市被大火烧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然后这个美国步兵却因在废墟中拿了一把茶壶而遭到逮捕。在对他进行了常规审判之后，他就被交给行刑队枪决了。”

“是啊。”奥黑尔说。

“你不认为全书的高潮应该在这里出现？”

“这方面我一窍不通，”他说，“那是你的行当，我是外行。”

作为干这种勾当——设计高潮和情节、塑造人物、编写精彩对话、安排悬念和冲突——的人，我已经多次为这个德累斯顿的故事规划过提纲。规划得最好的那个提纲，至少看上去是最漂亮的，写在一卷墙纸背后。

我使用女儿的彩色蜡笔，每个主要人物用一种颜色。墙纸的一头是故事的开始，另一头是结尾，然后是所有的中间部分，居于墙纸中间。蓝线遇到了红线，又遇到了黄线，然后黄线中断，因为黄线代表的人物死了。如此等等。德累斯顿大毁灭由一个橙色交叉线组成的垂直色带代表，所有还活着的彩色线都穿过这个色带，从另一端出来。所有线条都停止的终结点，是哈雷郊外易北河畔的一片甜菜地。天正下着雨。欧洲的战争两个星期前已经结束。我们排着队列，由俄国士兵看守着——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新西兰人、澳大利亚人，成千个列队等候的人马上将不再是战俘了。

甜菜地的另一侧站着成千个俄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由美国士兵看守着。战俘交换在雨中进行，一个对一个。我和奥黑尔同其他许多人一起爬上了一辆美国卡车的后部。奥黑尔没有带上任何纪念品，而其他每个人几乎都有些小玩意儿。我有一把纳粹德国空军检阅军刀，现在还保存着。在书中我称之为保罗·拉扎罗的坏脾气小个子美国人，带着大约一夸脱的钻石、翡翠、红宝石之类，这些东西是他从德累斯顿地窖的死人身上找来的。事情就是这样。

一个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掉了所有牙齿的英国白痴，把他的纪念品装在一个帆布包里。帆布包搁在我的鞋面上。他不时朝包里偷偷张望，转动着眼珠，扭动着细瘦的脖子，试图逮到任何企图偷看他包中之物的人。他提起包在我的鞋背上颤动。

我以为颤动是无意中发生的，但我错了。他必须找个人展示他的藏品，并认定我是个可信任之人。我俩眼神相遇时，他对我挤挤眼睛，把包打开。包里是一座埃菲尔铁塔的石膏模型，漆成金色，上面有一只钟。

“这里头可是个好东西。”他说。

我们坐飞机来到法国的一个整体营地，喝上了巧克力麦乳精，吃其他富有营养的食品，直到浑身填满了婴儿脂肪。接着我们被送回家。我与一位同样浑身填满婴儿脂肪的漂亮姑娘结了婚。

我们生了几个孩子。

他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变成了让人讨厌的老家伙，回忆旧事，打打门球。我的名叫

扬·扬逊，工作就在威斯康星，木材场里我工作。

有时在深夜，等我妻子上床睡觉后，我尝试打电话给我过去的女友。“接线员，不知你们是否可以替我找到某某太太的电话。我想她住在某某地方。”

“对不起，先生。名册上没有这个人。”

“谢谢，接线员。还是非常感谢。”

我有时放狗出去，有时让狗进来，我们说说话。我让它知道我喜欢它，它让我知道它喜欢我。它并不在意芥子气和玫瑰的混合气味。

“你很好，桑迪。”我会对狗说，“你是不是知道，桑迪？你很不错。”

有时我会打开收音机，收听波士顿或纽约的谈话节目。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受不了录制的音乐。

或迟或早我上床睡觉，妻子问我几点了。她总是要知道时间。有时候我不知道，就说，“你问我，我是谁？”

有时候我想起我所受过的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芝加哥大学待过一阵子。我是人类学系的学生。在那时，他们传授的思想是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今天他们也许仍然传授着同样的思想。

他们传授的另一个认识是，没有人是怪僻的、邪恶的或者可憎的。我父亲在去世前不久曾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从来没写过一篇里面有坏蛋的小说。”

我告诉他，那是战后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之一。

我一边学习当人类学的课业知识，一边在著名的芝加哥城市新闻署当警务记者，每周可得二十八美元的报酬。有一次他们将我的夜班换成日班，于是我一口气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得到城里所有报刊的资助，还有美联社和合众社等。我们的报道范围包括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和密歇根湖上巡航的海岸卫队等。我们通过铺排在芝加哥街道下面的压缩空气动力管道，与这些资助我们的机构取得联系。

记者通过电话将新闻故事口述给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刻写成油印蜡纸。油印后的新闻稿被塞入铜和丝绒做成的管状盒里，进入压缩空气推动的管道。最心狠手辣的记者和记录员都是女性，男人上战场后她们接管了工作。

我不得不通过电话将我负责报道的第一篇新闻稿口述给这群可恶的姑娘中的一个。写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了个工作，在一幢办公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的电梯门是由铁镶边构成的，铁制常春藤从孔眼中缠来绕去。一根铁枝条上停栖着一对铁制的情侣鸟。退伍兵决定将电梯厢开到地下室，关了门，开始下降，但他的结婚戒指勾住了门上的装饰。于是当电梯厢的地板开始下降，离开他的脚底时，他被悬在了空中，电梯厢顶部砸碎了他的脑壳。事情就是这样。

于是我就发了事件的电话稿，准备打蜡纸的女人向我提出了问题：“他的妻子怎么说？”

“她还不知道呢。”我说，“事故刚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要个说法。”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芬恩警长，你有不幸的消息要通知她。让她知道这件事，听听她怎么说。”

于是我照办了。她说了些你能想到的话。家中还有一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到办公室时，女打字员问我，说只是她自己想知道，那个被砸的人砸碎时是什么样子。我如实相告。

“这种事让你感到不安吗？”她说，口中嚼着“三个火枪手”牌糖果。

“见鬼，不，南茜。”我说，“在战争中我见过的场面比这糟糕得多。”

即便那时我仍琢磨着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在当时的美国，知道那场空袭的人并不多，没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它比广岛大爆炸更惨。我本人也不知道。公布的消息不多。

在一个鸡尾酒会上，我碰巧同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谈起我亲眼看到的空袭，以及我计划写的那本书。他是一个叫作“社会思潮委员会”的成员。他对我讲起关于集中营，还有德国人如何用犹太人尸体的油脂做肥皂和蜡烛诸如此类的事。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让每个人变得韧性十足。我成了纽约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的公关员，也成了我购买的第一套房子所在地阿尔普罗斯村的志愿消防队员。我的老板是我所能遇见的人中韧性最足的一个。他曾是巴尔的摩负责公关的中校。我在斯克内克塔迪的时候，他加入了荷兰改革派教会，一个绝对韧性十足的教会。

他曾几次不无嘲讽地问我为何当不了军官，就好像我犯过什么错误。

我和我妻子身上的婴儿脂肪消失了。那些年是我们干瘦的年代。我们的朋友中有很多干瘦的老兵和他们干瘦的妻子。我认为在斯克内克塔迪，最可爱的老兵，那些最善良、最滑稽、最憎恨战争的人，是那些真正上过战场的人。

那时我曾写信给空军，索要德累斯顿空袭的详细资料：谁下的命令？出动了多少架飞机？为什么要轰炸？取得了哪些预期的效果？如此等等。一个同我一样从事公关工作的男性给予了我回复。他说很抱歉，此类信息仍属绝密。

我把信大声读给妻子听，然后我说：“绝密？我的天哪——向谁保密？”

那时候我们是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的成员。现在我不再清楚自己属于哪类人。也许是电话使用者，我估计。我们打很多电话——不管怎样，至少我打，在深更半夜的时候。

在我给战时老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打电话两周以后，我真的动身前去与他见面。那应

该是1964年左右——反正前一年是纽约世贸会。唉，一年又一年。我的名叫扬·扬逊。伊斯坦布尔有个小青年。

我带了两个小女孩一同前往，我的女儿南妮和她最要好的朋友艾丽森·米勒。此前她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科德角。如果我们看见一条河，就得停下，这样她们可以站在河边，稍作思考。她们此前从未见过这么长、这么窄，又没有盐分的水体。这就是哈德逊河。河中有鲤鱼，我们能看见它们，大得就像核潜艇。

我们也观赏了瀑布，像无数溪流从悬崖跃入特拉瓦河谷。可以驻足观看的东西有许许多多——然后到了该上路的时候了，总是有该离开的时候。两个小女孩穿着社交聚会时穿的白色连衣裙和黑色皮鞋，陌生人一看就知道她们有多么可爱。“该上路了，姑娘们。”我说。然后我们离开。

夕阳西下，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晚饭，然后我敲响了伯纳德·维·奥黑尔家漂亮石头房子的前门。我手握一瓶爱尔兰威士忌，像提着通知就餐的手摇铃。

我遇见了他可爱的妻子玛丽，我的这本书就是题献给她的。我也将此书题献给德累斯顿的出租车司机格哈特·米勒。玛丽·奥黑尔是个受过职业训练的护士。当护士对于女人来说是个很好的职业选择。

玛丽非常喜爱我带来的两个女孩，让她们同自己的孩子一起在楼上玩游戏、看电视。只是在孩子们上楼以后，我才感觉到玛丽不喜欢我，或者说不喜欢那天晚上的某方面的事情。她彬彬有礼，但十分冷淡。

“你们这屋子真是可爱，很温馨。”我说。这不是奉承。

“我收拾了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去那边聊聊，免受干扰。”她说。

“好。”我说。我想象的是一间墙上有镶板的房间，壁炉旁放着两把皮椅，两个老兵可以坐着喝酒聊天。但她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她在白色瓷面厨房桌子旁放了两把直背椅子。头顶上是一盏二百瓦的灯泡，桌面的反射光直刺眼球。玛丽准备的是一间手术室。桌上只放了一只玻璃杯，是给我的。她解释说自战争以后奥黑尔不能喝高浓度酒。

于是我们坐下。奥黑尔有点尴尬，但他不告诉我问题出在何处。我无法想象是我哪方面的过失，使得玛丽如此大动肝火。我是个顾家的男人，没有离过婚，没有喝醉酒，在战争期间也没有对她的丈夫使过坏。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可口可乐，在不锈钢水槽上敲打制冰块的盘子，制造了不少噪声。然后她走到屋子的另一处，却不安静静地坐下。她满屋子走来走去，开门关门，甚至把家具拖来拖去，发泄愤怒。

我问奥黑尔，我说错做错了什么，使她有如此举动。

“没事，”他说，“不用担心。这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他出于好心，没说实话。事情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于是我们不理會玛丽，回忆战争中的事。我喝了两口自己带来的烈酒。我们有时谈笑风生，就好像战争中的故事正渐渐重现，但我俩谁也回忆不起任何有价值的片断。奥黑尔记得有个家伙灌饱了酒，我们在德累斯顿遭到空袭之前不得不用一辆独轮车把他送回家去。这类素材不足以写成一本书。我记起两个俄国兵抢了一家钟表厂，他们的大马车上装满了钟。他们酩酊大醉，兴高采烈，嘴里抽着用报纸卷的巨大烟卷。

能回想起的大致就是这些，而玛丽还在制造噪声。她最终又一次走进厨房，再倒一杯可乐，从冰箱里取出另一个冰格盘子。虽然冰格盘外已经有不少冰块了，她还是不停地在水槽上敲打。

接着她转身对着我，让我看清她有多么生气，让我知道她的怒气是冲我而来的。她自言自语在说些什么，因此我听到的只是整个对话中的一块残片。“那时候你们只不过是些不懂事的娃娃！”她说。

“什么？”我说。

“战争中你们只是些不懂事的娃娃——就像楼上的那些娃娃！”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这样的说法。战争中我们的确是些涉世未深的娃娃，正处于童年的末端。

“但你写的东西不会实话实说，对不对？”这不是一个问题。这分明是谴责。

“我……我不知道。”我说。

“但你可知，”她说，“你会假装你们不是些娃娃，而是男子汉，让弗兰克·辛纳特拉、约翰·韦恩或其他一些魅力十足的、好战的、有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在电影中表现你们的故事。战争看上去无比美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战争。送去当炮灰的是些娃娃，就像楼上的娃娃们。”

我终于明白了。是战争让她如此愤怒。她不想让自己的或任何别家的孩子到战场去送死。她认为书和电影起的作用是为战争推波助澜。

于是我举起右手向她做出保证。“玛丽，”我说，“我觉得这本书也许永远不会完稿。到现在为止我肯定都已经写过五千页了，但都已被扔掉。但如果真的完成了，我以名誉向你担保，书中不会出现弗兰克·辛纳特拉和约翰·韦恩的角色。”

“这么说吧，”我说，“我把书名叫做《童子军圣战》。”

自那以后，她成了我的朋友。

我和奥黑尔走进客厅，聊些别的话题。我们对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童子军圣战产生了好奇，于是拿出他的一本藏书查阅，是法学博士查尔斯·麦凯写的《特殊流行幻觉与集体疯狂》。这本书1841年在伦敦首次出版。

麦凯对所有圣战不怀好感。对他而言，与其他十次成年人的圣战相比，儿童十字军东征只不过略微更加卑鄙了一点。奥黑尔大声朗读了下面精彩的一段：

历史庄严的书页告诉我们，十字军圣战士只不过是些无知野蛮的人，其动机来源于绝对的偏执，其历程浸透着血泪。而另一方面，浪漫作品放大了他们的虔诚和英雄主义，用热情洋溢、慷慨

激昂的语气描述他们的美德和气度，赞颂他们为自己赢得的永久的荣耀，以及为基督教做出的巨大贡献。

奥黑尔接着往下读：

所有这些争斗的显赫结果是什么呢？欧洲以上百万的财富及二百万生命的鲜血为代价；一小撮好斗的骑士拥有了对巴勒斯坦一百年左右的控制权！

麦凯告诉我们，童子军圣战始于1213年。两个僧侣突发奇想，在德国和法国招募儿童，到北非再把他们当奴隶出售。三万娃娃志愿报名，以为将前往巴勒斯坦。显然他们是些大城市中到处可见的游手好闲的弃儿，生活困境使他们深陷罪恶，胆大无比，麦凯写道，他们无所顾忌。

教皇英诺森三世也以为他们将向巴勒斯坦进发，异常激动。“我们仍在昏睡，而这些孩子觉醒了！”他说。

大多数孩子是在马赛乘船离港的，其中大约一半人因航船失事葬身鱼腹。另一半人到达北非后被卖掉。

由于信息错误，有些孩子来到热那亚报到，但那边没有前来接他们的奴隶船。热那亚的好心人给他们提供吃住，亲切地询问事由——然后给了他们一点钱和很多忠告，送他们回家。“向热那亚的好心人致敬。”玛丽·奥黑尔说。

那天晚上我被安置在一间孩子的卧室过夜。奥黑尔给我床边放了一本书，是玛丽·恩德尔写的《德累斯顿：历史、剧院和艺术画廊》。书是1908年出版的，序言这样开始：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对您有所帮助。本书为英语读者提供一个整体图景：德累斯顿的建筑如何逐渐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德累斯顿的音乐上如何通过几个天才的出现发展至今天的繁荣；德累斯顿还有一些成为永恒艺术里程碑的珍品，它的许多画廊因此成为让人难忘的艺术胜地。

我继续读这座城市的历史：

1760年，德累斯顿处于普鲁士人的包围之下，7月15日炮轰开始。绘画艺术馆起火。许多馆藏绘画此前已经被转移到了哥尼斯坦，但还有一些被火炮弹片严重损坏——其中著名的一幅是弗兰西亚的《基督洗礼图》。此外，曾用于日夜监视敌军动静的雄伟的克鲁齐亚塔楼也被火焰吞噬，后来倒塌。与克鲁齐亚塔楼不幸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圣母院，普鲁士人的炮弹在它的石穹顶上像雨点一样被弹回。最后弗里德里希获知他新征服版图中的要塞格拉茨被攻陷的消息，不得不放弃围攻。“我们必须向西里西亚进发，不然我们将失去一切。”

德累斯顿遭遇的摧残难以估量。当还是个青年学子的歌德来到此地时，他眼前仍然满目疮痍：“从圣母院的穹顶，我看到横卧在美丽而井然有序的城市中间的这堆令人厌恶的瓦砾。恰在此时，教堂司事对我夸赞起建筑师的技艺，教堂和穹顶被建造得如此坚固夯实，早就为意料之外的轰炸做好了准备。随后，心地善良的司事又引我看了教堂四周的废墟，并忧心忡忡地附上一句：这都是敌人干的！”

第二天上午我和两个小姑娘渡过了乔治华盛顿曾经跨过的特拉瓦河我们来到纽约世贸会，通过福特汽车公司和华特·迪士尼的展示，了解过去的历史，又通过通用汽车公司的展示，看到将来的世界。

我向自己提出了关于今天的问题：今天有多宽，有多深，有多少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可以留存。

自那以后我在爱荷华大学著名的作家写作班任教，教了两年文学创作课。我卷入了一些绝对甜美的麻烦，又从中得以解脱。我下午去写作班上课，上午写作。我不让任何人打扰。我伏案笔耕的是我那本关于德累斯顿的名作。

正是在爱荷华大学的日子，一个名叫西摩·劳伦斯的大好人向我提供了一个三本书的出版合同，我说：“好的，三本中的第一本将是那本著名的关于德累斯顿的书。”

西摩·劳伦斯的朋友叫他“山姆”。我现在可以对他说：“山姆——书稿给你。”

书不长，杂乱无章，胡言乱语，山姆，因为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可以说每个人都已经死了永远不再说任何话，不再需要任何东西。大屠杀以后一切都趋于无声，永久沉默，只有鸟儿还在啼叫。

那么鸟儿在说些什么？关于大屠杀所有能说的也只是“叽一唱一叽”？

我告诉我的儿子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与大屠杀，即便是对敌人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也不应该给他们带来满足和欣喜。

我还告诉他们不要去那些制造屠杀武器的公司工作，对那些认为我们需要那类武器的人，我们要表示鄙视。

我说过我最近与朋友奥黑尔一起故地重游，再访德累斯顿。我们去了汉堡、西柏林、东柏林、维也纳、萨尔茨堡和赫尔辛基，也去了列宁格勒，一路笑声不断。此行对我帮助很大，因为我看到了许多可供我以后创作虚构故事的真实背景，这些作品之一是《俄罗斯巴洛克》，另一篇是《不准接吻》，另一篇是《一美元酒吧》，另一篇是《如果机会巧了》，如此等等。如此等等。

汉莎航空公司有一航班从费城飞往波士顿，再到法兰克福。原计划是奥黑尔在费城登机，我从波士顿出发，一同前往。但波士顿机场因大雾关闭，于是航班从费城直飞法兰克福。在波士顿的大雾中，我成了个多余的人。汉莎公司将我同其他一些多余的人送上一辆大型轿车，送到一家旅馆度过多余的一天。

时间不愿朝前走。有人在玩弄计时器，不光是电子钟表，也包括使用发条的那些。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要等上一年，才会再次颤动一下。

对此我无能为力。作为地球仔，我只能相信钟表上——还有日历上显示的时间。

我随身带了两本书，打算在飞机上阅读。其中之一是西奥多·罗特克的《给风的话》，在书中我读到了这样的词句：

我醒来又入睡，把苏醒放慢。

我感觉命运，不会惊恐。

我行必行之路，学习人生。

我带的另一本书是伊丽加·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塞兰尼和他的幻觉》。塞兰尼是一战中一名勇敢的法国士兵——直到他的头颅被打裂。自那以后，他无法入眠，脑中不断有噪声轰响。他成了一名医生，白天给穷人看病，夜晚写怪诞故事。“没有经历与死亡共舞，就不可能产生艺术。”他写道。

真理就是死亡，他写道。我尽我所能与它长期巧妙周旋……与它共舞，为它装饰花彩，伴它优雅地四处飘荡……为它披上彩带，让它兴高采烈……

时间使他着迷。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引导着我走入了《分期支付死亡》中的奇妙场景，在其中，塞兰尼试图让街上忙忙碌碌的一群人停止不动。他在小说书页中喊道：让他们停下……别让他们移动一步……就这样，让他们凝固……永远永远！……这样他们才不再会消失！

我在旅馆房间里翻阅基甸国际赠送的《圣经》，在其中寻找大毁灭的故事。当罗德进入琐珥时，太阳已在地球上升起，我读着。然后，主从天外之主那里引来硫黄与火，降落在所多玛和蛾摩拉；他摧毁这两座城市，所有的平原，所有城中的居民，以及一切地面的生物。

事情就是这样。

两座城里住的都是坏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没有他们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当然，罗德的妻子被告知不能回首观看她的同胞和家园所在之处，但她还是回首了。我很欣赏她的举动，因为那是人之常情。

她变成了一根盐柱。事情就是这样。

人们不应回首往事。我当然不再如此。

现在这本关于战争的书我已完稿。接下来我要写一本好玩的书。

这是一部失败之作，非如此不可，因为它是由盐柱写下的。书是这样开头的：

听我说：

比利·皮尔格林从时间链上脱开了。

书是这样结尾的：

叽一唱一叽？



本文摘自《五号屠场》，注释从略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虞建华译

读客文化 |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7月

库尔特·冯内古特

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猫的摇篮》《五号屠场》《冠军早餐》《时震》《囚鸟》等。他的作品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冯内古特的文学创作，不少灵感正是来自于在二战战俘营的经历。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从50年代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60年代起开始出版长篇。



发现经典

这里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Lisha Riabinina on Unsplash](#)

非虚构 答案在风中飘荡

李明洁 | 非虚构图书馆

要经历多少死亡，才明白生命逝去已太多啊？

要有多少耳朵，才能听见民众哭嚎？

要经历多少死亡，才明白生命逝去太多？

朋友啊！答案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鲍勃·迪伦

《答案在风中飘荡》，1962 年

鲍勃·迪伦 (Bob Dylan) 1962 年首唱《答案在风中飘荡》(Blowing in the wind)，在纽约的民间音乐季刊《唱出来！》(Sing Out!) 上谈创作体会，“除了说答案还在风中飘，这首歌我没有太多可说的，书中、电影里、电视上、讨论组里都没有答案。哥们，答案在风中，在风中飘着呢。髦得合时的那帮家伙们要告诉我答案在哪里，去，我才不信呢。我还是说答案在风中，就像一张吹得停不下来的纸片，是会落下来……但唯一的问题是，当答案落下来的时候，人们任凭它飘走，没人去捡起来，……也就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到可以知道。我还是要说，罪大恶极的是那些看到错误并明知道自己错了的人转过头去佯装不知。我只有 21 岁，已经看过太多战争……你们这帮人早过了 21 岁，该更老练更有数了吧。”我不知道当年的迪伦是不是在故意耍酷，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60 年了，中国人说的一个甲子轮回的劫波都已渡过，而纽约人只怕是越来越没有答案了。



2022 年 2 月 27 日下午 3 时，曼哈顿中城布莱恩特公园里热闹的滑冰场。越来越多的纽约人走出家门，脱下了口罩，纽约市民从心理上进入了“后疫情时代”。

2021 岁末，灰沉沉的天空咬着牙较着劲。直到 2022 年 1 月 6 日，狂风终于裹着暴雪，迅疾掩埋了随处丢弃的一次性口罩，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劈头盖脸的，还有认识的人染上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 (Omicron) 的消息。

承建商安德鲁 2021 年初染过德尔塔，以为天然免疫了，但这次又中彩，老婆孩子无一幸免，但告诉我就像感冒。卡罗琳是纽约第一代新冠肺炎感染者，2020 年 3 月上过呼吸机，早打好 3 针辉瑞疫苗，发微信告知我头痛失声，也懒得去测核酸了，

自己吃了针对性的非处方药，新年饭局推迟一天。保罗的孙子布雷顿 13 岁，没打过疫苗，感染后喉咙痛到无法进食，医院拒绝接诊，在家里耗了 2 周，但密切照顾他的父母亲都没事儿。楼上 93 岁弗兰克的私人看护流鼻涕，做抗原自测，阴性；但她头痛，再做核酸，阳性。灯具商高迪是疫苗的积极宣传员，早早打好三针莫德纳，天天催太太去打，年底却失去味觉，确诊感染；夫人马上去做快速检测，结果抗原阳性，但两人都并无大碍，这让高迪动摇了，“是不是疫苗对奥密克戎无效啊？那为什么还宣传让人去打呢？去库存吗？”理查德因为得过癌症又很胖，格外小心翼翼，打过强生，加强针也打得积极。12 月里他领着粉刷匠们翻新好一座教堂的内外墙，19 日礼拜天，应邀参加重开弥撒，人数控制在 60 人；神父周六核酸阴性，周一阳性，结果 20 人感染。理查德躲过了德尔塔却没躲过奥密克戎，立马引发哮喘，急诊打吊针，一走廊的人。61 岁的女友随即中招，不敢回家接触 85 岁的老母亲。纽约的酒店查疫苗卡不查核酸，两人索性开了房间，买来圣诞树装饰起来，从 12 月 23 日住到 31 日，“上帝保佑，搞得像度蜜月似的”。

除旧迎新的圣诞假期，熟人间调侃的问候语已经是“嘿，阳了吗？”。开始我还试图通过比对找出规律，但人人都是人的反例。疫苗、抗体、核酸、抗原、免疫，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宣讲的科学概念，被一轮又一轮的真人真事打脸，有了如今无数版本的民间解释，答案飘荡在风中，纷纷扬扬得叫人晕眩。

街上的检测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部免费。但谁不明白疫情是门大生意呢？曼哈顿中央车站 42 街的出口，沿街 50 米内，整个冬天都挤着三家检测机构，法相庄严，寸土不让。



2022 年 2 月 4 日上午 9 点半。中央车站 42 街出口处停着由大都会运输署的敞篷观光巴士改装而成的快速核酸检测车。后面蓝色的顶蓬是“快捷实验室”(Lab Q) 的检测点，这是一家 2019 年创立的体检公司，在曼哈顿占位最多。在它后面透明半封闭的塑料帐篷，是一家小型检测公司。各类公司的检测点在市区争抢地盘，互不相让。

《纽约时报》报道，依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1 月 10 日，美国新增感染人数超过 143 万，这是世界上自新冠流行以后单个国家的最高每日统计数；与之对照，上海当日新增 27 人（当然上海人也没曾料到 4 月时会日增过万，“动态清零”到全市拉响断粮警报）。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缩短原先建议的 10 天居家自我隔离的期限为 5 天，因为疫情导致了劳工短缺。纽约市长白思豪 (Bill de Blasio) 过了元旦就到任期了，下台前签署了一系列防疫法令，特别是 12 月 27 日起，纽约市所有打工人都必须证明打过一针疫苗，45 天内必须打第二针。没有什么“知情同意”之说，纽约人要想出门干活，必须先打疫苗。这当然是针对需要人手的现场工作，居家网上办公是轮不到查疫苗卡的。橱柜商奇里的女儿管着他爹的财务和样品，备孕中，不愿打疫苗，“我能解雇她吗？”里奇索性挂出歇业的牌子，老客户来才开门。到 3 月 10 日，我去纽约公立研究图书馆调阅民国时期的北京档案，117 地图室的门上还贴着告示，“缺人不开，若急需请至 121 方志室问询”，馆员倒是很帮忙，但毕竟不是他们熟悉的馆藏，等了 2 个多小时后，我才拿到 1926 年、1935 年和 1939 年的北京地图，在一名馆员的看护下细览。

星巴克在全美约有九千家门店，要求近 23 万员工接种疫苗或戴口罩并每周接受检测，限定 2 月 9 日为最后期限，这也是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规定的大雇主要求全面接种疫苗或每周检测的日期；1 月 14 日，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拜登总统针对员工人数超过 100 人的企业疫苗强制令，大法官们表示这一强制令超出了政府的权限；1 月 18 日，星巴克发出电邮备忘录，暂停对员工的疫苗要求，但这又与纽约市府的规定不符，让纽约三百多家门店无所适从。大都会运输署 (MTA) 从事巴士、地铁、轮渡和铁路营运的员工约 6 万，三分之一都不愿打疫苗。纽约州长霍楚 (Kathy Hochul) 去年底，以强制令会加剧人手短缺为由，驳回了白思豪强制运输署人员打疫苗的请求，强调应对近九百万人口的大都会的公交保障，疫苗政策不得不“适度拿捏”。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斯科特 (James Scott) 的《弱者的武器》，主要想说，下属的日常抵抗表明他们并没有同意被统治；但他断然料到，在偷懒、装傻、暗中破坏、假装顺从之外，底层抵抗的形式里还会有“不打政府强推的疫苗”吧？

哥伦比亚大学 1 月 8 日给在校学生群发邮件说，已经没有空房供核酸检测阳性的学生隔离，“我们觉得学生和家长要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即需要和测试阳性的同屋密接。目前我们不再对现有的指导性意见做出改变，也不会关闭校园的更多空间和项目”。这“弃疗”的宣言，等于在直白地承认这一轮病毒变种的感染率之高、对青年群体的危害之微以及维持教学秩序之必须了。哥大进教学楼要刷校园卡了，美国大学竟然也竖起了电子围墙。哥大里面，自愿闭门不出，自我隔离的中国留学生；或者让学生们坐在教室里看屏幕，自己在家用 ZOOM 视频会议软件讲课的讲席教授；以及主

持在线中美学者政策论坛，将疫情期间涉及亚裔的犯罪引导为“仇亚症”的“社会运动员型”系主任，我也确实认识若干。



2022年2月1日下午2点，虎年正月初一，曼哈顿唐人街，舞狮巡街、拜年讨彩，人潮涌动，不同族裔共庆中国春节。种族矛盾与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是纽约这个移民城市长久并存的痛苦与骄傲。

奥密克戎，不上不下，捉摸不定；纽约，各行其是，进退拉锯。如何评价这些纠结的做法及其背后的立场，恐怕见仁见智，标准答案只能是在风中飘。但比较肯定的是，这些放到了台面上的相互抵牾，最后却避免了铁板一块，给众口难调的社会留出了各自存活的缝隙。哪怕是2020年致死率最高的病毒泛滥时，包括加油站、超市和药店等核心营生都开着门。像逮捕理发店“顶风”营业的、电话监察在家隔离之类的强制民众居家隔离的政策，由于执法难度太大或者成本太高，不是很快放弃就是不了了之。不论是主动的意愿还是被动的结果，权力遇到了约束，社会受到的冲击因此减弱，倒是给很多人留下了生路。

1月11日，摄氏零下8度。陪斯蒂芬去特殊外科医院（HSS）复查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恢复情况，不用提供核酸结果，只有手术当日的患者医院才会为其先做检测。这家创建于1863年的骨科医院是美国骨科的鼻祖，至今仍是业界头牌，在病患中口碑无敌。所以被前台接待员怒喝，惊骇莫名：“都站到挡板后面去！你，还有你，出去！不许陪护！”所谓挡板，是2020年至今的纽约一景。杂货店通常是拉扯一张透明塑料布，对于即使在纽约封城一百天里都开着门的业主来讲，这不过是一道心理屏障；而医院和图书馆用的多是有机玻璃板，质料更厚实一点，形状要规整一点，但我无法排解的难受也更多一重——医院和图书馆原本是纽约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也是最应且最能以身作则去消解迷惑和误解的岗位。挡板这玩意儿对奥密克戎还有没有用，专业医生和学者应该清楚或者应该去弄清楚；但现实却是架在了人心上，人人戴上口罩，视而不见。医院大楼外用蓝色塑料布搭了个简易帐篷，里面没有取暖设施，贴了“等候区”字样。东河边朔风凛冽，躲进去的还有一位来陪妻子初诊的老先生。我跺着双脚，半个小时后脚似乎消失了；老先生坐坐铝条长椅，一动不动。

无知、猜疑与恐惧，是疫情下的蛊。以抗疫之名，理性之真与人性之善，被打得丢盔弃甲。政府两年来一直通过主流媒体、公益组织和政府机构推广疫苗接种，向公民发放纾困金，然而，这些救命钱却被同一批人大规模欺诈性地挪用或占用；从今年一月底开始，每个地址可以向政府免费申领2次共4盒新冠检测试剂，三月份还可再度申请，全部通过美国邮政的头等包裹服务送达；但民间对疫苗效果、专家意见和防疫政策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已经出版了不少纪实政论著作，其中最畅销的当推贝伦森（Alex Berenson）的《疫症》（Pandemia），这名已被推特封号并被《纽约时报》解雇了的专注医药和金融欺诈的前调查记者，在他2021年出版的书中指出：“搞砸了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防控的，正是两面派的专家、渴望权力的官员和危言耸听的媒体。他们利用传染病这一危机，来实现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被允许发表的言论的前所未有的控制。”这句话的确过于尖锐了，因为翻译成任何国家的语言都毫无疑问。



上面是与美国主流媒体持不同政见的两本书。左边题为《真正的福音》，作者小罗伯特·肯尼迪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侄子，知名反疫苗人士，他对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和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清洗异议的做法提出质疑。右边即为《疫症》，副标题是“新冠癫痫如何接管了我们的政府、权利和生命”。下面橘黄色是寄到每家每户的免费抗原检测试盒，蓝色的是在市立图书馆免费自取的，都是“中国制造”。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中心碎”。

1月。去东54街公园路的仁爱（Renai）希腊餐厅赴宴，官网上引用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等于在曼哈顿中城的钢筋丛林里意淫下诗和远方。前台要查验疫苗证明和有照片的身份证件，我从国际旅行健康码应用软件下载了中英文疫苗接种信息，前台三名女招待估计没见识过，看了半天，我说名字和生日与我的护照对得上就对了，她们也觉得是，就抄录在一个大本子上。客人和服务生大都是中年白人男性，衬衣西裤皮鞋，职场标准装，我点的大虾意面36刀。这和以警察和消防员为代表性居民的史泰登岛上很不一样，那天跟里奇去尼克意大利餐厅吃晚餐，里奇和女招待打情骂俏着落座，吃到一半，两个男人进来，店主一声口哨，几名客人立刻起身去了卫生间。里奇眨了下眼睛，“没事，环保局（DEP）查疫苗卡的”，看我惊吓的样子，“没事，尼克的本子肯定早就记得满满的了”。这是去饭店？还是去面试，或者去搞地下党？房地产商麦克很擅长在饭桌上谈生意，这个襁褓中随父母从德国逃亡到美国的犹太人，今年86岁了，心脏搭过桥，非灭活疫苗有可能产生血栓副作用的新闻让他格外警惕，家族记忆让他对查验证件敏感感到会有应激反应，“去吃饭要看身份证，去选举倒不看了，不是美国公民也可以投票选美国总统了。奇葩吧？不打疫苗的都好像被打上了大卫星，成了贱人，博物馆进不去，现在连去个饭店也不行了。”对一位爱好收藏艺术品的美食家，这确实太折磨。

3月13日前，博物馆一公里上的几大博物馆都是这套操作，之后虽然不再要求疫苗卡，但还是必须全程戴口罩。我一周两天都要去大都会里面的华生图书馆查书，疫情前人潮汹涌，常常要排半个小时的队进场；现在游客骤减，也要至少半小时。大门口黑压压多出来的保安和慌忙翻找两份证件的观众，在富丽典雅的哥特式门廊下，很显突兀。由于牵扯传染病与公共安全的议题，涉及疫苗的“身体自主权”的讨论更为微妙和复杂，但原本应起到普及教育、促进沟通和养育社区等文化功能的博物馆，却因为疫苗原因将很多非传染病感染者或持不同政见者挡在门外，无论如何是存在伦理悖论的。



2022年2月22日上午11时，大都会博物馆门前，蜿蜒蛇行的进场队伍。

古根海姆美术馆有抽象主义先驱画家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 1866–1944）的个展，我早就留意，但因为展期到九月，总想着稍空才去。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一周里西方世界开始“抵制”与俄罗斯相关的艺术家和文化活动，纽约也迅速反应，3月3日大都会歌剧院解雇了首席女主角、俄罗斯女高音奈瑞贝科（Anna Netrebko），这名“大都会史上最伟大的歌唱家”20年里参演了200场演出。见势不妙，我立即上网，最早可预定的是3月5日，22刀一张。我也为康定斯基的狂热粉丝里拉先生定了一张，他刚好65岁，可以买长者票15刀。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里拉，1970年代在华盛顿大学读哲学系，留长发办剧社，临摹过每一幅能看到的康定斯基，在下面配上诗歌感言，动手一针一线订成册子，“应该还在上州我度假屋里的什么地方，我太爱他的自由！坏了！我没疫苗卡！”5日下午，我排了好长时间才排到入口，不断让后面的人先进去，二十分钟后，里拉才顶风而来，举着有他名字的小白卡，“长岛一路堵过来！那边波兰人社区仿的多，200刀，便宜下来了。我才不做小白鼠。钱可以赚，命只有一条”。场馆里熙熙攘攘，最全藏家的地位绝非浪得虚名。徜徉其间，里拉先生掏心掏肺的讲解陪伴左右，是怎样的享受，又是怎样的惆怅啊？康定斯基出生于莫斯科，求学并入籍过德国，又入籍并终老于法国；和他的画作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颠沛流离，而如花少年的成长则定格在敖德萨（Odessa），如今不再属于俄罗斯而是归为乌克兰的“黑海明珠”。那么，康定斯基是哪国人？他属于哪种文明呢？他会被抵制吗？如果有灵，亲历过纳粹和战争的他会怎样评说今天的世界？

谁来回答？如何回答？答案在风中飘荡，奈何在风中飘荡？

2月27日，去第五大道42街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看建馆125周年的珍藏展，唯一入选的中国文献，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明代摹本，在纽约戴着口罩，欣赏北宋开封摩肩接踵、无拘无束、生香活色的市井人间，恍然若梦。出门走到时代广场，所谓“世界的十字路口”，“后疫情时代”用力过猛的促销，竟生出些汴京商贸的夸张穿越感来。直到撞见二三十人，举着牌子站成一列，走近看，上面写着“我是俄罗斯人，我反战”、“停止侵略”、“不要战争”等等；还有一个亚裔面孔的男青年，举着英文和中文繁体字手写的牌子“欧罗巴的孤儿”，一问，果然来自台湾。现场有举着黄蓝两色乌克兰国旗的，有举着美国星条旗的，还有一位披着白红两色的波兰国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表情凝重，但都很配合路人视频和照相，不少人不管是自拍还是被拍

都自觉假笑、摆着姿势。看得出摄影师和摄像里有专业人士，设备级别在那里，队形和口号也多番整合。旁边的咖啡座坐满了人，陷落在艳光四射的液晶广告牌的深谷里；人偶们哄着游客照相，蝙蝠侠和超人左拥右抱着。人们汇集到纽约，各有各忙。



2022年2月27日下午3点半，纽约时代广场。兰蔻巨幅广告牌下是纽约警察局的岗亭，前面聚集的人群在抗议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

鲁斯兰 (Ruslan) 二月底以来情绪很有些压抑，他来自 1991 年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平日里哈萨克语说得少，俄语倒是常说，毕竟俄语是布鲁克林羊首湾 (Sheephead Bay) 这个前苏联移民聚居区的“普通话”。战争爆发后，他和生意伙伴马尔钦 (Marcin) 通过一次电话。马尔钦是波兰裔，在电话中怒斥俄罗斯“侵略成性，杀人如麻，你当然知道卡廷惨案，对不对？”鲁斯兰因为岳母住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顿巴斯，就回应说，“之前 8 年一直被乌克兰政府军狂轰滥炸，左邻右舍就没有全家齐整的，现在基辅总算知道炮弹不是玩具枪了吧？”结果两人就吵翻了。“打来打去死的都是自家人，我讨厌战争。我只是不明白，美国打伊拉克，北约打利比亚，其实都是先行打击未来最危险的威胁，为什么就不是侵略了呢？美国人那时候怎么不反战呢？这次战前拜登明确说不会出兵干预，战争开始了又不给任何谈判的空间，这不是在拱火吗？”

其实，承认这一点是残酷的：所有这些战争，都笼罩在 911 梦魇的阴影里。纽约去年在下城的世界贸易中心原址举办了二十周年悼念仪式，在怀念故去的亲友和赞美救援英雄的同时，美国主流媒体却完全没有勇气去揭示 911 的本质，即：世界在恐怖战争的威胁下，失去了具有国际基本共识的维和机制；而美国和北约更是以“反恐”为名发动了名副其实的“恐怖战争”，导致了新的国际安全困境。俄罗斯不过是利用了联合国安理会的久议不决，持械挺入了“规则破坏者们”的行伍罢了。

“火炮要射多少发，才会永远禁用它？要经历多少死亡，才明白生命逝去已太多啊？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

鲁斯兰开始叮嘱 6 岁和 9 岁的两个女儿，不要和别人提起外婆。她们在离家很近的一家芭蕾舞学校上兴趣班，之前叫“俄罗斯芭蕾舞学校”，开战后连夜粉刷成了“国际芭蕾舞学校”，校长夫妇其实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乌克兰人。鲁斯兰很委屈，“两个国家不分彼此，大多是亲戚啊。”媒体上一片反战声，市区里蓝黄两色变成了流行色。史泰登岛上也有一个俄裔小社区，我常去买荞麦黑面包的巴扎俄国超市门口，也插上了乌克兰国旗，“哎，一言难尽，美国人哪懂那么多？生意一下子淡了，我们也是用脚投票移民来的，但不被砸就好。”负责切面包的中年师傅来纽约前是莫斯科一家国营医院的外科医生，纽约医师资格申请程序的严格和专业语言的障碍，让他按下了再拿手术刀的念想，“你们中国人懂的”。

我接过面包，像同志间一次触及灵魂的握手。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与价值观项目主任塞缪尔·戈德曼 (Samuel Goldman) 在接受“美国之音”电台采访时说的，“最宽厚的解释是，人们对俄国政府过去一个月的行为感到愤怒并且付诸行动。不那么宽厚的解释就是，他们处于一种道德狂热 (moral frenzy)，不能区分俄国政府的行动和俄国文化、俄国人。虽然是好心，但我不认为会成功，这和击退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目标没有关系。”开战意外延续一月后，更多俄罗斯艺术家在西方遭到封禁，我甚至下意识地联想到 1942 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像一战期间对待德裔侨民一样，把美国本土的 12 万日裔美国人关进了集中营，其中超过六成是入籍的二代移民；而二战的欧洲战场上令敌军闻风丧胆的美国陆军 442 步兵团尤其是“紫星营”100 营却是清一色的日裔。我在国内的朋友圈在战况报道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分裂得汹涌澎湃；当然到 3 月底被上海排山倒海的“疫情”淹没了下去，似乎西线突然没了战事。比起种族偏见和战争恐惧，“道德狂热”戴起白手套，杀起人来甚至还有高贵的荣誉感。2 月 13 日星期天，去麦克的合伙人克利夫夫去看超级杯橄榄球赛，他烧好意大利酱茄子，炸好鸡腿和薯条，约了左右邻居，还有高中时的哥们儿，据说一半的美国人都观看了当天比赛的直播。中场广告音乐响起，连一边闲聊的女士也聚精会神起来。“哎呦，连我都熟，这曲目和演员，也太过了吧？”年逾六旬的布莱尔性格直率，她在社区老牌纸媒做过二十多年的副刊编辑，直到十年前停刊。她给我介绍，阿姆 (Eminem)、安德烈·杨格 (Dr. Dre)、玛丽·布丽姬 (Mary J. Blige)、史努比狗狗 (Snoop Dogg)，“你就理解成是一场美国饶舌嘻哈名曲串烧吧”。克利夫夫从沙发上站起来，“我还是去给你们做点热狗吧。美国就只剩黑人歌手了？这是一场黑命贵 (BLM) 的政治汇演吧？”保罗退休前是消防员，“那不是还有我喜欢的阿姆吗？”汤姆顶他，“阿姆，你看到没？这丫唱好《失去你自己》(Lose Yourself) 后，就单

膝跪地了。”2016 年球员卡佩尼克 (Colin Kaepernick) 在赛前演奏国歌时用这个动作而不是站立右手抱胸，来抗议警察暴力对待黑人，当年国家美式足球联盟 (NFL) 没有支持他，卡佩尼克就自主终止合同，离开了球队。2020 年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跪压 8 分 46 秒致死事件后，“单膝下跪”变成了抗议标志性动作；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拜登跪下了，80 岁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穿着橘色套装也跪了 8 分 46 秒；有人赞赏这是种族和解之跪，也有人批评这是为拉选票作秀。汤姆是做金融结算的，我惊讶于他 2 米的身高，“我是杂种 (mutt) 哈，德国、爱尔兰、荷兰混血的。美国就是个混血的国家，我百分之一万支持种族平等，但黑命贵嘛，他们成立了全球联络基金会 (MLMGN)，2020 年一年就收到九千万美元捐款，却一直交不出年度财务报告。基金会资金流向非常混乱，创始人卡勒斯 (Patrisse Cullors) 在加州买了几套豪宅，她却突然辞职了，机构没有领导人了。你们懂的。”



纽约“博物馆一公里”的最北端是“非洲中心”，除了有一家咖啡馆营业外，这里并没有常规的博物馆展示活动。2020 年 6 月，死于警察暴力的黑人姓名被做成贴纸贴在了面向第五大道和东 110 街的窗户上。2022 年 1 月 28 日，数以万计的纽约警察冒雪参加被黑人射杀的年轻同事莫拉 (Wilbert Mora) 在圣帕特里克教堂的葬礼，场面壮观，但主流媒体几无报道。摄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

黄先生是一名华裔图书馆员，儿子在布鲁克林技术高中读书，“我家也捐了不少，不捐孩子都不敢去学校，说政治不正确。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这所高中是纽约市教育皇冠上的钻石，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一直受到自由派政治人物、学校领导批评，认为学校是精英主义的堡垒，因为黑人和拉丁裔入学率低，被指“具有实质上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该校黑人和拉丁裔占 15%，远低于纽约公立学校平均数 63%；而亚裔在该校占 61%。“如果学生要按照肤色比例而不是成绩高低录取，那教学质量还能保证吗？我们那么多的努力都白费了吗？你们不知道光是补课费都不得了。难道美国不再需要科学家？不再鼓励努力、勤奋、成功的美国梦了吗？”

安德鲁是保罗的儿子，正好休假回家。他在亚利桑那州做边防警察，“美国梦？老子也不想不通，拜登以后，偷渡不用抓，人家都大摇大摆地从墨西哥过来，咱得给他们办好文件，再送他们上飞机去想去的地方，纽约、迈阿密，还优先头等舱，直接就美国梦了。机场海关干脆撤了算了，查什么鸟签证嘛？走私毒品倒是要管，但机会少之又少。这边防真没啥好防的，太他妈操蛋！”

黛安娜是汤姆的太太，意大利裔美人，刚还在说两年都没用过口罩了，3 月 7 日她教书的高中总算可以不戴口罩了，“你们注意没？球场有 7 万人吧？似乎没几个人戴口罩哦。这在加州不是违法吗？”大家都看向维尼，他和克利夫是发小，法雷尔主教男子中学时的橄榄球队友，后来在纽约的亨特学院读本科，再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硕博连读，现在有了自己的病毒实验室，“口罩像你们这些布的纸的，还这么戴，完全没用。但怎么可能要求每个老百姓长时间都严格佩戴 N95 口罩呢？医生都明白，但我们能公开说吗？媒体傻吗？我看是别有用心。精英阶层多少是废了。口罩是一场驯服运动，还搞成功了，美国人现在比中国人都爱戴口罩！中产和下一代已经是温室里的花朵，没有野性，失去了独立判断和社会担当，他们把驯养当成了教养，把这么煽情的自虐看成是利他的自律；甚至用这种所谓的‘高尚道德’绑架了所有人。这很可怕，纽约被这帮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垄断了，没希望了。”

里拉从长沙发上一跃而起，和维尼击掌，“我不能同意更多！美国现在很危险，我给你们背一段大学时候教授让我们背诵的名言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民族一旦成为臣民，就会立即完全忘记自己的自由，以至于几乎无法被唤醒到重新获得自由的地步。他们那样轻易自愿地臣服，好像他们不是丢掉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这些话物理性地撞向我，“你怎么会不知道拉·波埃西 (La Boetie) 呢？法国政治哲学家，蒙田总知道吧？他哥们”。市立图书馆可以下载 1576 年的法语电子版《论自愿为奴》，我看不懂，借来了 1975 年的英译纸本，“在犯罪之前，哪怕最令人反感的罪行，他们总要先来一番动听的言论，内容关于整体利益、公共秩序，还有穷人的救济。你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使用的言论，千篇一律，言而无信。”伟大的先哲啊，战争、疫情、油价、选举、运动，太阳底下何来新事？

纽约不是美国，但是没有了纽约也就无所谓美国。没想到超级碗中场秀，变成了美国现实的超级批判。美国怎么了？连纽约人也搞不明白了。答案飘在风中，恨意堵在心口。我看着窗外承重着积雪的松林，不知道能对他们说些什么。

“横笛和愁听，斜枝倚病看。朔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

2021 年的最后一天，我去莫拉维亚墓园 (Moravian Cemetery)，祭拜老房东海伦。2020 年 3 月新冠疫情爆发后，由于殡葬业不属于纽约市府认定的核心工作而被要求停工，很多家庭都没办法给亡故的亲友举办追思会和葬礼，甚至没能将亡人入土为安。2021 年 6 月恢复营业后，赶工赶不上需求，2020 年 9 月过世的海伦的名字，直到 2021 年 11 月才刻上墓碑。我带上一棵泛着蓝绿光泽的杜松，种在了她的墓前，感谢她以天主教徒的慈爱给我四年的悦纳。这是我第一次在圣诞节期间去墓园，举目望去，成片的精心装饰的圣诞墓毯 (grave blanket)，在冷风里绽放着生迹——死亡并不是分离。始建于 1740 年的这座莫拉维亚兄弟会基督新教墓园，是纽约最古老也是最大的意大利裔天主教徒安息地之一；缘起是二十世纪初，主理神父力排众议，收留了因违背教义而被传统天主教墓园拒绝接收的纽约黑帮黑手党的大批尸骨。墓碑一直都是不可移易的活着的见证，人性曾经可以如此宽厚绵长。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3 时，莫拉维亚墓园。墓前是亲人献上的用松枝、彩球和缎带编制的圣诞墓毯。

曼哈顿东北角的东哈莱姆是个贫困社区，居民以西班牙语裔为主，民俗壁画很出名。2017 年至今，每到纽约，我都必去回访。东 111 街上的第一西班牙联合卫理会教堂是个“红色革命圣地”，1969 年到 1973 年，“青年主人党”（Young Lords）数次占领教堂作为运动指挥部，主张暴力革命和波多黎各民族自决，把教堂改名为“人民教堂”。这个冬天，教堂正墙上挂着抗议 2019 年底发生在这个街口的枪击案的海报，侧墙涂上了色块简单的新墙画“团结就是力量”，对街是表现力极强的老墙画，仿“帕尔尼克”的“致敬毕加索”，中间隔着政府的疫苗接种车和七零八落的垃圾桶；而教堂呢，大门紧闭。我继续步行到 115 街上的卡梅尔山圣母教堂。1884 年贫苦的意大利南部逃难而来的男男女女在白天忙完生计后，在夜间举家出动，一砖一瓦凭人工建起了这座教堂，还凑出一百美金买下卡梅尔山圣母塑像替代了从家乡带来的纸神。神像身上披挂着的信众奉献的绣花衣裳，墙上“请不要在神像身上写字”的字条，都在提示此处信众的草根性。卡梅尔山圣母教堂提供拉丁语、波兰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四种语言的弥撒服务；拉丁弥撒如今很罕见，是梵蒂冈当代“礼仪之争”的焦点，历史背景复杂，但足见卡梅尔山的保守和传统。1 月 23 日周日，波兰语这场弥撒人不多，管风琴声伴着女高音给我真切的在场感，神父讲道说，“相信基督的死是救恩的人，都是神选之子；不论贫富，都是救恩的一部分。手并不比足更高贵，手足相联才成为人，这是我们应有的人观。疫情中的每个人都是教堂、城市和国家的一部分，基督爱每一个人。”红旗漫卷西风，谁迷信？谁革命？谁为了人民？我坐在教堂里，哪里才能找到答案呢？



2022 年 1 月 23 日下午 2 时，东 111 街和莱克星顿大道路口。左边是“人民教堂”，右边可见 2004 年绘制的揭露东哈莱姆社区暴力、贫穷的壁画“致敬毕加索”。

阿方斯修车行的一角是他的小办公室，我很好奇墙上三角形镜框里的星条旗，他告诉我是他父亲葬礼盖在棺木上用过的。退役军人去世，亲属填表告知退伍军人协会，政府都会寄来国旗纪念。他的父辈大多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我们叫“抗美援朝”），“叔叔伯伯大概十多位是有”的。当年摇号，一个街坊一个街坊的男人抽签上战场，“这个国家的自由是老百姓的儿子们拿命换来的”。他穿着卡哈特（Carhartt）工装，说是最后一件，因为做警察的儿子打电话来，告知该公司在拜登的疫苗令被最高法否决后坚持解雇不打疫苗的员工。卡哈特工装因为坚固耐磨，主要消费者都是牧场主、农民和工人等体力劳动者，这些人开始用拒买来抵制它，“不能吃着我们还要做我们的主”。车行里的修车工马可（Marco）是老伙计，洪都拉斯裔，因为不打疫苗就不能去督战儿子中学的棒球赛，就去打了一针辉瑞，结果手臂上出现了大片血疹，搔痒不止几个月。儿子的教练对着学生们喊：“政府不全是对的，不能因为别人错误的决定而伤害到自己。疫苗卡不是有卖的吗？”一月，有人来车行闹过，要求工人们带上口罩，阿方斯冲过去指着他的鼻子，“我的规矩，我做规矩（My tool, My rule），你小子给我滚！”直肠子的他，总让我想起《1984》里说的，“所谓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承认这一点，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

2022 年 3 月 17 日，曼哈顿。停办 2 年后，15 万人的游行队伍，2 百万的围观群众，穿透阴云的风笛和鼓声，全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重回第五大道，浩浩又荡荡。我从 44 街起，追随着人流，一路跑跑停停，直到 79 街。人人用爱尔兰的标记性绿色扮靓自己，各个天主教社区扛出自己的圣像，天主教会中学派出了齐整整的鼓乐仪仗，警察、军队、国民卫队在星条旗下挺胸昂首。风很大，雨也很大，但游行的队伍稳健向前，围观人潮大声尖叫着，鼓掌、喝彩、拍照。人是需要社会的，无论多大的风雨抑或有传言中尚未远走的所谓疫情——三年，长到足够可以认清很多人和事；人们终于在神圣的名义下再次集结，为了重新夺回的生活！

“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这就是回答。



2022 年 3 月 17 日，曼哈顿第五大道，圣帕特里克节游行。上图为在麦迪逊 44 街候场的西班牙裔社区风笛表演队，中图为行进到 44 街的爱尔兰裔鼓乐风笛队伍，下图是在 55 街上热情的围观青年。

起稿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于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午后 3 时
局时上海市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开始网格化核酸筛查”
2022 年 4 月 16 日修定于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中之隔离酒店

补记：

这里且记下 2022 年的回国之旅。

纽约至上海唯一直飞航线，东航只售头等舱，89000 元，元旦之后每天刷票，都是无票状态。2 月 10 日被迫放弃，投奔美联航，最早只能买到 4 月 2 日旧金山飞上海的航班，就剩最后一张了，6653 美元经济舱，这几乎是三个月工资的总和，但我后半学期的三门课程开课在即，不得不飞。520 美金再买美联航，3 月 26 日凌晨，纽约飞旧金山，登机无需核酸文件。落地直奔圣何塞（San Jose）。按照中国领馆规定，起飞前要提前七天到这一指定核酸检测机构做第一次核酸检测，棉签捅了两侧鼻孔，付费 185 美金。为节省旅店费用，抱憾借住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友人家中，省下最少 2000 美金。3 月 31 日提前两天再去做两种不同方式的核酸检测，两侧鼻孔各捅了两次，花费 368.5 美金。全部阴性后，上网提交领馆要求的至少九份文件，包括：三次核酸检测结果、登机前七天的自我健康检测表、旅美旅居史申明、机票凭证、疫苗接种声明书、疫苗接种证明、赴美签证和入境美国登记表等，完成国际旅行健康码即所谓“绿码”申请。4 月 1 日获得绿码，再按要求在中午 12 点后到检测机构做一次抗原测试，花费 50 美金。旧金山的住处离指定检测机构有三刻钟车程，没有公共交通，租车费用 480 美金，另付小费 40 美金。4 月 2 日，交验绿码和抗原结果，在手机上申领好回国必须的“海关码”，乘 UA857 旧金山经韩国首尔技术经停到上海。降落浦东机场，所有工作人员都穿着防护服，“大白”森然。时值浦西封控第二天，闭环送至隔离酒店，路上空无一人。隔离时限为 14 天，只定了早午两餐，缴费 7630 元，期间四次核酸，每次都是鼻腔加喉部取样。4 月 17 日解除隔离，闭环运送到小区门口，四望无人，快递堆积。进门看见女儿，正埋头团购食物。上海市府之前通告只需四天“静默”管控，她信了。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



李明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偏重文化认知和社会记忆领域的研究。近年来长居上海和纽约，致力于北美汉学收藏的挖掘整理与美国流行思潮的观察和记录。著有海外人类学札记《那是风》等，非虚构著作《纽约的伤：一座大都市的损毁与愈合（2018–2022）》预计于 2023 年 3 月出版。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为 Robert Henri. (1902) Snow in New York

非虚构

纽约的残冬漫长

李明洁 | 非虚构图书馆

世道与人心，政治与冰面，
不知道哪个更冷酷。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杆后便没有宇宙。

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在心中化为乌有。

——里尔克，《豹》，1903年，冯至译

在没有见识过纽约的冬天之前，我在华盛顿的博物馆里见过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 1865–1929）的《纽约的雪》。没有天际线，高楼将天空切割成浑浊的长条。积雪的街道湿滑难行，惨淡的路灯不合比例地突兀出来。那时，我很感佩这位垃圾桶画派（Ashcan School）的核心创始人，以城市写实主义的决绝转向贫民纽约的勇气。2020年熬人的新冠疫情里，我常常想起这幅1902年的画作。这一整年的纽约，无非是他固住的那一瞬间。



2021年1月16日。从新泽西隔着哈德逊河眺望曼哈顿，可见沿河诸多轮渡码头。由于疫情，渡船减班，河道清冷。不少人搬离纽约市区，令对岸新泽西州的房市大涨。（本文图片除两处网页截图外均为作者拍摄）

寒彻、泥泞、漫长。纽约永远的冬天。

2020年岁末，纽约间歇地下起小雪，冷冽窸窣，地上不留多少痕迹。美国疾控中心（CDC）说，旅行会扩散疫情，纽约规定即便是家庭聚会也不可以超过6个人，这些声音在电视上报纸上滚动喧嚣。但圣诞节，怎么说都像中国人的春节啊。当地友人告诉我，回纽约的航班没有不满座的；但这是有记忆以来，第一次平安夜大家族不能聚在一起吃个饭。阿娜从民主党执政的加州旧金山来，在家里也戴着口罩，吃饭才取下，端着盘子与家人保持着距离。她去看望儿时伙伴，从晚上7点聊到10

点半，居然是戴着口罩站在户外的走廊上聊的。纽约夜里早已是零下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旧金山市府规定，不戴口罩罚款五百美金，口罩就这样长在了他们的脸上。戴娅从佛罗里达州来探望父母，只有出门才戴口罩。她去新泽西会友、跳操、吃饭，出手大方。因为佛罗里达是共和党执政，餐厅虽然限制人数，但室内餐饮一直迎客。迈阿密一贯有众多从纽约飞去的“候鸟人”，纽约闭市后，迈阿密直接成了“陪都”。她这一年每天都能收到两百多美金的小费，估摸着一天要招呼25桌左右的客人，“因祸得福吧？都是豪客老乡”。圣诞礼物还是照送，不过今年多了新风景，亲朋好友互赠富余的糕点和菜肴——家家户户“准备年货”都是老规矩，但今年谁家也吃不下了。

但从纽约出入境的航班，人都不会多。阿霞的父亲有糖尿病，且肥胖，只有六十多岁。染上新冠，病危。波兰疫情严峻，但纽约疫苗是按年龄往下，75岁以上先打，阿霞刚满四十，她等不及也顾不上了。由于航空公司敦促乘客做好核酸检测，阿霞忙不迭地办好阴性证明，飞回波兰，结果一路上没人查。她入了美国籍，否则出去了还回不来。圣诞节当日，阿力坐飞机回国索沃的首都普里什蒂纳（Pristina）。走之前他就去街角的社区医疗点验了核酸，很多人排队，反正不是走保险就是政府买单；但登机前并未得到结果，出入境时也无人问津。等他到了家，与家人聚餐时，手机响了，阳性！可是他什么症状也没有，一大家人倒也不慌张。阿力的祖父母、父亲和舅舅都是当地的知名医生，祖母作为南斯拉夫早期女性外科专家还得到过“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铁托授予的勋章。他老爹很淡定地帮他安排了2次核检，都是阴性，大家族整个圣诞节都在一起，平安喜乐，“我爹说了，核酸检测不全靠谱。”纽约市政府招募了6万“疫情追踪队员”，月薪四千美金。阿力回到纽约，因为阳性登录在册，果然接到电话查问行踪。纽约市府曾试图推行类似中国健康码和大数据行程卡之类的东西，但民众不认不从。阿力不想麻烦，就说哪儿也没去，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他节后在亚马逊倒谋得了一份工作。线下的小商家被按在地上摩擦了一年，对亚马逊网站和开市客（Costco）超市这样的霸主，估计连羡慕嫉妒恨的气力都没有了。我曾经问阿力怎么来的纽约，他说是1999年春夏之交科索沃战争的时候，阿族母亲拉着8岁的他从火海中逃出来，以难民身份到的纽约，一年后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这和我的记忆吻合，就是那一年的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军队炸毁了，上海有市民和大学生到美领馆门前抗议，焚烧了美国国旗。世界上没有别的城市像纽约这样，身上带着全世界的伤。

安德鲁的岳母核酸检测阳性，她在长岛波兰人开的美发品工坊打工，厂里有四五十个波兰裔工人，说是四五十人感染上了。纽约都是居家隔离，她要在家里呆两周。安德鲁马上去测，快速检测和实验室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他自己也毫无感觉，所以，检测后他还去市政厅办过电梯安装执照。两天以后他感觉腿沉，再去测试，阳性！之后一周，剧烈咳嗽，肌肉疼痛到哭，医生说这算轻症，无需用药。他憋在家里实在难受，二男一女三个孩子吵得他快疯了，他就戴着口罩出门骑车。再一周，太太头也痛了，她没去检测，因为家就这么大，谁也回避不了谁。大儿子马修刚上公立小学，因为外婆生病，已经隔离了2周。刚想返校，一同学又感染，全体再隔离。一大家子都要崩溃了。这当口，8岁的马修抱着疫情前每周日带他去天主教堂的老爹说，不能上学真受不了啊，他喜欢上一个女孩儿了，她没有爸爸有两个妈妈。安德鲁心力交瘁啊。他的合伙人马森近来也非常抑郁，他心爱的表妹失业半年后，在英格兰全境级别封锁期间跳楼自杀了。英国在2020年12月初已经开打美国辉瑞的疫苗，2020年1月初开打英国牛津疫苗。但英国1月4日至2月中旬还是实施了新一轮封锁政策应对病毒变异，规定除了在极有必要情况下（例如满足基本的医疗和食品需求等），公民必须居家隔离，坚决不允许聚会社交类活动。从2020年9月到2021年3月，反对疫情严格管控的抗议游行，在英国首都伦敦就没有停止过。

2021年的元旦，纽约下起了冻雨，硬生生打在脸上。

剧场、博物馆、音乐厅、体育场，乃至教堂，这些原本洋溢节日气氛的场所，至今大门紧闭。美国人辟邪般地唾弃2020年，12月5日《时代》周刊的封面直接就在黑色的“2020”上打了个红色大“X”。但辞旧迎新的时代广场，没有迫不及待的汹涌人潮，隔着电视屏幕的除夕落球仪式，连烟花都那么寂寞。从1907年开始，纽约人就用这样的仪式迎接新年，与这次灾难类似的，恐怕就是1942年和1943年二战期间限制照明的死寂。是天灾？是人祸？抑或既是天灾又是人祸？元旦的中央公园，凄风冷雨，但满眼还是熙熙攘攘的口罩。住在公园附近的纽约人，多数属于可以居家工作或者是根本就无需工作的，在户外空旷处也戴口罩，这被他们自诩为一种“德行修养”。公园的游乐设施，似乎只有沃尔曼（Wollman Rink）溜冰场还开着——溜冰到底是纽约的冬季民俗。中场时候，磨冰车慢悠悠洒着水雾修补冰场，白色车身上硕大的黑色“特朗普（TRUMP）”标志，开过来，开过去，像特朗普本尊的嗷嗷的恨意。1980年，溜冰场年久失修而关闭，纽约市府斥巨资花了六年也没完成翻修。1986年，特朗普接管，三个月搞定，花钱少于预算；特朗普颇得意，把自己的大名以巨大的字号刷在围墙上、印在溜冰鞋出租台和员工的制服上。没曾想，2019年都在自己的总统任上，“反特”就成了纽约的“政治正确”，场子边沿和制服等处的名字被抹掉，旗杆下营造商的名字改用了很小的字体。只有磨冰车来不及换新，还顶着刺眼的“特朗普”磨磨叽叽。是不情愿还是不甘心？世道与人心，政治与冰面，不知道哪个更冷酷。



2021年1月1日，曼哈顿中央公园内的沃尔曼溜冰场。旗杆下残留很小一行字，写着承建商“特朗普”的名字。

但纽约还是有讲人情的地界。如果真有耶稣从天上看，一片阴郁中，他会格外欢喜布鲁克林区戴克高地（Dyker Heights）的人间烟火。家家户户比拼着圣诞灯彩，那是财力物力人力的竞争，又是价值观审美观和生活方式的展演。纵横两条主街和五条马路的上百户人家，自发自愿、兴致勃勃——节俗自古以来都是百姓生活的华彩乐章。耶稣诞生在马槽，伯利恒之星（the star of Bethlehem）永远指引，圣诞老人不忘派发礼物，驯鹿和雪橇依然欢腾——无论如何，信仰依旧在，“生活”在继续。人类还没有沦落到只知道吃喝（更准确地说，百姓只有吃喝是被权力允许）的“生存”状态。



2020年末，纽约布鲁克林区戴克高地，民间自发的圣诞灯彩。上左：圣诞树、雪人、礼品盒和驯鹿，是圣诞节最常见的民俗符号。上右：世俗文化中的圣诞老人和他给孩子们藏礼物的大袜子。中：尽管疫情肆掠，但2021的新年，戴克高地仍然华灯齐放。邻里争奇斗艳，游客流连忘返。下左：除惯有的宗教元素外，今年的灯饰还带有疫情特色。这户人家做了美国国旗，还在牌子上写着：“谢谢！核心工作者们！我们爱你们！”。下右：圣诞节也是纽约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圣诞灯饰一般从头一年的12月初开始，延续到新年1月6日的“主显日”（Epiphany）。以《圣经》为蓝本的耶稣诞生的场景（Nativity Scene）是常见的主题，“伯利恒之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纽约新民俗戴克灯彩（Dyker Lights）的创始者是今年65岁的露西（Lucy Spata），1986年她搬到这个平民街区后，就决意用粗鄙盛大的圣诞灯饰让它热闹起来，意大利裔生就了群居敞亮的脾性。街坊从不习惯到仿效，再到每年吸引30万游客。有报纸采访露西，说是不是今年疫情就别再搞了，以免人多聚集。露西两年前死了丈夫，但她到底还是这个地界的“腕儿把子”，“难道咱们不更应该给大伙儿鼓鼓劲儿吗？”我问一个看灯的白人大叔为啥拖家带口来，“太给力了！Go Guinea Go！（上啊，‘意佬’们上啊！）”。Guinea是纽约俚语，这个市井老词儿原来是专指在纽约赚小钱的意大利裔苦力，类似称呼黑人“黑鬼”（Nigger），带着上海话里说苏北人“赤佬”的那种歧视，但有时候调侃、亲昵甚至服气的调调也是有的。“Guinea们”在二十世纪初处在纽约社会受苦受难的最底层，如今这些劳工的后代却被主流媒体暗指为“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基本盘。1980年代，露西在农贸市场练摊儿，起早摸黑，卖老公亲手做的意大利香肠和胡椒粉，并冠名“露西香肠”爆得大名，后来成为纽约所有食品节上的标配。露西上过好多次游行彩车，抛飞吻的艳照登上报纸。老公开着肉铺，还兼职为黑手党科伦坡家族跑腿；但过圣诞节必定停下一切，头等大事帮老婆张灯结彩，说是喜欢“她有童心”。他们的儿子小安杰洛（Angelo Spata Jr.）后来娶了科伦坡家族老大的女儿，1990年代成为岳父的私人助理，帮他从监狱传出话来遥控全局；他自己也进过局子，出过局子，势力范围遍及布鲁克林、曼哈顿和布朗克斯。早年挤破头的布鲁克林意大利食品节，小安杰洛一虎镇八方，每个摊位要交给他2500美金保护费。这一家“赤佬”，简直是电影《教父》的真人版，尤其是第二集。别忘了，美国黑手党过去是、现在依旧是意大利裔的天下。明明是“坏人坏事”，普天之下的良民却都成了影迷。无他，足够现实粗粝的社会底层，才保有足够的执拗强悍的生命力。盗亦有道，敬畏存焉。



2021年1月1日，纽约“戴克灯彩”创始者露西家的圣诞彩灯，格外夺目。

但2021年开局的“三个惊悚”，可能预示着美国的“黑帮”换了主业。

1月6日，特朗普和朱利安尼主持“拯救美国”集会，特朗普发表演讲，认为“大选存在舞弊”，不接受“败选”；随后特朗普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大选认证程序中断，有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导致六人死亡。此乃“一惊”。当晚特朗普被“推特”（Twitter）永久封锁，“脸书”和“照片墙”（Instagram）火速跟进，“油管”（YouTube）随即隐藏了特朗普的视频。上不了社交媒体的特朗普，就像中国人被封了微信和微博，一步坠入“社会性死亡”。一名在位民选总统被本国商业公司噤声，前无古人，举世无双，此乃“二惊”。随后，“谷歌”将允许特朗普及其同情者发声的“说吧”（Parler）软件从应用商店中移除，“苹果”也将其下架，而“亚马逊”应声停止为其提供互联网托管服务，从而导致“说吧”网站下线。此乃“三惊”。“新黑帮”，“云”上坐。所有的专制和屠杀，

无不从监控与禁言滥觞。垄断一如专制，一手能遮天，才敢无法无天。“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美国“言论自由”的贞洁牌坊，在互联网寡头引领的“政治正确”中，呼啸着，轰然倒下！

“我们耻于美国人，但也许你该为此爱上它；因为你有权如此声张，而不会被公开吊上绞架。他们从未释放奴隶，他们明白无需锁链。他们给我们迷你屏幕，我们就当是自由无数。因为我们对这牢笼熟视无睹”“政治不正确的说唱歌手麦克唐纳（Thomas C. MacDonald）如当年崔健般异军突起，他的《假醒》（Fake Woke）1月份上线，一个月里点击播放了千万余次。

1月的纽约，滴水成了冰。

迟迟不许“里边请”，没有了餐厅的纽约也就没有了客厅。阳伞加帐篷，熬过了夏天的饭店业主，在门前马路上搞出了各式临时搭建。上东区93街上的意大利餐厅维科丽娜（Vicolina），求生欲绝对强悍，在麦迪逊大道上搭起木屋，挂上窗帘，烧起火炉，装饰上真的藤蔓。哭笑不得的是，典雅温暖的饭店本尊就在2米之遥；而坐在“模拟餐厅”（virtual即模拟，也译作“虚拟”，从2000年春开始就是纽约榜首流行语，满世界的“虚拟会议、虚拟课堂、虚拟展览”）里，你还要在餐费之上多付3.5%的所谓“新冠补偿费”（COVID-19 Recovery Charge）——这是纽约市议会的决议，最高可以收到10%，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幢木屋的造价保守估计也要2万美金啊。纽约的冬天，寒风凌烈。当地人都会在羽绒服套头帽里面再戴个绒线帽子，街面上实在是呆不住。1月22日，我从97街走到57街，麦迪逊大道上所有的室外搭建里都没有超过5名客人，且全部是白人。我特地转到熟悉的卡罗拉乔（Carrolagio），木架棚里摆着10张桌子，一对客人穿着大衣，戴着手套！小商铺渐次开了门，二十平方的面包店门上写着只可以同时有4名客人，十几平方的首饰店只可以进2人。这些张贴看得人怄气——人类互相嫌避，人山人海的纽约成了遥远的传说。



疫情期间不允许室内用餐的纽约餐饮百态。
左：2021年1月22日，曼哈顿的麦迪逊大道上，维科丽娜餐厅搭建的豪华版临时木屋，几乎碰上了从餐厅本体伸出来的雨蓬。
右上：2021年1月22日，纽约餐饮时尚地标熨斗区，临时搭建连成了排，但宾客寥寥。
右中：2021年2月14日，史泰登岛上的艾记（Egger's）冰激凌店因纽特人的“圆顶冰屋”（Igloo）为创意，在户外搭建的情人节“食客区域”，45分钟场租30美金，网上预定火爆。
右下：2021年2月23日，一家做街坊生意的小吃店外，工人们正在临时搭建里吃着店里提供的快餐。

惠特尼博物馆终于恢复了营业，开馆时间大大缩水，要提前网上预约时间。2020年3月闭馆前就开始的墨西哥壁画特展到1月底就要结束，里面人头攒动。观众大衣口罩、背包戴帽，狼狈地面对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衣帽间不再服务，整个世界不可触碰的样子。在这个“革命”的热展之外，还有什么特展呢？一个黑人摄影师群展和一个同性恋画家个展。惠特尼近年的策展水平令人担忧，越来越热衷“身份政治”的图解。以肤色和性取向来认定艺术家，难道不是对其完整人格及其艺术品修为的无视、肢解乃至诋毁吗？好在还有固展，但1900年到1965年的珍藏前，观者寥寥，人们似乎不记得它们曾经也时髦得惊世骇俗过的。但身体不说谎，一进来，其他展厅的聒噪与骄狂就被消了音。时间最忠厚诚恳。我在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星期天的早晨》前坐了许久，1930年他描绘的第七大街，像是纽约疫情的预言——街上空无一人，商铺缄默不语。如此现实，又如此的现实感丧失，仿佛面对的是幻境与幽灵。历史没有巧合。罗伯特·亨利画《纽约的雪》的时候，徒弟的名单里就有日后鼎鼎大名的霍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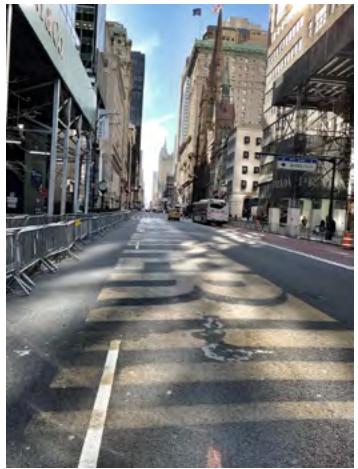


2021年1月28日，惠特尼博物馆。观众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和口罩，参观墨西哥壁画特展。背景是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的《人，宇宙的控制者》，原作现存墨西哥城美术馆。这幅壁画原名《十字路口的人》，是1933年迭戈应邀在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的墙面上绘制的，里面有列宁等社会主义者的头像。洛克菲勒要求迭戈删除遭拒，洛克菲勒结清润笔，结束了合同。后该壁画被毁。迭戈随即回墨西哥，在贝拉宫美术馆墙上重绘了这幅画。于历史于现实，这幅画都值得再三玩味。

1月31日，纽约飘起大雪。很快，“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1月20日拜登入住白宫后，第五大道上的大商家才真正恢复营业。蒂凡尼门前的路

障总算被移除了，车辆通行，碾过刷在地上的“黑命贵”标语。以前由年轻的白人帅哥担任的门童都换成了黑人大叔，沿街的蒂凡尼广告上清一色黑人模特。时尚界是靠敏感吃饭的，2020年11月号的《Elle》（《世界时装之苑》）杂志的封面就已经是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了；在她坐上副总统宝座后，《Vogue》（《服饰与美容》）把她登上了2020年第2期的封面，迟了一步不说，还因为把黑人和印度人混血的她拍得显白而引发了舆论争议。但话都是人的，世界顶级模特公司IMG不失时机地把哈里斯的养女艾拉（Elle Emhoff）收入帐下，总裁巴特（Ivan Bart）就说得不管不顾，“高矮胖瘦性别什么的都无所谓哈，艾拉有酷酷的乐呵劲儿”。好吧，特朗普做了四年总统，第一夫人梅拉尼娅（Melania Trump）可是专业模特出身，却一次封面都没有上过。2月7日被比作“美国春晚”的“超级碗”橄榄球赛，可容纳6万多人的球场仅限2万观众；空座上插着3万纸板人，大把大把的人花100美金把自己的照片印上去——这都什么鬼？佛罗里达是特朗普的大本营，前任总统亲临现场，但媒体上一个鬼影也没有。所以说，美国的主流媒体也是特别讲政治的。历史和魔鬼，都藏在这样的细节里。



2021年1月28日，纽约第五大道上移除护栏后的“黑命贵”标语。这条标语是2020年7月由纽约市长带领刷在地上的，之后长时间不允许人车通行。旁边是刚刚恢复营业的蒂凡尼旗舰店。

当然，纽约主媒也有让人惊诧莫名的时候。2月4日，《时代》周刊发表调查记者莫莉·鲍尔（Molly Ball）的署名文章《保护了2020大选的影子竞选运动的秘密史》。这份详细的报告指出，“左翼活动家和商业巨头”联手的“影子运动”，稳准狠地“保卫了2020年总统大选”。我姑且逐字翻译两段原文如下：“尽管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偏执狂的梦想，但参与者还是希望2020年大选的秘史告诉人们：这是由跨各行各业和意识形态的实力者组成的阴谋集团，他们在幕后共同操作，来影响民众的看法，改变规则和法律，引导媒体报道并控制信息流”，并抵御了预料中特朗普的欺诈指控。鲍尔声称这是“维护自由和平选举的英勇努力”，“他们不是在操纵选举，而是在强化它，他们认为，公众需要了解选举系统的脆弱性，以确保美国的民主能够持久。”《时代》是左派媒体，这样成王败寇式的文字究竟是得意忘形、邀功请赏还是不打自招？不得而知，但2020年的大选被人做了手脚，且是以相当堂而皇之的方式，已然不再是谣言了吧？



2021年2月4日，《时代》周刊调查记者莫莉·鲍尔的推特截屏，中间是为该文设计的插图。插图上方的文字是：“我的新作是篇大家伙——《保护了2020大选的影子竞选运动的秘密史》”，图下的文字是“一个组织松散的联盟争相支撑了美国的制度”。

事实的反转，可谓一夕数惊。纽约市一直是疫情重灾区，但纽约州长科莫（Andrew Cuomo）一直以“抗疫英雄”自居，2020年10月就出了本被我外交部某发言人公开表扬的书《美国危机：从新冠疫情看领导力教训》，他的“丰功伟绩”之一就是把感染的老人送回养老院；因为每天上电视评说疫情，甚至获得了2020年的美国电视大奖“艾美奖”。吊诡的是，2021年1月下旬，纽约州检察长发布报告称，纽约养老院的死亡人数不是先前公布的9154人，而是15049人，占纽约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半个月后，科莫给出数据对不上的理由是“数据报告延迟”；但尴尬的是，2月11日，科莫的秘书在电话会议中告知州议员们，隐瞒真实数据，是为了防止特朗普政府采取“政治行动”；当同事公开批评后，科莫竟电话威胁断其前程。舆论一度哗然，而邀请哥哥上CNN（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节目十多次的知名主持人小科莫却对此丑闻保持了沉默。更有意味的是，随即爆出所谓科莫“性骚扰”的绯闻，如果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摩美国的政坛，是可以咂摸出一些暗度陈仓的味道的。

科莫的《美国危机》仍在亚马逊上热销，最高的一条读后感超过三千复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一条真正的批评：将COVID阳性患者送回疗养院的决定，杀死了数千人，而这是他拒绝承担任何责任的事实。封锁和限制，对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用科学来领导？让我们记住，‘用科学来领导’也曾是纳粹德国优生运动的口号。人们不会不理会科学，但是COVID期间的科学简直是可怕的，而且完全被政治化了。”

2月的纽约极寒，雪花纷纷扬扬，无休无止的样子。

拜登1月20日上台后，民主党主政的芝加哥、费城和华盛顿立马恢复了室内用餐（限客流25%），加州紧随其后，纽约硬是拖到了2月中旬。18日暴雪，好友说好不容易又可以去饭店了，顶风冒雪的，就去家好点的吧，于是约了中央公园西面“特朗普国际酒店”里的法餐厅“让·乔治”（Nougatine at Jean-Georges）。这是家米其林两星，菜品没话说，但餐费真的只为口腹之欲吗？这样高级的餐厅，桌上放着洗手液；为了防疫，点菜要扫码，闺蜜是纽约“老克腊”，不紧不慢，轻轻一句“我要菜单，可以吗？”经理一路小跑着打印了人手一份，“您留着，您放心，不重复使用的。”很显然，菜单与疫情前相比是瘦身了的。侍应生带着一次性纸口罩和塑料手套摆上刀叉，直接就是医院里开刀前医生码齐手术刀的即视感。小伙子原先在下城的格拉梅西酒馆（Gramercy Tavern）跑堂，饭店做的是周边写字楼的生意，现在都在家上班了，午餐也就开不起，他就转来这里。问他为什么戴两层黑色纸口罩，何不直接戴一个N95保险？他说不好看，而且黑色看起来比蓝色、白色的口罩要高级。也是，何止“让·乔治”啊，人人都在戏里。两层口罩，从直播拜登的就职典礼就开始流行了，而且外面一层布口罩还要和着装配着色，俨然“新时尚”，“两朝元老”疫情专家福奇医生在接受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说，两层口罩“应该更管用（it likely does）”。美国人从去年最不习惯戴口罩，到今年流行戴两层口罩，我很难判断，这是不是矫枉过正；但我确定的是，“两层口罩”已然是阶级分化和党派归属的标记物，高低贵贱，民主共和，“罩”数分晓。



2021年2月18日，恢复营业的纽约高档法餐厅“让·乔治”。只允许25%的客流，餐桌间隔很大，由有机玻璃板隔开。侍应生戴双层口罩，桌上摆着印有餐厅标志的消毒液和菜单二维码。左下是“让·乔治”的招牌甜点熔岩巧克力蛋糕，请想象一下，这般美食是由服务生戴着一次性塑料手套端上餐桌的。

雪越下越大，路面积雪很厚。开车四轮驱动，也不敢超过时速20英里。

只能坐在家里看书了。上亚马逊看见时事类里的畅销书第一名，是一本2月17日出版的《深探》（The Deep Rig），216页，Kindle卖3.99美金。副标题特别长，“大选欺诈是如何毁灭了唐纳德·特朗普的白宫生涯——作者是一个没有投票给他的人——或者如何回应人们的疑问：‘你为什么对2020年大选的公正性持有怀疑？’”，亚马逊上十天不到有149条评论，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观点南辕北辙，我想，美国的政治学教授们是否愿意躬身倾听一分钟这类的声音呢？

3月2日，出版商“苏斯博士企业”发布声明，旗下初版于1937年到1976年间的六本童书，因涉嫌“以伤人且错误的方式描绘人”而停止出版。路透社的报道说，这些童书是“种族主义的”，存在对亚洲裔和非洲裔的负面影响。我一打听，邻居老太卡洛家就有一整套，我和她的外孙、6岁的尼古拉商量，借来了一本“嫌犯”。看下来，很像小朋友的语音教材，多是押韵的有趣的句子，配上夸张诙谐的画面，被报上批评的那页写着“中国人吃饭用棍子（筷子）”，画着一个穿马褂的男孩，戴着一顶清代的喇叭式凉帽。苏斯博士（Dr. Seuss）是西奥多·盖索（Theodor Seuss Geisel，1904–1991）的笔名，福布斯2020年名下进账最多的过世名人榜单上，他排名第二，仅次于已故歌星迈克尔·杰克逊，足见其在美国民众中至今受欢迎的程度。苏斯博士一生画了六十多本童书，但他估计没有过一个中国好友；其实他的年代，美国所有大众文化中对中国的异域想象，就没有不荒唐走板的。然而，究竟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尤其是本国文化遗产中的问题和局限？与当前以禁书禁言为表征的“删除文化”（似曾相识的说法叫“破四旧”或者“贴大字报”）相比，美国是否拿出更理性、更智慧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将是美国向上走还是向下走的分水岭。当历史为我所用被断章取义，当文化遗产也要接受“政治验血”，当民众习惯于听信与服从，人类就会失去“自由思考”这一沉重而至尊的权利。



2021年3月6日美国亚马逊网站截屏。在“苏斯博士”系列中的六本童书遭禁后，亚马逊热销书排行榜有7本“苏斯博士”绘本升至前十名，且稳稳占据了前三榜单。

百多年过去了，纽约的雪还是纽约的雪。银装素裹，只会是清晨的一瞬间。很快的，盐撒过、车开过，人踩过。邋遢的残雪，终是纽约冬天的日常。
顶着暴雪，深一脚浅一脚，再付了三小时六十美元的车库停车费，赶去摩根博物馆。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生命写真》个展，像一份画出来的简历，坦白出他一生中亲近过的人。名冠天下的老人家，据说正在法国南方庄园里自我隔离着画花花草，这里不过是些早期探索性的作品，自我表白的成分多，尤其在青年同性恋题材里沉浮又纠结；当然这在纽约之当下，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还是“髦的合时”的。疫情极大地刺激了网络技术的应用，网上预定时间和门票，避免了接触，控制了人流。我预约的是周五下午三点进场的免费票，不是舍不得买票，而是贪恋每周五下午循例会表演的室内乐，太久没有现场欣赏过演出了呀，可又担心太多老规矩都以疫情之名大打折扣。偌大的博物馆不超过30名客人，但乐声安闲随意地充满了这个新旧一体的牢固空间。三位乐手带着口罩，演绎着爵士；观众穿着大衣，保持社交距离，静静倾听。大片大片的雪花在几十米挑高的玻璃幕墙外飘然而落，摩根图书馆的大理石屋顶早已皑皑无瑕。我知道，这是摩根的气度，也是纽约保有的一种底线和尊严。



2021年2月19日，重开的摩根博物馆延续了每周五室内乐慈善义演的惯例。戴着口罩的乐手在演奏爵士乐。

当一切都不确定时，应该去曼哈顿下东城吃一块三明治，那也是踏实的纽约的味道。卡茨熟食店（Katz's Delicatessen），1888年在犹太移民聚居的贫民街区开业。新名片背面印着2021的年历，头顶一句“美国建国245年，我们开业133年”。二战期间店主的三个儿子都在部队服役，它就打出广告“给你队伍里的男儿寄根香肠”，这句话至今印在卡茨提供给境内外美军特供食品的包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游客败坏的“当地”，所有人都乖乖地“屈从”于它古老的购物规则，拿小票、点餐、票上记账、吃，只要不出门，上述步骤可无限循环，最后去门口小窗凭票付现金。情绪低落时我会来这里，店堂里站着的坐着的，没有一天不是人挤人的；点上一份《男欢女爱》（When Harry Met Sally）里的女主吃过的三明治，心情马上大好（原因不宜剧透）。老法制作的熏牛肉，处理过程长达30天，绝对酥软。一份熏牛肉（pastrami）三明治21刀，一般都会厚到手握不住，但具体有多大，要看你和壮硕的切肉师傅面对面的互动效果，这才是高潮。一列壮汉排开，你好不容易挤上柜台逮着一位，他拿着大块的肉，给你各种切各种尝，你负责各种尝各种赞；你往他的杯子里塞小费，他往你的三明治里塞牛肉；双方意犹未尽。纽约人爱这里的摩肩接踵，爱这里的热闹俚俗——爱这里轻松畅快的人与人。但疫情及其政策，竟然让开业了百年的老店，一年里没有坐进一个客人来。外卖能塞饱肚子，但无法慰藉人心。社会，本该是人与人的连接，这和“饮食男女”一样，原本也是“人之大欲”的呀。

3月里，被铲到路边的雪堆开始融化，里面裹挟着的垃圾露出来，有不少是丢弃的纸口罩，东一个西一个，皱巴着，像残废的病体，像无声的叹息。但春天，还是不可遏制地到了。我在脏兮兮的街边土路上，又看见了儿时常挖的一簇一簇的野葱，一片荒芜中欣然然。房东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把野草挖回来种在阳台上，还把它放到菜里去。我很难讲给他听中国人在背诵“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的心悸，我只能给他念德国诗人里尔克的句子，“我们只是路过万物，像一阵风吃过。万物对我们缄默，仿佛有一种默契，也许视我们半是耻辱，半是难以言喻的希望”。



李明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偏重文化认知和社会记忆领域的研究。近年来长居上海和纽约，致力于北美汉学收藏的挖掘整理与美国流行思潮的观察和记录。著有海外人类学札记《那是风》等，非虚构著作《纽约的伤：一座大都市的损毁与愈合（2018—2022）》预计于2023年3月出版。



2021年2月19日，位于第五大道42街的纽约市公共图书馆主馆。这座研究型的图书馆自2020年3月14日闭馆至今。北面的石狮子叫“坚毅”，身上落满了积雪，不知道是谁给他戴上了巨型口罩。图书馆门柱红色的旗帜上写着“纽约永在”。

2021年3月26日完成于如家酒店14天隔离中

最好的非虚构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图片来自 [Carl Solder on Unsplash](#)

非虚构

2020 纽约： 正确与不正确的一百天

李明洁 | 非虚构图书馆

谁建造了纽约？谁寄生在纽约？
谁维持着纽约？谁享受着纽约？

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

——埃尔文·怀特 (Elwyn B. White)
1948 年，《这就是纽约》

2020 年 2 月末，极寒，去缅因州拜访傅路德和富平安夫妇的一双儿女。3 月 1 日返回纽约，晚上八九点的时辰。给妈妈打微信电话，相当于武汉 3 月 2 日的早晨。“造孽哦，连过生日哥哥们都冇得办法过去一下！月 23 号封的城，几时能看到头啊都快四十天了。”到底是老娘，“怕什么事啊？我都 83 了，心里有数得很。你那边怎么样啊？”我说纽约安全，一个病例都没有。第二天一早，纽约州长科莫 (Andrew Cuomo) 在广播里喊：纽约市曼哈顿岛，从伊朗返回的 39 岁女性，昨天确诊，纽约州首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人，“会出现社区传播，但是没有担心的必要。”

妈妈呀！“可防可控”，多么熟悉的声音。

民主党的这个官二代，从此成了电视屏保，天天声情并茂，与作古正经的共和党总统特朗普打上了擂台。新闻亦或是宣传早就分不清了，双方辩友都很卖力，“塑造”民众“正确的集体记忆”。5 月 29 日，这人又喊，“纽约有望 6 月 8 日复市。历史上没人重启过纽约，历史上没人关闭过纽约。这要记上我的功劳簿。”

别扭吧？是我的脑子还是他的脑子坏了？一提起灾难，就不由自主，深以为伟大并自我感动，难道不是一种智力残缺或者情感障碍？凭君莫话封侯事，3 月 24 日此君还在和特朗普吵架，“呼吸机联邦只给了 400 台，纽约急需 30 万！”

3 月 1 日到 6 月 8 日，整整一百天。纽约，无法呼吸。



2020 年 4 月 15 日下午三时许，纽约，作者在无人的时代广场。身后的巨型广告牌上写着：“生病者，请居家禁足”，“践行社交距离，帮助挽救生命”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官网地址。（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拍摄）

三月：“破坏实验”

三月之前，纽约还是纽约，怀特七十年前就下了定义：“纽约是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在这么一个浓缩的竞技场上，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然而，三月来了。

靠近市区北端的西切斯特(Westchester)县，住着一名天天到曼哈顿 42 街上班的律师。2 日确诊，可能是他也可能是他的家人参加了犹太教堂的活动，反正后果很严重，当地 3 月 5 日 8 个感染病例，3 月 8 日 82 例。3 日之前纽约做过感染检测的不到 20 人，但州市政府“一切尽在掌握”，10 日西切斯特调集了国民警卫队。4 日与哥伦比亚大学一步之隔的布朗克斯疫情爆发。11 日到 13 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同步决定远程授课测试，校园嗖嗖蒸发到了“Zoom”上面。从山东出国被拒签八次的美籍华人袁征，估计惊掉了下巴。2011 年研发的视频会议软件这般席卷全球，而且是拜疫情荒诞紧逼的天意。嗅觉灵敏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撤离，光纽约大学就有超过五千名中国学生。逃亡还是留守？是莎士比亚级别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朱生豪 1943 年译成“生存还是毁灭”，第二年不到 33 岁被肺结核凄然毁灭，也是飞沫传播的传染病。不详与恐慌深埋人类的基因。不知所措的超级都市，困兽聚集。



由贝聿铭设计的贾维茨会议中心 (Jobs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 3 月 27 日由美军陆军工程兵部队改建为纽约第一个应对新冠疫情的临时医院。这是 3 月 31 日医院外景，大屏幕上写着：“呆在家中，保持联系。我们都在一起。”该医院 5 月 1 日关闭，一共仅接收约一千名病人。

3 月 12 日早间，大都会博物馆通知当晚闭馆。赶去布鲁尔分馆，抢看了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 的个展《一切归于绘画 (Painting after all)》。德国人何以反省纳粹的残暴？而极权会借着人性怎样的弱点堂皇吃人？大都会乃第五大道“博物馆一英里”的旗舰，晚上一个一个网站点进去，闭馆、闭馆、闭馆……，图书馆、剧院、学校、教堂应声倒下。上东区大道上空留着广告旗，从 2 月到年底，写什么的都有，是一张张已经毁约或者誓不兑现的苍白婚约。13 日，惠特尼博物馆，穿过熙熙攘攘赶末班车的头顶，特展《美国生活：墨西哥壁画家重塑美国艺术 (Vida Americana: Mexican Muralists Remake American Art)》的前言弹眼落睛：“墨西哥在 1920 年代革命结束后，经历了彻底的文化革命。艺术与公众之间建立了新关联，直接向人民宣讲社会正义和民族生活”，当下美国艺术家要“去创造美国历史和日常生活崭新的历史叙事，以艺术来反抗经济、社会和种族的不公”。纽约知识阶层引以为豪的“政治正确”里，太多的似曾相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瘟疫不是革命的充分条件，但它突显了矛盾、引发了混乱、攒够了干柴。闭馆百天后，惠特尼博物馆的首页，馆长表态“我们站在黑人社群 (black communities) 那边”。然而，同志们，“黑人 (black)”一词的用法正确吗？1960 年代倡导民权，“黑就是美 (Black is beautiful) ”；之后不可用肤色称呼人，“政治不正确”，要改说“非洲裔美国人 (African American) ”；1980 年代美国又“身份政治”了，“黑人”一说成了斗争的铠甲；“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 ”2013 年爆发，当下正在风口，5 月底的纽约下城，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6 月 8 日谷歌公司表态，“黑名单”一词不正确，要改说“禁止名单”。语言，被人心任意摆弄，人类无非是举着它的旌旗翻覆云雨罢了。



6 月 16 日，曼哈顿苏荷区。右起第一块防护板上的口号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s) ”，右起第三块橱窗被砸碎，上面涂有 ACAB 字样，即“所有的警察都是混蛋 (All cops are bastards) ”。左边，工人正在为重新开业更换被毁的玻璃。

1954 年，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 (Harold Kafinkel) 提出“常人分析法”，来研究普通人的行为处事。历史不是在和纽约开玩笑，巨型的国际都会成了他著名的“破坏实验”的标准实验室：通过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局部引入混乱，造成局部失范，从而发现实践活动的内部规律。以打破常规来发现常规，如此拗口的学理在纽约的日常里通俗易懂。3 月中，肉制品、意大利面和面包等主食和调味酱料的货架空了，一下子明白美国民众的基本伙食都是啥。3 月底，卫生纸、洗手液、消毒剂的货架，无辜地贴着限购的纸条，纽约人用起清洁用品向来有种不羁的豪迈，这不是卫生意识升级了，而是对疫情的漫长何其恐惧。再来看纽约市的“金领”人口分布。第五大道 1140 号是上东区老牌古典豪宅，阿尔巴尼亚裔的门房告诉我一半的住户都出游了，可见至少半数左右的年长“上等纽约客”在山区和海滨是有度假别墅的，而且是“到下城东河边直接坐直升飞机就走了”；再去中城 57 街东 117 号，这幢靠近中央公园的新式豪宅有约 200 个单位，熟识的斯里兰卡裔（纽约门房的族裔很有意味）保安说，现在真住在里面的只有二三十户——很多房主是外

国人，买套公寓不过是在纽约置办一间私家旅馆客房罢了，现在谁还敢来谁还能来；本地房主大多去了度假屋，这既说明世界范围内“new money（新贵）”在“old money（贵族、富二代）”前已是毫不怯场，也可见纽约的“高尚社区”并不是纽约人的了。（这也是环球现象，普通话和英文在上海中心都比上海话好用。）两幢楼里这类主动、快速、自觉的“金领隔离”，世界各地都有，其中会写字的还写了不少精致且高尚的文章，比如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斯利玛尼（Leila Slimani）3月13日离开巴黎，逃到度假宅邸开始乡居隔离生活，并在风景如画之地为《世界报》撰写“疫情日记”，连载了六篇即被叫停，被认为是“何不食肉糜”的法国版。武汉也有个作家，但她是封在城里写的日记，网民各种努力各种转发，但后来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记下的日子，各有各的幸与不幸。

23 日纽约市所有非核心商业机构禁止营业，非核心工作开始居家办公。中央车站下午四点的光景，全天候的喧嚣嘈杂一下子彻底静音，眼光所及，绝没超过二十人！4名男性摄影师长枪短炮，2名男性旅客快步流星，其他全部是向你走来的男性乞丐。我夺门而出。谁建造了纽约？谁寄生在纽约？谁维持着纽约？谁享受着纽约？谁向往着纽约？“破坏实验”下，水落石出。日夜不息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的平凡人的搏命的潮汐退去，纽约静了下来。



3月31日下午四时许，空落的中央车站。

铜牛身边永远的人群被掠去了，它耙着华尔街的地皮，不肯倒下去。矗立的高楼晾在那里，世界不再等着我们、看着我们以及围绕着我们。



3月31日下午2时许，无人围观的华尔街铜牛。

四月：社交距离

2003年初，我在香港经历非典疫情的全过程。全港人戴着口罩，坚忍地让一座特大城市运转如常。这次纽约大动静，闭市停工，还兴出“要戴口罩、居家禁足”和保持6英尺（2米）“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的规矩。这套由政府和卫生机构搭起的新规范，挑战着人们的生活秩序，日子的过法开始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别了。一开始，纽约人对口罩很排斥，一是当地文化中只有病人和抢劫犯才戴口罩，二是媒体在月初极力宣传把口罩留给防疫物资储备不足的一线医护人员。愚人节那天我给房东所在的居委会打电话，请主任拜托物业加强楼道里公用电梯和门把手的消毒，她才意识到危险已经不再是愚人节的骗局；76岁的她开始发烧，疑似感染，家里居然没有备用口罩；房东是她的老闺蜜，急着要去探视，被我强行拉住，“现在这样做不正确！”

“社交距离”对纽约人来说，是毫无概念的概念。与其说是陌生的生活样态，不如说是既有的阶级标尺。与“金领社交距离”的多选项和跨地区尺度相比，“蓝领社交距离”几乎就是个传说。“核心从业人员”，除了医护外，超市、加油站、药房的员工，大多是拿周薪的底层劳工，而家政护工、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多是西班牙语裔、亚裔和黑人，不上班就沒收入，这些工作既无社交又无距离。中产阶级的“白领社交距离”，是布爾乔亚式的甚至带着道德意味的。布鲁克林是纽约之“小资圣地”，乔氏超市（Trader Joe's）环保、全球、有机，弄得中产很舒服，金色大街上排队的人儿，2米一哨地站了两个街口；六大道4街口上的“公园坡食品合作社”（park slope food coop），1973年成立，大名鼎鼎，有近2万名会员，会员想激活？每四周务必在店里工作2小时3刻钟。“公园坡”这个地界住着的是什么阶级？有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代新人”！举个例子，现任纽约市长民主党人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搬入官邸前就住在这里，1994年他把曾经是女同性恋的激进黑人活动家麦克雷（Chirlane McCray）掰直成婚，生下混血儿女一双，2001年自己改随母姓（他的父亲是德国裔，母亲是意大利裔），恨不能在自己身上克服整个时代的“不正确”。“公园坡食品合作社”，杠杠的，不认同他们价值观

的恕无可卖，非会员只可参观不可购买。闭市已经快一个月了，排队的会员不慌不忙，站了一个街口，数一数，15个，直接可以拉上T台，各自有型，是买个菜都要扮上的那种，当然也是完全可以通过网络“在家工作”的阶层。有点钱有点闲，买贵点、排队时间长点都没关系，因为这很“道德”，当然就比去贴隔壁的华人小超市买通过资本主义自由商品渠道批发来的蔬果要“正确”了。1950年代，中国也搞过农村合作社，集体所有，集中劳动、按劳分配，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中国改革开放了，市场经济了；轮到纽约的城市中产办起了“政治正确”的合作社，人按思想分门别类了起来，居然“风景这边独好”。



6月9日，纽约复市的第二天，曼哈顿中央公园。纽约公园管理局在全市公园内设置了这个标示“保持如此间距”，提醒人们保持2米社交距离。

4月12日的复活节未能天随人愿，原定2周到期的闭市计划并未解禁，墓地全部大门紧锁。一家三代，被阻隔在一处铁门外。小孩子很天真，“是怕我们传给爷爷还是怕爷爷传给我们呀？”围栏外人们留下鲜花、兔子的玩偶和棕榈叶的十字架，“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4月13日得知坚持每天健身跑的女友竟然发烧了，背部剧痛，15日测试确认感染新冠病毒，18日她的九旬老父病逝，20日入院吸氧，服用羟氯喹见效，24日她的母亲因感染病毒以及其他固疾离世；27日她才出院返家，妹妹又被确诊。牵记、伤痛和歉疚，都敌不过“正确”的隔离。



4月22日，“海景公墓”围墙外，疫情期间禁止入园的祭奠者留给亲人的鲜花、复活节兔子玩偶和棕榈叶十字架等。

纽约市长宣布，为保障监狱里的“社交距离”，在三月中旬之后的三周内，城市监狱释放了1500名囚犯，纽约囚犯人数减少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纽约很多地方比如皇后区的科罗纳（Corona，意即“冠”），恐怕要比监狱更难保障“社交距离”，熙攘的街巷挤得像城隍庙，满街都是南美移民开的店铺，间或几个劳碌华人从旁边的法拉盛匆匆穿过。像是命运的捉弄（这次流行的就叫冠状病毒 Coronavirus-19），这个通用西班牙语和汉语的贫困街坊成了纽约最重的疫区。并不是所有人都领情白思豪的“伟光正”政令，3月底开始，苏荷区的奢侈品店在玻璃橱窗上加装三合板，被嘲笑说是“反应过度”。纽约人忘了，这些广布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欧洲名牌，刚刚被“黄马甲”运动洗礼，见识过大世面。路易威登还维持着体面，“稍歇的旅程终会再出发”；拉夫劳伦甚至很励志，“携手并肩，共克时艰”。然后就是5月31日，“欲盖终无‘弥彰’”，苏荷区一夜之间火光冲天。



4月15日，曼哈顿苏荷区。路易威登纽约旗舰店加装了防护板，上面写着“稍歇的旅程终会再出发，路易威登愿您与所爱安康。”

4月的纽约，忍耐、压抑、平静。百无聊奈的日子里我想，它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呢？3月27日特朗普签署法案，动用2.2万亿美元作为纾困金直接下拨，4月15日，房东、

邻居甚至我认识的几名中国留学生，都说收到了署名是总统特朗普的通知函和汇款，“在与看不见的敌人交战之时，我们也在全天候地努力工作，保护像您一样努力工作的美国人免受经济停摆的困扰。”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为疫情期间失业的劳工，提供每周600 美金的额外失业福利。白宫经济顾问顾德洛(Larry Kudlow)在有限电视新闻(CNN)上发牢骚，“我们等于是发钱给民众，让他们不上班。金额比工资还高。”一到 4 月就接到市政府打到住处的电话，说从 3 日起，纽约 435 个地点(领餐点大多设在公立学校)从周一到周五都可以免费领取一日三餐，无需任何证件和证明；60 岁以上长者可送餐到家。2 月底湖北 6 岁男孩在爷爷感染病毒去世后不敢出门靠饼干充饥，刺痛无数人心扉。我跑到离我最近的“市立第 53 小学”一探虚实，遇到干了 23 年的总务长老约翰，他每天早上 5 点第一个来学校开电闸开烤箱，6 点半老师们来分装食品，7 点半发到下午 1 点半，每天来的街坊能有两三百，“都愿意留给更有难处的人家”。学校的外墙是民间艺术家勒贝多(Scott LoBaido) 2013 年画的巨幅美国国旗，我前年采访他，知道这位“星条旗专业户”25 年的作品虽然数以千计，但纽约主流艺术圈对他各种看不上；对因此被冠以“民粹主义者”的帽子，勒贝多格外愤愤不平，他坚持认为这面旗帜是“为人民服务”的旗帜。我不知道他的判断对不对，但这一张支票和一顿饱饭，中气十足。



左为美国纳税人于 4 月 15 日收到的署名为特朗普的疫情纾困金通知函。右为 4 月 21 日供任何人免费领取的疫情救济餐，无荤食，穆斯林适用，其中牛奶全部为脱脂奶。

疫情为星条旗在纽约赢得了短暂的“正确性”，毕竟这座城市的政治正确是属于彩虹旗的。2019 年同性恋运动五十周年纪念，纽约宣布整个六月为骄傲月(以多样化的性倾向为傲)，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代表着 LGBTQ 社群(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等)的彩虹旗和彩虹图案。不过今年四月，“彩虹图案”被部分纽约人赋予了新意，人们在窗户和门扇上手绘彩虹，表达对“雨过天晴”的期盼，也向身边的一线工作人员致谢。在共和党倾向的史泰登岛更是随处可见，这也很好理解：纽约的其他四个区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和布朗克斯，都是民主党倾向的，文化上“先进”左倾，彩虹旗必须是“骄傲”的；而史泰登岛的原住民多为工人阶级，他们及其子女的涂鸦，很难入其他纽约客的眼，不仅艺术上土俗，观念上也很不“高级”嘛。然而，我却因为这些彩虹，对纽约保有了最低限度的信心。邻居珍妮的弟弟在纽约市消防局紧急医疗服务局开救护车，带着外甥来看她，因为社交距离，只能楼上楼下地喊话，两个孩子在楼下的水泥地上画起了彩虹，“献给最爱的姑妈”。珍妮很骄傲地介绍给我认识，“我还有个姐姐在做护工呢，担心是担心的，但他们俩救过来好多人啊”。我向阳台上的她挑起大拇指，这难道不是最善良的价值观和最美好的公民教育吗？在整个世界神魂颠倒地保持着“正确”和“距离”的时候，普通百姓以及他们的常识、常情和常理，是潺潺流过心田的溪流。道不远人。



纽约史泰登岛上老百姓在门窗和墙壁上绘制彩虹、黄丝带和星条旗等图案，为尽快结束疫情祈福。上部是 4 月 22 日画家莎妮应披萨店主的邀请在其门店窗户上作画，其中护士形象的灵感来源于美国二战的文化符号“铆钉女工 (Rosie the Riveter)”，与 1942 年的海报“我们能做到”呼应。左下角是 4 月 5 日民间艺术家勒贝多在第 35 市立小学的外墙上绘制的十米见方的心形星条旗，缅怀因疫情逝去的美国同胞。

五月：破碎与断裂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生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参合在一起。”春雨的确催促了那些“迟钝的根芽”，但很多人却没能跋涉出四月纽约的“荒原”。

闭市之后，失业、酗酒、吸毒和自杀的人数攀升，皇后区在五月开始前的六周内自杀人数已是去年同期的 2 倍，达 16 人。4 月 26 日，纽约长老会医院急诊科主任罗兰·布林 (Loran Breen) 医生自杀，以悲壮的方式，宣告了这座城市疫情 2 个月来惨烈的身心伤亡。截至 6 月 8 日复市，纽约共有 20.5 万人感染，2.2 万人死亡。然而，往日承担着社会救济、心理安抚和操办人生仪式等众多重要世俗之责的社会机构，仍旧被迫关闭；哪怕不少教堂申辩这些事项理应属于社会的核心需求，很多机构也质疑这对私权构成

了侵害，大量民众甚至以 1968 年“香港感冒”在美流行而政府并未介入来申明公民和社会都需要责权对等的自由与繁荣；但大家心知肚明，很多地方的政府和政党都视疫情为千载难逢的机遇，以疫情为名，掌控了前所未有的权势，这在社会组织原本极为自主且活跃的纽约颇为新鲜。宗教团体在政治正确的纽约更是早已式微，5 月 23 日现任天主教纽约总教区枢机弟茂德·多兰 (Timothy M. Dolan)，来到纽约史泰登岛洛雷托山这一纽约托幼慈善事业的始发地，为因疫情亡故的 946 名岛民祝祷。这一兼具历史和现实价值的新闻，《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只字未发，我是在很多当地人的脸书上看到的。主教冒雨上岛，来到民间艺术家勒贝多创作的装置作品《音容 946》前，天空放晴，若奇妙恩典。疫情期间殡葬业停工，没能做最后告别的家属聚集到这里。海边拾来的枯木还是抵挡风雨的翅膀，沙滩上的 946 块玻璃破碎却还轻触低吟。这是生命毁而不灭的声音。



5 月 21 日，勒贝多为史泰登岛上的 942 名疫情死难者创作了纪念装置“音容 946”(5 月 23 日，多兰主教来祷告时死亡人数增至 946 人，改名为“音容 946”)，宽 3 米余，高 4 米。后为 1972 年电影《教父》开场戏的拍摄地圣约阿希姆和圣安妮教堂，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意大利裔纽约人的生活状态。

6 月 4 日，两家精英医学杂志《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 撤回了两篇备受瞩目的冠状病毒论文，原因是原始数据的来源可疑；而前者已经产生全球影响，世界卫生组织 (WHO) 因其紧急叫停了羟氯喹的药物试验，而该药因为曾被特朗普热捧，而在媒体上被热讽冷嘲了不短的时间。3 月州长声大叫纽约需要 30 万台呼吸机犹言在耳，而“美国健康与指标研究所”的数据模型显示，4 月 8 日纽约已达呼吸机预计使用的峰值 5008 台，实际使用量只会更少。曾经喧嚣的媒体，莫名的万马齐喑。神仙打架，百姓不由得怀疑学界、政界、商界和媒体是否是同谋。4 月 30 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五分之三的美国人不能或者不愿意使用“感染跟踪系统”(类似中国的“健康码”)，尽管谷歌和苹果公司都设计了应用软件，但由于人数不够这项跟踪技术的基数而无法投入使用。硬件上的原因在于，六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智能手机；而拥有智能手机的人中，愿意用和不愿意用的人平分天下。有意味的是，民主党人更愿意用，也包括害怕感染后有严重影响的，他们更倾向于依靠政府；而不担心疫情的共和党人则很不愿意，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过多介入私人生活，害怕个人隐私被泄漏或被不当使用。6 月 20 日众议员科尔斯 (Alexandria Ocasio-Cortez) 在推特上提及中国民众熟悉的“抖音”，这名 30 岁代表纽约州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对网络水军喊话，“看到并感谢你们的贡献”，直言大量青少年在抖音上注册特朗普的竞选造势大会门票，却有组织地放了他的鸽子。此事真相待考，但当晚特朗普刚刚开讲，科尔斯 8 点 32 分就发了这条推特，集了 23 万点赞，却是真的。



34 街 8 大道 15 层楼高的墙画，结合了多种族裔面部特征的护士形象。由街头涂鸦设计师伊顿 (Tristan Eaton) 和蒙特菲奥雷 (Montefiore) 医院合作，献给 5 月 12 日的“国际护士节”。上方写着“献给所有勇敢的护士，从现在到永远。谢谢你们疗愈着纽约。”左下写着“纽约”，右下写着疫情最早爆发的“布朗克斯区”。

2020 开年，在疫情还是四面楚歌的时候，纽约只有亚裔在周围人白眼里戴着口罩，可是到了 5 月纽约人离开口罩已经寸步难行。4 月 15 日，白思豪市长在疫情简报中公布“口罩令”，这一政令要求大家在公共场所戴口罩并无争议，但它授予任何人秒变衣警察的资格，遇到进店未遮面的顾客，都要拍照上传到 311 政府热线告警，警察会进店

帮助执行”。可笑的是，白思豪素以“煽动反警察情绪”而与警察势同水火，2014年底纽约华人警官刘文坚和队友拉莫斯因公殉职，数百名警察在白思豪到场悼念时以背相对，“背对”由此成为纽约警察“面对”本届市长的标准动作；不可笑的是，2个月后，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P. Floyd）遭明尼苏达警员跪颈致死，引发全美对警局的抗议，纽约市警务处长谢伊在6月16日突然宣布，取消市警打击犯罪小组，全市约600名便衣警察面临重置。纽约人一向看中肖像权，对着陌生人拍照显然有悖旧有的“教养”。纽约的老百姓对极权还是太没有经验，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在尊重个人权利的私有制社会，这是公权力堂而皇之高歌猛进的前奏，而公权力一旦鼓动群众起来斗群众，一只口罩就马上会变成“武器”。5月15日美国炸鸡连锁店派派斯（Popeyes）在上海淮海路开出旗舰店大排长队；这家快餐店在纽约门店多得是，特别受黑人欢迎，住处附近就有一家。经理是黑人，店员黑人、白人和墨西哥人均分，勾起馋虫的我16日进店一看，前面站着2名黑人和一名白人青年，都没有戴口罩；经理出来说明，没有口罩不许进店。一名黑人很大声，“有没有搞错？我们是顾客，送钱给你的”；另一名马上举起手机，“他的口罩露出来鼻子，她的口罩挂在耳朵上。我叫警察来，你们现在就关张滚蛋”；而同行的白人青年不响。在现场喧嚷不安的氛围中，我脑子里全是孔飞力《叫魂》里的话，“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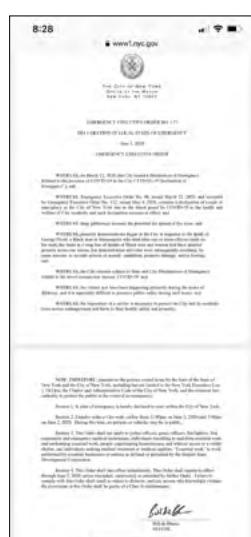
五月底，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与祖国之间的距离成了“乡愁”——乡愁是一张窄窄的机票，我在这头，上海在那头。2月28日美联航为应对中国疫情爆发，宣布取消4月30日前的所有中美航班，涵盖了我原定双程票的回程时间，改签5月4日；没想到3月26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俗称“五个一”的限航令，即“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4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出推文，呼吁海外美国公民“立即回国”，引发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网上更是各种脑洞大开的猜测，没想到人家一语成谶，国际间商业航线停航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四五月间，世界范围内没有不是“万水千山总是难”的；求告无门的留学生编了个段子：“一个中国人，一旦出国当了一名留学生，就会一直买不到一张回国的机票，简称五个一”。6月3日美国运输部要求中国航司从6月16日起停飞中美航线；6月4日，中国适度放开了对美国航司的限制。这简直就是曙光，我立马算了算，如果美联航申请航线，中方可能批准，可能不批准；如果批准，美联航会在现有的三条航线（洛杉矶飞北京、纽约飞上海、旧金山飞上海）中选一条；如果选中我买的纽约飞上海航线，会在一周七天中选一天；二分之一又三分之一又七分之一，我改签的7月2日的机票会有四十二分之一也就是大约2.4%的执飞几率！痴痴地等，美联航7月6日起恢复了旧金山到上海的航班，签证就要到期，“鸿雁啊，天空上，排队排成行”。

社会的断裂熬到五月已经再也无法掩饰了。“家庭观”几乎可以看作美国民众世俗的宗教，而家庭成员的人生礼仪差不多就是宗教节日，尤其是孩子们的毕业典礼。今年所有的毕业礼都在云上飘，不少人家的门口，都插着大小中各类学校的毕业祝贺标志。舞会、合影、宴请都取消了，太多蓄谋已久的故事连开讲的机会都没有。5月20日纽约开了266年的哥伦比亚大学，首次线上直播“云”毕业典礼。校长李·布林格（Lee C. Bollinger）致辞，“与带给我们生活意义的人们、场所、仪式和传统分离，是回避不了的悲伤。当危机来临，社会需要大学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他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言论自由领域著名的法学者，前面一句话我感同身受，但是后面一句话我却有点怀疑。知识分子最恐怖的身份错认，就是往往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当下美国的知名大学，当然给了社会一些“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恐怕也给了不少“煽动、消解和破坏”。1791年第一修正案获得通过，使美国成为首个在宪法中明文保障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尽管学界都在虔诚地谈论“宽容”，但今日美国大学对那些挑战政治正确教条的人，又能有多少耐心去宽容呢？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师、诗人和学者都变成了它出钱招募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里，1848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

六月：纽约无法呼吸？

纽约人是不过六一国际儿童节的。2020年6月1日，纽约宵禁。



6月1日作者手机上收到的由市长白思豪签发的宵禁令。

这是二战后纽约的首次宵禁，上次宵禁是1945年2月，盟军轰炸德国，美国煤炭短缺，所有娱乐场所停止夜间营业。5月25日弗洛伊德之死事件曝光后，不少美国市民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公正审讯涉事警员和正视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但示威很快演变为暴动，堵路、店铺抢掠、破坏公物等现象蔓延全美，截至5月31日，33个城市宵禁，27个州出动国民警卫队。弗洛伊德死前最后所说“我无法呼吸”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新的口号。5月31日周日晚间，纽约下城熨斗区和苏荷区遭纵火抢劫，包括美国最大的百货公司梅西旗舰店。6月1日市长宣布当晚11点到2日5点宵禁，之前还未安装防护板的店家一夜之间紧急行动起来。6月2日白思豪再令从3日晚8点开始到8日早5点宵禁，提早到日落前20分钟，曼哈顿96街以南车辆禁止通行。当天的大新闻是，萨克斯第五大道雇用了一列私家保安和至少7条德国黑背和斗牛犬，严正以待。为了复市，宵禁提前一天结束，但暴乱让8日所谓的“复市”成了空头支票。9日，我穿行在曼哈顿麦迪逊大街这条纽约标志性的高档商业街上，从96街数到50街，走过四十多个街口，上着板且关着门的店家不下80%。我走到萨克斯门前，问黑人保安泰拉怎么看，他严肃地回答“我在纽约做了25年的私家保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阵势。”



6月9日第五大道萨克斯百货公司旗舰店，私家安保护卫中，烈犬已撤离。防护板上罕见地加装了带有锋利刀口的防爆铁丝网。

疫情一百天之后，巨大的纽约像一头搁浅在北美大陆东岸的死鲸，鲸爆终于来了。各种丑陋，大白天下。疫情已经无法成为任何一方的幌子，人群密集的抗议示威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酒吧街边的饮酒青年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正确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媒体在互相揭露中各取其辱。政客秀跪，教授蒙尘，历史雕像被毁。来自波兰、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或者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东方阵营”移民，更为敏感和惊惧，“Fire, Riot and Looting (造反有理)”、“Defunding the police (砸烂公检法)”、“Silence is not a choice (人人表态过关)”。极端思维，笼罩全城，纽约似乎已经无法正常呼吸。

我确实认识一名相当成功的白人剧作家，得过包括艾美奖在内的不少行业大奖，他的想法和做法在美国影视圈里自然是极“主流”的，比如，他下载了此次抗议的专门软件，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市区的所有游行；他们认为特朗普是万恶之源，只要谁支持特朗普谁就是种族主义者（我对好莱坞正在传染的情绪和逻辑，同情却不能理解。特朗普显然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社工系的教授高呼“只有黑人的命是命，其他的命才能是命（All live matters after black live matters）”，认为维护社会正义比防止社会停摆更为重要。阿尔·夏普顿（Al Sharpton）被推为当下美国“黑权运动”

（black power movement，其中的激进派是由五十多个核心组织互相协作的运动联盟M4BL，即 Movement for black lives，“黑生命运动”）的领袖，2014年开始他推动刑事司法改革，理由是黑人在美国被捕和被监禁的人数占比高；2017年身为黑人的他呼吁联邦政府停止维护杰斐逊纪念堂，因为这位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曾有600名奴隶，“人们要知道自己被奴役了，咱们的家人都是受害者。用公共经费维护这些纪念物，就是要咱们出钱去羞辱亲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也是黑人，他在推特上直言：“把人们领进依附和不满的死胡同，可能无助于改善他们的处境，但那些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者之友的人，却可以名利双收”，“无论政治左派的意识形态或修辞是什么，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议程一向是代替别人做决定，并管制他人的生活。我在加油站遇到前联邦众议员维托（Vito Fossella），‘在我的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见到商业大公司发声支持暴力抗议，第一次见到好莱坞明星为警察拘留者付费保释。左派已经极左到吓人了。马丁·路德金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个大右派，和白人‘一个梦想’？政治极不正确。’退休的狱警保罗打开他的枪柜，给我看他私有的各式枪械，“解散警局？出了事为啥只会打911呢？这帮没良心的！美国百姓为什么不放弃持枪权？就是因为要是王八蛋的政府想操蛋，胆敢侵犯我的财产，改变我的美国，老子头一个扛枪出阵。”如果我们愿意去听，这些人的想法里多少有些真相甚至真理的影子，大家的手中都掌握着解决顽疾的密码中的几个字符，但问题是彼此不能或者根本不愿意交流了。人们选边站队，所谓的“民主”成了“一个美国，两种表述”，人们鸡同鸭讲，风马牛不相及；而政客们无不仗着大众的名义兴师动众。人民统统成了人质。



史泰登岛一市民院子里插着的三块标志牌，上左写着“我们站在纽约警察那边”，上右写着“感谢您，一线工作者”，这两块牌子上都写着“坚强！（加油！）”和“上帝保佑美国”。下面的“细蓝线”取自支持警察的旗帜图案，上面写着“顶住！”。

“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我们自己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大概也可以被称之为预示性的惊颤，正战战兢兢地为我们所要创造的那个社会提供目前还难以解读的信息。”6月2日《费城询问报》发表一名建筑批评家的专栏文章《建筑也重要》（注意英文标题“Buildings Matter, Too”），8日执行主编因此辞职；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一名参议员的观点文章《派军队来：国家需要恢复秩序，军队随时待命》，7日该报评论版主编詹姆斯·贝内特（James Bennett）因此被迫辞职。美国新一代的所谓“警醒”（woke）文化，以急风骤雨般的“删除攻势（cancel culture）”加“点名攻势（call-out culture）”，向秉持“客观中立公正”的公民自由主义传统的新闻观念，“气昂昂”地发起了“倡导式新闻”的大会战。美国主流媒体的代际更替轰然而至。文化思想的自由不可能一下子公开消失，它有可能被神圣的承诺和高尚的理念一点一滴地夺权，有可能被拒绝对话的偏执蛀空，更有可能是个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放弃了独立思考而被“平庸之恶”（准确地说是“从众之恶”，里面还有很多仗势自欺的懦弱）吞噬。没有了思想自由及其标志性的言论自由，美国还何以成其为美国？

我在被洗劫后的苏荷区的弹街路上，高高低低地读那些防护板上的涂鸦。等在街边的黑人司机肖恩见我走了好几个来回，与我攀谈起来。他的祖母从索马里来，他出生在布鲁克林，“我34岁了，日子这么不安生，可是头一回，咱纽约不带这样的。”我说，“纽约现在乱是乱的，但可以这样明火执杖地对着干，也是别的地界少见的。”



6月16日曼哈顿苏荷区，一名白人女青年正在画一个骷髅头的草稿。最左边的涂鸦上写着“不能呼吸”，中间的涂鸦上写着“种族主义是一种病”；最右边的涂鸦上写着“爱”和“所有人的和平”。

“我爱纽约”，我和肖恩几乎同时异口同声，又几乎同时下意识地伸出了手。我们随即意识到，这样做现在是不正确的。但我们还是在夕阳里有力地握别，“珍重（Be safe），珍重”。这句疫情期间兴出来的告别语，如今有了越来越多的意涵。1946年也是3月，“局外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乘船驶入纽约港，一年以后，他也回想在纽约度过的一百天，写道，“我爱纽约，那强烈的爱有时留给人的，全是无常与恨意”。

6月19日于纪念美国南部黑人解放的六月节初稿第五大道纽约公共图书馆

6月20日特朗普连任竞选集会电视直播夜修订于史泰登岛林地公寓

6月21日报悉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决定移除罗斯福雕像再改

本文以《[纽约 2020：正确与不正确的 100 天](#)》为题，首发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李明洁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偏重文化认知和社会记忆领域的研究。近年来长居上海和纽约，致力于北美汉学收藏的挖掘整理与美国流行思潮的观察和记录。著有海外人类学札记《那是风》等，非虚构著作《纽约的伤：一座大都市的损毁与愈合（2018–2022）》预计于2023年3月出版。

非虚构图书馆

最好的非虚构作者和他们所记录的。



4月4日，贝鲁特大爆炸纪念游行，抗争者挥舞雪松旗，经过其一受难者死亡的公寓。
摄影：陈映好

非虚构

烟硝散尽之后， 黎巴嫩漫长的公民抵抗 在场 | 生活亲历者

“没有任何人会给你一个国家，
你必须自己去争取。”

本文为“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一季获奖作品，作者：陈映好

第二季报名已截止，更多讯息见在场官网。

小鸟文学授权转载。

贝鲁特一直以来
是用人民的灵魂酿造的红酒
是用人们的汗水制成的面包与茉莉
那为什么现在味道尝起来，像火药和硝烟?
致贝鲁特，用灰烬堆叠而成的荣耀
致贝鲁特，用她怀里儿子的鲜血制成

——菲鲁兹《致贝鲁特》

三月底从伦敦抵达黎巴嫩贝鲁特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入境处的照明比我预期中的还亮，空调也运作正常，难以想像 20 个月前的大爆炸，如何将机场震得满地碎玻璃与天花板塑胶块。

提取行李的运输带旁，中东航空公司派数位专门协助搬运行李的人员，在输送带旁协助说着阿拉伯语的旅客，在推车上叠起一个又一个厚重的行李箱，4 到 5 个 24 吨行李箱是基本，还有乘客堆着大大小小总共 8 个。曾看过报导提起所谓的“行李箱经济”，眼前的一卡一卡皮箱，是现实生活里黎巴嫩人面临经济危机和医疗资源短缺下的结果——人们必须靠自己透过人脉网络与境外资源建立起供应链。

54 岁的计程车司机哈比 (Habbi) 在机场外和我斯文有礼地挥着手，欢迎我抵达贝鲁特。第一次吗？他边开着车边问。喔不，2019 年五六月来过一次。我说。

你会发现那时和现在，很不一样。

54 岁的计程车司机哈比 (Habbi) 和我说，在 1997 年到 2019 年上半年，一美金还是绑定约 1500 黎币，他的修车库一天可以赚进 100 美金，足够让他缴房贷，养家庭，供两个 20 出头的儿子女儿上大学，有时还可以搭 20 分钟的飞机到塞浦路斯度假。直到 2019 年，由于公共债务不断升高、失业率居高不下陷入金融危机，黎巴嫩磅贬值超过 90%，2020 年爆发的新冠疫情让财政情况雪上加霜。出发前我下载了里拉汇率即时更新软件 (Lira Exchange)，每 3 到 4 小时，就浮动一次，今年一月时最高飙到一美金 3 万黎币，在计程车上，记录下收到的通知分别是 25400、21500 和 23500。但黎巴嫩的最低薪资仍旧维持在每月 675000 黎币，以抵达当日的黑市

汇率计算，最低薪资从 450 美金，掉到剩下不到 30 美金。这不止导致黎巴嫩银行财政的崩塌，也导致严重的能源、粮食和药品的短缺。

“这一切要我们怎么活？”计程车司机哈比没办法掩藏这两三年来他的挣扎，他现在一个月大约只赚得了 40 到 50 美金（约 100 万黎币），因此下午 4 点下班，紧接着开计程车来维生，有时到凌晨 1 点才得以休息。“当时谁会知道，2019 年竟是黄金年代。”

和 2019 年 6 月时造访的贝鲁特相比，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个城市变暗了。晚上 7 点多几乎没有路灯亮着，高楼大厦与楼房没有几盏灯是醒着，仍经营的店铺靠着私人发电机供电，或是仅依赖电池通电的灯泡继续生意。

抵达贝鲁特朋友的住处，用着手电筒走上楼梯，电梯因为停电无法使用。朋友要我抄下这些数字，10 到 11, 13 到 15, 18:30 到 23:00.....是这栋公寓发电机的供电时间，公共电网基本上在 2021 年，因国家电力公司 (EDL) 在燃料进口短缺的压力下，关掉了两处主要发电厂，让全国电力从原本半瘫痪到完全瘫痪的状态，本来每日供电 5 到 6 小时，到一天平均不到 2 小时，有些地区甚至完全没有电力。居民抱着有电是侥幸，没电是人生的心态。

晚上 11 点，不出所料，卡！贝鲁特友人家的发电机准时跳闸。“欢迎来到黎巴嫩！”友人欢呼，下一秒就反射性地打开备用灯管，拎着毛毯，在昏暗黄光下照样在客厅喝着玛黛茶聊天。上一秒他们还在称赞中国制的直立小型低耗能电暖炉，如何因应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供电处境，将四面的发热管从三支减为两支，降低耗电瓦数，暖炉顶部还可以放咖啡壶保温。

即使公共电网瘫痪，在市中心的酒吧和夜店仍靠着私人发电机，让年轻人狂欢到深夜。跟着一群叙利亚朋友拜访位在贝鲁特西北角哈姆拉区 (Hamra) 的地下酒吧，挤满了上百位 20 岁上下的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和一些外国人。阿拉伯流行舞曲一首接着一首，灯光由黄转为紫红，再从紫红转为正红，人们摆动，酒杯交错，他们的眼神、搔首和触碰，都像是百分之百拥抱当下的亢奋、欣喜和自由。让我想起《必是天堂》(It must be heaven) 中的最后一幕——巴勒斯坦籍导演伊利亚·苏莱曼坐在海法 (Haifa) 的一间酒吧里，无声地凝视着舞厅里的霓虹和紧贴乱舞的年轻男女。在不知明天是否将会糟中更糟的生活里，人们今夜有酒今夜醉。

贝鲁特大爆炸遗留的火种

黎巴嫩最具代表性的歌手菲鲁兹 (Fairuz) 在 1975 到 1990 黎巴嫩内战期间，写下《致贝鲁特》(Li Beirut) 这首歌给她的城市。4 月 4 日，贝鲁特港口大爆炸后第 20 个月的 4 日，这首歌再次播放放在受难者家庭的抗议队伍之中。当天下午 4 时，受难者家属与倡议者聚集在市中心用广告写字版搭起的数百公尺受害者纪念墙贴上一张张新的高约两公尺的亲人素描肖像，或是修补被风吹雨淋毁损的海报纸。

街角另一头，是一辆辆的装甲车和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在附近警戒。

49 岁的贝卡 (Hiem Bekai) 站在儿子的素描像前，一手抚摸着海报，一手捧着儿子的遗照频拭泪。照片上是一位阳光的男孩，穿着牛仔衬衫，带着灿烂的笑容。2020 年 8 月 4 日——事发那天的傍晚——贝卡唯一的儿子卡丹 (Ahmad Kaadan)，刚巧开车经过靠近港口的杰美札区 (Gemmayze)。那里是贝鲁特的夜生活中心，许多年轻人下班后聚会小酌的场所。没想到两声巨响杀死了他的儿子，享年 29 岁。



4 月 4 日，贝卡捧着儿子卡丹的肖像，默默掉泪。摄影：陈映好

罹难者家属拿着家人的肖像出发，行经一栋一栋受难者曾经的住所，有些已修复，有些仍可见被摧残的痕迹，他们停在一栋挂着 15 岁男孩遗照的民宅前，挥舞着雪松旗。游行队伍继续前行，其中一位律师，他的亲人也在爆炸中离开，他用着大声公，对着灾后翻修好的法国建筑大喊，“楼盖好了，但正义去哪了？”一旁其他的家属，忍不住在队伍里哽咽哭泣。

一路走到事发的港口，直望 2020 年骇人的爆炸现场——已被夷为平地的 12 号仓库，和前方仍旧焦黑皱烂的黎巴嫩国家储备粮仓。2750 吨的工业用爆炸原料硝酸铵，就是在那被点燃。家属在 6 时 7 分，爆炸发生的时间，点燃蜡烛，为死去的灵魂哀悼。纳格尔 (Paul Naggar) 捧着 3 岁女孩的插画图像，戴着卡其色布口罩站在抗争中的一角，他的 3 岁女儿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是受害者中年纪最小的之一。纳格尔回说：“这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首都，我们的生命被轰炸、被夺走，我不会，也不可能放弃这场战斗。”

紧抱着儿子遗照的贝卡也说：“我们上街是要铲除‘这群人’、换掉‘这群人’。”

贝卡口中的这群人，和许多年轻人口中的“sulta”(سلط) 是同一群人——阿拉伯语的掌权者，指长期利用宗派政治体系掌握权力的传统大党政客，包括领导基督教自由爱国运动党 (Free Patriotic Movement) 的黎巴嫩总统奥恩 (Michel Aoun)、在位 30 年的国家议会发言人兼阿迈勒运动主席贝里 (Nabil Berri)、2019 年公民抗争后下台却仍掌控地方势力的时任总理萨德·哈里里 (Saad Hariri)、大爆炸后引咎辞职的时任总理迪亚布 (Hassan Diab)，还有大爆炸后新上任总理、同时也是黎巴嫩亿万富豪与电信大亨的米卡提 (Najib Mikati)，以及由伊朗支持、拥有自己军事组织的什叶派真主党。

被彻底摧毁至少 5 次的城市

2020 年 8 月 4 日傍晚，22 岁的消防员查贝尔·哈地 (Charbel Hatti)，接到贝鲁特港口报案仓库失火了。当时，与哈地一起值班的还有他 26 岁的堂哥纳吉 (Najib Hatti) 和 37 岁的姊夫查贝尔·卡拉姆 (Charbel Karam)，他们迅速组成 10 人小队赶往港区起火点。

起初，他们还不清楚仓库内放了什么，只觉火势不对劲。火势很快地蔓延，最终点燃堆在 12 号仓库里搁置 6 年之久的 2750 吨工业炸药原料硝酸铵，短短几十秒内，两次的爆炸声响，瞬间摧毁了港口的大部分地区，空中窜起巨大骇人的红色烟雾蘑菇云，酿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人为非核爆炸之一。



查贝尔·哈地、纳吉、查贝尔·卡拉姆三位消防员的肖像，被挂在重建的东贝鲁特消防局外。摄影：陈映好

贝鲁特大片地区被摧毁，建筑物倒塌，数十人被当场活埋在瓦砾堆中，[至少 218 人死亡](#)——包括卡拉姆、纳吉和查贝尔哈蒂在内——根据当地独立媒体 *The Public Source* 调查，因大爆炸死亡人数已超过 250 位。另外 7000 多人受轻重伤，其中至少 150 人严重伤残。爆炸使贝鲁特一半的医院和医疗中心停止运作，10 多座教堂、100 多间公私立学校、数百间咖啡厅、餐厅和酒吧，数千栋建筑和 77000 间公寓被彻底摧毁或大面积破坏。在 200 公里外的塞浦路斯的居民甚至都能感受到震动波。前方简状的黎巴嫩国家储备粮仓，原本储存 15 万吨的谷物化为灰烬，是黎巴嫩全国 3 个月以上的粮食储量。世界银行估算，此次爆炸造成最高 46 亿美元的物质损失，这对经济正在崩溃的黎巴嫩社会，是又一计崖式的毁灭性打击。

“我们花了整整 17 天到港口、医院各地寻找他们的尸块和残肢，”今年 22 岁的安东内拉 (Antonella Hatti) 在 4 月 4 日的纪念抗争现场，拿着三位亲人的照片气愤地说。这场爆炸带走了东贝鲁特消防队里 10 名消防员和其他的紧急救援人员，三位消防员所在的办公室，也被炸毁的只剩下建筑主体和裸露的钢筋。

“我们家里一下失去了三个男人，他们的离开是因为掌权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20 个月的调查，2 名法官，仍未能替 200 多位罹难者找回真相

爆炸发生 2 天后，黎巴嫩总统奥恩就公开承诺“将迅速追究贝鲁特大爆炸的真相”。但 20 个月过去，什么结果都没有——没有案发真相、没有程序检讨、没有任何涉事的高层官员承担政治或法律责任——政府当初的究责承诺，再一次成为自欺欺人的谎言。

政府怠忽导致的世纪灾难，从 2013 年的 11 月开始。一艘悬挂着摩尔多瓦旗、由俄罗斯商人租赁的[老货船 Rhosus 号](#)，载着引爆这场灾难的 2750 吨工业用硝酸铵，从乔治亚的黑海港口出发，预计前往东非的莫桑比克。出发之后，船东要求 70 岁退役的俄罗斯船长把船开到贝鲁特港口——因为船东没钱支付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只能让船长在贝鲁特港装载额外货物来赚取现金。但靠港后不久，Rhosus 号就因未支付港口停靠费遭黎巴嫩政府扣押。

为了自救，船长卖掉船上的燃料，并用赚的钱聘请了一个法律团队，根据律师事务所的声明指出，当时就已警告黎巴嫩当局，这艘船随时都有可能沉没或有爆炸的危险。但这批致命的货物却没有被妥善处理，而是被转移到港口的 12 号仓库置放，无任何保护措施。

在 2014 到 2017 年，海关署共 6 次致函地方法院，要求尽快处理这批硝酸铵，却是水落石沉——根据 NGO [人权观察](#) 调查的官方文件与证据，包括奥恩、时任总理迪亚布、国家安全总干事、前陆军司令、时任内政部长、前财政部长和前公共工程交通部长等黎巴嫩高层领导人们，皆被告知硝酸铵带来的风险，却无动于衷。

官员忽略无数次的公安警告，6 年后的 2020 年 8 月 4 日，成了灾难的现实。

黎巴嫩的宗派政治体系长期瘫痪国家政治的运作，也时常凌驾于司法单位的独立，在日后的调查也不例外。第一位负责调查大爆炸的法官萨万 (Fadi Sawan) 在要求调查涉案官员后，真主党在国会的同盟，庇护这些涉案官员，甚至向法院申诉，要求免除他的职位。萨万在 2021 年初遭到开除，调查也因而推延。

2021 年 10 月 14 日，真主党号召支持者上街，要求换下第二位负责的法官比塔尔 (Tarek Bitar)，在贝鲁特的街区爆发冲突，[导致至少 6 名什叶派民众遭到枪杀、32 人受伤](#)。爆炸的调查，再度停摆。

整整 20 个月后，依然没有任何涉事的高层政府官员为这场灾难负责。对许多黎巴嫩人，这个故事不过是统治阶层长期贪腐失能的另一个证明，也是 2019 年公民抗争里人民反对的核心。

自己国家自己救

今年 26 岁的达尔维 (Ibrahim Darwish)，是协助灾区重建组织“给予之乐”(Offre Joie) 的土木工程师，他来自北部大城的黎波里 ([Tripoli](#))，爆炸发生后，知道他的专业能够帮上忙，从爆炸第一周开始，都在这里工作。4 月初的周三一早，他带我走过大爆炸 20 个月后，组织最后一个重建还未完工的社区卡兰迪娜 (Karantina)。卡兰迪娜社区是受大爆炸影响最严重、也是贝鲁特最贫穷的区域之一，不同族裔的



卡兰迪娜社区，在大爆炸 20 个月后，开始有居民回到重建的公寓里生活。摄影：陈映好

人在这生活，其中包括一个巴勒斯坦难民棚户区。“99% 的民宅都已修复完毕，一个教堂的圆顶也完工，还有 3 到 4 处的历史保留建筑正在进行，接着是店铺、街道园景……”达尔维介绍着即将完工的重建计划。在大爆炸发生后，数千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自发性地加入他们的重建工作，前两个月志工都在清理数十万吨的碎石砾，接着他们在断垣残壁的建筑体上标上数字，一位建筑师带一组志工团队，从清扫瓦砾堆开始，一间公寓接着一间耐心重建。

“我每天都在这里，住在这里。”达尔维说，初期还没有所谓的办公室，志愿者员工需要轮流睡在没有门的仓库里。20 个月内，他们克服国家电力的瘫痪，经济的重创还有疫情的肆虐，在三个重点受灾社区，一共重建了 52 栋民宅，39 个商铺，7 个文化遗产建筑，贝鲁特消防局还让 350 个家庭顺利回到自己的家。

“给予之乐”是在黎巴嫩内战期间成立。一开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协助战后的儿童安置和家园重建。没料到 30 年后，他们参与重建的城市再次被夷为瓦砾。

事实上，自 1943 年黎巴嫩独立以来，贝鲁特已被至少摧毁了 5 次。第一次，是 1975 年基督教长枪党和巴勒斯坦民兵在哈姆拉街区的楼顶展开枪战，爆发长达 15 年的内战。第二次是 1978 年，叙利亚军队对以基督教派居民为主的东贝鲁特，展开“百日围攻”，夷平大部分法国统治时期建造的公共建筑和民宅。第三次，是 1982 年，以色列军队包围以伊斯兰什叶教派为主的西贝鲁特，摧毁大部分巴勒斯坦难民区，举世惊惊的夏蒂拉大屠杀 ([Shatila](#)) 就是其一。第四次，是 2006 年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为期 34 天的[军事冲突](#)，全国超过 1200 人死亡，4000 多人受伤，贝鲁特西南部区域也遭以色列空袭摧毁。

人们不断在灾难中重建，找回城市的灵魂与光彩。但统治阶层的失能与贪腐，让 2020 年的大爆炸，第五次摧毁贝鲁特。

大学毕业不久，达尔维就主导了城市里意义重大的建设计划。“即使这一切非常困难，但发生的事已经发生，这些是我们人民做得到的改变。我希望可以让以后来到卡兰迪娜的人们，可以记得这个社区的颜色，感受到这里的独一无二。”达维尔说。



达维尔在“给予之乐”办公室附近，持续重建的工作。摄影：陈映好

“政府要是真的在乎（人民），那 2750 公吨的硝酸铵就不会置放在那里 6 年的时间！”协助志工招募的纳萨尔 (Nady Nassar) 就没有那么乐观。27 岁的纳萨尔，毕业于城市景观系，也是灾后初期就投入重建工作。他在小吃店边吃着 Zattar 起司烤饼，一边和我表达着他对调查进度和统治精英的愤慨：“我们尽力做我们能做的，但那远远不够——到真相到来以前都不会够。”

在整修完毕的东贝鲁特消防局，高挂着一张张殉职消防员的照片，这是悼念、也是提醒。其中三张，就是安东内拉·哈蒂她的三位消防员家人——哥哥、堂哥和姐夫。带我们参观的年轻消防员说：那天，他值班结束去健身房一趟，听到爆炸声赶回来后，出去的同事们已全被埋在瓦砾堆下。剩下的队员在港口四处寻找尸体、验尸块、找回同伴，唯一的一位女性消防员，剩下一只还套着迷彩服的腿，以及黑白秀长的头发。走在“给予之乐”已经协助完成所有重建的社区米哈伊尔 (Mar Mikhael)，一位穿着红色 polo 衫的中年大叔朝我说：“爆炸发生当下，我们社区死了 7 人，我也全身是血。”即使肉眼可以看见重新搭起的建筑，居民试着回到日常继续生活，但公寓前的十字架纪念碑，阳台上飘扬着的雪松旗，墙上“我们不会忘记”的标语，都在提醒着爆炸对人们带来的巨大创伤。



Mar Mikhael 社区里，重建公寓外的十字架，纪念逝去的罹难者们。摄影：陈映好

黎巴嫩在阿拉伯世界在现代与传统、西方与中东的交叉口，贝鲁特更有中东巴黎之称，有着说着三种语言的专业人才、顶尖一流的时尚设计产业，喧闹迷人的夜生活，还有被誉为阿拉伯世界最自由的思想空气。

但自内战以来，黎巴嫩没有 24 小时供应的电力，没有政府提供的大众交通工具，没有统一处理垃圾的系统（导致街上时常弥漫一股食物酸臭味）——人们戏称此为“黎巴嫩三大特产”，嘲讽长期失能怠职的政府。

黎巴嫩始终无法结束的政治内耗与政府失能，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良”。

1943 年黎巴嫩自法国独立后，当时所立下的《民族宪章》奠定了黎巴嫩的教派政治制度，也是国家分化的基础。其中规定，新共和国的总统、总理和国会议长需分别由基督马龙教派、穆斯林逊尼派和穆斯林什叶派担任，议会席次也以“基督徒 6：穆斯林 5”的比例固定分配——表面上看似公平，却使黎巴嫩各派因权力分配严重分歧，武装冲突不断。1948 年 第一次以阿战争 开打，数十万失去故乡的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各宗派的人口平衡因此剧变。1975 年，黎巴嫩基督教的长枪民兵与巴勒斯坦游击队爆发冲突，随即升级为长达 15 年的内战、超过 100 万难民逃往海外。而结束内战的《塔伊夫和平协议》 虽然把提升国会的穆斯林席次提升至与基督徒对等的 1:1，但却无力进一步化解黎巴嫩教派政治的沉疴。

无力改变政治，就只能无奈改自己。在黎巴嫩消费主义至上的社会，中产阶级找方法让自身处在例外状态，例如聘僱私人司机和倒垃圾专员，或是拥有私人发电机、每月缴两份电费单，默许政府失职 30 年。

但在 2019 年秋天，政府对汽油、烟草，甚至是使用社交软件 WhatsApp 征税的计划，成为压垮人民的最后一根稻草，积年累月的压抑与不满，在 10 月 17 日，引爆了国家 30 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跨宗教教派的公民抗争。

几十万人上街头，要求包括总统、总理和国会议长在内的所有掌权阶层全面下台。示威者举着抗议标语，挥舞着雪松旗，喊着革命的口号。对许多年轻人来说，从小到大生活在以宗教教派来切分权力的国家，那是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个词：团结。“这场抗争让我与街头连结，与黎巴嫩各地的人和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连结在一起。”25 岁的甘杜尔（Hussein Ghandour）在贝鲁特的一个人民自造的公园里告诉我。个性随兴、不拘小节的甘杜尔，大学念完生物学后，加入气候与环境倡议的行列。2019 抗争爆发时，他把街头当作家，与抗争伙伴搭起帐篷占领街头，两个月生活在掺杂着催泪弹、汗水和燃烧轮胎的橡胶气味中，数次被警察或是反抗者的殴打，他们的帐篷被警察用火烧毁一次，被反对抗议者毁了数次，“即便如此，我不想要错过任何参与这场行动的机会。”

噩梦的开始

“但从那（2019 年黎巴嫩反贪腐抗争）之后，所有事情却变得更糟。”今年 30 岁的凯瑟万（Mariam Kesserwan），打扮时髦俐落，耳上挂着明显的银圈耳环，带着磁性低沉的嗓音，是一位活跃的社会运动家，也是有上万人追踪的社群帐号“黎巴嫩起义”（Lebanese Uprising）创始人。

凯瑟万以公民记者的方式，更新最新抗争资讯和街头访问，批评怠职的官员。她更参考香港的抗争指南，善用线上匿名协作，挖出大部分政客、官员、法官的住家和出入场所，并号召数十位示威者前往现场抗议，要他们立即下台或做出改变；其中一位国会议员甚至被激怒，隔日公开表示，谁敢再出现在他家门外，“一律从（家中的）窗户开枪扫射”。

“局势变得更加邪恶、更加混乱，银行体系的崩坏，电力系统的瘫痪，我们没有司法系统，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资源。我们掉进了更黑暗的深渊。”凯瑟万一边抽着烟，一边激动地说：她发现革命场上起初近乌托邦式的希望，不久便陷入人们熟悉不过的分裂局面——党团、教派、企业甚至是非政府组织互利结盟，团结像是昙花一现。为时数月的 2019 革命，虽在两周内成功拉下前总理萨德·哈里里（Saad Hariri）与几位官员，却不足以推倒整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换来的是一场惩罚性的经济危机。



黎巴嫩议会大楼附近的围墙，布满 2019 年公民抗争人民留下的涂鸦。摄影：陈映妤

短短两年内，全国 75% 的人口被推入贫穷线以下。我在黎巴嫩遇到曾经是酒吧的调酒师，他说因为薪水只剩下 60 美元，决定辞职；学校校长说，他的薪水从原本的 1700 美元掉到剩下 100 美元；全国第一大公立高校黎巴嫩大学（Lebanese University, LU）的教授已连续罢工数月；大批的医师、护理师、药剂师离开黎巴嫩。原本住在贝鲁特的叙利亚青年说因为长期失业返回叙利亚；住在棚户区的叙利亚妈妈买不起糖和食用油；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妇女，决定让儿子偷渡到土耳其找工作；待在黎巴嫩 8 年的菲律宾家政女佣说，情况甚至比生活在她菲律宾的家乡还糟。“我才不会去投票，这对我来说根本是个浪费，光是油钱就要花我 130 万（官方绑定汇率为 856 美元，黑市汇率约 50 美元），然后去投一个什么也改变不了的票？”一位 24 岁的咖啡研究师艾里亚斯（Elias），被问到 5 月的大选是否有期待时，第一个反应是计算花多少燃料费。

凯瑟万气愤地这么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当下的她，坐在东贝鲁特的露天咖啡厅，先是生气再转而掉下眼泪：“我觉得很后悔……”

当天稍晚，她随后传讯息来说，自己当天有点情绪化，她不是真的后悔，而是失望。凯瑟万说，她将所有的精力与时间，都献给了前线，结果却远不如她的预期。她认为她的一位社运圈伙伴因为参与抗争“被自杀”，其他真正想要改变的同辈——离开黎巴嫩。许多家庭烦恼着下一餐在哪里，根本很困难持续参与政治，她也坦承自己若没有父母经济上的支持，不可能撑到现在。

采访当天，疲惫写在她艳丽的妆容底下。她觉得所做的一切，在国家深根的教派主义（sectarianism）和恩庇侍从主义（clientelism）之下，似乎都微不足道。

后记：2022 选举的惊奇

许多像凯瑟万的年轻人在 2019 年慷慨上街，后来发现人民的团结撼动不了统治精英，换来的是一连串的灾难，还有一场末日般的大爆炸。人们陷入更大的无助和疲倦感，曾经义愤填膺的人消失在街头，数十万黎巴嫩人随移民潮黯然离开。但 5 月的国会选举，让一些年轻人相信，改变还是有可能。

5 月 15 日，公民抗争、大爆炸和经济危机后的第一场国会选举在一场混乱中展开。投票所附近不同支持者爆发推挤和冲突，前总理哈里里的支持者在路中央放置超大型充气游泳池阻止人们去投票；因为断电，开票所里的计票员拿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数票。即便如此，大选的结果仍出乎大家的预期，年轻人们热血沸腾，在街上大声放着音乐庆祝不容小觑的一点胜利。

这次大选，在 128 个国会席次中，共有 16 名独立候选人当选，2018 年时只拿下 1 位。其中包括“给予之乐”共同创始人哈拉夫（Melhem Khalaf），当选贝鲁特第二选区国会议员，以及 33 岁保护抗争者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Protesters）律师哈姆丹（Firas Hamdan）——在 2020 街头抗争中，一枚金属弹刺穿哈姆丹的心脏，险些夺了他的性命——这次拿下以真主党和其联盟长期掌控的南部选区的其一席次。

最大的突破，是长达 30 年拥有国会多数的真主党输了选举，16 位独立候选人有望影响组阁主动权。

“真的是远远超乎我的想像，太让人振奋了！”贝鲁特大爆炸罹难者家属纳格尔在讯息中说。纳格尔为了在大爆炸牺牲的 3 岁女儿，开始投入政治，奔波于独立候选人的助选。许多的黎巴嫩受访者也表示，这次选举结果意料之外的好，往前不小的一步。传统党派势力仍然强大，像是其中两名被指控与 2020 年贝鲁特港口爆炸有关的官员也同时当选，在位长达 30 年的国会议长、真主党的同盟阿迈勒运动主席贝里（Nabih Barri），选举两週后仍不意外地宣布第七次连任，都可能让大爆炸的调查持续停滞。但这次选举，似乎给了这 3 年来挫败的青年一剂强心针，原来有些看似难以撼动的，也不是真的那般坚不可摧。

5 月 15 日，公民抗争、大爆炸和经济危机后的第一场议会选举在一场混乱中展开，投票所附近不同支持者爆发推挤和冲突，前总理哈里里的支持者在路中央放置超大型充气游泳池阻止人们去投票，开票所里的计票员，因为断电用着手电筒在黑暗中数票。即便如此，大选的结果仍出乎大家的预期，年轻人们热血沸腾，在街上大声放着音乐庆祝不容小觑的一点胜利。

漫漫民主路：夺回国家的自主权、寻找共同的政治认同

黎巴嫩的政治评论家与工作者穆罕默德（Mohamad）是其中一位从黎巴嫩离开，又再回来的。

长期生活在海外的穆罕默德，参与 2019 年的公民抗争后，在家乡面临一连串的社运与危机后离开黎巴嫩。他知道他有选择可以在回来与出走之间徘徊。在许多家庭担心温饱与丢失工作之际，他能坐在文艺聚集地哈姆拉（Hamra）社区里的咖啡厅侃侃而谈。

“是一种愧疚感，我还未遇到任何离开国家的人感到开心的。”穆罕默德说。

今年他回家投票，并参与公民抗争后成立的跨党派政治团体“贝鲁特反抗”（Beirut Tuqawem），帮新兴的独立候选人助选。许多“贝鲁特反抗”成员来自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的学生政治性社团，穆罕默德也曾是一员，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在校园谈论打破宗派政治的可能。他们在贝鲁特的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派的各区扫街，甚至在选前宣传时被传统党派的支持者攻击。

“不论我们属于哪个教派，我们面对的是一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教派邻居同样损失了所有在银行的积蓄，我们知道他们没办法负担得起电力，没办法给孩子好的未来。”穆罕默德的父母一位来自逊尼派、一位来自什叶派，戏称自己出生就是“混种”，他认为这场选举非常重要，即使不可能一下换下所有当权者，但却是一个机会，让更多跨党派的人一起合作。

“现在的反对派，仍没有一个集体的政见，仍然分歧。但此时此刻，这还没有关系，我们正在寻找我们共同的政治认同。”

穆罕默德认为改变不可能一步到位，黎巴嫩用了 15 年逐出以色列驻军，30 年逐出叙利亚军队，这是一场长期的抗战。

“没有任何我们渴望发生的事情会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就到你身边，没有任何人会给你一个国家，你必须自己去争取。”

过去的黎巴嫩，主导国内冲突的因素，都和境外政治势力像是叙利亚、以色列、伊朗等有关，而今日的黎巴嫩，是公民主动要夺回国家的自主权，解决自己的问题。在黎巴嫩街头与高速公路上的竞选海报口号，像是“我们必须团结”、“贝鲁特需要（一颗）心脏”、“我们的沉默，会换来再一次的大爆炸”，都反映了从 1943 年就法理独立的黎巴嫩，人民开始想要做自己国家的主人。

凯瑟万表示，黎巴嫩这样的小国，数十年来做不成自己，但 2019 年抗争之后，还是看到了一些改变，包括公民素质的培养。“我们至少，至少开始会质疑、会要求政府公开透明，要求政府负起责任。我们试着在做的是靠我们人民自己，提升意识，来

监督掌权的人。”她说，黎巴嫩的认同正在形成。

“很多人觉得黎巴嫩的多元是个问题，我觉得恰恰相反，多元就是我们的认同。”

* 本文特别感谢刘怡老师、Rita Kabalan 和 Ana Maria Luca 对此篇报导的协助。

作品同时刊登于[《报导者》](#)，感谢责任编辑 / 张镇宏、张诗芸。



在场

在場奖学金由 Matters 写作平台及文艺复兴基金会共同出资设立，目标是资助非虚构写作者完成有潜力的短期计划，题材包括但不限于观察纪实、调查报导、田野研究，唯需书写记录内容 100% 真实，文中事实引述或描述，需注明来源。“在場”奖学金每个季度开展一次，一年共四次，致力于持续培育、支持华文世界的非虚构写作。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Zongnan Bao on Unsplash](#)

非虚构 此里卓玛： 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①

黄菊 | 生活亲历者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有一个人这么活过。”

本文由此里卓玛口述，黄菊撰写。

玖农顶村，不开心的小学

我叫此里卓玛，云南德钦人。我是1981年三四月左右出生的，我们不记生日，小时候也不用身份证，中学时，老师问具体出生日期，妈妈说：“你是麦田里拔穗时出生的。”我想了想，二月还在过年，六月麦子收割，拔穗时应该是三四月，就写了个大概日期。德钦是藏族自治县，地理上，属于三江并流地区的核心范围，横跨了金沙江、澜沧江、白马雪山、卡瓦格博（就是外面人说的“梅里雪山”）。下面的乡镇，比如奔子栏镇在白马雪山东坡，金沙江边；燕门乡、云岭乡和佛山乡在白马山西坡，澜沧江边。我家在云岭乡玖龙顶村，背靠白马雪山，面朝卡瓦格博，脚下就是澜沧江大峡谷。澜沧江江面的海拔不过2000米左右，但白马雪山主峰5430米，卡瓦格博主峰6740米，在这三四千米的垂直落差中，分布着干热河谷、森林、草甸、雪山。我们在干热河谷种葡萄，在森林里采菌子，在草甸上放牧、挖虫草，依靠着雪山融水灌溉农田。

每片干热河谷都有绿洲，一个村子是大绿洲，一户人家就是小绿洲。我家的房名叫“斯尼雅卡”，斯尼，蝉；雅卡，山坡上。合起来就是：蝉鸣叫的山坡。小时候房子周围都是灌木，上面很多蝉，房名描绘了一个小绿洲的样子。

我出生时，玖农顶村已经是云岭乡乡政府所在。乡政府之前在佳碧村，因为经常出现泥石流，就搬来了玖农顶。父母亲都是农民，生了四个孩子，大哥、大姐、二姐和我。我出生时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我属于超生，被罚了款，村里分土地时也没我的份。父母亲随和，不愿和人争，最初包产到户时，别人都去抢中间的农田，那些田肥，也不容易被牛羊攻击，我们只分到最边上的地。边上的地贫瘠，大家不好意思，就多给了一点。后来乡政府搬来，要占用农田建城镇，不能占用中心农田，只能占最边上的。于是，乡医院占走我们一片地，学校占走一片地……地被占了很多，但我们家也变得很方便，隔壁就是银行，门口是医院，再过去就是学校。

因为挨着乡政府，好像很自然的，哥哥、二姐和我都上了学，只有大姐，从小就勤快，一直留在家里干活儿。

我哥哥上小学时还有藏文班，念到四年级时，拉萨藏医院和云岭乡藏医院合作，招了一个藏医药班，哥哥就在这个班上。五年级开始，全班直接去藏医院上课，平时学藏文、藏医，周末就去山上找各种药材，我现在记得的有药用价值的植物，都是那时哥哥教的。学到后面，需要去拉萨进修，回来就可以当藏医，全班同学都去了，

哥哥坚决不去。后来他的同学都当了藏医，哥哥去印度做了僧人。我上学时已经没有藏文课，很多藏文老师都下岗了。

小学过得不是太好，那时大家都在自己村子上学，四年级以后才来中心完小，我从一年级就在中心完小。同学大多是乡政府里双职工的孩子，爸爸妈妈有工作，有工资，他们有很多作业本和铅笔，我什么都没有。

我们家东西都是不卖的，牛奶、奶渣、核桃、水果、酸奶、酥油，都送人家，但商店里的东西都是卖的，没有钱拿不到。那时太小了，还不太会区分什么是富裕、贫穷，但跟别人不一样的感受很难受。大家都有很好的鞋子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我们放学了还要干活儿，捡猪食，管牛羊，烧火做饭，衣服裤子都会弄脏。

我对书本上的知识根本不感兴趣，书里讲的东西和我的生活没有关系，但还是悄悄地努力背，学习成绩好，老师就会给奖励，比如作业本、铅笔。

小学之前一直很开心，很野，没上过幼儿园，可以到处玩，但到小学时，和家庭条件很不一样的人在一起，那种差距就会很明显。有次过夏令营，老师说，每个人交两块钱，给大家买饮料。妈妈说：“啊，两块钱！那么多钱要干吗？”真的，全班都有，就我没有。在山上，同学们说：“饮料你就别喝了，喝水吧。”大家都是小孩儿，不懂事，但我特别难受。

因为挨着学校，我们家没有任何隐私。学校在很高的山坡上，我们家低一点，家里干什么事他们都能看见。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就来走廊上看：“你爸爸妈妈又在田里干什么……”老师养的鸡跑去我们田里吃东西，他们也说。

有次家里杀猪，有个好朋友，我们天天一起玩，那天中午请她去家里吃饭。回来时，班上男生把我们围在门背后揍，“你们俩吃了猪肉，嘴上的油都没擦干净，来炫耀什么？”他们也常常偷我们家苹果，摘我们家番茄。那时想，我要是从其他地方来借读的就好了，没人知道你爸爸妈妈，虽然他们没做任何坏事，就是正常在劳动，但同学们总是这么针对我。

我同桌作业写得特别差，字也难看，但他有很多作业本，我就帮他写作业，他给我作业本，所以我作业本前面的名字都是划过的。那时老师让我们背很多课文，但他要做饭、带孩子，也没时间，每次都是我第一个背完，然后同学们找我背。一开始还认真听他们背，但六点多了，还没背完，我也肚子饿了。他们就说：“不要我给你买饼干吃？”雨崩村有个同学，那时天天买夹心饼干给我。他是1974年的，比我大七八岁，那么大才来读书，真的记不住。雨崩村过来太远，需要寄宿，家长只能让孩子比较大的时候再来念书。我们班最大的是1972年的，比我大十岁，一米七！

我背书快，学习成绩也好，三好学生、少先队代表讲话、主持人，都是我，老师也愿意什么机会都给你。同学们特别生气，下课了就群攻我。我哭着说要回去告诉爸爸，爸爸是当兵的，个子高，力气大，很严肃，同学们都怕他，但打架的事，我一次都没和爸妈说过。我家门前有条水沟，每次哭着到水沟那里，总会把脸洗干净了再回去。整个小学都不是很开心，但我爸妈挺开心的，觉得每年我都能拿奖，老师也夸他们，六·一儿童节都会来学校看演出，那是我们割麦子的时候，其实很忙，有些家长是不来的，但爸妈会来，我会得奖，晚上的表演会当主持人，也跳舞。

小学毕业就到德钦县读初中，要离开家了，藏族人觉得银的东西可以防毒，妈妈送了我一副手镯，一直戴到现在。

德钦县，不公平的初中

中学三年都在德钦，比小学好一点，大家都住集体宿舍，有农村的也有城里的，没有太强烈的对比，成绩也还行。

初三毕业时，我报考德钦一中的高中，考了第一名。但妈妈说，没钱供我读书。学校愿意承担我整个高中的学费，还承诺高三时给我保留送大学的名额。妈妈还是不同意，她说大学肯定没钱读的，就读中专不行吗？三年毕业出来马上挣钱。我很生气，说，“不让读，我就不吃饭不上厕所，屎尿就拉在床上。”我妈各种折腾，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她一哭我又心软，最后决定去找旁边红坡村的活佛算命，看活佛怎么说。活佛说，“读中专也可以，上高中也可以，人只要有降生到这个世上的福分，就有一口你的糌粑吃。”真的，他就是这样说的。妈妈说，既然都可以，就念中专吧。我很想上高中，想着上大学的感觉肯定特别棒，但只能依从妈妈，于是复读一年，考中专。我想报云南广播电视台学校，小时候没有任何课外读物，我妈不识字，也不会给我买书，但我和姐姐很喜欢看书。乡政府有旧报纸，他们读过就不要了，我妈会拿过来擦屁股，我们就读那个报纸。我和姐姐跟村子里邮递员的关系非常好，乡里有人订阅杂志，那时订一本杂志要一个月才到，她就给我们快速看完再交到订阅人手里。到中学，特别喜欢听广播，喜欢播音员的声音，那时收音机很流行，能从里面听到很多歌和故事，所以就想报考广播电视台学校。

但当年德钦县只招一人，有个官员的女儿也要报考。中考前，我们每次摸底考试都要全校张榜，前三十名才会在榜上。我每次都在榜上，她每次都不在。看到我报名，他们就找人来和我谈话，让我不要报考。刚开始找班主任，然后找副校长，后面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最后被告知，即使你瞒着大家悄悄填了志愿，也会被改掉，而且还不知道会改到什么地方去，不如自己另外选一个。对方说，如果愿意改志愿，三年后我从学校毕业时，可以关照我的工作。打电话问家里人，爸妈也没办法，只有认了。

当时广播电视台学校招的专业是“电子声像设备”，正好云南电影学校也有这个专业，就改了。最后成绩出来时，我比那个女生刚刚高了100分。

昆明，自由、开放又多元

在电影学校，没想到开学第一周就遇到那位官员的女儿，电影学校和广播学校只隔三站路，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很大的体育场，他们开会、上体育课，都要到这里来。她见到我就哭得不行，抱着我说，“如果不是你，我肯定考不上。”我本来很生气，当初那么多人来威胁我时，我想这个社会怎么这么黑暗，但她一哭，我就原谅了，反正我也考上了，而且电影学校也很好。

我的同学里有各种少数民族，苗族、拉祜族、景颇族、白族、回族……藏族比较少，但我前面的学长学姐都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老师们对我也非常好。我从小就攻击性很强，随时是备战状态，习惯了和人去打架，任何时候都像刺猬一样，非常警惕。但在这里，大家都很喜欢我，我就愿意做得更好一点。

是到中专时，我才正式学会说汉语。那之前，虽然书本上学汉语，但日常生活中说的都是藏语，昆明没几个藏族人，只有说汉语。同学们的汉语带着各种口音，听着很费劲，感觉每个人的语音都听不懂。气候也不适应，昆明很热，大家都穿短袖，我从没穿过短袖，很不好意思露出手来，但是太热了，我就在房间里穿着短袖洗脸，去倒水的时候再把外衣穿上。在家里，妈妈特别严，洗完头发不允许披着，她说女人披着头发就像魔鬼，我妈到现在都是洗完头就把头发马上编起来，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头发太多，洗完头就扎起来很难受，那时没有吹风机，只能悄悄躲在屋子背后晒太阳。但在昆明，没这么多规定，大家都披着头发。

我们也没有刷牙和洗澡的习惯，初中时在德钦县城，很多同学都不刷牙不洗澡，只有一两次，毕业前要集体体检，老师让所有人去洗了一次澡。记忆中，我们都是过年期间和村里人一起去泡温泉洗澡，很多人泡在一个大池子里，下水后会被灌一口青稞酒。也不洗脚，应该很臭吧，但平时没有这个习惯。有个思茅的同学给我打来洗脚水，说，“这里很方便，有热水，洗个脚吧”……于是，在昆明有了一系列新习惯：穿短袖，周末洗澡洗头，洗完头还可以披着头发！

也不努力学习了，好像这样也没关系，只要过了六十分就行。考试前，我会跑去找老师，“能不能给我勾一下重点？老师很无语，“你这个学生，我勾给你，不要告诉其他学生啊！”

我们对这个城市太好奇了，每个周末都走路去各个景区，几个宿舍的人一起，男生女生都有，没钱，也不坐公交车，路上买个馒头，一直走，走一整天。昆明所有地方，你耳朵里听到过的名字，我们都走了一遍。哪个周末都走，哪个地方都走，整个城市走遍了，有时半夜三更还在走，有很多很大的老鼠在城市里跑来跑去。商场里也去，不一定买东西，就是到处走，保证有一点饿不着肚子的钱，比起德钦和香格里拉，昆明物价也便宜。

所有人都对我很好，我发脾气也没人说，有次我把宿舍门都踢碎了。我们当时是女生男生都住同一栋楼，那天有两个男生来我们宿舍找其中两个女生，到了打饭时间，我们回去拿碗，他们把门锁着，不开。一个宿舍八个同学，两个人在里面，外面就有六个女生。我大声说：“来开门！不开我就踢了！”他们不开，我就一脚踢门了。我力气大，但那个门很硬，第一脚没踢开。他们有点害怕，之前把小锁也锁上了，我踢完第一脚，一个女生就过来开小锁，刚把小锁打开，我就踢了第二脚。门被踢穿一个洞，她也被踢到了。我那时非常气愤，妈妈从小教育我们，男人和女人的界限是非常严格的。

除此外，宿舍关系都很好，唯一有个抽烟的，我不让她在宿舍抽，赶出去，她笑笑也就过去了。我觉得自己挺坏的，但她们都说我很好，说我很勇敢。

宿舍有个瑞丽来的景颇族女孩，很瘦，很高，很有钱，买很多衣服裤子，穿一个星期就不要了。她四十四公斤，我四十七公斤，只有我穿得下她的衣服，她穿完一个星期就全部给我。那几年我有很多新衣服穿，那些衣服全都很有个性，像模特一样。另一个同学在孤儿院长大，每个月生活费也是孤儿院给，所以不多。我饭量小，她饭量大，但舍不得买，我如果出钱买给她，她是不吃的，但如果我说吃不完，让她帮我吃一下，是可以的。每次打饭，我其实吃二两，但都打四两饭三个菜，我们在家不太吃菜，我吃二两饭一个菜就饱了，把饭吃到一半就说，“我吃不下了，你帮我吃吧。”她知道我有剩余的饭，就会打二两饭一个菜，吃完自己的饭等着我。

电影学校的专业分技术类的，像我们就是学放电影、调光调音；也有艺术类的，像影视表演班，要走模特步。我中学时胸就比较大，但没穿过胸衣，跑步时会晃，穿毛线衣的时候也很明显，不好意思直着走，只能夹着肩膀走。同学说，一直这样弓腰驼背不好，去模特班学习走路吧。我很害羞，班上就六七个同学围着我，不让其他人看见。走模特步时，穿着高跟鞋和模特服，两边都是镜子，头上顶着书不能掉。每天放学就去练，有女生也有男生，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学会抬头挺胸走路了。

在昆明，感觉好自由，什么都可以做，我甚至把头发剪了，穿超短裙。那时各种少数民族在一起，大家习惯不一样，语言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反而谁也不管。在德钦，全是藏族人，星期天穿了新衣服回学校就会被“哦哦哦”起哄，很担心，很麻烦。但在昆明，谁也不关心你穿了什么，整个环境都很多元，很开放，很自由。

小时候，从课本上学到的知识，老师传递的信息，还有大人告诉我们的，都在说：我的家乡很贫瘠。整个小学、中学，努力学习的动力就是不要待在这个山里。那时看电视，里面的人都穿着干净的衣服，吃饭时都有刀子叉子，拿着刀叉各种操作。所以到现在，我对刀叉都特别迷恋。反而是在昆明读书，第一次听到人们对藏族的赞美，原来别人对你有很多好奇，原来我们是很不一样的，原来世界上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少数民族。



黄菊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先后就职于《新旅行》杂志社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行李”，以人物采访的形式，探讨人地关系，希望借此书写一种有活生生的人参与其中的当代地方志。已出版行李访谈书系《天堂，是因为有足够的地方闲浪》《寻隐记》《荒野志》《仿佛若有光》。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图片来自 [和平](#) on Unsplash

非虚构 此里卓玛： 一位藏族女性的成长②

黄菊 | 生活亲历者

成为德钦第一批职业导游，
以及写下自己的《一千零一夜》

遇见卡瓦格博文化社

中专毕业回到德钦，妈妈陪着我去找当年那位领导。他是认账的，给我安排了实习单位。实习期间也给我发工资，三百块钱一个月。但是，单位不让我用调音设备，说设备太贵，我一个女生，怕用坏了，就让我坐办公室。办公室的人每天一到办公室，电炉打开，水烧开，然后就围着电炉烤火，打毛线，聊八卦，这样一整天。

我们楼下有个画画的，斯朗伦布，他正在一面墙上画卡瓦格博神山，见我在办公室待不住，就安排我去给他当助手。他站在凳子上画，下来取各种工具不方便，我就帮他递画笔和颜料。他一边画画，一边和我聊天。比起办公室那些人，他很尊重我，什么都会问我意见。有一天，他说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了“卡瓦格博文化社”，最近在做免费的藏文扫盲班，问我想不想去听。我们虽然说藏语，但并不认识藏文。在村子里，如果学过藏文，就会成为受欢迎的人，因为可以帮忙看历书，藏历都是藏文的。以前学藏文有两种途径，一是去学校，一是进寺院，后来学校取消了藏文课程，现在有机会学习，当然愿意啊。

在那里，我认识了文化社早期最核心的成员：来自佛山乡江坡村，本来做烟草生意的哥哥肖玛；本来职业是检察院司机，但热衷于传统文化的木梭；来自明永村的诗人扎西尼玛；喜欢孩子的钟华……斯朗伦布是社长。

扫盲班不只教藏文，也教很多传统藏文化知识。毕业时，我本来想着干一番事情的，从小觉得自己还行吧，但他们讲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就开始做笔记，学习家乡和自己民族的各种知识，从此和文化社保持紧密联系。

文化社最初的想法是，我们在语言、文字、歌舞方面的传统文化都在慢慢消失，想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让大家反省、回归，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搞藏文扫盲班，让大家学习自己的母语，至少会写自己的名字。

取名“卡瓦格博”，因为那是我们的神山。“卡瓦格博是我们的神山”，我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育。我们相信，每一座山都有一个山神。山神有很厉害的，也有一般的，卡瓦格博在整个藏区都很有威力，我们都敬畏它。敬畏的具体表现，不只是朝拜，是不会随便把山上的树砍掉，不随意去打山上的动物。它和我们的关系是相互的，可以保护你，也可以伤害你。如果只保佑你，大家就没有畏惧心理，否则山上的树不可能保存至今。现在的林业局是后来才有的，在那之前，几千年都没有这样的部门，因为大家对这种因果深信不疑，也因此控制着人们的欲望。反倒是后来有了各种保护部门，大家越来越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事，是那些专业部门的事，整个环境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有一支歌颂卡瓦格博的锅庄，歌词大意是：神圣的卡瓦格博，你就在雪山之巅，我不用刻意双手合十为你祈祷，因为山上自然生长的香柏林就是天然双手合十为你祈祷的树木；我不用刻意用圣水为你敬献，因为山脚下流淌的澜沧江水就是自然为你敬献的圣水；我也不用刻意用水果供养你，因为我在农田里种植了果树，它们结的果，就是自然为你敬奉的果实。这是藏族人对一座山的描述，我们和自然是一体的。文化社成立时，社长们去神山旁做了一个仪式，跟神山说：“借用一下您的名字，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得利，而是想借此传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如果传统文化没有传承下来，大家会慢慢放掉对自己的束缚，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段时间，白天在单位实习，晚上就去参加文化社的各项活动，有时上课，有时做志愿者。文化社是公益机构，每个人都是在自身工作之外参与进来，大家都尽一己之力。

原以为可以一直这样工作下去，但实习期间，在单位遇见一件很不好的事，提前结束实习，回老家待了一年。那一年，在家跟着父母亲干农活，好像也挺好，没有负担。我还想着，可以边干农活边写点东西，后来发现，重活干多了，就没时间思考了，每天回家吃完饭，什么都不想思考，只想睡觉。

德钦第一批职业导游

在家待了一年，妈妈觉得不是办法，让我去考公务员。从初中开始，到实习时，看到了公务员系统里很多不好的事，我这种很难被驯服的人，是没法适应那个系统的。但妈妈强迫我考，就又去找活佛算命。活佛说，可以去试试啊。我心里不愿意，就不好好看书，也就如愿地没考上。

我有个堂姐在德钦，那时她母亲去世，四十九天还没过完，父亲就接着去世了。家里还有个很小的孩子，姐夫那时当领导，天天出差，忙不过来。姐姐问妈妈，可不可以让我去她家当保姆，妈妈同意了。

姐姐要求非常严格，不许睡懒觉，七点钟就起床，早上干完很多事，她就去上班。她走后，我会把家务活快速做完，然后把孩子背在背上（他们在家时不让我背），给他念书。念着念着，孩子很快就睡着了。姐姐家有很多很多书，什么《拿破仑传》、《雪山寻梦》，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姐夫也特别爱看书，吃饭前一点时间看书，坐车也看书。他看我也爱看书，觉得在家当保姆可惜了，正好德钦招第一批导游，就让我去考个导游证。

这里有大背景。卡瓦格博被叫成“梅里雪山”，其实是一个误会，但 1991 年一月三日，这里发生了登山史上最大的一次山难：十七名中日联合登山队的队员全部遇难。从此，卡瓦格博将错就错地变成了“梅里雪山”，而被外界广为人知。不久，又有另一件大事发生。以前，德钦县的财政收入一直依靠白马雪山的木头砍伐。但 1996 年，北京来了一个“大学生绿色营”，都是环保人士，他们揭露当地生态遭到破坏，引来很多关注，一直曝光到《焦点访谈》。最后，不得不终止木头砍伐。《雪山寻梦》主要就是讲这件事。也因此，德钦才想着转向旅游经济。与此同时，随着“梅里山难”事件的发酵，越来越多人想来这里，而 1998 年，遇难的十七名队员的遗体遗物陆续在明永冰川发现。这年四月，明永村终于通了公路。五月一日，明永村迎来历史上第一批游客……

与此同时，香格里拉也在发生很多大事：在众多申请以“香格里拉”命名的地方中，曾经的“中甸”获胜：香格里拉机场修成并通航……整个迪庆州（包括德钦藏族自治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和香格里拉县）的旅游都慢慢开始了。

记得《雪山寻梦》里说，“我们找到了心中的香格里拉，但是香格里拉呀，你要用什么方式守住你的纯洁和善良？”这话写得真好呀，当时从文化社知道了藏族文化里一些好的东西，外面的人也看到了美好，可我们自己知道，不全是美好，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没有了，现在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的 PK 阶段，我们作为香格里拉人，作为德钦人，就应该冲在前面，来守护她的纯洁和善良，导游就是这样一个桥梁。

很顺利，2002 年，我拿到导游证，成为德钦县第一批正规地方导游，开始带团接客。当时我们接团，是香格里拉旅行社的人把客人送到金沙江边的奔子栏，我们去那里接上，带他们先去东竹林寺，再翻白马雪山到德钦，然后去明永冰川，最后送团到奔子栏结束。

导游是没有工资的，带团那天才有五十块钱，但那时客人都给小费，给多少由客人自己决定。每次线路结束前，我们就唱歌和大家说再见，唱歌时客人就给小费，领队会拿一顶帽子挨个去收，每个客人都会给，有时还会装在信封里。那时来德钦的客人主要是港澳台和海外的，经常收到港币、美元，我最高的时候拿到一万八，一个香港人给的。

那时当导游，除了身体辛苦一点，心里是很舒服的，不用卖任何东西，只需要把你知道的讲给他们，把路带好，客人也不挑剔。但慢慢的，香格里拉旅行社开始直接带客人进德钦，不再经过德钦的旅行社。那时雨崩还没向团队开放，德钦对外的景点只有明永冰川。旅游团越来越少，其他导游都陆续走掉或者转行，我是留到最后的一个，一直留到旅行社转卖出去。

2003 年，我从德钦来到香格里拉做导游。

2003 年，非典与人类学家

2003 年，藏历水羊年，卡瓦格博属羊，是它六十年一遇的本命年。经文里说，这一年，来自印度、尼泊尔、汉地、北方香巴拉以及以冈底斯山为首的康藏 128 处大圣地和 1022 处小圣地的守护神，都会聚集到这里来。如果在这一年朝圣卡瓦格博，就等于同时朝拜了 128 处大圣地和 1022 处小圣地。所以那一年，来自全国藏区的数十万人前来转山。

一同来转山的，还有一位来自昆明的人类学家，郭净，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卡瓦格博的。他计划跟藏族学者仁钦多吉一起转山，仁钦多吉被郭老师称为“最懂卡瓦格博的人”，而他就是我坎农村的邻居。仁钦多吉是带全家人一起转山，把路上的神山圣迹一一指给后辈们看，而郭老师，要拍一部记录他们一家外转卡瓦格博的纪录片。

可能因为这些缘分，当郭老师来到文化社时，诗人扎西尼玛就问我要不要和他们一起去转山。我很钦佩仁钦多吉，他在家里建了一个“卡瓦格博博物馆”，把整座神山做一个立体沙盘。虽然我们都是藏族人，但不是所有人都懂神山，大部分人转山，纯粹觉得那就是好的行为，包括我自己在内。知道他要一起走，很动心。我那时刚到香格里拉做导游，但那年“非典”，游客都出不来，没什么工作。就这样，我和他们走了一趟外转卡瓦格博的朝圣之旅。

扎西尼玛把郭老师介绍给我们时，把他吹得像个神，说他有学识，有才华，有各种头衔。但真正和他一起走路，发现他就像个老农民，没有任何架子，对我和我们的文化都非常尊重，我们讲的任何东西，他都觉得有意思。他好像什么都知道，像百科全书一样。回来在网上看他写的文章，他为四川若尔盖的藏族小孩写过《卓玛，你的眼睛》，看到就哭了，莫名地感动。

在那次转山路上，我一方面跟着仁钦多吉学习关于神山的知识，一路记了很多笔记，后来整理后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文章《卡瓦格博，我将永远流淌在您的心窝里》；一方面跟着郭老师学习摄像，第一次使用DV，拍摄了人生中第一个纪录片《小生命》。2004年，郭老师和云南省社科院的学者在香格里拉做社区教育项目，我因为是本地人，又懂藏语，也作为他们的成员之一。

项目是在尼西乡中心完小和汤堆村小学做一个校本课程，让大家在书本之外，学一些与生活相关的东西。我自己上小学时，书本上的东西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最简单的，比如红绿灯，书上说红灯停绿灯行，可是我都没见过红绿灯，考试时常常弄混。那时很多父母都不愿意让孩子去读书，觉得孩子读书回来，农活不会干了，村子里的事情也不了解了。所以当郭老师说要做社区教育，出一本和本土相关的教材时，我觉得太好了。

我负责记录、拍摄，也给他们当翻译，之前当导游，我知道每个人的表达方式，大家说的话不一定直译，但可以把双方的意思很清楚地表达给对方。

那期间，我是边做项目边做导游，但导游做得越来越不开心，虽然比起德钦，挣的钱明显多了。这时的导游没有工资，也没小费，但要带大家购物，每天最少能挣三五百，因为带的人多，不像德钦，路不好，最多只有十九座的客车，香格里拉经常是三四十人一车。那时只要你把人放进去，老板就按十块二十块一个人的费用给你，如果是四十个人，你就可以拿八百元。一旦把客人送进一个大购物中心，多多少少会买一点，最便宜的，比如十块钱一双的筷子肯定会买，有人觉得便宜，就买个十双。那时游客对购物也没意见，他们都知道，就说，“卓玛，去哪里对你有好处？我需要买东西，你保证东西是好的就行，支持你的工作。”他们越是这样，我越不好意思。

旅行团结束，有些人离开时是哭着走的，觉得我们太淳朴了，我们那时涂脸油不擦，防晒霜也不涂，觉得好心疼。也有客人建议我们，这么年轻，有没有想过继续学习？

我从小没穿过很好的衣服鞋子，那时有钱，买了很多很多衣服，我目前买到最贵的衣服也是在那时。游客不是喜欢穿户外装嘛，当时觉得，如果我们穿得跟他们一样，那我们不就跟他们一样了吗？村民看到我们也像游客，就好好骄傲啊。户外的鞋子防水，三百多元一双，哥哥问，为什么这么贵？我说因为防水。哥哥说，水靴更防水啊，只要几十块钱。

那时的感觉是，挣钱不开心，不挣钱也不开心。客人对你好，对你不好，都不开心，很想换个环境。

另一方面，比起做导游，虽然对社区项目更有兴趣，但做的途中发现自己能力很弱，除了要有沟通、翻译的能力，还要做文字记录、拍摄，后期出版成教材时还要考虑做设计，这些我都不会。郭老师就提议，要不要去昆明学个设计？那时导游挣钱很容易，我担心会后悔，但郭老师说，要破釜沉舟。我把导游证给了一个和我名字一模一样的朋友，走之前，旅行社还让我带了一个团，说挣点学费。那天带大家去碧塔海，晚上又吃猪肉又吃烤羊，大家都很高兴，挣了三千五百元。

重新回到昆明，白天在云南师大广告设计，晚上去爱因森教育学电脑平面设计。以前妈妈不让我上大学，现在自己挣了钱，补上一个大学，很开心。

郭老师也鼓励我写作，转山时，我在路上写过转山日记，他帮我发表了。那期间就鼓励我写村子里的故事，把这些故事变成《阿觉娃的一千零一夜》的连载发表在网上（我们会把朝圣者称为阿觉娃）。那时郭老师正在做“云之南”纪录影像展，我现学现用，也用我的设计帮着设计海报、奖品等等。也同时做拍摄，还用《小生命》参加了纪录片导演吴文光老师创办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

在昆明很快乐，很充实。两年学习结束，再次回到香格里拉。

阿觉娃的一千零一夜

这就是我二十多岁时，在郭老师的鼓励下，根据村子里的故事写的《一千零一夜》。因为大多都是身边的真事，为了避嫌，就假以“阿觉娃”的身份讲述。时间过得真快呀，我都已经是个小学生的妈妈了，那时，我也还是个孩子呀。

引子——

转山（卡瓦格博）的路途漫长，特别到了夜晚，成群的麻子叮得人难以入眠。人们百般无奈，只得烧起一堆篝火，喝茶聊天，以度长夜。众人轮流说笑，但口才大多一般，讲不了多久，便教人昏昏欲睡，那讲话的人自己也没了兴趣。可在人群当中，有个阿觉娃（转经人）与众不同，她每天必讲一个故事。不管什么场合，只要在晚上的宿营地，都见她被一大群人围着，兴致高昂地讲着。等讲完了，有人说：再来一个吧。她回答：我的故事完了。可第二天，在一个新的宿营地，她又会想起一个新的故事。

故事摘选

竹篮子

很久以前，有个姑娘的妈妈老了，再也做不动事，帮不了她任何忙。姑娘就用竹篮子把妈妈背到澜沧江边，不顾老人央求，把她扔到江里。她觉得空篮子还有用，就

背了回来。

过了很多年，她也老了，她的姑娘也用那个篮子把她背到江边。虽然她后悔当年做的事，但来不及了，她也被扔进江里。女儿又把篮子背了回来。

后来的每代人都这样做，一直到第九代。姑娘依然用竹篮子背母亲到江边，看见妈妈流眼泪，心软，舍不得丢。她心里想，今天我把妈妈从这里丢下去，明天女儿也会丢我，为什么要让这种事情继续下去？她把妈妈抱出来，把篮子丢进江里。从此，这样的事再也没有发生。

我和羊

我们家曾经养过很多羊，小时候，我经常去放羊。

我喜欢和羊闹着玩，不肯像哥哥姐姐那样一打开羊圈门就赶羊出来，我会悄悄打开门，然后来个突然袭击，大叫一声，吓它们一大跳。或者，打开门后，什么话也不说，盯着它们看。羊也奇怪地看着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把头慢慢往下偏，羊也和我一样把头偏下来，眼睛还一直盯着我。有时我会轻轻地摇头，羊也学着做，它们的头摇来摇去的时候，就好像那些看羽毛球比赛的观众。有些老一点的羊对这些怪动作不屑一顾，甚至会从鼻子里扑哧呼出一股气，把鼻涕也吹了出来。玩够了，我就大叫一声，羊群吓得赶紧往角落里挤，我得走进圈里把它们赶出来。

早上刚把羊放出来，它们喜欢边走边拉屎，要等到它们拉完，才能把外面的大门打开，放它们出去。一到外面，它们就特别高兴，小羊喜欢边走边跳，像我一样。走着走着，它们还会打起架来。这一架对我们这些牧羊人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有预测作用：要是两只公羊打架，说明今天要倒霉了，会很辛苦；要是两只母羊打架，说明今天会有好运；要是一只公羊和一只母羊打架，说明今天运气一般，不好也不坏。

抗日

我们喜欢看电影，以前经常在公社的天井里放露天电影。天井中间摆着一台流动放映机，靠墙的两根柱子上挂了一块白布，放电影的人在门口拦了一根木头作为关卡，比木头高的人收两毛钱，跟木头一样高的娃娃交一毛钱，比木头矮的不用交钱。

我正在读小学二三年级，但瘦瘦高高的，每次都被列入要交钱的行列。我们几个同学约好，趁放映员在跟大人收钱时，赶紧从木头底下钻过去，混进看电影的人群。放映员要来追我们，大人就会乘乱而入，所以他只能在我们背后鼓眼睛骂几声。其实，大人逃票更厉害，公社的天井旁边有个水池，可以从那里爬上来，进入天井。但那里有点高，只有健壮的年轻人上得去。

那时，一部片子会重复放好多天，村民看熟了，还是喜欢看，会说里面的话，唱里面的歌，尽管不懂那些汉话的意思。有段时间，经常放抗日战争的影片，每天看日本人欺负我们的农民，看得大家都非常气愤。有天晚上，刚好放到日本鬼子要刺杀农民的时候，忽然“嘣”地一声枪响——荧幕上日本人的头被打了一个洞，露出背后的砖墙。大家吓得“哇”地回头看，一个中年男人正端着一把步枪，气哼哼地在装子弹，嘴里还骂道：“我再来一枪，看你还活不活得成！”

以后每次看电影，不单是日本人，电影中的每个人走到那个位置，头上都会有个枪眼。开枪的人自己取了个汉姓“蒋”，他的两个姑娘也姓蒋，还说除了他媳妇以外，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孙子和重孙子。

三个爷爷

父亲有两个哥哥，但他们不完全是亲兄弟。他们有一个母亲，三个父亲。希望听故事的人，请你不要急着下结论，觉得我奶奶有点那种。请听我细细往下说。

奶奶是个勤劳的人，心地善良，长得也不错，所以没满十七岁，就有很多人来我们家提亲。奶奶有些骄傲，不愿意轻易答应谁。祖母对她说：女人啊，也就只有在没有嫁到别人家之前可以骄傲一小段时间，等嫁了人家，就得做牛做马了。奶奶听后很害怕，她不想嫁人了。

祖母给她找了一个女婿，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好景不长，当奶奶生下一个儿子后，爷爷就去世了，那个儿子就是大爹。

祖母觉得奶奶还年轻，不能让她就这样过下去，就把她嫁到离我们村只有十多公里的村子里，还办了喜事。对方是个年轻小伙子，在这里就暂且称他为“二爷爷”。大爹那时还小，就由祖母养着。

才嫁到那里不久，奶奶就逃回家来，她请求祖母不要让她离开这个家。祖母很生气，觉得嫁到人家又反悔很丢人，说：“既然已经把鲜花撒到坝子上，那只能让它自由地生根发芽，再没有办法把它们收回来了。”然后叫奶奶的哥哥把她送回那个村去，后来奶奶又逃回来好多次，都被送回去了。

日子就这样悄悄地滑过，奶奶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那是我父亲的二哥。儿子的到来也没能抓住奶奶的心，奶奶再一次逃跑了。这一次，她是跟着村里的另一个男人逃跑。他们没有回家来，躲在牛场里。

没过多久，二爷爷知道了他们的下落，他提着一把斧头，背着一些糌粑，往牛场走去。快到奶奶他们住的石头房子时，他把斧头藏在树背后，只背着糌粑进去。

二爷爷没和他们吵架，反倒递糌粑给他们：“你们走了有段时间，肯定没什么吃的，我送一点上来，顺便希望你能回去看看我们的儿子，他生病了，不听我们的话，只想要你。儿子的病好了，你们就可以在一起了，我不会阻止。”一提起儿子，奶奶的心就软了，她马上同意了。

二爷爷让奶奶先回去，他留在那里和他的情敌过夜。晚上，他建议情敌用木头当枕头睡。等情敌熟睡后，二爷爷走出石垒房，拿来斧头，把情敌当场打死，然后趁夜逃回村子。

奶奶回家一看，儿子根本没生病，她就放心了。半夜，二爷爷回来了，他说太想儿子，就回家来了，奶奶信了他的话。

第二天，他背上儿子，带着糌粑，说要去山上住一段时间，让奶奶暂时在家，等他回来后，马上成全他们。二爷爷背上儿子连夜翻山逃到了怒江州，后来在贡山县住

了下来，再也没回来过，死在了异乡。

奶奶等了好多天都不见他回来，心里着急，她请村里几个男的到山上砍柴的时候顺便到牛场去看看。那些男的在牛场发现已经发臭的尸体，但没有发现二爷爷。

奶奶失去了她爱的男人以及儿子，被赶了回来。村里到处是闲言碎语，把祖母气坏了，弄得全家人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我们家住在卡瓦格博脚下朝圣者必经的一个路口，行行色色的过路人都会来我们家借宿。有天晚上，来了一个男人，四十岁左右，是西藏察隅人。祖母故意让他睡在奶奶旁边的一张小床上。半夜，奶奶大声喊叫起来，其他人要起来去看，都被祖母制止了，直到奶奶的哭声越来越小。那个男人强暴了奶奶。

早上，祖母要求那个男人留下来，他真的留下了，成了我的三爷爷。奶奶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父亲两岁多一点时，奶奶去世了。爷爷也离开了，回到他的家乡察隅，与我的父亲隔着一座怒山山脉，这座山脉的主峰叫卡瓦格博。

藏起来的村庄

转山路上，时常会看到人们在一些大石头前面烧香。据说这些石头里面藏着“日告”，意思是“躲在下面的村庄”。

当地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讲深山里的雨崩村是怎么被发现的：有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每年都会背着布口袋来西当村借粮食。人家问他的家乡在哪里，他也不说。这引起了村里人的好奇。有个聪明的村民想了主意，他在借粮食给那个陌生人之前，在袋子上捅了洞。那人不知道，背着袋子往山上走，一边走，粮食颗粒一边掉出来，那村民便顺着洒在地上的粮食，悄悄跟在后面。跟着跟着，来到一块石头前，洒落的粮食没有了。他把石头翻开，眼前马上出现一个村子。它的四周被雪山和森林环绕，风景如同仙界，它就是后来出了名的雨崩村。

雨崩被外面的人当作香格里拉，而雨崩村的人也说他们的山里藏着“日告”。据说曾经有飞机在雪山上飞的时候，看见山里有七个村子，但派人去找，至今也没找到。



黄菊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先后就职于《新旅行》杂志社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行李”，以人物采访的形式，探讨人地关系，希望借此书写一种有活生生的人参与其中的当代地方志。已出版行李访谈书系《天堂，是因为有足够的地方闲浪》《寻隐记》《荒野志》《仿佛若有光》。

生活亲历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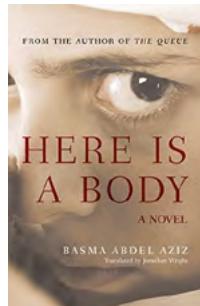


图片来自 [baber khairy](#) on Unsplash

位著名学者建议：

“我们当你们不存在，把你们彻底消灭，把你们的名字移出官方记录（要是那里面竟然还有你们的名字的话），像对待流浪狗一样对待你们。国家没法在你们不提供任何回报的情况下给你们提供食物、教育和住房。国家花不起那个钱。”

不过，最后当局还是决定放过这些男孩，不杀他们，而是把他们重新安置到集中营。在这里，他们失去自己的名字，仅被称为“身体”（badan，阿拉伯语，专指躯干，即无头身体）；他们的主人则被称为“头”。他们要接受体育训练，还要上课。他们被告知，他们必须出力保卫国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就像手术刀，负责切除民族身体上感染的伤口；他们是受全能的神支持的士兵，神将在后世奖励他们，并把他们的敌人送进火狱。



《这是一个身体》

非虚构

在埃及拒绝沉默

乌苏拉·林赛 | 小鸟文摘

和你的过去和解是一回事，
把遗忘像兜帽一样套在你头上是另一回事。

2021年11月下旬，在离开两年后，我又来到开罗。我知道会有变化，也发现不少变化。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附近，大多数文化生活都消失了，这个区域也变成一个装饰性的、警力严控的展示场所。布拉克（Bulaq）密集的下层阶级街区已被清空，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宾馆和高楼。我以前住的街区旁边的滨河步道也在施工，我担心那里的树，因为在其他地方，很多树都被拔除。巨大的新高架高速公路穿过中央街区。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总统的政权正在斥580亿美元巨资，在埃及东边的沙漠兴建一座气势恢弘的行政新都[1]。这些公路就是为方便驱车前往新首都而设计的。

这座城市看起来陌生，但不只是因为这些有形的变化。我对开罗的感觉，还停留在我在那里生活的最后一年，也就是2014年。那一年，反革命军事政权的建立，结束了三年前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欣快、混乱和焦虑。自那时起，我也回来过几次。我认识的人走了很多，留下来的，要么厌倦谈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要么忙于应对他们陷入的永无止境的麻烦。

这一次，不同的是，关于2011年起义的记忆看起来不但被埋葬，还被消除，好像它不曾发生过那样。自上台起，塞西政权的目标就一直是，不但要消除起义的影响（塞西说，从一开始，他就把阿拉伯之春看作“埃及这个国家的死亡证明书”），还要用洪流般的谎言和威胁把关于起义的故事抹除，使人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今再去回顾阿拉伯之春，人们的感受是绝望，甚至可悲。但少数埃及人依然坚守着起义的记忆和理想。巴斯玛·阿卜杜勒·阿齐兹（Basma Abdel Aziz）便是其中之一。我曾在某天早上和她讨论过她最近的书《这是一个身体》（*Here Is a Body*）。

当局下令，不许她的出版商宣传这本书，不许书店卖这本书，不许报纸写这本书。

这本书的英文版由乔纳森·怀特翻译，开罗美国大学出版社（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简称AUCP）出版，但在埃及买不到。是什么使这本小说如此不受欢迎？

打开《这是一个身体》，迎面而来的是迷茫和恐怖。拉比（Rabie）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他和其他流落街头的孩子一起在垃圾场生活。一天半夜，有人来垃圾场试图把他掳走：

“某人的靴子踩到我的手和埃马德（Emad）的手臂。我无声地喘气。接着，有人提起我的脚，拽开趴在我腿上睡觉的尤素福（Youssef），把我的身体拖起来。我紧紧抓住尤素福的衣服，但对我来说，那只手的力气太大了。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脑袋在空中晃动。我梗住脖子试图控制它，可没有用。我分不清发出命令的声音来自哪里，但它肯定是从上方传来的。

‘起来，你这个肮脏的杂种。起来，你这坨屎。起来，起来’，它说。”

孩子们被塞住嘴，蒙住眼，运到一个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他们被扔进一个拥挤的房间关了好几天，独自在那里哭喊、呻吟、大小便。一个抓他们的人解释说，抓他们是因为他们四处流浪，有碍观瞻、有损市容。为此，人们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一

一开始，男孩们还不信。但最终，他们开始被派出去执行任务，攻击抗议者，为警察创造向抗议者开枪的借口。一些男孩陶醉于他们新发现的权力，就像他们中的一个解释的那样：

“现在我们是主人了，国家的主人。没人敢骚扰我们。没有哪个婊子养的司机敢看不起我们，没有哪个卑鄙的服务员敢在餐厅或咖啡厅门口驱逐我们。没人敢向我们求助或举报我们。是我们举报他们，把他们像稻草一样从地面抹除。要是有哪个杂种敢叫唤，我们会让他闭嘴，让他以后只有在对我们表示服从的时候才敢张嘴。”

这本书的另一条故事线涉及一对夫妇，阿依达（Aida）和穆拉德（Murad），他们决定加入抗议者在“那个空间”里形成的帐篷城邦。静坐是“举旗运动”组织的，它们要求把权力归还给他们被绑架的统治者。任何熟悉埃及近来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在指什么：这说的正是2013年夏天开罗的拉巴阿·阿达维亚广场（Rabaa el-Adawiya Square），穆斯林兄弟会在这里举行了一次大规模静坐示威活动。不久之后，安全部队开始清场，造成了埃及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屠杀。

2011年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下台后，过渡时期的水被刻意搅浑。期间，穆斯林兄弟会、临时军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为权力相互周旋，而抗议者则持续与安全部队冲突，要求真正的改革。2012年，兄弟会的穆罕默德·穆尔西以微弱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在执政的头几年，兄弟会证明了自己的顽固、不宽容和目光短浅。他们攻击批评者，拒绝约束警察和他们支持者的暴力，还推行一部把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奉为神圣、疏远国内自由主义和进步势力的宪法。

穆尔西与法庭冲突，并发布争议性很大、赋予总统各种例外权力的宪法宣告。一个自称“塔玛罗德”（Tamarod，意指“反叛”的群体开始聚集起来，他们联署请愿，要求穆尔西下台。2013年6月30日，反对穆兄会的抗议浪潮席卷全国。军队介入并逮捕穆尔西。他的支持者则拒绝接受这个结果。

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一名临床心理医生，多年来一直在治疗被国家酷刑折磨的受害者。她告诉我，她的人物是虚构的，但她写的事基于研究和一手记述。她捕捉到了穆兄会静坐期间展示的那种自欺、浮夸和好斗。一位谢赫（译者注，阿拉伯语尊称，一般指长者、头人，宗教语境中通常指教长）对人群说：“他们要小心了。要是有人敢伤害我们的统治者，哪怕撒过来的是一滴水，我们也会报之以血的洪流！”

阿齐兹指出，穆兄会领导层利用自己的群众基础，期待通过协商，至少拿回部分权力。她展示伊斯兰主义阵营的一些人是怎样号召拿起武器（实际上，一些人也的确这么做了），被怀疑告密和卧底的人怎样受到残酷对待，以及周围街区如何陷入恐慌，并因为穆兄会的静坐而被迫静止。但她笔下的抗议又是绝对和平的，普通人怀着某些错付但可以理解的动机加入其中。阿依达心想：

“她最想不到的是有一天她会去街上和成千上万人一起抗议，抗议某种政治问题，可在统治者被劫持时，你又能做什么？在他被拖出办公室，他的支持者被耻辱地赶出政府时，你又能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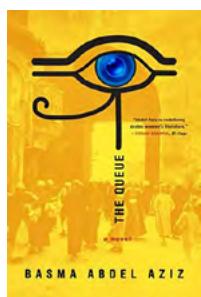
7月24日，当时的国防部长塞西请求埃及人民上街，授权他与恐怖主义斗争。他说，“我请求你们告诉世界，如果有人要搞暴力，或有人要搞恐怖主义，那么军队和警方就有权与之对抗。”8月14日，安全部队开进拉巴阿（Rabaa），用催泪瓦斯、武装运兵车、推土机、狙击手和直升机清场。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发现，他们对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抗议者无差别地使用荷枪实弹。在袭击开始之前，他们只播放了几分钟事先录好的离场警告，抗议者也找不到安全出口；许多人报告说，他们在试图逃离时遭到枪击。在描写屠杀的那一章，阿齐兹描写了在绝望的恍惚中，失去丈夫的阿依达在营地里徘徊，找不到儿子或出路：

“可以看到讲台区喷出的火舌。许多抗议者蜷缩在还没有着火的沙包和轮胎后面。他们以为自己安全，可子弹像刀切黄油一样打进轮胎，又从另一面穿出。推土机边铲尸体，边把路上的尸体轧得粉碎。粉碎机开足马力，抹除一切可能让人想起抗议的痕迹。这40多天必须从地面上消失。推土机推掉一座帐篷的短桩，又冲向另一座，夷平里面剩下的一切。它不会因为人藏在扭曲的椅子和破碎的毯子里停下。它会把

他的血肉骨头与锅碗瓢盆、古兰抄本和各种各样的家用物品碾在一起。阿依达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向这狂暴的野兽扔去，接着她又扔了第二块，第三块。”

清场过后，这本书又用 60 页篇幅细数事后的审判、抓捕和审查，然后戛然而止。《这是一个身体》写得急促、不均衡、乱，有时还用力过猛。它不如阿齐兹的上一本小说《队列》（*The Queue*）精巧。后者对极权主义的眩晕感进行了紧张而富有想象力的描述，其主角叶海亚（Yehya）在一次用“可耻的事件”一笔带过的抗议中被安全部队击中。但因为否认向抗议者开枪，当局篡改了他的医疗档案。他因内脏中的子弹濒临死亡，但当局不会承认那颗子弹存在。和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他在关闭的门——一个不断发布规章条例的神秘行政部门——前，花好几天时间排了一英里的队。只有在这里，叶海亚才能拿到公民身份证明，接受治疗的许可。那本书很好地捕捉到这点，即持续的监控和恶意的官僚主义是怎样使人们因恐惧陷入一种自我贬低和绝望的虚伪状态。

阿齐兹 2012 年开始写作《队列》。关于可能发生最坏情况的故事尚有悬念，关于已经发生最坏情况的故事则不然。《这是一个身体》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现实拉平想象，巨量残酷和谎言使作家再无发明空间，只有自觉记录的冲动。



《队列》

八名警察和至少九百人——实际数字很可能远远超过一千——在拉巴阿遇害。屠杀之前，是一轮散布恐惧、非人化的媒体宣传；屠杀之后，是一场同样激烈，对异见之声的追捕。没有一名官员或政客被追究大屠杀的责任；甚至提及此事也会被认为有罪，会被认为是在支持恐怖主义。

考虑到这样的气候，写这件事（哪怕打着虚构幌子）、同情地描述其受害者是一个勇敢的行为。阿齐兹也做好被抵制的准备；可迎接她的却是震耳欲聋的沉默。当然，这是审查和恐惧的结果，但也源于这个国家媒体界、知识界和精英那里的否定，他们要么同流合污，要么默不作声，还没有认真思考。

埃及活动家和作家阿拉·阿卜杜拉·法塔赫（Alaa Abd el-Fattah）在谈到拉巴阿时说：“有很多人赞同它；更多的人即使不赞同，也决定视而不见，因为害怕；还有更多的人，只是保持沉默，因为无能为力。”

他是少数不保持沉默的人之一。他的谴责一点儿也不含糊 [2]。

“拉巴阿的崩溃比我们经历过的一切都要可怕”，法塔赫在当时这样写道，“只有战争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拉巴阿是独一无二的。”他责备兄弟会创造了 2013 年夏天的政治困境；他见证并谴责其支持者的暴力。但他也强调，那一切都不足以认为拉巴阿发生的事情正名：

“无论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的罪行如何罄竹难书……（与拉巴阿屠杀相比，）之前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虽是大屠杀的受害者，作为组织的兄弟会和作为理念的政治伊斯兰也有很多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但我拒绝在谴责大屠杀的同时谴责它们，就好像我需要证明自己反对兄弟会，或是需要证明我对民族或革命的忠诚那样。”

他立刻看到，“今天指向穆斯林兄弟会的武器下一次会指向别人：军队不是反伊斯兰主义的世俗主义者，军队是反对变革的旧制度。”屠杀是一个转折点，它将定义新制度和人们对先前所有制度的理解。通过接受这种程度的国家暴力，埃及人将失去一切对民主、负责任治理的希望。数年后，法塔赫写道，“除烈士外，无人幸免于拉巴阿的后果；今天，甚至那些对它视而不见或为之辩护的人，也在为之付出代价。”

《你还没有被打败》（*You Have Not Yet Been Defeated*）收录了法塔赫的大量新闻专栏、推文、讲话、脸书帖子、访谈和狱中通信，自 2011 年起，他的大部分时间在监狱中度过。这本书在埃及买不到。读这本书时，你会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位作家的诚实、谦逊和独创性打动。你会震惊于此：法塔赫往往是对的，不是说他知道该做什么，而是说他经常看穿每一个混乱、两极分化且经常是无望历史节点的真相。他的文字犀利、有趣，充满激情又敏感脆弱，慷慨地努力说出有用的话。



《你还没有被打败》

我最早知道阿拉（编者注，法塔赫的名，表示亲切）是在 21 世纪头几年。他当时是个年轻、友好、自信的活动家，一头卷发，为组织反对穆巴拉克对权力无休止的把控和争取更多司法独立的抗议而奔走。他是一名程序员和博主，和妻子玛娜尔（Manal）运营着 Manalaa.net（译者注，这个网站名称拼接了两人的名字 Manal 和 Alaa）。这是一个联结埃及国内外早期网上公民活动的网站，也是联合其他博主，传播关于开源软件和公民新闻的平台。他写道：

“我们来自第二次起义的时代，在炸弹落在巴格达头上时，第一次真正走进世界。我们身边的阿拉伯同胞都在喊，‘踏过我们的尸体！’北方盟友大叫，‘别以我们的名义！’南方的同志在唱，‘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当时我们就懂了，我们继承的那个世界正在死去，并且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并不孤单。”

在世纪之交的埃及，他们渴望“有一天不再窒息地肯定，明天会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模一样。”

几年后，当阿拉伯之春在埃及爆发时，阿拉和玛娜尔从南非赶回家，此前他们一直生活在那边。在埃及革命的头几年，阿拉投入组织工作。他发表了对政治转型进程的尖锐批判，并提议仿照南非《自由宪章》，起草一部真正的宪法。很快，他不可避免地与临时政府背后的军方发生冲突。

2011 年秋，科普特基督徒（Coptic Christians）举行反宗教歧视游行。军队袭击游行队伍，杀死 26 名抗议者，可当局和媒体却称军队遇袭，呼吁公民上街保卫军队，从而导致教派冲突。阿拉和其他活动人士在停尸房花数天时间说服遇害抗议者家人验尸，结果被逮捕，并被指控偷窃和破坏军队财产、攻击士兵，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被控“谋杀，意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他在出席军事法庭时拒绝承认其权威，认为自己该在民事法庭接受审判。在当局因多方抗议和压力撤销指控，放他回家之后，他说：

“我无法庆祝自己冤屈得雪，我们一直都知道，杀人的不是我，可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在哈姆迪·巴丁（Hamdy Badeen）将军戴着手铐在庭上抠鼻子，一罐燃气只卖五镑时，革命，这次革命就会取得成功。”

两年后，在把兄弟会赶下台时，军方承诺不会参与政治。可不到一年，塞西将军就参与选举，在实际上几乎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取得压倒性胜利。（在他下一次参选，也就是 2018 年，为取胜他还得确保先把潜在竞争者都关进监狱。）他的政权很快就把矛头指向所有“革命青年”领袖，而阿拉的名字，就在清单的头几位。在抗议完全遭到禁止时，他和其他一些人觉得有义务举行反对新法的示威活动。于是他被判三年徒刑。

阿拉的狱中写作大多是在承认失败并寻找原因。他总结说，“像 2011 年到 2012 年，当（革命）得到广泛民众支持时，我们竟然不能明确说出一个共同梦想——在埃及，我们想要什么？我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失败”。革命者的错误是迷醉于自己的神话，“在有毒的两极分化——一边是迅速军事化的伪世俗政权，另一边则是恶毒地执着于教派之争的伊斯兰主义——中输了叙事之战。”

阿拉总是把埃及的事件，和从巴勒斯坦到美国更加广泛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的斗争关联在一起。他在 2017 年写道，“我们被打败了，意义也和我们一起被打败了”。

“就像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在受世界影响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那样，我们的失败都是一场更加广泛的战争的症状和原因。这场战争针对的是意义，是追求超民族国家公共领域的人民的罪行。在那个领域中，他们可以亲密地联系、交流、沟通，甚至争吵。在那里，关于现实的共识和多种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梦想都将成为可能。”

他于 2019 年 3 月获释，但根据政权对他为期 5 年假释的严苛解释，他被要求每晚在警察局待 12 小时。每晚的报到令他痛苦不堪。他身上和周围发生的变化也让他晕头转向。在一次接受独立新闻网站 Mada Masr 访谈时，他说，“我会在街上迷路。我会在同时被要求做两件事情时困惑。”“人们用表情和声音——哈哈呵呵——而非文字说话”这个事实让他迷惑。他对抵抗话语表示怀疑——“西方左翼花了 20 年时间让这个词变得廉价。任何一个边缘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被称为抵抗”——他觉得社交媒体使人无脑地接受荒谬，并败坏了人们讨论复杂观念的能力。

2019 年 9 月，在一名与塞西政权关系密切的建筑承包商发布一系列详细记录腐败，并呼吁人们对此表达抗议的视频时，当局展开新一轮大规模逮捕。阿拉被预防性监禁两年，这个被滥用的法律规定，允许当局在提出指控前抓人。当新冠疫情在埃及监狱中爆发时，当局的反应是否认和进一步限制。阿拉的书被收走，他不能锻炼，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和家人联系。他把出庭当作与外界联系的手段，在庭上即兴演讲。事后，他的律师根据记忆把这些演讲记录下来。“实际上，我是俘虏而非被告”，他对法庭说：

“我的处境之荒谬超越小说家的梦想……检方没有向我提供调查的细节，没有向我出示任何证据、证人、证词，甚至没有解释我面临的指控的细节。”

人权团体估计，自政变以来，塞西政权拘留了 6 万名政治犯。这个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不得不建立一个秘密监狱网络，其中酷刑盛行。1 月 11 日，为数不多检测埃及被拘留和关押人数的组织——阿拉伯人权信息网络（Arabic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简称 ANHRI），宣布因难以承受政权的骚扰，即将关闭。大多数政治犯被当局指控为穆兄会成员。但埃及最显眼的世俗与自由派活动人士也都面临被起诉、监禁、虐待、监控或流放的命运。

在不断升级的压迫面前，阿拉及其家人依然大声疾呼，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他的父亲艾哈迈德·赛义夫·伊斯兰（Ahmed Seif el-Islam）是共产党员，1980 年代在狱中受过酷刑，后来成为一名受人爱戴的人权律师。父亲去世时，阿拉还在监狱。（次月，他获准短暂出狱致悼，这本书中也收录了那篇悼词。）儿子哈立德出生时，他也在监狱中。他的母亲莱拉·苏伊夫（Laila Soueif）是数学教授，她和阿拉的两个妹妹莫娜（Mona）和萨娜（Sanaa）一直坚定支持阿拉和其他囚犯的权利。两年前，在监狱门外露营时，她们遭到几名女暴徒袭击，后者在狱警眼皮底下殴打她们，偷走她们的财物。当萨娜向检察官报告这次袭击时，她被当街抓进一辆货车。下车后，她被指控“散布假新闻”、“煽动恐怖主义”、“滥用社交媒体”，被判处 18 个月徒刑。

2021年12月21日，阿拉又被判了5年。他的共同被告是博主穆罕默德·“氧气”·易卜拉欣（Mohamed “Oxygen” Ibrahim）和律师穆罕默德·巴克尔（Mohamed el-Baqer），巴克尔在被捕前一直是阿拉的辩护律师，被判了4年徒刑。审判在紧急状态下的国家安全轻罪法庭举行，那里没有上诉的可能性。案件在塞西总统宣布取消紧急状态法前几天被移交到了那里。在制定如此之多的法内法外压迫形式之后，他不再需要这部法律。法庭向几名家人和律师宣布判决（在坚持之下，他们才被允许进入一个空旷、配备警卫的审判室）。法官和被告都没有出席。辩护律师看不了卷宗，见不了当事人，也没法辩护。看起来，“散布假新闻”这个指控的依据，仅仅是阿拉在推特上转过一名囚犯死亡的新闻。

就在几个月前，去年9月，塞西否认埃及存在政治犯，主持了埃及国家人权战略的启动仪式。他在讲话中声称，埃及尊重他的政权剥夺的那些权利——“人身安全、个人自由、参政政治生活、言论自由和建立非政府组织的权利”。他还宣布将建造一系列“美式”大监狱。他解释说，这些监狱将配备现代设施，被拘留者甚至不需要再去法庭出席，因为法官将在现场工作。今年1月，美国政府因埃及糟糕的人权记录，扣留1.3亿美元对埃援助，同时又批准超过20亿美元对埃军售。

《你还没有被打败》是一部宝贵的记录，包括过去10年埃及发生的事件、一位左翼、人文主义、国际主义思想家的心路历程、一个在压倒性不义面前不屈不挠的非凡之人的努力。在一篇题为《关于疗愈的五个隐喻》（*Five Metaphors on Healing*）的短文中（保释期间，他在警局过夜的一个晚上，写下了这篇文章），阿拉引用了叔本华、尼采、詹姆斯·鲍德温、列宁、瓦尔特·本雅明和雅克·德里达来形象地说明，疗愈的过程如同重生，如同截肢，如同某种形式的回收，如同鬼魂出没，以及最终（受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启发），如同再生：

“如果我们只能做没有能动性的动物，那就做吧。但我们要避开牲畜，无视宠物和驯养动物。我们要向蜥蜴、海星和蚯蚓——那些无论受多重的伤，都能在受伤后再生的存在——看齐。我们应该接受，再生的器官可能和失去的器官不一样。它们可能看似残缺，但仔细看，你会看到畸形中的美，因为只有畸形者才能整合梦和希望的历史与失败和痛苦的现实。畸形者无需忘记旧伤，亦能克服对新伤的恐惧。”



《睡眠之书》

这种悲伤、充满希望和诗意的生存愿景也回荡于现旅居柏林的埃及作家海什木·瓦达尼（Haytham El Wardany）的《睡眠之书》（*The Book of Sleep*）。这本书写于2017年，去年，罗宾·莫格把它翻译成优美的英文。这是一部由论说文、小说和散文诗组成的文集，里面的文章都很短，充满了凝结为非凡形状的思想和情感。

瓦达尼把睡眠呈现为这样一种状态，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庇护、逃避、安慰和自由。他写道，“到夜里，另一种更加安静的力量在运作。它把手掌伸向白天制造的事物，把它们从命运中解放出来。睡眠不在我们内部或外部发生。万物聚集，便有睡眠。”入睡是一种既孤独又集体的经验，它把我们代入“一种流过世界之心的退缩”。

那些熬夜探索睡眠边界的人，摆脱了白天劳动和生产的命令。他们游荡、挥霍，把夜间的城市变成“一个巨大的火堆，（变成）一团火，在火中，每个人都争相毁灭他们能够抓住的一切——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欲望，他们的不平，他们的心血——然后，心满意足地在升起的浓烟中端坐”。同时，睡着的人从个体性本身的重量得到解放。睡眠的放弃使我们和我们周围的物和造物，进入一种同情和平等的状态：“我们被送回自然；它对价值的无尽冷漠。”

睡眠不只是一种悬置，一种意识的缺失，也是一种不同的、必然的、活泼的状态。在睡眠中我们做梦、融化、生长、疗愈、变化。自我抛弃自己，又找到自己。睡眠是一种失败的让步，是一种放弃——但，是一种健康的放弃。它包含希望，因为在迷迷糊糊时，我们相信我们会醒来，“每一次醒来都是在新的一天做出的一次努力，无论这个努力有多小。”

书中只有几处提到阿拉伯之春的事件，但怎样走出那时的欣喜和绝望是影响整个文本动人心弦的潜流。在一篇论说文中，瓦达尼写到抗议者对空间的占领。“只有通过第二个极端、几乎与之截然相反、脆弱的行为，也即在占领地睡觉的行为，才能实现占领这个激进行为。当抗议者在他们抗议的地方睡下，就像他们在解放广场做的那样时，他们才完全拥有那个空间：

“在开放的占领中睡觉的人，不再是战斗中的个体，相反，并肩而眠的他们变成一种新的现实的代理，他们的梦是这种现实的语言，他们力图破解这门语言的密码。”

革命是梦吗？瓦达尼问。亦或是觉醒？看起来，它可以是梦，也可以是觉醒，这取决于环境。同时，睡眠是我们面对自己的过去，并从根本上摆脱它的地方。在一篇题为《蹲伏的野兽》（*The Squatting Beast*）的文章中，他写道：

“你会醒来。可能要一年或一百年，但最终你会醒来……你被吐出自己的生命，和下一个清晨一起重生。你的一部分永远死了……当你睁开眼，你会发现那个小时的部

分像狗一样端坐着，看着你……你会继续走过你和过去的野兽相遇的街道。每看一眼，它就小一点，直到最后只剩它的目光。你会把这些街道命名为你的新生。你的新生，在你过去的目光下生长、繁荣的新生。”

和你的过去和解是一回事，把遗忘像兜帽一样套在你头上是另一回事。塞西政权想垄断记忆的权利——记住一位像阿拉这样的异见人士，把他永远关进监狱；记住革命，确保它永远不会再发生。而这些书有自己的话要说。

注释：

[1] 参见 Yasmine El Rashidi, “Sisi’s New Cairo: Pharaonic Ambition in Ferro-Concrete,” nybooks.com, October 16, 2021.

[2] 关于法塔赫的更多信息参见 Yasmine El Rashidi, “Egypt: Lost Possibilities,” The New York Review, November 4, 2021.

这是一篇书评，评的是：

巴斯玛·阿卜杜勒·阿齐兹 (Basma Abdel Aziz): 《这是一个身体》(Here Is a Body), translated from the Arabic by Jonathan Wright, Hoopoe/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333 pp., \$18.95 (paper)

巴斯玛·阿卜杜勒·阿齐兹 (Basma Abdel Aziz): 《队列》(The Queue), translated from the Arabic by Elisabeth Jaquette, Melville House, 217pp., \$15.95 (paper)

阿拉阿卜杜拉·法塔赫 (Alaa Abd el-Fattah): 《你还没有被打败：作品选，2011-2021》(You Have Not Yet Been Defeated: Selected Works, 2011-2021), translated from the Arabic by a collective, with a foreword by Naomi Klein, Seven Stories, 398 pp., \$18.95 (paper)

海什木·瓦达尼 (Haytham El Wardany): 《睡眠之书》(The Book of Sleep), translated from the Arabic by Robin Moher, Seagull, 161 pp., \$17.00 (paper)



乌苏拉·林赛

美国记者、散文家、书评人，主要关注阿拉伯世界的文化、教育和政治，纽约大学近东研究硕士，现居于约旦安曼。

译者：王立秋

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翻译略有删减，原文来自 Ursula Lindsey, “Refusing Silence in Egypt”,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il 21, 2022 issue. 经《纽约书评》授权翻译，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pyright © 2022 Ursula Lindsey.

小鸟文摘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电影《奇爱博士》(1964)剧照

非虚构

“值得爱的一定不止死亡”

库尔特·冯内古特 | 发现经典

生命在这里是非常不受欢迎的，
也许在另一个星球上会有所不同吧。

我觉得，存在于生活中心最恐怖、最吓人或是最悲剧的伪善，就是那个无人敢碰的真相——人类不爱生命。

采访者：罗伯特·穆西尔
《国家》(The Nation)
1980年8月

穆西尔：写出《五号屠场》这样的作品绝非易事。你为描述德累斯顿的经历做了多久的思想准备？

冯内古特：嗯，写德累斯顿这座城市和德累斯顿大轰炸似乎是我的首要任务，因为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而我，一位欧洲后裔，一位作家，就在屠杀现场。我必须作出表态。我耗了很长时间，很痛苦。最难的地方是我已然失忆了。这场轰炸灾难让我了解了一种现象，就是我的失忆和那些经历过雪崩、洪水和大火的人们一样，与他们聊过后我发现，人的大脑里有某种装置，在灾难超过一定水平后，会关掉我们的记忆。不知道这仅仅是我们神经系统的局限，还是实际上以某种方式保护我们的装置。虽说我当时在场，我真的完全不记得德累斯顿轰炸的情景，回想的办法尝试了不少，就差找一位催眠师来恢复这块信息了。我写信给很多一起经历过轰炸的人，请他们“帮我回想”，而每次得到的回复都是拒绝，简单坚定的拒绝。他们不愿去想这段经历。《生活》杂志有位作家，不清楚他多了解兔子和神经系统，但他说兔子是没有记忆的，这是它们防御机制的一种。如果它们记得单单一小时内的虎口脱险，生活也会变得无法忍受。它们一逃脱德国杜宾犬的追逐，就把一切忘得干干净净，这种回忆是它们几乎经受不起的。

穆西尔：你给这些人写信，研究德累斯顿轰炸的时候，你自身经历的往事细节会不会重现？你说开始想这件事的时候很痛苦。

冯内古特：不管怎样，那座城市面积庞大，我在地面上被烟雾和火焰包围，勉强才能看到两米半的距离，只能研究城区俯瞰图，那种飞机上的漂亮仪器拍出来的照片。所以后来是根据英国军事史学者的调查，才有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最终得到了伤亡估算。东德完全不回应我的咨询。他们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回想起来，大概最奇怪的事情就是，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关心德累斯顿轰炸的人，因为我没见到为这座城市哀悼的德国人，也没有英国人。我曾经碰见几个参与轰炸的飞行员，他们挺恬懦，并不以此为傲。但我没见过任何一个人是抱有歉意的，包括被轰炸的人，虽然哀悼亲友是肯定的。我和一位朋友回到那儿的时候，没有一位德国人说“啊，这地方从前多么美，那些种了树的街道和公园多好看”。他们极其不屑。富兰克林图书馆出版社推出了《五号屠场》的特别版，

需要我为订阅者写一篇特别导言，然后我发现自己是德累斯顿轰炸的唯一受益者。那时我算了一下，自己大概能从每个死人身上赚到近四美元。

穆西尔：在这系列访谈中，我采访过目击大型轰炸的人。你不是轰炸者，但你亲身经历过轰炸。不知道德累斯顿的经历会不会引起你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特殊兴趣（这么说是有冷血了）？或者是对像核武器这类话题的兴趣？在你看來，《猫的摇篮》里有没有相关的联系呢？

冯内古特：嗯，我认为这种兴趣是本来就有的。德累斯顿并不是一个重大启示，而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巧合。其实不管怎样，我都会是个和平主义者。我接受的是理工科教育——我主修化学，而不是写作。那时我正在学化学，我们全家坚信技术统治论。在大萧条时代，我们确实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应该执政，科技乌托邦是有可能实现的。我九岁的哥哥成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就是伯纳德·冯内古特博士，麻省理工大学博士毕业，最闪耀的成就是发现了碘化银人工降水的原理，那是他的专利。他其实是当今领先的气候化学专家。

不过对我来说，科技很糟糕，在如此信赖科学，画了那么多梦想汽车、梦想飞机和梦想的人类居所之后，我却目睹这科技被用来摧毁整座城市，夺取十三万五千条生命，接着，更精密的技术制造出了轰炸日本的核武器。曾经被我寄予厚望的科技，此时却让我感到恶心。于是我开始恐惧它。你看，就像成了虔诚的基督徒后，目击了基督教战胜后的恐怖屠杀。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惶恐，这种惶恐如今仍然纠缠着我……

穆西尔：你刚刚提到了宗教和哲学观。在《猫的摇篮》的结尾，博克依讲起要编撰人类愚蠢的历史……

冯内古特：你知道吗，真有书名是这么起的，叫《人类愚蠢历史简论》，作者是华尔特·皮特金，书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我觉得，存在于生活中心最恐怖、最吓人或是最悲剧的伪善，就是那个无人敢碰的真相——人类不爱生命。碰到人类对死亡的渴望时，伯特兰·罗素回避了这个问题，很多心理分析家也是如此。但我认为在活着的人中，至少有一半，或许九成的人，真的不喜爱这场磨难。他们装出颇为爱惜生命的样子，对陌生人微笑，每天早上起床为生计奔波，不过是想找办法熬过去罢了。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是一场可怕的磨难。他们会随时想要终结。我觉得这比贪欲和大男子主义等问题严重得多。你懂的，这才真谈得上是生活的阴暗面。大多数人不想活着，他们尴尬不堪，他们失去尊严，他们担惊受怕。我认为这是当前最根本的现状。像你这样投身和平事业的人，面对的其实可能是几乎一样勇敢、一样坚决、一样足智多谋、一样深思熟虑的人。而他们真正想做的，就是像按电灯开关一样关掉人生。

穆西尔：那么你认为自己是宿命论者吗？你的书中有一句话贯穿始终——“事情就是这个样子。”但这反复出现的主题句指的是什么？是否暗示着你默认了我们拥有核武器的未来？

冯内古特：不管从事什么活动，我不得不考虑身旁大多数人不在乎将要发生什么这一事实。大多数人胜任不了生命的守护者，我信不过他们，在这方面我很悲观，并不是很多人希望生活继续。其实我是生不逢时。你看，我就这样出生，就这样遇见这个星球，但生命在这里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也许在另一个星球上会有所不同吧。

穆西尔：《猫的摇篮》中的叙事者似乎正在写一本关于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书，他的书研究了爆炸那天所发生的事件，并试图发掘人们的所作所为，包括伟大的科学家费利克斯·霍尼克博士，你虚构的核弹之父。这本小说的源起是什么？你为何选择了这样一种叙事中心？

冯内古特：我曾经是通用电气公司研究实验室的公共关系员，那是个尤其有趣的研究实验室。通用电气发现，将科学家从麻省理工学院或普林斯顿大学或其他什么院校雇佣过来，效率奇高，只需要对他们说：“嘿，你不用再教课，可以整天做研究，而且我们不强制分配任何项目给你，我们只负责买仪器。”我的职责就是经常拜访这些科学家，跟他们聊天，问问正在做什么研究。不时就会聊出一些好故事。我渐渐同这群人熟络起来，年长的人开始给我出了不少难题；不是年轻人，而是这些老科学家，他们起初相信一切必须服从真理，而研究过程中不论发生什么都无须畏惧。那儿有位曾与我哥哥合作过的科学家，名叫欧文·朗缪尔，是诺贝尔奖得主，他或多或少启发了费利克斯·霍尼克的形象。朗缪尔从岩石上得到科学发现，丝毫不理会它将被用到何处，就随意递给了身边的人。他认为任何发现本身就足够美好，所以根本不在乎下一个是谁接手。

我觉得文学和戏剧典型引导了人们的生活，其程度远甚于我们的想象。而那个年代，纯粹而无所谓的科学家是经典的文学形象，还有不少笑话调侃神不守舍的教授，等等，而很多科学家乐此不疲地接受了这种什么都不在乎的人物设定，包括毫不关心自己科学发现的去向。那一代人完全不提防是什么信息被移交给了政府，移交给了战争部，移交给了军队的秘书，移交给了别的什么人。但是那一代有个人，诺伯特·维纳[1]，二战结束后不久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再也不向政府透露任何信息了”。科学家们大概从此也开始变得谨慎。据我所知，我哥哥就是如此。他听说空军曾在越南全境喷洒碘化银，就为了让对方狼狈。这也太荒唐了。他说如果想震慑敌军，他们完全可以喷点什么辣椒粉。当听到他们期待自己的科研成果能有破坏性的用途时，他心里一阵反感。

穆西尔：如果战后诸多问题之一便是你所见的技术统治论的疯狂失控，你会通过文学作品或自我思考提出怎样的替代方案呢？你认为现实世界的费利克斯·霍尼克有没有克星或是化解之道？

冯内古特：嗯，我提倡克制方案。我认为德累斯顿的问题肯定在于克制，或是克制的缺乏。别把技术统治者当成疯子，我觉得疯的是政客，这是他们的常态。不顾众人反对而下令轰炸德累斯顿的那个人，温斯顿·丘吉尔，应该负主要责任。这决定出自一人的头脑、一人的怒火、一人的骄傲，我实在不能为此怪罪科学家们。

穆西尔:但是你的确说过,或至少《猫的摇篮》的叙述者说过,如果霍尼克是原子弹之父,他再也没有办法保持无辜。

冯内古特:其实,现在我对他的感想是,他获得了一种特许,允许他去全心投入生活的一个方面,而这种特权超出了人类应有的限度,过度专业化是造成他道德感空洞的原因。如果一位音乐家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里,感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一位科学家也如此,便难免会成为一个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人物。

穆西尔:你怎么看核武器威胁这个话题?你认为这种威胁正在增长吗?你是否担忧?

冯内古特:嗯,是的,我确实担心。我还是担心人们对这件事漠不关心。《奇爱博士》这部电影可以有很多种解读,但是我告诉你,最令观众满意的就是世界的美好终结,然后一边播放那首煽情的歌。它本来具有反讽含义,但对观众席上的大多数人和大众的普遍认知水平来说,这就是美的。我不是说那些人头脑简单,我的意思是这个末日场景很惊艳、很可爱、很吸引人,不会让任何人退缩。不过,的确有部电影让人恐惧战争而连连退缩,那就是《战争游戏》。那部片子很特别,难以忍受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死亡的过程是可以多么缓慢,孩子们慢慢死去的样子惨不忍睹,诸如此类。这对人们来说是很糟糕的事情,不过电影和平而没有痛苦的结尾让人大为宽慰,超过了彼得·塞勒斯[2]的所有演艺佳作,精彩的基南·温[3]喜剧或是一枪击爆可口可乐贩卖机的硬币箱。恐怕那个美好的结局就是那部电影受人喜爱的原因。无心也好有意也罢,库布里克[4]拍了一部让人开开心心回家去的电影。我敢肯定每个看了那部电影的人之后都睡了一个安稳的好觉,夫复何求。

穆西尔:那么你的《五号屠场》呢?你觉得人们会对书里描写的灾难场景做何反应?

冯内古特:我实在无从知道,没和很多读者聊过,但我的确听年轻人说:“我爸爸说战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德国人的反应则是:“不,不,战争并非如此。”当然了,战争如何,德累斯顿爆炸如何,我做的调查和他们一样详尽。但是你看,德国人觉得这场战争是他们版权所有,而我竟敢妄加评论。

穆西尔:关于核武器及其扩散,除了作家之外,你还担任了其他角色吗?

冯内古特:说起来有一样,我繁殖了后代。我生了孩子,非常爱他们,并希望他们爱生命,我不想他们失去信念。而对于核武器,我想象不出任何人会想要这种东西。我不想让我的国家拥有核武器,我不想任何人拥有它。国家间一个接一个再接一个地制造核武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一旦存在于任何地方,就会威胁整个星球。所以我不想让我的星球拥有核武器,而那些感觉它们不太危险的人,肯定不是白痴就是伪君子。或者像刚才说的,也可能他们厌恶生命,想要终结一切。

穆西尔:但是像约翰·肯尼迪这样的活跃人物呢?你如何评价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行为?有的人只是坐在那儿,然后说,唉,我们大概也只能这样办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冯内古特:嗯,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伪君子了。热爱生命的人喜欢爬山、徒步攀岩,或是投身各类伟大的冒险,他们露着牙,对,激动地咬着牙去爱牛排、爱女人、爱威士忌,爱所有这一切。我每当看到这种人,不禁生出些警觉,因为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伪善的一种症状——一个假装热爱生命的人其实会用力过猛,就像有什么要隐瞒。

穆西尔:你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弄清德累斯顿轰炸这样的事件,又去研究能制作出冰-9的科学家或原子弹之父的本性,那么你对政策制定者的炸弹或核武器威慑论有何想法?

冯内古特:我只能想到他们说谎的心,这是政治的常规部件。我有位一同参战的朋友。我们一起当过童子军,后来又一起被俘虏。那之后他做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地方公诉人,他名叫伯纳德·奥黑尔。我们那时坐部队运输船回家,一起从纽波特纽斯下船。我说:“来讲讲,你有什么收获?”我指的是二战,我们两人都是列兵。他想了想说:“我再也不相信政府了。”

我们成长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我们信赖政府,并且热忱地支持政府,因为经济正在复苏。我们是如此配合的公民,所以对政府失去信赖只需要一点小事——我们发现政府在撒谎。那个年代识破政府欺诈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识破的谎言跟轰炸技术有关,政府说我们有高超的轰炸瞄准器,能将炸弹投进烟囱里,继而给地面造成种种显微手术般精密的爆炸效果。随后我们见识了真实场景。他们派乌泱泱的一大群飞机去狂轰滥炸,根本没用到什么轰炸瞄准器,完全是地毯式轰炸。而这一切都对美国国内保密:空袭、随机轰炸,还有向任何移动的物体开火袭击这件事的本质。

穆西尔:你一开始是否接受杜鲁门与史汀生[5]对广岛原子弹轰炸的官方解释?还是说你觉得是很明显的谎言?

冯内古特:我那时已经下了部队运输船。我五月被释放,但是一直到六月中旬才回到家。广岛核爆炸是在八月,我那时候正在家休假。我见过轰炸的情景,所以当杜鲁门讲到将要攻击广岛市内集合场等军事目标的时候,我就知道是屁话,因为任何东西都是集合场,任何直立的楼都碍眼,两根棍子之间只要还挂着线都是军事冒犯。然而它们身上可以安这么多名目。我一直记得杜鲁门讲了我们在广岛要袭击的目标,讲到了集合场。你知道纽约有集合场,印第安纳波利斯有集合场,南本德有集合场。我觉得那些不过是铁路调车场,但如果你在里面集合了那就成了这种可怕的东西。

穆西尔:回到当代,听到吉米·卡特在就职演说上声称“我们希望向无核化的终极目标前进”,你是否当即否定了这种说辞?你是否认为公众已经开始对政府领导人的言论不抱信任?

冯内古特:如今是想法让人们不再信任。奥威尔详尽讨论了语言和用词错误的问题。但他讲的是委婉语,只是对不好听的事实的美化伪装。实际上,委婉语一转换成街头语言就好懂了,只需要解开谜语,就能得到一个难听的真相。但我讲的是谎言,不再需要委

婉语了,委婉语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十足的假话,因此没有办法真正解开谜语,只能假设欺诈的初衷。

穆西尔:我来提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人们了解到原子弹的威胁,确实明白这个世界可能会爆炸,同时又不造成太大的心理反感?假如我来请教你,说:“请问,我想让人们警觉核武器的存在,如果可以拍部电影、写几首诗或做几场演讲,怎样做最好?”

冯内古特:在我看来,你和你的同类像是在旷野里呐喊,而周围能听见的却只有一块石头或一棵树。这是我之前说的,热爱生命的人少之又少,比如你爱打麻将,如果人人都打,就会再一次掀起20世纪20年代的麻将热。但是,现在没人愿意看一眼麻将牌,没人理会了,大家满不在乎。他们不喜欢那种娱乐方式,而你这项娱乐是求生。只不过是另一种游戏,而大多数人无心去玩。

穆西尔:那你由此得出什么结论?由于你经历过二战,见到我们从重磅炸弹发展到爆炸力只有一万两千吨的所谓微型原子弹,再到百万吨级的原子弹,而现在全世界的原子弹大概共有五万枚。你是否暗自觉得“我们可能撑不过去了”?

冯内古特:但是,我们撑过来了,我是说,我们在这儿呢。我们还活着不是吗?我们幸存于世,而能幸存多久,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整个世界似乎正在采用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活法,过一天是一天,我认为卡特总统也不例外。每天晚上睡觉前他就咯咯笑:“拜上帝所赐,我们又活了一天!人人都说我是糟糕的总统,看,我们又多活了一天。还算不错。”我们现在是一天一天又一天地苟活,世界却仿佛没有克制。戒酒的人每天的任务就是不喝酒,仅仅是坚持一天之内不喝酒。但对于好战行为却不存在这种实在的克制。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活着,愿意清醒,每一天不仅要庆祝自己活下来,还要庆祝自己没有做出战争的姿势。但是这种克制不存在,每一天都有更多的武器被制造出来,更多战争论被愉快地灌输,更多危险的弥天大谎被讲述,所以说是没有克制的。如果我们能像戒酒者那样,不好战地多过一天,就已经很美好了。但不是这样,我们绝对好战,迟早会出现问题。我正在写的书是关于一个孩子的,他已经长大了,四十多岁,他父亲曾是个枪迷,家里有几十把枪。这孩子十一岁的时候无意中拿他父亲的枪来把玩,他把弹夹装进30—06步枪,也就从那么扇阁楼窗户开了一枪,结果杀死了十八个街区外的一位家庭主妇,子弹穿进她双目当中。他在这个阴影中度过了人生,并且身败名裂。当然这个武器本来不应该存在。他出生来到这个星球,星球上有这个极度不稳定的装置,而他必然要在周围试探它、打量它。我的意思是,这个武器想要被开火,它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开火。它除了开火没有其他目的,而这样不稳定的装置存在于任何一个人类可以碰到的地方都是不可忍受的。

[1] 诺伯特·维纳 (Norbert Weiner, 1894—1964), 美国数学家、哲学家。

[2] 彼得·塞勒斯 (Peter Sellers, 1925—1980), 英国喜剧演员,曾出演《奇爱博士》。

[3] 基南·温 (Keenan Wynn, 1916—1986),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常演典型配角,以丰富的面部表情著称。

[4] 斯坦利库布里克 (Stanley Kubrick, 1928—1999), 美国著名电影导演、编剧、制片人,《奇爱博士》的导演。

[5]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 (Henry Lewis Stimson, 1867—1950),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任期间的战争部长,二战期间主张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



本文摘自《冯内古特: 最后的访谈》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李爽 译

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7月

库尔特·冯内古特

20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猫的摇篮》《五号屠场》《冠军早餐》《时震》《囚鸟》等。他的作品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冯内古特的文学创作,不少灵感正是来自于在二战战俘营的经历。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从50年代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60年代起开始出版长篇。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History in HD](#) on Unsplash

非虚构

2004 年 11 月 11 日， 我满八十二岁

库尔特·冯内古特 | 发现经典

我知道，还梦想着为子孙们
留下一个容身之地的人已经不多了。

2004 年 11 月 11 日，我满 82 岁。这么老是什么样子呢？我不能再平行停车招来谩骂了，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请别观看。重心也不如以前，更不好把握了。

当你到了我这把年纪，如果你到这把年纪，而且生儿育女，你就会发现自己也会问那些时值中年的孩子们：“生命都是为了什么？”我有七个孩子，其中三个是父母过世的侄子。我把我的大疑问扔给我儿子，儿科医师冯内古特博士。他告诉他蹒跚的老父说：“爸爸，我们到这世上就是为了互相帮助度过生命，不管是什么样的生命。”

*

不管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媒体、我们的宗教和慈善组织可能变得多腐败、贪婪和残酷，音乐依然会很动听。

如果我死了一一上帝保佑，让这个做我的墓志铭吧：

他证明上帝存在
所需的惟一证据
就是音乐！

在我们愚蠢的灾难性的越南战争中，音乐变得越来越动听悦耳。顺便提一下，我们输了这场战争。印度支那的秩序只有将我们踢出来之后才能恢复。

那场战争只是把百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现在的战争则把亿万富翁变成千亿万富翁。现在我把它叫做进步。

为什么我们侵略的国家的人民不能像诸位淑女绅士们一样打仗呢？穿制服、开坦克和驾驶武装直升机呢？

回到音乐的话题上。音乐让每个人都变得比没有音乐的时候更加喜欢生命。虽然我是和平主义者，军乐也能让我十分振奋。我特别喜欢施特劳斯和莫扎特，以及其他同类的音乐家。但是美国的非洲人在他们还当奴隶时就给世界带来了无价的礼物，这件礼物弥足珍贵，以致它的存在几乎成为许多外国人至少还有一点喜欢我们的惟一理由。曾经治愈全世界一度流行的大萧条的，就是这个特别的礼物：布鲁斯音乐。现在所有的流行音乐——爵士、摇摆乐、Be-Bop 爵士乐、猫王、甲壳虫、滚石音乐、摇滚音乐、说唱音乐，等等，都起源于布鲁斯音乐。

这是给世人的礼物？我听过最好的节奏和布鲁斯混合乐，有一曲就是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市的酒吧里，由来自芬兰的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女孩演奏的。

阿尔伯特·穆瑞是个很厉害的作家，是爵士乐历史学家，除了这些，他还是我的朋友。他告诉我在这个国家的奴隶制时期——我们无法完全从中恢复的暴行——奴隶主的平均自杀人数占总数的比率比奴隶的高多了。

穆瑞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奴隶懂得怎么克服绝望心理，这是他们的主人们所没有的。他们可以唱着弹着布鲁斯音乐把自杀老头给赶走。他还说了点什么，我听起来也挺对胃口的。他说虽然布鲁斯不能把绝望赶出屋子，但是只要在哪个屋子弹奏它，就能把绝望赶到旮旯里。所以请记着这一点。

外国佬因为爵士乐而喜欢我们。而且他们也不完全憎恶我们所声称的自由和正义。现在，他们憎恶我们的傲慢。

*

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詹姆斯·怀特库本·莱利第 43 学校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常常画未来的房子、未来的船、未来的飞机，画上充满了对未来的所有梦想。当然那时候什么都停止了。工厂关闭了，大萧条横行，最神奇的词汇就是繁荣。到某个时候一定会繁荣起来的。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梦想人类应该居住的各种房子——理想居所、理想的交通工具。

极其新鲜的是，我那刚满 21 周岁的女儿丽丽，像您的子女，像小布什小的时候，以及萨达姆·侯赛因等人一样，发现自己继承的是令人震惊的人类奴隶制的当代历史；是艾滋病泛滥；是核潜艇潜伏在冰岛及其他峡湾的海底深处，时刻准备着一声令下，用火箭和氢弹头大规模地将无数的男人、妇女、儿童化为放射性齑粉。我们的子女们继承了技术，但是科技的副作用是，不管在和平还是战争年代，这个为各种生命提供了可呼吸空气、可饮用水源的生态系统的星球正在迅速被摧毁。

学过理科或和科学家交谈过的人会发现我们现在已身处危险境地。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人类已摧毁了生态链。

现在面对的最重要事实是——可能会让我剩下的日子毫无生趣——我觉得人们并不关注这个星球是否会延续下去。我看每个人都像是嗜酒者互戒协会的成员一样得过且过地活着。能再苟活些日子就够了。我知道，还梦想着为子孙们留下一个容身之地的人已经不多了。

*

很多年前，我很天真地以为我们美国可能变得讲人道、讲理性，像我们这一代很多人常常梦想的那样。我们在大萧条时期，没工作的时候，梦想着这样一个美国。然后在失去和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为这个梦想而战斗、牺牲。

但是现在我明白，美国这鬼地方压根儿就不可能变得人道、讲理。因为权力腐化了我们，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化了我们。人类是一群对权力疯狂着迷的猩猩。这么说，我们的首脑们就是嗜权如命的猩猩。我这么破坏士兵在中东拼杀、献身的士气，是不是很危险？但是他们的士气早如没有生气的身体一样，被炸得四分五裂了。他们像富家子弟的圣诞节玩具一样被对待，我可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

最聪明，也最体面的祈祷，是一个著名的美国人亚伯拉罕·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讲给在场的人听的。那时，一场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刚刚过去。战场还很小，骑马站在小山顶上，就能把一切尽收眼底。因果都很简单。原因是弹药，它是硝酸钾、木炭、硫磺的混合物。结果就是漫天飞舞的金属。或是一把刺刀。或是来复枪的枪托。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烈士陵园落成典礼上致哀时说了这番话：

我们没有能力为这块土地做奉献，
我们没有能力使这块土地更神圣。
在这里战斗过，仍然健在或已经牺牲的勇士们，
已经使这块土地变得如此神圣，
我们微薄的力量已不足以增加或减少它的圣洁了。

这就是诗！它可以把战争年代的恐怖和忧伤变得近乎美丽。美国人一旦想起战争，可能还会产生关于荣誉和庄严的种种幻觉。其实这是人类性器官的幻觉，你知道就是那个玩意儿。

我可以稍带说明一下吗？我在这里说的，已经比林肯的整个葛底斯堡讲演多上一百字了，可能还不止。我也吹起来了。

*

通过旧式机械或大学里研制的新型武器，大规模屠杀无数手无寸铁的平民家庭，以期获得军事或外交优势，毕竟不是什么新鲜主意了。

这有用吗？

这个主意的狂热支持者、爱好者——如果可以这么称呼他们的话，都想当然地以为，那些制造麻烦或者还糟的政治首脑们，有能力怜恤自己的人民。但是如果他们看到，或至少听到，那些变成肉泥的女人、儿童和老人，和他们有着相同的长相，说着相同的话语，甚至就是他们的亲戚，他们就会控制不住地哭泣起来。照我说，这就是道理应验了。

即使相信这一点，那些人可能同样会千辛万苦，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装扮成圣诞老人和牙仙子的模样。

*

马克·吐温在亚伯拉罕·林肯在哪里呢？现在正是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来自美国中部的乡下男子，这两个人让美国人民学会了自嘲，懂得欣赏那些非常重要、真正有道德寓意的笑话。想想他们今天如果还在世，会说些什么呢。

马克·吐温写的一部最考验我们的羞耻心、最使人心碎的作品，是美西战争后在我军解

放菲律宾人民的过程中，屠杀六百个摩洛男女和儿童的故事。我们英勇的指挥官叫里欧纳德·伍德，现在还有个堡垒以他的名字命名。密苏里州的里欧纳德·伍德堡垒。亚伯拉罕林肯会对美帝国主义战争说些什么呢？这些战争寻找这个或那个堂皇的借口，目的在于为拥有最佳政权体系的美国增加自然资源和驯服劳力的供给。几乎每次提到亚伯拉罕·林肯都是个错误。他总是抢戏。可我马上又要提到他了。回到 1848 年，那是他发表《葛底斯堡演讲》之前十几年，那时林肯还只是个众议院议员，他就为我们与墨西哥的战争感到羞耻和极度伤心。墨西哥没侵犯过我们。林肯在做他的讲话时，脑子里知道詹姆斯·波尔克就是那种人的代表。林肯这么描述总统、武装军队总司令詹姆斯·波尔克：

他相信自己可以避开相关监察，通过让民众关注炫目的军事辉煌——腥风血雨中的美丽彩虹，毒蛇的眼睛，破坏的魅力等等——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战争。

多精辟的话！我本来还以为我是作家！

你知道在墨西哥战争中我们实际上夺取了墨西哥城吗？为什么那天不是我们的国庆日呢？为什么矗立在拉什莫尔山上的不是当时的总统詹姆斯·波尔克的脸以及纳德·里根的脸呢？回到 19 世纪 40 年代，早在我们内战之前，墨西哥在我们眼里之所以罪大恶极，是因为在他们那里，奴隶制是非法的。记得阿拉莫战役吗？通过那场战役，我们把加利福尼亚，以及许多别的人民、财物攫为己有。我们这么做，好像屠杀那些只为护卫自己家园的墨西哥人不算谋杀。除了加利福尼亚还有其他什么呢？对，得克萨斯州、犹他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一部分，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

说到“全身心地投入战争”，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小布什对阿拉伯人这么恼火吗？因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代数。还有我们使用的数字，包括代表无的符号，这是欧洲人以前所没有的。你以为阿拉伯人很无知吗？试试用罗马数字做做连续除法就知道了。



本文摘自《没有国家的人》

[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刘洪涛 / 黄翠玲 / 张淑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9 月



库尔特·冯内古特

20 世纪美国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作家。代表作有《猫的摇篮》《五号屠场》《冠军早餐》《时震》《囚鸟》等。他的作品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冯内古特的文学创作，不少灵感正是来自于在二战战俘营的经历。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从 50 年代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60 年代起开始出版长篇。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图片来自 Gérard Rondeau / Agence VU

档案

如何理解棱镜一般的苏珊·桑塔格？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这位女性是如此多面：作为情感个体、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作为观察者，甚至更多。

2012年，美国作家本杰明·莫泽（Benjamin Moser）收到一封邮件，说一个小型委员会读过他为巴西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写的传记《为何此世》（*Why This World*），认为他是写苏珊·桑塔格传记的合适人选。“我并不兴奋，老实说，我只感到害怕。”[莫泽回忆](#)。写过传记的他深知，要和传主的亲人、朋友、敌人等打交道多么困难，而且自己对桑塔格的强烈感情也让他害怕。最后，他决定不在乎这些，接受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签署授权协议后，莫泽成为最早获许查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苏珊·桑塔格档案”的那批人，并前往伦敦、夏威夷、萨拉热窝、斯德哥尔摩等地采访，其中包括此前从未谈论桑塔格，但又至关重要的人物，比如她的情人、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在历时7年，采访近600人后，莫泽2019年出版了厚达800多页的《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Sontag: Her Life and Work*），并于次年获得普利策奖。

桑塔格（1933—2004）复杂深刻、魅力四射，有着“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美国公众的良心”、“大西洋两岸第一批评家”等众多标签。关于她的传记和回忆非常多，但莫泽这本被不少人看作是比较权威公允、资料丰富，但又有自身特色的一本。虽然厚重，但有一条清晰脉络贯穿全书，即对真实和隐喻的探讨——什么是真实，什么是隐喻，两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存在什么差别，如何才能看到真实……这不仅是桑塔格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桑塔格的人生写照。真实和隐喻之间的张力，也是人们对桑塔格褒贬不一的根源。



《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

莫泽对桑塔格的分析，很有弗洛伊德色彩。他从她的家庭写起，苏珊5岁时，从事毛皮生意的父亲杰克·罗森布拉特在中国天津去世，但母亲米尔德丽德没有给她足够关爱。苏珊生活在永远的恐惧之中，生怕她会突然并且随意撤出。从母亲身上，苏珊学到通过周期性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来点燃浓情蜜意，说这是她最深刻的体验”。莫泽称，“它创造了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动力，这一动力在苏珊的一生中反复出现。在她长大成人的家里，爱并不是无条件给予的。相反，它被暂时延期，后来却又被随意取消：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游戏，这个女孩熟练地掌握了游戏规则，在其中游刃有余”。苏珊12岁时，母亲突然再婚，嫁给了前空军纳特·桑塔格，但她很开心，觉得可以摆脱当她妈妈的妈妈的责任。但是，“父亲亡故，母亲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苏珊因此也把一个个恋人变成了父母”。

在这种成长环境下，阅读成为桑塔格的精神避难所，帮她重塑和美化现实，也让她比同龄人早熟聪明。17岁时，她和相识一个多星期的28岁年轻教师菲利普·里夫结婚。意外怀孕后，苏珊惊慌失措，打电话给母亲，但母亲马上歇斯底里发作起来，没有给女儿任何帮助和安慰，而是逃避现实，把电话递给了苏珊15岁的妹妹朱迪丝。朱迪丝称，这一次彻底改变了她姐姐和母亲的关系。因为当时堕胎没在美国合法化，苏珊最后艰难找到一家小诊所做人流，医生没有用麻醉，而是把收音机音量调大。

在《桑塔格传》中，莫泽揭开了《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灵》一书的作者之谜。该书1959年出版，作者署名为菲利普·里夫，但其实是桑塔格执笔。当时，桑塔格为了摆脱里夫，成功离婚，所以放弃了这本书的署名权，但后来非常后悔，耿耿于怀。更为重要的是，莫泽通过对这本书的解读，再次把桑塔格的人生与作品串联起来，比如认为她定义的“现代艺术的意义”源自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将梦置于许多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心。现实与梦境、客体与隐喻之间的矛盾，自柏拉图以来便一直是哲学话语的宠儿。如果它在智力上吸引了桑塔格，那么，她对它的兴趣首先是情感上的；她最个人化的作品恰恰是那些她在其中最坚决回避“我”的作品。当无意识在梦中和言语中显露出来时，自我也无意识地渗透进她的字里行间。

除了家庭关系，莫泽着力挖掘的另一能量根源是桑塔格的同性恋身份。这是桑塔格生前不愿公开承认，但许多人心照不宣的一点。当然，因为桑塔格有过男性情人，如约瑟夫·布罗茨基、罗伯特·肯尼迪，不少人还误以为她是双性恋。可能由于[莫泽也是同性恋](#)，所以更能理解桑塔格那代同性恋者的痛苦、挣扎与矛盾，以及与人的紧张关系、和作品创造的关联，这部分内容写得相当敏锐精彩。

在1959年的日记中，26岁的桑塔格写道：“我想写作的欲望与我的同性恋有关。我需要这个身份来作为武器，以对抗社会反对我的武器。它并不证明我的同性恋是正当合理的。但是它会给我——我觉得——一张许可证……身为同性恋者让我觉得更加脆弱。这就增加了我想隐瞒、想隐身的愿望。”

莫泽称，“像她一样，很多同性恋者都结婚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任何与其他同性恋者交往的尝试都会招致可怕的风险。被人发现可能意味着，就像苏珊差点遭遇的一样，失去自己的孩子，以及，在任何需要许可证的行业，包括医疗行业、法律行业，或精神病医疗行业，暴露同性恋者身份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业许可证可能因其‘道德败坏’而被吊销。警察袭击同性恋者。……这就是桑塔格在其中长大成人的世界。尽管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她晚年的行为表明，她从来就未能摆脱那些她年轻时盛行于世的观点”。

在《关于“坎普”的札记》中，她将“坎普”定义为“把世界视为一种审美现象”。莫泽认为，该文背后隐藏的主题其实是关于同性恋的札记。这在她未公开的文档中能看到对应草稿。“她宣称，真正‘有趣味的贵族’都是同性恋者。他们的‘唯美主义和反讽’加上‘犹太人的道德严肃性’一起构成了现代感受力的先锋派思想。这不只是对平等的隐晦陈述，更是对同性恋优越性的赤裸裸声明。”

如果说家庭关系和同性恋身份深入的是趋向真实一端的桑塔格，那作为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她，则是趋向隐喻一端的“桑塔格”。桑塔格成名于1960年代，她的第一部小说《恩主》就受到汉娜·阿伦特、雅克·德里达、约瑟夫·康奈尔等人的赞赏。当然，她最为人熟知的是那些发表在知识分子刊物《党派评论》《纽约书评》等的随笔，包括《论风格》《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等等。



《恩主》

桑塔格那时归属的是纽约犹太裔知识分子圈。莫泽认为，这群人的核心追求是“高雅”——区分高雅和低俗的不是阶级、教育、宗教和种族，而是对某种永恒的精神和政治价值的信仰。高雅的人反映这种信仰，而低俗的人排斥这种信仰。在文化上，这个家庭的根基是传统的，以哈钦斯的芝加哥大学为范例：名著的古色古香使得与现代主义共存变得困难，甚至对桑塔格也是如此。在政治上，这个家庭则是激进的。一些人误以为桑塔格是在商业艺术和高雅艺术之间消除等级。事实上，她希望的是扩充，建立新的等级，曾提出在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联盟。“桑

塔格认为，在强势的庸俗风气的重压下，高雅文化经常面临崩塌的危险，而复杂性则为高雅文化提供了一道防御。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文化常常显得严肃、缺乏幽默感而又认真；这也是为什么其作品非但没有流行开来，而是正好相反。”莫泽在书中写道。

1960 年代的美国是文化变革的激进年代，桑塔格自然也投身其中。她因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被捕，称“作家应该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的先驱——为那些害怕的人、那些觉得羞愧的人、那些说‘不’的人、那些说‘我们正在流血’的人、那些大声叫‘停下’的人”。但是，这一时期她对政治的观察和行动主要是从审美角度进行，也可以说是作为隐喻的美国或者浪漫激进的左翼。

转变发生在 1970 年代，她和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流亡者接触后，尤其是和布罗茨基的交往，桑塔格断断续续地舍弃了她早期的热情，不再激进。她也在布罗茨基的文化观念中找到自己的观念。布罗茨基认为，“人类最大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类心灵之粗俗，人类想象力之粗俗”。而阅读经典令人敏感化、人性化，成为“阅读人”是反对粗俗和暴政的有力武器。

相比上一代的纽约知识分子，桑塔格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一种更宽泛、更现代感受力的代表。她发掘出无数后来被视作大师的艺术家，自己也成为高雅文化新一代的典范和裁决者。埃德蒙·怀特说：“埃利亚斯·卡内蒂获得诺贝尔奖时，苏珊的文章是唯一一篇用英文写的关于他的文章，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提到 W.G. 塞巴尔德、丹尼洛·基什还有罗贝托·波拉尼奥的人——他们现在全部被视为文学大家。”

正因对高雅文化或者说普世性的追求，桑塔格和榜样阿伦特类似，觉得自己虽是女人，但首先是个作家，并不会特别强调女性身份。而且，鉴于当时纽约的男权文化氛围，桑塔格还有对声望和读者的实际考虑。莫泽觉得，如果被外界知道她是个女性主义者，更别说还是个女同性恋者，这将会把她推向边缘。不真实是桑塔格为保持她的文化中心地位所付出的代价。

后期的桑塔格三次患病——1975 年、1988 年、2004 年分别诊断出乳腺癌、子宫癌、白血病，身体受到很大影响，作品产量大不如前，但也凝结出了《火山情人》《关于他人的痛苦》等佳作。不过，这一时期更为许多人津津乐道的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作为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的言论和行动。她主张以文化为中心的信念，文化是抵御野蛮的堡垒，艺术与保证个人尊严的政治价值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火山情人：一部罗曼司》

比如鲁西迪因《撒旦诗篇》面临追杀令。当时，一些知名作家，如阿瑟·米勒、库尔特·冯内古特，都避而远之。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鲁西迪称，“在苏珊的督促下，几乎所有人都找回更好的自己”。美国笔会主席苏珊·桑塔格组织了一些重要作家（包括唐·德里罗、琼·狄迪恩、爱德华·萨义德等）朗读《撒旦诗篇》的选段。“我很高兴是苏珊当上了主席，而不是一个比她怯懦怕事之人。”鲁西迪说。

桑塔格晚年的高光时刻是在萨拉热窝。波黑战争爆发后，萨拉热窝被封锁 1425 天，这是现代历史上最长的一场围城战。期间，桑塔格总共 11 次造访，并发挥重要作用。戏剧导演哈里斯·帕索维奇说：“她是国际上第一位公开表示 1993 年波黑发生的是种族灭绝……她认为这不仅仅对波黑很重要，对整个世界也很重要。”但是，大量知识分子对此漠不关心，比如冯内古特、君特·格拉斯、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

“萨拉热窝之战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内战，然而，人们的反应大相径庭。1937 年，尽管极其危险，但欧内斯特·海明威、安德烈·马尔罗、乔治·奥威尔和西蒙娜·韦伊等一个个奔赴西班牙。韦伊被严重烧伤，奥威尔则遭到抢劫，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这些危险视为自己不去的理由。他们团结起来，行动一致，而且，从他们的行动中产生了一些他们那个时代最精美的文学作品。”桑塔格当时对记者说。1993 年，桑塔格决定制造一起文化事件，到萨拉热窝执导戏剧《等待戈多》。参与者伊祖丁·巴吉罗维奇认为选择这部戏的原因显而易见：“我们当时真的是在等着有人来把我们从不幸中解救出来。我们认为那会是一种人道的行为。……然而，没有人来救我们。我们徒劳地等待着。……我们真的就活在《等待戈多》的戏里。”这出戏演出时没有电，也没有正式服装，演出布景用的是联合国分发的塑料布，它们本来是用来挡住被狙击手射穿的窗子。虽然简陋，但这部戏受到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萨拉热窝人对此感到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终于被看见，是对文化赋予尊严的一种认可。

《等待戈多》之后，桑塔格 7 次往返于萨拉热窝，拒绝穿防弹衣的举动让波黑人至今记忆深刻。1995 年，《代顿协议》签署，围城终于宣告结束。2004 年桑塔格去世后，波黑国家剧院前的广场被命名为苏珊·桑塔格广场。

在《桑塔格传》的结语“身体及其隐喻”中，莫泽总结道：“关于苏珊·桑塔格，重要的是她象征着什么。……她展示了如何以过去古人的成就为根基，同时又完全融入自己所处的时代。她对艺术、对美彰显出无穷无尽的钦佩——面对思想上和精神上

的庸俗则表现出无穷无尽的蔑视。她以不畏惧男性思想家且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如此的形象给一代一代女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代表了自我完善——让自己成为比所期望的更伟大的人。她象征着涉猎广泛但又不过分专业化或太业余窠臼的那类作家。她代表了一种希望，希望美国是一个宽容、多元化的国家，毫无沙文主义地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联系。她代表了艺术家的社会角色，展示了艺术家如何反抗政治暴政。在这个被冷漠和残酷包围的世界里，她却对文化的永恒抱有希望。”

“她既总结了她的时代，又对抗了她的时代。……桑塔格揭示出隐喻如何构成自我，然后又扭曲自我：语言如何能够安慰人，它又如何能够摧毁人；描述如何能够既令人惬意同时又令人生厌；为何既是一个伟大的阐释者也应该反对阐释。她还告诫人们不要神秘化照片和肖像——包括传记作家笔下的那些人物肖像。”

莫泽称，“桑塔格去世后，每当出现需要阐释的新现象，人们往往想知道她如何看待这些现象，于是就会表达对她的怀念”。事实上，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桑塔格看到美国特朗普的上台、堕胎权合法化被推翻、俄乌战争爆发、新冠疫情施虐、鲁西迪被刺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泛滥等层出不穷的现象和事件，可能会写些什么，做些什么。

正如莫泽在采访中说，他希望通过这部传记，人们开始阅读桑塔格的书，进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这个时代和世界。“她的作品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是因为，与同时代的任何一位美国作家相比，她更能给你提供一把开启文化之门的钥匙。更重要的是，她帮助你理解现代大思想家们如何思考我们这个世界，以及如何活在这个世上。她给你讲解他们的观点，她给你讲解她对他们观点的观点，然后，她激励你形成自己的观点。”

2022 年 10 月，《桑塔格传》出了中文版后，我们和该书译者姚君伟做了一次笔谈，以提供不同于莫泽的另一个角度和视野看待桑塔格的人生和作品。60 岁的姚君伟现在是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大 S (赛珍珠)，翻译小 S (桑塔格)”，目前译有桑塔格著作和传记十种（如《恩主》《火山情人》）。尤为难得的是，2004 年，他还在纽约见过桑塔格。2009 年，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也来南京看过他。这使他对桑塔格的观察多了一丝感性体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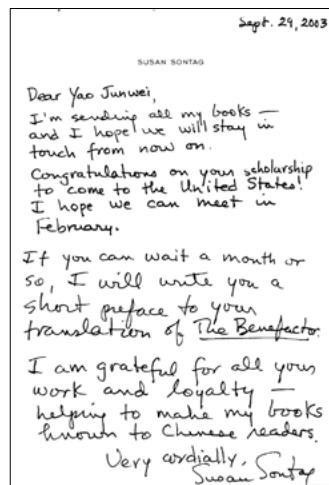
他说：“桑塔格是个‘多棱镜体’，太过复杂。我觉得，她留下的有价值的遗产，并不是某件物品，而是她的思想、她对待学术的严谨态度，她无处不在的好奇心，她战胜病魔的勇敢。”

以下是《小鸟文学》和姚君伟的访谈节录。

小鸟文学：关于桑塔格的传记和回忆很多，除了这本《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像今年中国还出了法国人贝阿特丽丝·穆斯利的《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桑塔格的助手、儿子的前女友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回忆苏珊·桑塔格》，之前还有她生前就出版的《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以及德国人丹尼尔·施赖伯的《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儿子戴维·里夫的《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你翻译了四本，另外的不知道你是否看过？很多读者可能都想问，能不能从比较的视野出发，谈谈这些传记和回忆有什么特色和不足？不然无从选择。因为在《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的译后记中，你已经比较详细说明这本书的四个特色，只简单提了其他作品的问题，所以希望回答主要从比较的角度补充这本书的不足，以及多谈谈其他作品的特点及不足，帮助读者分辨。

姚君伟：这些年因为翻译桑塔格，免不了会有一些想法，也会做一些桑塔格研究。我会关注桑塔格的作品，也会关注研究桑塔格的作品，所以，她的作品和关于她的作品我几乎都有，也几乎都读过。而且，她的传记我自己就翻译了四种，即最早的卡尔·罗利森夫妇的《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但只写到 1999 年，桑塔格去世后，他们把桑塔格生命最后的 5 年补充进去，并对全书进行了修订，重新出版，我以《桑塔格全传》为名译出）、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回忆苏珊·桑塔格》、戴维·里夫的《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以及最近莫泽的《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

罗利森夫妇在未经传主同意（甚至还遭到了反对）的情况下写成并出版了《铸就偶像》，卡尔告诉我，他们几乎是克服重重困难进行采访。他们态度冷静，立场中立，不捧不杀，比较客观。但也因为这种距离感，少了一些激情和深度。修订后的《桑塔格全传》有一定的改进，尤其是文字表达做了打磨，比较这两个版本，我本人更喜欢《全传》。



桑塔格手迹。照片来自：姚君伟

桑塔格儿子戴维的《死海搏击》是我译得最痛苦的一本，虽然这篇幅不长，也算不上是真正的传记，只讲述了他和母亲 2004 年 3 月 28 日到 12 月 28 日短短 9 个月的经历。桑塔格一生三次罹患癌症，前两次她都战胜了病魔，活了下来。这一次，她没有成功。戴维感谢我把他这本书译成中文，但同时又表示他真心不希望我接下这个艰难的任务，他甚至不希望我去读这本书，因为不想我重新过一遍他经历过的、令人痛楚的日子。的确如此，翻译期间，我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最轻松的应该是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回忆苏珊·桑塔格》。作为桑塔格儿子的前女友，努涅斯的回忆分寸把握得很好，既无局外人难免存在的隔阂，又有局内人可能难有的距离。她的文笔轻松、干净，又不失幽默，观点明确，语言优美，书写的文本夹叙夹议，颇有桑塔格叙事的风格。这也是我很看好，也很喜欢的一种风格，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接下来会愿意继续翻译她的作品，事实证明我没看走眼，我随后翻译的她的小说《我的朋友阿波罗》获 2018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莫泽的《桑塔格传》和这几本比，除了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获得授权的桑塔格传之外，篇幅最长、受访者最多也是该传的特色。书上把桑塔格的生平（生活）与其作品联系起来描述和分析，让我们对桑塔格其人其作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

我曾经说过：像桑塔格这样一位有着广泛国际影响的作家，“一人多传”并不令人惊讶。当然，作者不同，写作的手法、切入点、叙述的重点都会不同。桑塔格本身就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喜欢她的人因为其个性而爱她，读了这本传记可能会更喜欢她，不喜欢她的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憎恨她，读了这本传记可能会更讨厌她。所以，读者可能会有偏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近已经有读者和书评人撰文在评论其中某一本或比较其中的几本了。我就不下定论了，也无法下定论。

小鸟文学：因为之前你对桑塔格已经有很多了解，所以很想问问你在读《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觉得有意思的细节与故事值得分享？比如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你谈了这本书解开了一直缠绕在你心头的两个谜，一是桑塔格与她母亲的关系，二是《弗洛伊德：道德家之心灵》一书的署名之谜。我觉得说得特别好，类似的能不能多讲讲？

姚君伟：其实厚达 800 多页的《桑塔格传》中，让我吃惊的地方不止你提到的这两处。她一辈子有多个异性、同性情人，虽然一个个都分手了，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并没有完全停止。这一个个前男友前女友在桑塔格遇到困难（比如最后一次病倒）时，还能放下手头的一切，或出钱或出力过来照顾她，我想他们一定是因为桑塔格本人的魅力、她的才华而爱她，情不再，爱还在。爱情不再，关怀还在。不过，与其说让我吃惊，不如说是让我感动。

当然，还有就是桑塔格与儿子的关系。虽然戴维以前曾对我说，他与母亲的关系常常很紧张，时常还难以交流，但我认为桑塔格与丈夫离婚后，打官司获得儿子的抚养权，带着儿子独闯纽约打天下，母子俩应该是相依为命，怎么可能关系不睦呢？莫泽在书中多处举例提到了母子俩冷战或在戴维数次最需要人帮助和安慰的时候，桑塔格玩失踪，去了欧洲。这一个个例子并不是来自戴维本人，而是来自他们共同的朋友的讲述。他们是这些例子的目睹者。这真的让我很惊讶。

还有让我心生钦佩的地方，即桑塔格在萨拉热窝围城期间，数次前往，做她能做的事情来帮助他们。一次次冒着枪林弹雨的体验是她一辈子值得自豪的事情。

小鸟文学：从接手《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的翻译，到现在中文版推出，整个过程中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或有价值的故事可以和读者分享？当然，翻译的难点也可以说说。比如我看资料提到，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虽然授权这部传记，但他看后并不觉得好；在《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的作者要求下，这本书删除了有关他们的一些内容。

姚君伟：桑塔格去世后，我曾联系戴维，希望他自己能为他母亲写传，因为戴维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但他说他不会自己写，但会物色一个合适的人，授权他来写。后来他找到了莫泽，还很开心地写信告诉我，说他很看好这个作家。

等《桑塔格传》出版、我准备翻译时，写信问戴维对他这本传记的看法，他却回复我：“我不想评论这本传记。”我当时觉得好奇怪，等我拿到书，看了后才知道原因：书中曝光了太多桑塔格和戴维的隐私，而戴维因为事先谈好，不作任何干涉，所以，颇有些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我后来又一次跟他提这本书，告诉他我已经译完初稿，正在核校和润色，他回信说：“你知道我不喜欢这本书，你还要跟我提。”哈哈，我禁不住笑了起来，想起当初我要译他的前女友努涅斯的《回忆苏珊·桑塔格》时，他可是直接表示反对的。这次他没表示反对，只是不想提这话题。

有意思的是，这也是一本尚未出版就差点惹上官司的书。2019 年 6 月 26 日，我收到卡尔·罗利森的邮件，邮件的主题是“难以置信”。信中说他看到了即将出版的莫泽的《桑塔格传》，里面有些关于他的内容不真实，如果不删改，他将起诉出版商和作者。当然，书正式出版时，这部分有争议的内容已经删除。

小鸟文学：你从 2003 就开始翻译桑塔格的作品，到现在差不多 20 年了，一共翻译了十本。能不能讲讲这 20 年间，你对桑塔格的人生与作品的感受和认识有什么变化？经历过几个阶段吗？

姚君伟：一开始我只是想在教学、科研之余做一些翻译，只要作品有意思就行，并没有太在意作者是谁。但一切都是缘分，说我选择了桑塔格也好，说桑塔格选择了我也罢，反正就这样，20 年坚持下来了，中途有很多困难，但几乎从未想过放弃。说几乎是因为，人在高校，有体制要求下更急迫、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翻译又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译好了是作者的功劳，译不好则必须译者负责。

刚开始译桑塔格时，遇到问题还可以联系她本人，她去世后，就只能和她儿子或其他桑塔格研究者和译者讨论了。因为在译完《恩主》后我去纽约见了桑塔格，她要我继续翻译她的作品，我答应了。所以，作为一个承诺，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着，

即使艰难，即使一段时间译著不算科研成果。

一开始译桑塔格的作品，为她的长句、难句，短句、省略句，大胆的、非常人习惯的词语搭配，为她的语气犀利而困顿，常常纠结不知如何处理。但桑塔格几次写信给我，让我“不要阐释，就按字面意思处理”。这样问题反而解决了，这些句子留给读者自己去理解、去品味吧。现在再译桑塔格，已是一种日常，感觉自己通过翻译，还在继续与桑塔格交往、交流，还在继续我们的对谈、争论……这感觉真好。

小鸟文学：2004 年，你在纽约见过桑塔格。2009 年，戴维·里夫也来南京看过你。能不能具体讲讲这两段故事，以及你的感受？与此相关，她们的母子关系一直是个焦点问题，莫泽的传记也有许多讨论，很好奇你是怎么看的？

姚君伟：2003 年我翻译了《恩主》，译稿交给出版社后，我就去宾大做我的赛珍珠研究课题。因为翻译期间与桑塔格有联系，她得知我去费城后，就邀请我去她家做客。那天我们聊得很开心，从她的书到我在费城的生活等等，她还热情地邀请我太太和孩子去她家做客。她对我把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恩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认识她表示感谢，希望我能继续翻译她的作品，她曾经把自己的作品签名后寄到南京给我，但我这次去美国没有带这些书，她又让助手重拿了一套，让我带回费城。



桑塔格与姚君伟合影。照片来自：姚君伟

甚至当她得知我没有带电脑到美国，每天要去学校图书馆才能写邮件时，马上让助手把她自己的一台笔记本电脑装上拼音输入法，让我带回宾大使用。那天我们聊了很多，我提出要和她合影时，她马上进房间拿了一条丝巾系上，主动地挽着我的胳膊，让她的最后一任助手、哈佛毕业生安妮·江普帮我们拍照。这让我看到了桑塔格在严肃对待文学和学术以外完全不同的另一面，邻家大姐般好客、热情、慷慨。

小鸟文学：除了翻译，你也做桑塔格的研究，聚焦在她的短篇小说，为什么？能不能讲讲你的研究心得与感受？可以举些例子说说。因为通常更多人还是看重她的文论与批评，但她自己更看重小说。

姚君伟：是的，除了翻译，我也做了些桑塔格研究。实际上，翻译和研究在我这里也不是那么容易分开的，我一向主张“寓研于译”。我在翻译的同时，也比较关注国内外桑塔格研究历史和现状，也指导了多篇以桑塔格研究为选题的博士论文。

桑塔格一生兴趣广泛，身份多样，是小说家，也是评论家。但就她本人而言，在她所有作品中，她最喜欢的是她的第三部小说《火山情人》。我们若了解她，那对此一点都不会感到惊讶。虽然她因为写评论而非写小说更闻名，甚至也有她的崇拜者认为桑塔格误解了她自己才华的本质，但她首先想做的就是小说家，其次才是评论家。

记得美国 2014 年发行的纪录片《关于苏珊·桑塔格》中，有一段桑塔格接受采访的录音剪辑。当记者问：“你心里是否期望过自己早一些把更多精力放在小说写作上”时，桑塔格脱口而出：“我的全身心都这么期望啊。假如我这些评论文字人间蒸发了，我都并不在乎。我 1960 年代写的那些评论文章，口气非常傲慢，我觉得小说、文学、记叙体才是持久的东西。”她这里说的是心里话。

她儿子戴维·里夫在为她的日记第二卷《心为身役》所写的序言里说：“写小说一直是她的抱负。”我 2004 年去她在曼哈顿的寓所看她时，她问我，是喜欢她的评论还是喜欢她的小说？我说，喜欢她的评论。这时候，我分明看到她非常失望的神情。看过她大多数作品之后，我想说，写小说（当然包括短篇小说）才是她的初心，缺了对她小说的研究，断不能算是完整的桑塔格研究。

我开始研读桑塔格的时候发现，在中外学术界，目前已有多部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桑塔格小说研究专著出版，但其不足之处在于，迄今为止尚无多少桑塔格短篇小说专论，已有的成果对桑塔格短篇小说特征的把握尚欠准确。所以，我有意在桑塔格短篇小说研究方面做出学术努力，2013 年就以桑塔格短篇小说研究申报了一个教育部项目并顺利获得立项。

随后，我对《心问》（即《我，即其他》）这个集子里的所有桑塔格的短篇小说进行文本内外的读解，对学术界较为忽略的《美国魂》《假人》《中国旅行计划》，特别是艾滋病叙事经典之作《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做了一些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桑塔格的短篇小说进行了整体研究，概况出它们所具有的自传性、人文性、实验

性、寓言性等总体特征。这些研究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桑塔格的短篇小说的关注，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也在不断推出。



《心问》，收录于小鸟图书馆

小鸟文学：你个人做的主要研究其实是赛珍珠（Pearl S. Buck），和桑塔格对比，你觉得两人有什么异同吗？比如她们其实都和中国有联系，但赛珍珠显然要更深一些。

姚君伟：我的家人经常调侃我，说我研究大 S（赛珍珠），翻译小 S（桑塔格），因为两人的名字中都有 S。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对象相对集中在美国作家赛珍珠和桑塔格身上。这两个作家都与中国有缘，赛珍珠是在襁褓中就被身为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 40 年，并以中国为故事背景创作的小说和她为她父母写的传记而获得 1938 年诺贝尔文学奖；桑塔格的父母则在中国天津从事皮毛生意，桑塔格自己曾“吹牛”说她是在中国孕育的，中国是她曾经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她母亲也对自己早年在中国的生活念念不忘。赛珍珠和桑塔格身上的中国元素让我对她们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

开始桑塔格的翻译，起源我前面已提到过。开始赛珍珠研究也是非常偶然。1991 年 1 月，我和原镇江师专中文系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好朋友一起出去办事，路上遇到了老同事杨积庆教授。他告诉我们，中国首次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将在镇江召开，希望我们年轻老师能写论文参会。就这样，我放下手头研究的英国现代作家伊夫林·沃，赶写了一篇赛珍珠研究论文《探析〈大地〉中赛珍珠的思想倾向》参加会议，并从此走上赛珍珠研究的道路。

两个 S 有共同之处，她们都是学者型作家、社会活动家。赛珍珠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浸润型的中国生活让她身上有很多中国元素，她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她对中国文化、中国小说的了解和肯定让她回到美国后努力向她的美国同胞介绍中国人和中国故事，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与交流。徐志摩、梅兰芳、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客。她也是因其中中国背景的小说而获普利策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赛珍珠研究已有 30 多年，对她的小说、非小说领域都有涉足。两个 S 与中国都有渊源，但在我看来，大 S 应该算半个局内人关注中国，小 S 也关注中国，但算不上局内人，尽管也到访过中国，还见过中国作家丁玲。

小鸟文学：你未来还会做哪些桑塔格有关的翻译与研究？对于完全不了解桑塔格的读者，你建议他们从哪些作品开始阅读比较好？

姚君伟：有合适的选题，无论翻译还是研究，我都会努力去做。至于推荐书目，如果从来没读过桑塔格，但并不太在乎钱，那就买本大传（《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如果觉得一开始不想花很多钱，那就买本小传（《回忆苏珊·桑塔格》）看看，但不建议买《死海搏击》，正如作者戴维本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本难写也难读的极其痛苦的书。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图片来自 [fabio on Unsplash](#)

档案

芯片将如何影响地缘政治？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1 条动态。

10 月 7 日，拜登政府宣布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售半导体技术的全面新措施。除非得到特别许可证，美国企业将不能向中国供应先进的计算机芯片、芯片制造设备和其他产品。人才也不例外，政府禁止美国公民支持开发或生产某些可以推动中国技术应用的高端芯片。公开资料显示，大量华人已在中国创办多家芯片设备和材料公司，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做出取舍。

5 天后，在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出要“超越中国并遏制俄罗斯”。而在两个月前，拜登还签署了一项规模高达 2800 亿美元的芯片法案，旨在保持美国优势，反制中国影响。该法案将为在美国制造芯片的公司提供 520 亿美元的补贴和税收抵免，并有 2000 亿美元用于新的制造计划和科学研究，尤其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器人技术等领域。

这一系列举措将中美关系推到又一个关口，科技领域的竞争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双方均是如此设想。但是，对普通人来说，要理解这场芯片战具有不小难度。正好，美国塔夫茨大学副教授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在 10 月出版了一本讲述芯片业历史和现实的新书《芯片战：争夺全球最关键技术》（*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受到许多媒体推荐。

美国记者弗吉尼亚·赫弗南（Virginia Heffernan）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中称，如果有哪本书能让普通读者通过了解硅时代，并最终认识到硅时代的刺激和重要性不亚于原子能时代的话，那就是《芯片战》了。该书按时间顺序讲述了半导体芯片的发展、突飞猛进及其战略应用。从汽车到玩具，再到核武器，这些芯片如今是所有东西的心脏。

“米勒在塔夫茨大学讲授国际事务，他把他在俄罗斯和中国历史方面的专长运用到书中，描述了制造芯片、精密到接近原子尺度的芯片制造工具的全球寡头垄断企业以及相关代工厂。最后，《芯片战》一书用大量论据得出结论：芯片业现在既决定着全球经济结构，也决定着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赫弗南写道。

《经济学人》认为，这本书文风简洁优雅，对于想要更好理解这个产业的人来说，是个不错的起点。1947 年，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发明了晶体管。不出十年，他们将几个晶体管放在一片硅片上，制成“集成电路”，也就是芯片。到了 1965 年，工程师戈登·摩尔预测，通过缩小晶体管，工程师们大约每两年就能将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翻一番，而这也使芯片的性能提高一倍。后来，摩尔和同伴一起创办了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

“随着市场的发展，美国的竞争对手对芯片的兴趣也日益增长。先是苏联试图仿造出一个硅谷，但以失败告终。后来，东芝和富士通等日本公司在部分芯片市场上成功占据一席之地。但战略性的威胁来自中国，中国目前在芯片进口上的支出超过石油。中国政府要求科技巨头减少对外国芯片的依赖，每年拨款数百亿美元支持。然而，中国大陆的首

要任务不是匹敌美国的技术，而要先赶上中国台湾，全球 90% 用于数据处理的高端逻辑芯片都产自这里。”《经济学人》写道。

台湾在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源自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他 1931 年生于大陆，成长在香港，在美国读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芯片制造商德州仪器工作。1980 年代，张忠谋没能晋升为该公司的 CEO，于是接受邀请，前往台湾创办台积电，专门生产客户设计的芯片。得益于规模化生产和张忠谋的出色经营，大多数公司开始专注设计，不再生产尖端芯片，转而依赖台积电，比如苹果就是台积电的重要客户。目前，台积电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企业。它和韩国科技巨头三星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

不过，随着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开始担心自身的优势与安全，转而寻求自给自足。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随之反应，使得芯片的全球供应链发生变化。对于台积电，正如《金融时报》的报道所言，它既处于美国与中国台湾之间一场较量的中心，在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的新冷战中，它也站在打得最火热的前线。目前，台积电正在推动制造地点多元化，准备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建造工厂。此前，它的投资几乎都在中国台湾和大陆。

关于现实之变，米勒在一篇评论中称，中国的补贴和美国的芯片限制迫使下游行业发生变化。苹果正增加在越南和印度的设备组装，其精细的供应链决定整个行业采购零部件的方式。最大的信号是，苹果为中国用户生产的手机可能会使用与在海外销售的手机不同的组件。苹果已向美国立法者表示，它将只会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手机中使用长江存储的存储芯片。分开运作“中国”和“非中国”供应链显然是在进行脱钩。在补贴方面，除了中美，欧洲、日本和印度也在推出各自的半导体补贴。

从芯片发明到现在之争的几十年里，摩尔的预测得到验证，现被称为“摩尔定律”。一个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也从最早的 4 个发展到现在约 118 亿个。这也是技术比拼的核心。米勒称，目前大陆能大规模生产的最尖端技术比台湾落后 3-4 代。在接下来 5-10 年内，可能上升至 5-7 代。

在 10 月底一场新书活动上，米勒和实务界专家保罗·特里奥罗（Paul Triolo）展开一场对谈。谈及未来，米勒说：“中国半导体产业面临的挑战是，由于中国的军事建设，美国认为自己只能将计算能力作为其在亚洲保持军事优势的关键。因此，美国的战略是加倍发挥其在芯片供应链中的核心作用，并阻止中国进入这一场域。鉴于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这种动态很难改变。中国政府可能需要调整其外交和国防政策，才能帮助中国企业更顺利地融入世界。”

特里奥罗则认为：“美国的封控措施已经产生了一系列附带影响，未来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破坏全球半导体行业。……总之，半导体行业一直在以市场驱动的方式向前发展，资金、人员等在此过程中自动流向最优化的位置。这种动态在权力对抗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半导体行业正在努力调整和重组其供应链以维持摩尔定律，但前景似乎并不乐观。”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10 月 30 日，巴西的左翼前总统卢拉（50.9%）险胜右翼现任总统博尔索纳罗（49.1%）。卢拉现年 77 岁，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工人出身的总统，曾于 2003 年至 2010 年间任职。卸任总统后，他卷入贪腐案，判刑 12 年，但在狱中度过 19 个月后被释放，判决也在之后撤销，不过这一事件始终存在争议。

如何理解巴西这些年民主实践？《纽约书评》的两篇文章或可参考。一篇是美国记者文森特·贝文斯（Vincent Bevins）的《比博尔索纳罗更大》（*Bigger than Bolsonaro*），着重讲述了博尔索纳罗上台的背景。巴西在 1980 年代结束独裁统治后，到 2014 年选举前很少有右翼人士，其注册的 32 个政党中，26 个的名字带有左翼符号。2014 年后，卢拉 2015 年陷入贪腐丑闻，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卢拉的接班人）2016 年被弹劾，再到 2018 年，被称为“巴西特朗普”的博尔索纳罗当选，向右急转。

贝文斯通过评价巴西政治学者卡米拉·罗卡（Camila Rocha）的著作《少点马克思，多点米塞斯：巴西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右翼》（*Menos Marx, mais Mises: O Liberalismo e a nova direita no Brasil*），揭示右翼崛起的过程。贝文斯称，罗卡指出了两个群体的重要性，分别是自由市场智库和右翼在线社区。这些智库的名称有自由研究所、米塞斯研究所等，出现在 1980 年代和 21 世纪头十年之间，通常在美国有意识形态或财政支持者。在线社区则是社交媒体 Orkut、Facebook 等，常常围绕着巴西右翼思想家奥拉沃·德·卡瓦略（Olavo De Carvalho）开展。

这听起来和美国激进右翼崛起的过程类似，此前美国记者简·迈耶（Jane Mayer）就写过一本《金钱暗流》揭露背后的富豪科赫家族。除了贝文斯这篇，美国记者拉里·罗特（Larry



剧集《黑金高墙》（*O Mecanismo*）第二季（2019）海报

Rohrer) 在 2020 年评介了三部关于巴西的作品也值得留意。在这三部作品中,一部是为许多普通人熟悉、入围过奥斯卡的纪录片《民主的边缘》,但罗特认为,这部作品过于私人,太偏向卢拉方面,如果将它作为了解巴西过去十多年的历史,不是很可靠。

相比之下,虽是虚构剧集,但两季共 16 集的《黑金高墙》具有影射色彩,更能反映巴西现实,提供了对巴西贪腐和劳工党(卢拉和罗塞夫所属政党)倒台最有启发性的看法。他认为,这似乎是个更真实的事件版本。没有纯粹的好人,无论哪个政党名义上掌权,只有一个被建筑公司和银行家组成的腐败垄断联盟控制的国家。最后一部作品是英国知名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弟弟)的著作《巴西裂开》(Brazil Apart: 1964–2019),罗特在评论中指出了他的洞见,以及偏见。

02

10 月 26 日是伊朗女孩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逝世第 40 天(伊斯兰教哀悼期的结束日),大批抗争者聚集在阿米尼的坟墓前,高喊“生命、自由、女性”等口号,其他多地也爆发抗议活动。5 天后,伊朗当局称,将对德黑兰约 1000 名示威者公开审判。另据人权组织统计,9 月中旬以来,伊朗约有 300 名示威者丧生,超过 1.4 万人被捕。上期,我们提过一些对这场抗议的反应和看法。一个月后,随着事态发展,更多观点涌现。比如伊朗裔美国作家《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作者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在《卫报》撰文称,她知道有许多虚假的曙光,比如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但伊朗发生的两件事让她意识到,无论结果如何,这次是个转折点。第一件事是伊朗人民,尤其女性和年轻人,已经发现自己的力量,并决定使用它;第二件事是伊朗当局发现自己失败,不再是处于强势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他们很害怕,剩下的就只有枪了。

“今天的年轻示威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与我这代人不同,他们没有党派化的意识形态,而是在说:‘我们想要生命、自由、正派的生活’,寻求团结。对伊朗女性而言,这场运动事关生死存亡。她们说:‘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强加给我们的行为’。这是这个政权无法获胜的原因。他们可以摧毁政治组织,但能拿成千上万走上街头、拒绝戴头巾的人怎么办?把他们都关监狱或者杀了吗?幸好没有。这些年轻女性很了不起……揭穿了伊斯兰共和国主宰伊朗传统和文化的神话。”纳菲西写道。

伊朗裔美国学者阿塞夫巴亚特(Asef Bayat)则在接受伊朗《信报》的采访中提到:“夺回生活是一个强大的概念。每个阿拉伯革命者都会背,突尼斯诗人阿卜杜拉·卡西姆·沙比(Abu al-Qasim al-Shabbi)那首著名的诗反映了这个概念的深度:‘如果有一天,人民要求生活,那么命运将不得不回应。’在这次起义中,夺回生活变成一个普遍要求。我们看到,从人民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一种‘集体伤痛’和一个集体要求被创造出来了一—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不但感受、分享它,也为它而行动。随着‘人民’的出现,起义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进入革命阶段。”

03

在去年的年终文化笔记中,我们记录了 2021 年 2 月缅甸军事政变后,大批诗人抗议,但被关进监狱或直接杀害。差不多一年过去,缅甸军政府的镇压更加无情,但反抗仍在继续。据《纽约时报》,政变两周后,军政府在刑法中增设条款,将发表“引起恐惧”或传播“虚假消息”的文字定为犯罪。随后,该国许多知名媒体被吊销执照,数百名记者逃离,140 多名记者被捕。

但是,仍有一批年轻人“以笔为枪”,争取言论自由,地下独立文学杂志 Oway 就是其中之一。这本刊物最初因反对英国殖民由仰光大学学生会创办于 1936 年。现在,成员大多二三十岁,其中有名记者年仅 15 岁,主编也只有 22 岁。“通过新闻工作,我确信我可以代表无声者并为他们发声。现在,我想写下一切所见所闻,因为在这个国家,一切都不公平正义。”这名 15 岁的年轻女孩说。

04

10 月 1 日是物理学家杨振宁 100 岁生日,学术杂志《二十一世纪》推出“祝贺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专题。专题共 11 篇文章,既有回忆与杨振宁的相识与交往,比如徐立之的《我认识的杨振宁先生》,陈越光、尹捷的《物格无止境,理运有常时——我们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也有金耀基、刘青峰、金观涛讲述《二十一世纪》与杨振宁的渊源,等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回忆文章不是单纯的故事,更记录了杨振宁对中国发展和世界前景的不少看法,而一些作者还表达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思考。

比如金耀基称,杨振宁谈到近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有些无奈。他对美国“过度的个人主义”很不以为然,认为美国国力已是螺旋式下降,“军工复合体”影响太大了。对于美国在科技上与中国脱钩,他表示短期中国应可应对,但长远就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87 岁的金耀基希望并相信,中国在建构新文明的过程中,将会把民主(重个体的自主性与人之自由与尊严)纳入到新文明的价值体系中。二十一世纪肯定见证中国从古典农业文明转型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大业。

除了回忆文章,一些作者是写专题论文致贺,比如许倬云的《1840 年以来的中国与美国》、翁松燃的《中美关系前瞻》、刘遵义的《中国经济展望》、陈方正的《想象未来——人类文明往何处去?》,各有特色。

05

照例记录新冠疫情。新疆、西藏、青海、甘肃、河南、广东、山西、内蒙古等地疫情升级,悲剧也不断重新上演,比如兰州三岁儿童死亡、呼和浩特女子坠亡、保定男子持刀冲卡买奶粉、郑州富士康工人徒步返乡、西宁老人因无流食饥饿死、乌鲁木齐尿毒症患者因无法透析去世、广州近三天转运隔离城中村居民 3 万余人,等等。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疾控局监督一司二级巡视员妥佳称,他们对于近期群众投诉进行梳理,主要发现三方面问题:一是对来自于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黑龙江省大庆市、山西省太原市这类投诉较多;二是随意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山西省运城市、河南省郑州

市这类投诉较多;三是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群范围,广东省深圳市这类投诉较多。

另外也发现,除了违反“九不准”规定之外,一些地方处置疫情存在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新的表现形式。一是隔离场所收费,比如贵州省毕节市、四川省南充市;二是随意静默、封城代替管控,如河南省郑州市。此外,舆情监测发现个别地区以赋码弹窗的形式限制人员出行。

从 9 月到 10 月,顾某的北京健康宝始终处于“弹窗 3”状态,导致其无法进京。期间,他多次在北京 12345 提交申诉解除弹窗,无果,也未收到任何依据。因此,顾某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政府等提起行政诉讼,希望判处被告限制原告进京行为违法,解除弹窗。早在 5 月,北京市司法局就受理过首例因健康宝弹窗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以调解告终。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界融向国家卫健委提交了一份《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希望依法解除自 2020 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措施。

06

我们之前关注过的三件事有了更新。一是美国法官阻止企鹅兰登书屋收购西蒙与舒斯特,称会减少竞争;鲁西迪的经纪人称,8 月的袭击事件导致鲁西迪一只眼睛失明,一只手失去行动能力,但最重要的是,他活下来了;伦敦高等法院判定安娜·帕斯捷尔纳克起诉拉娜·普雷斯基特抄袭案败诉,称两本书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还有几条文化新闻可以一看。柯林斯词典公布 2022 年度词汇是 permacrisis,该词由 permanent 和 crisis 组合而成,意为“长久危机”。词典方认为这简明总结了 2022 年是多么糟糕:华裔好莱坞明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 1905—1961)成为首位登上美国硬币的亚裔。美国铸币局称,选择黄柳霜是因为她为亚裔美国演员争取更多角色,而且她一生中克服了重重挑战与阻碍。

德国杜塞尔多夫 K20 博物馆举办展览“蒙德里安的进化”,策展人宣称,蒙德里安 1941 年的作品《纽约城一号》自 1945 年首次公开展出以来,一直被倒置悬挂,也就是被挂反了 77 年;70 岁的坂本龙一宣布 2022 年 12 月 11 日将面向全球举办一场钢琴独奏会。因患咽喉癌和直肠癌,他说,“或许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以这种形式进行演奏”。

美国最高法院开始审理哈佛大学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歧视案。案件原告为非营利组织“学生公平入学”(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它们 2014 年提出诉讼,称哈佛与北卡具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政策歧视了符合入学条件的亚裔美国人。所谓“具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政策”,是指根据“平权法案”,美国高校会确保少数民族在学生中有充分占比。而在实践过程中,许多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受益于此政策入学。

《纽约时报》报道,“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六名保守派成员对‘多样性’一词提出质疑,称大学招生是‘一场零和游戏’,给予一个群体优势必然会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但另外三名自由派法官为‘平权法案’进行了有力辩护”。多样性和种族偏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也是美国社会最为关注的几个议题。美最高法将于 2023 年 3 月发布裁决结果,很可能引会来一场舆论战争,甚至社会行动。



2022 年布克奖获奖作品
《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

07

几个奖项结果可以关注。斯里兰卡作家谢汉·卡鲁纳蒂拉卡(Shehan Karunatilaka)凭借小说《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The Seven Moons of Maali Almeida)获得布克奖,该小说设置背景是 1989 年的斯里兰卡内战;法国作家布里吉特·吉罗(Brigitte Girau)凭借小说《活得快》(Vivre Vite)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该小说是一部关于丈夫去世,留下年幼儿子的自传体作品;

马华作家张贵兴获得纽曼华语文学奖,被认为“融合东西方的文学美学和叙事风格”,其作品《野猪渡河》《赛莲之歌》《猴杯》有简体中文版;诗人哈里·约瑟芬·贾尔斯(Harry Josephine Giles)以苏格兰奥克尼方言和英语为平行世界书写的诗体小说《深轮奥克尼》(Deep Wheel Orcadia)获得亚瑟·C·克拉克奖,该奖代表英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

08

几部英文新书可以留意。在出版《编年史》后 18 年,鲍勃·迪伦推出新作《现代歌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展现他对音乐和人类的思考;迪伦之外,另一重要音乐人,U2 主唱波诺也出版了回忆录《投降:40 首歌,一个故事》(Surrender: 40 Songs, One Story);继《癌症传》《基因传》之后,悉达多·穆克吉写了新书《细胞传》(The Song of the Cell: An Exploration of Medicine and the New Human);美国作家乔治·桑德斯出版小说集《解放日》(Liberation Day),他于 2017 年获布克奖的作品《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最为有名,中文译稿当年就已完成,但至今仍未见出版。

09

10 月 13 日,李叔同(弘一法师)逝世 80 周年,他在书画、音乐、金石、佛学等领域均有贡献,并在抗战等历史大变动时以生命实践典范。10 月 24 日,历史学者张荫麟逝世 80 周年,他著有《中国史纲》,被梁启超称为“天才”,但 37 岁就因病早逝;11 月 1 日,诗人埃兹

拉·庞德逝世 50 周年，他早年以意象派诗歌著名，自称“儒者”，后期转向法西斯主义，被美国以叛国罪逮捕，但通过装精神病，躲过审判，在精神病院待了 12 年；11 月 16 日是作家**若泽·萨拉马戈**诞辰百年，他是第一位获诺贝尔奖的葡语作家，1990 年代的代表作《失明症漫记》在新冠时代屡次被人提及。

10

10 月 9 日，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 1947—2022) 逝世，他以行动者网络、重置现代性、拉式盖娅理论等闻名；10 月 17 日，出版家**卡门·卡利尔**(Carmen Callil, 1938—2022) 逝世，她创办了女性主义出版社 Virago Press (拉丁语中的‘女战士’)，出版阿特伍德等女作家的作品，改变男性主导的英国文学经典；10 月 21 日，考古学家**石兴邦**(1923—2022) 逝世，他被看作中国史前考古奠基人，曾主持发掘半坡遗址；10 月 25 日，学者**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 1946—2022) 逝世，他批判性思考城市、文化和社会发展，著有《水晶之城：窥探洛杉矶的未来》《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等；10 月 29 日，最后一位南侨机工**蒋印生**(1927—2022) 逝世，南侨机工是抗战期间，从南洋回国参加运输工作的华侨，为保障滇缅公路做出贡献；10 月 31 日，历史学者**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 1945—2022) 逝世，他专研中国社会经济史，著有《华南新乡村秩序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New Rural Order in South China) 等。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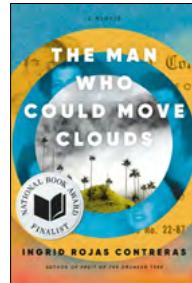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国家图书奖是美国最具威望的文学奖项之一，1950 年在纽约成立，旨在表彰在美国出版的最好的文学作品，扩大读者群体，并确保书籍在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经的获奖者有汉娜·阿伦特、威斯廷·休·奥登、索尔·贝娄、杜鲁门·卡波特、威廉·福克纳、玛丽安·摩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弗兰纳里·奥康纳、和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等，他们为美国文学根基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

今年的奖项将在 11 月 16 日为五类文学颁奖：虚构、非虚构、诗歌、翻译文学，和青少年文学，每类都有 5 本书进入决选名单，共 25 本，其中有 6 本是作者的首部作品。本届评选尤其关注作者的多元性，例如五本虚构作品的两部关注性少数群体；四部都来自美国少数民族的作家——有拉美裔、阿富汗裔、印度裔，和非裔，并且作品的主人公也来自相同族裔。主题上也同时广泛地关注个人与社会。非虚构作品除了上述特点外，尤其关注作品主题形式的多样，包括家族史、采访、传记、回忆录、评论、学术著作等等，且许多作品都同时包含多种主题形式。

以下是虚构和非虚构类的入围决选的作品：

非虚构——



英格丽·罗哈斯·孔特雷拉斯 (Ingrid Rojas Contreras)
《移动云彩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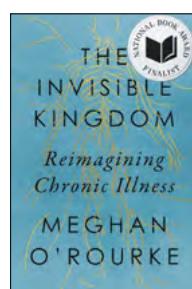
魔力是作者罗哈斯·孔特雷拉斯的家族传统，而这本书是由他们对魔力的爱与恨交织成的家族史。罗哈斯·孔特雷拉斯在哥伦比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暴力中长大，在土著和西班牙殖民文化中拉扯挣扎。她的祖父 Nono 是一位著名的民间医师，拥有家族所称的“秘密”——与死者交谈、预知未来、治愈病人和驱散乌云的能力。她的母亲在童年坠入井底后，也获得了魔力，成为第一个继承家族“秘密”的女性，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并能驱逐最顽固的鬼魂。

直到 20 多岁在美国生活，罗哈斯·孔特雷拉斯从她头部受伤导致的失忆中恢复时，她发现自己也获得了“秘密”。

2012 年，在母亲和阿姨们重新了解家族史的强烈愿望的刺激下，罗哈斯·孔特雷拉斯母亲一起前往哥伦比亚，挖掘祖父 Nono 的遗体。尽管一部分亲戚认为“秘密”是一份上帝的恩赐，其他人则认为它是一种“诅咒”，并对母亲以恶相待。

罗哈斯·孔特雷拉斯穿插了大量迷人的家庭故事，再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以及她自己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思考。她笔下不可思议的世界，证明了故事作为一种治愈性艺术的巨大力量，也邀请读者去欣然接受超自然的事物。

这本非虚构也许能告诉启发读者——南美大陆不仅有魔幻现实主义，更有真实魔幻的存在。



梅根·欧鲁克 (Meghan O'Rourke)
《看不见的国度》

这是对这个时代最重要、最神秘的问题之一的里程碑式探索：慢性疾病和自身免疫疾病的增加。

人们对许多慢性疾病了解甚少，它们甚至可能无法被诊断和识别。梅根·奥鲁克对这“看不见的”疾病进行了开拓性的调查，包括自身免疫疾病、治疗后莱姆病综合征，以及现在的新冠肺炎。她追溯了西方对疾病定义的历史，揭示了遗传的病因、诊断和治疗观念是如何导致我们忽视了许多难以理解的疾病，它们难以被简单描述或治疗。

在作品中，奥鲁克同时扮演着评论家、记者、诗人、教师和病人的角色，促使我们对待疾病的方式进行颠覆性的转变。

内战、《飘》、三 K 党、种植园、橄榄球、吉姆·克劳、奴隶制……很多美国人都能指出这些南方的标志，但它的特性比这个大多数人认为的更奇怪、更复杂。伊曼尼·佩里在书中展示了“美国”的含义与南方密不可分，我们对其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是理解整个国家的关键。



图片来自 [Paul Hanaoka on Unsplash](#)

档案

一本政治讽刺小说，得了 2022 年的布克奖

黄璐 | Newsletter

这里是过去四周重要的出版和书籍信息。

赢得 2022 年布克奖的是《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一部政治讽刺作品。作者谢汉·卡鲁纳蒂拉卡 ([Shehan Karunatilaka](#)) 来自斯里兰卡。你也可以说这是一本鬼故事，因为它讲述了一名叫做马里·阿尔梅达的摄影师死后的故事。

政治讽刺作品在今年布克奖的决选作品里占据了好几个位置。除了大奖得主之外，还有津巴布韦作家 NoViolet Bulawayo 的小说《荣耀》，一个关于非洲独裁者的寓言；[Percival Everett](#) 的一部探案小说，一对黑人侦探在其中调查一系列与私刑有关的谋杀案。

大英博物馆前馆长、今年的评委主席尼尔·麦格雷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 这本书将读者带入过山车般的生死之旅。”

谢汉·卡鲁纳蒂拉卡 1975 年出生于斯里兰卡的一个港口城市。他后来在新西兰读书，又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新加坡工作和生活。他曾担任广告文案，并在另类摇滚乐队“独立广场”弹吉他。他目前住在科伦坡，白天仍然在那里撰写广告文案，并在清晨写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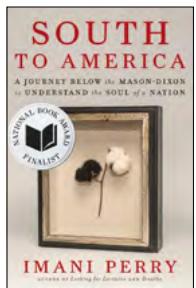
2011 年，他因为处女作《中国人》进入国际文坛视野，那本书讲述了一个酗酒的记者去寻找一位失踪的板球明星的故事。他因此被誉为“才华横溢的喜剧小说家”，并在 2012 年获得了英联邦图书奖。

《马里·阿尔梅达的七个月亮》以 1989 年的斯里兰卡为背景，主人公马里·阿尔梅达是一名战地摄影师，同时也是赌徒和同性恋。在某个早晨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死了，他被肢解的尸体正沉入湖里。他不知道谁是凶手，而他有“七个月亮的时间”来联系他最爱的男人和女人。在这段时间里，他可以在来世和现实之间穿梭。他希望找回一组储存在床下的照片，来揭露斯里兰卡内战的悲惨景象和历史背后的黑暗面。

1989 年的斯里兰卡，“猛虎组织、军队、印度维和部队、恐怖分子和国家敢死队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互相残杀”，因此卡鲁纳蒂拉卡认为那个宵禁、炸弹、暗杀、绑架和乱葬岗主导的时代是“鬼故事、侦探故事或间谍惊悚小说的完美背景”。

卡鲁纳蒂拉卡在接受布克奖时表示，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在他的祖国被阅读并铭记在心，并且，有朝一日它可能会被视为一部纯粹的幻想作品，而不是政治讽刺作品。“我希望在未来——10 年或者更久——腐败种族主义和任人唯亲在斯里兰卡不再奏效换言之，小说里的历史背景成为过去，人们不再视之为现实影射，而是一种幻想，因为人们根本已经走出那些历史带来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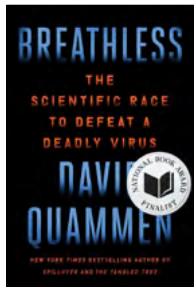
卡鲁纳蒂拉卡可能还有一点没有说完整，如果人们真的想“走出”那些“历史”，首先需要避免的，应该是缺席的历史教育造成的假性遗忘。



伊曼尼·佩里 (Imani Perry)
《美国之南：向南穿越梅森 – 迪克森线，理解国家灵魂之旅途》

这是一个黑人妇女和土生土长的阿拉巴马人重返家中，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它的故事。她的旅程充满了弯路，以及与地点与人的意外相遇。她以敏感和诚实的笔触描绘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方人，分享了对一段令人不安的历史、以及标志着南方生活的仪式性屈辱和欢乐的看法。

佩里将移民社区、当代艺术家、吃人的机会主义者、被奴役的人民、无名英雄、她自己的祖先和她的生活经历交织在一起，创作出了一幅与众不同的挂毯图，并主张：如果想为美国建设一个更人道的未来，必须把关注点集中在梅森 – 迪克森线以南。



大卫·奎曼 (David Quammen)
《令人屏息：战胜一种致命病毒的科学竞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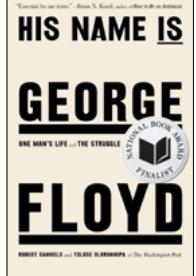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科学探索的故事，旨在破译冠状病毒 SARS-CoV-2，追踪其来源，并使抗击新冠大流行的疫苗成为可能。

奎曼展示了当我们破坏野生生态系统时，新病毒如何从动物感染到人类，并如何适应它们的人类宿主，这有时会导致全球灾难。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冠状病毒可能是一种“永远的病毒”，注定以各种变体无休止地困扰我们。

根据对近 100 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主要病毒学家的采访，奎曼解释说：

1. 传染病专家看到了这场大流行的到来
2. 20 多年来，一些科学家一直警告说，下一个大流行将由一种可变化的新病毒引起——很可能是冠状病毒——但由于政治或经济原因，这些警告被忽视了
3. 这种病毒的确切起源可能多年后才会知道，但一些线索很可信，另一些则是无稽之谈，等等

本书将带领读者走进国际社会为理解和控制新冠病毒所做的紧张忙乱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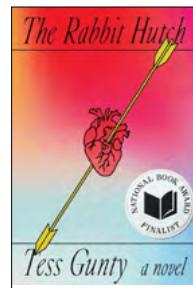
罗伯特·塞缪尔斯和托卢斯·奥罗伦尼帕
(Robert Samuels and Toluse Olorunipa)
《他的名字叫乔治·弗洛伊德：一个人的一生和为种族正义的抗争》

2020 年 5 月 25 日，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家便利店外被白人警官德里克肖万谋杀。他死亡的录像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使数百万人意识到种族不公正的普遍存在。

本书讲述了休斯顿住房项目中一位受人爱戴的人物的故事，他面临着作为美国黑人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系统性压力。本书将弗洛伊德的叙事置于这个国家长期存在的制度性种族主义遗留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弗洛伊德的家庭根源：奴隶制和佃农制度、学校的种族隔离、大规模监禁浪潮中对他所在社区的过度监管、以及对他与毒瘾的斗争的无情漠视——将当今的不平等用独特的人类术语表述出来。《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特·塞缪尔斯和托卢斯·奥罗伦尼帕通过对弗洛伊德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小学老师和大学教练、和那些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人等的数百次采访，对乔治·弗洛伊德的美国故事进行了深刻而感人的探索，揭示了一个只是想呼吸的人如何最终感动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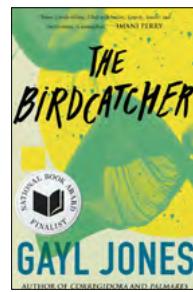
虚构——

故事发生在七月的一个星期里。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智慧而美丽出尘的女主人布兰丁，与三个和她一样从寄养系统中长大、离开的青少年，一起合租在一个破旧公寓楼里。汽



苔丝·甘蒂 (Tess Guntley)
《兔屋》

车工业抛弃了这里，楼里各式各样的人居民在这座濒死的城市里追求生存之道。《兔屋》是对当代美国后工业时代中西部的一个生动的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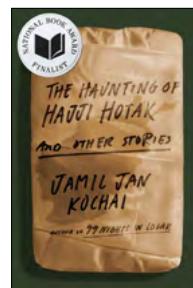


盖尔·琼斯 (Gayl Jones)
《捕鸟人》

这是一本关与在流放中的美国黑人艺术家的小说。

故事主要发生在西班牙的伊比沙岛 (Ibiza)，通过作家阿曼达的视角而讲述。她最亲密的朋友、天才雕塑家凯瑟琳多次因试图杀死从不肯离开她的丈夫而入狱。这三个人在白茫茫的小岛上形成了一个离奇的三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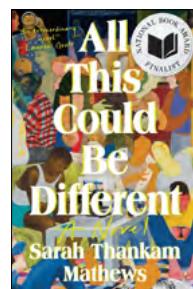
这部作品研究了黑人女性的创造性表达，以及她们之间紧张而激烈的关系，展示了作家琼斯对所有人性变迁的宽广的洞察力。



贾米尔·贾恩·科查伊 (Jamil Jan Kochai)
《哈吉·霍塔克的鬼魂，和其它故事》

这篇短篇小说集是关于现代阿富汗和流散于美国的阿富汗人群像。

在《合金装备 V: 幻痛》中，一个年轻人的视频游戏体验变成了一场超现实探索，关于他父亲对战争和职业的回忆；一名美国大学生在《饥饿的里基爸爸》中，以绝食来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暴力行为；在《哈吉·霍塔克的鬼魂》中，我们从政府监控人员的视角了解了一个代号为哈吉的人的故事，他已根深蒂固于移民家庭的生活……



萨拉·桑卡姆·马修斯 (Sarah Thankam Mathews)
《这一切本会不一样》

印度是美国移民最大的来源之一，主人公斯内哈便是一名年轻的印度移民。自从搬到了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工作后，她开始认识新朋友，给在印度的父母寄钱，并和女性开始约会，很快就对迷人的舞者玛丽娜产生了强烈的迷恋。但麻烦也不期而至。她面前的选择——住在哪里，爱谁，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都在迅速缩窄，她的生活变成了一团乱麻。

安德烈斯是一个同性恋的拉丁裔教授，他在发现丈夫出轨了之后回到了他在郊区的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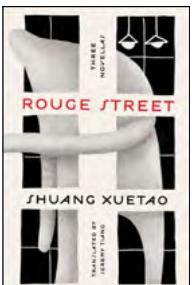
亚历杭德罗·瓦雷拉 (Alejandro Varela)
《巴比伦城》



王寅
《和幽灵在一起的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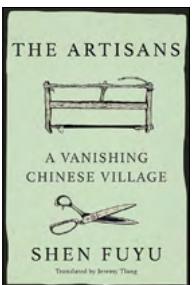
在那里,他不得不参加 20 周年的高中聚会,并开始重新联系曾经的朋友。接下来的几周,他一边照顾年迈的父母,一边在他长大的社区里漫步,和那些本以为已经远离的朋友们又重新恢复了旧习惯。不久后,他意外地和他的初恋纠缠起来,这撕裂了他过去的伤口。《巴比伦城》是一部处女作,是关于社会本质的现代成长故事,是一部关于年轻爱情的精彩小说,它仔细审视了我们的社会制度,以及当它们辜负我们时所付出的代价。

2022 年,有几本中国文学在美国翻译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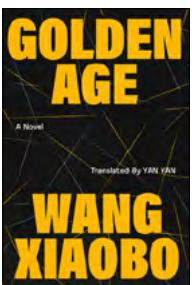
双雪涛
《艳粉街》

由 Jeremy Tiang 翻译,收录了三篇中篇小说,《飞行家》《光明堂》《平原上的摩西》。Jeremy Tiang 是住在纽约的新加坡作家、翻译和剧作家,曾经翻译过作家张悦然的短篇集和李耳的《花腔》等作品。



申赋渔
《匠人——一个消失中的中国村庄》

《匠人》讲述了作者申赋渔的家乡——申村中一个个手工艺匠人及其家族的命运故事,有竹编工人和他心爱的牛;木匠的神奇锯子;成为灯笼匠的逃兵;痛打绑匪的女子……这些故事展现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中,苏北一座万人大村的变迁,也追忆了作者失落的故乡。由 Jeremy Tiang 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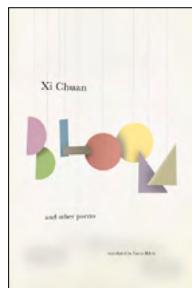


王小波
《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此前的英译本只节选了全书的一部分,直到今年 Yan Yan 的新译本问世。

这是 80 后中国诗人王寅继《幽灵 上海 海洋》后第二本英文诗集,由 Andrea Lingenfelter 翻译。首场新书发布于 10 月 16 日在纽约的重音姐妹 (Accent Sisters)

书店举行。王寅的中文诗集有《灰光灯: 王寅诗选》和《王寅诗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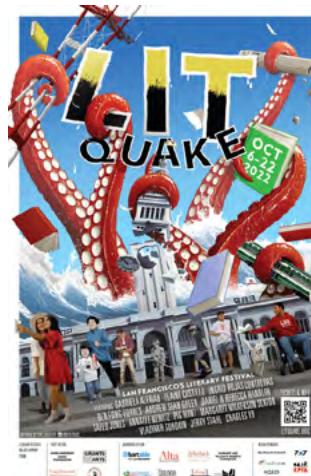


西川
《开花, 及其它诗歌》

由 Lucas Klein 翻译。

还有几个有趣的美国文学活动

[Litquake \(文学地震\)](#)



Litquake 是美国西海岸最大的独立文学节,每年十月都会在文化重镇旧金山举行为期两周的文学盛会,有前沿的专题讨论、跨媒介活动和数百场朗读会。场馆会分布在各个角落,好像领着读者探索这座城市。Litquake 尝试将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文学艺术带给读者,来凝聚文学社群,激发他们对时代问题的积极参与。另外, Litquake 在全年也有各种项目和工作坊。

我作为志愿者参加了很多场活动,帮助布置现场、接待读者。我看到了拉美裔诗人在教堂和街上演出诗作,身处美国使他们更以“拉美诗人”为身份而写诗,英文中夹杂西班牙语,讲他们在美国的挣扎、相互依靠和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看到了小说家们在养蜂店和画廊朗读作品、对话、答读者问、签字售书;看到了两位著名剧作人在投影仪下,为读者逐字逐句地分析几段文字的美妙,以如此的耐心做着如此单纯的阅读,在此如此简单的文字中找到藏匿深处的美;看到了评论家在意大利使馆聊地域文学,那意大利和瑞士交界处的提契诺区;看到女性和性少数作家在酒吧和俱乐部里表演她们性和爱的故事,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印度裔奶奶的脱衣表演,她脱下身上近十件衣服,从最外的印度传统服饰到最里的现代装扮,展现从小时候的传统到后来的解放……他们在各种或传统、或非传统的场域中展示多样的文学,既是继承了旧金山湾区的反叛精神,也是在展示文学的深广。

美国许多作家都喜欢社交,会积极参加见面会、讨论会、朗读会,把自己和作品展示给读者群,若非这样,他们真有可能淹没于百花齐放的出版物之中!在节日上你会见识到来自各种文化、地域、族裔和性别取向的作家们在这里自信地发出声音。文学和作家不再是遥望的存在,而是所能触碰到的鲜活生命。

LGBT 历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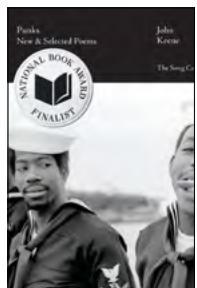
LGBT 历史月是一年一度长达一个月的纪念活动，纪念女同性恋 (lesbian)、男同性恋 (gay)、双性恋 (bisexual) 和跨性别者 (transgender) 的历史，以及同性恋权利和相关民权运动的历史。它是由密苏里州高中历史老师罗德尼·威尔逊于 1994 年创立的。LGBT 历史月会选出 31 名代表，颂扬他们的成绩，树立榜样，并就 LGBT 群体在国内和国际上取得的非凡成就发表声明。

以下是近期出版的关于 LGBT 群体较有代表性的书目：



卡尔·索连 (K.M. Soehnlein)
《爱人军团》

故事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同性恋男子保罗带着理想主义来到了纽约，认识了艾滋病活动团体 ACT UP。他发现在政府的不作为和社会污名面前，酷儿群体正在凝聚力量。当他抗议、聚会、建立一个新家时，自己却在远离他的艾滋病毒阴性男友，追求和一个充满激情的、艾滋病毒阳性的艺术家的紧密联系。保罗的觉醒与 ACT UP 的崛起、成功和争议相似。然后一切又发生了变化，他的家人陷入了生死斗争，这进一步考验了他。《爱人军团》诞生于作者在 80 和 90 年代活跃的酷儿社区中的行动，它将历史和小说融合在对记忆、社区、爱和正义的探索中。



约翰·基恩 (John Keene)
《朋克：新诗与诗选》

这本诗歌合集是小说家、翻译家、麦克阿瑟奖获得者约翰·基恩的里程碑，它将失去、欲望和爱的历史叙事编织在一起。这些诗采用了大量的形式、出现了许多声音——从历史上著名的黑人名人，到诗人在同性恋酒吧和卧室里的朋友和情人，以悲伤的歌曲来解决欲望、压迫、艾滋病和悲伤。

美国印第安人遗产月

11 月的印第安人遗产月旨在纪念印第安人对美国的建立和兴盛的重大贡献。

以下是几本近期出版的有关印第安人的书籍：

《交叉路口》(Crossings) – 琼·克斯特特 (Jon Kerstetter)

这是一本由一位美国原住民医生撰写的回忆录，讲述了他在伊拉克战争中作为一名医生士兵的经历，在经历了一次中风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他努力克服自己身体、思想和身份的新限制。

《我们拒绝遗忘》(We Refuse to Forget) – 凯勒·盖尔 (Caleb Gayle)

在本书中，记者凯勒·盖尔讲述了克里克 (Creek) 民族的非凡故事。两个世纪前，克里克民族是一个既拥有奴隶又接受黑人为正式公民的土著部落。在 Cow Tom 这样的克里克族领袖的努力下，美国政府在 1866 年承认了克里克族黑人成员的公民身份。然而，这种平等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粉碎了，当时部族首领撤销了黑克里克族人的公民权。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和采访那些为恢复公民身份而斗争的黑克里克人，盖尔揭露了作为这个故事核心的种族主义和贪婪。该书以新的视角揭示了白人至上和边缘化的阴影，它们持续阻碍着美国黑人的进步。

《可能是鲁比》(Probably Ruby) – 丽莎·伯德 – 威尔逊 (Lisa Bird-Wilson)

这是一个追寻自我的女人的故事。鲁比是三十多岁的女子，她的生活失去了控制。但很快我们发现，Ruby 的故事远比她想象的要复杂。鲁比在襁褓中就被人收养，由一对白人夫妇抚养长大，他们对鲁比的土著血统知之甚少。这是笼罩在 Ruby 生命中的巨大谜团——她的亲人是谁，以及如何调和她所失去的一切。



黄璐

中英两语青年写作者，旧金山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在读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Newsletter



图片来自 [Artin Bakhan](#) on Unsplash

档案

“这些年轻女性不害怕死亡”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3 条新闻。

9月，22岁的伊朗女子马赫萨·阿米尼 (Mahsa Amini) 因违反着装规定而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自那之后，伊朗的动乱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直至目前，城市的暴力活动仍在不断升级，抗议没有减弱的迹象——它依赖于少数民族、不同宗教团体之间以及男性与女性之间前所未有的团结。

女性抗议者一直走在示威的最前列，她们把矛头对准了政权的象征，在欢呼的人群面前游行时不戴头巾，或焚烧头巾，蔑视 1979 年革命后政府对女性实施的根深蒂固的着装规定。数千名妇女游行到总理办公室和最高领袖住所，高喊：“我们没有倒退的革命。”学生与工人也是抗议的主力，就在刚刚过去的周六，伊朗人权活动者通讯社报道，首都德黑兰的二十多个校园仍在进行静坐罢工和抗议活动。

最新一起活动是抗议者在霍梅尼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的祖宅纵火。霍梅尼在 1979 年领导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该国亲西方的君主巴列维国王 (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但在如今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中，伊朗人撤下了印有他名字的路牌，焚烧了印有他肖像的海报，高呼要推翻现政权。

抗议者首先希望得到世界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但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压制独立媒体并禁止外国记者拍摄。此外，公民也无法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抗议视频。[据互联网监控组织 NetBlocks](#)，在过去七周内，伊朗的互联网经常被关闭或大规模中断。这让媒体们无法核实具体的被捕人数以及死亡人数。

本月上旬，伊朗 290 名议员中有 227 人投票赞成对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实施死刑，一些官员也一再要求对几乎没有减弱迹象的动荡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人权组织警告称，随着伊朗领导人试图结束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国抗议活动，可能会出现一波处决浪潮。据 CNN 报道，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已有至少 378 人被杀，其中至少有 58 名儿童，有的年仅 8 岁。

伊朗领导人将他们称之为“骚乱”的抗议活动归咎于外国，比如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最高领袖发出警告，抗议运动“注定要失败”。

在 1979 年以后的几十年里，伊朗人一再要求正义、自由和平等。许多人因此被捕、受刑或被杀。每一次抗议活动都跨越了城市和农村，但每一次异议最终都被无情的政权镇压。但观察人士表示，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新一代已经决心从过去中吸取教训。大多数站在抗议最前线的人都是 Z 世代，他们只占人口的 7%，但他们不怕发出自己的声音。

伊朗裔美国学者 Haleh Esfandiari 对 [ABC 新闻](#) 说，这一代人受过高等教育，与全球联系紧密，完全厌倦了现状——“这些年轻女性不害怕死亡”。至关重要的是，这一代抗议者不仅了解伊朗以外的世界，而且了解在他们之前战斗过的人的历史。

过去伊朗的抗议运动针对的是不平等、福利和专制政权的某些方面，但这一次的要求更为广泛。“女性”、“生命”、“自由”的口号响彻全国各地，就像 Haleh Esfandiari 所描述的，“他们认为自己和其他生活在西方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他们想要过那种生活……他们不想成为二等公民。”

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在巴黎会见了伊朗异议人士，他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正在发生。革命的子孙们正在进行一场革命。”这番言论标志着欧洲领导人首次将这次的冲突定性为不只是抗议运动，而这肯定会进一步激怒伊朗官员。

ALSO IN THE NEWS

德国肯德基的促销广告冒犯了犹太人

11 月上旬，德国肯德基通过其官方 app 发出一条通知，邀请德国顾客点上奶酪和炸鸡来纪念“水晶之夜”。“水晶之夜”指的是 1938 年 11 月 9 日和 10 日发生的反犹暴动，这起暴动被认为是反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

这条消息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事件发生大约一个小时后，肯德基又发了一条道歉声明，并将其归咎于“我们系统的一个错误”。据推测，这条信息是由电脑生成的，宣传奶酪炸鸡的文字会自动与当前的纪念日联系起来。但德国的社交媒体专家表示，令人震惊的是肯德基内部没有检查机制来处理这个错误。

TikTok 创作者因嘲笑政客被判处 20 次鞭刑

11 月 7 日，尼日利亚北部卡诺州的一家法院裁定，两名 TikTok 创作者因制作了一段视频将被判处鞭刑，原因是他们在视频中诽谤了该州州长。据 CNN 报道，当法庭宣读指控时，26 岁 Mubarak Isah Muhamma 和 23 岁的 Nazifi Muhammad Bala 承认了两项罪名，即诽谤人格和煽动公众骚乱。

司法部发言人 Ibrahim 说，除了在公共场合被鞭打外，这两名男子还被要求每人支付 1 万奈拉（约合 162 人民币）的罚款，并清洗法庭厕所 30 天。他们还被命令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一段视频，向州长公开道歉。

国际特赦组织 (Amnesty International) 尼日利亚分部负责人 Osai Ojigho 谴责了这一裁决，称“讽刺当权者不是犯罪”。人权律师 Inibehe Effiong 希望向更高一级的法院挑战地方法院的裁决。她补充道，批评领导人是公民的权利。

卡塔尔世界杯上的球迷们只能喝无酒精饮料

第 22 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于本月 20 日在海湾国家卡塔尔开幕。这个穆斯林国家被认为是保守且传统的，严格控制酒精的销售和使用。上周，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经过主办国当局和国际足联的讨论，我们决定将酒精饮料的销售重点放在国际足联球迷节、其他球迷目的地和获得许可的场馆，并取消 2022 年世界杯卡塔尔体育场周边的啤酒销售点。”

今年 9 月，卡塔尔曾表示，将允许持票的球迷在世界杯足球赛开赛前 3 小时和终场哨响后 1 小时内购买含酒精的啤酒，不允许在比赛期间购买。但最终他们还是彻底转变了自己的态度。百威啤酒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后，在 8 个体育场周围的售票区域内销售啤酒。该啤酒品牌是国际足联的合作伙伴之一，它在推特上写道：“嗯，这很尴尬”。不过这条帖子很快就被删除了。一周前，卡塔尔颁布了一项禁令，要求将几十个印有百威品牌标志的红色帐篷转移到世界杯场馆内更隐蔽的位置，远离大多数观赛人群会经过的地方。

虽然一些球迷可能会对体育场的无酒精饮料感到高兴，但更多人感到困惑和沮丧。数千名球迷在航班抵达多哈后才得知他们不能在体育场内喝酒这个消息。

与此同时，LGBTQ 球迷对卡塔尔世界杯发起抵制

这是世界杯首次在中东地区举办，自一开始便笼罩着诸多争议——从移民主人的死亡到妇女权利以及 LGBTQ 的处境。

尽管卡塔尔表示欢迎所有球迷，但同性恋在这里是非法的，最高可被判处三年监禁。人权观察组织 (Human Rights Watch) 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卡塔尔安全部队去年任意逮捕 LGBT 人群并在“拘留中虐待”他们的案件。国际足联表示，他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不发生任何形式的歧视，例如公共和私人安全部队的人权培训课程，以及制定保护所有人的法律规定。

[但据 BBC 英超球队阿斯顿维拉的 LGBT 球迷组织 Villa and Proud 进行了一场调查](#)，以评估球迷在周日首场比赛前的感受。“我们会问，‘如果给你一次免费去卡塔尔的机会，包括住宿、机票和一切费用，你会去吗？’88% 的回答是不，他们不会。”一些人的心理健康受到了影响，他们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看球。

汇丰银行将为跨性别员工提供性别认同服务

汇丰银行 (HSBC) 已证实，从明年起将为跨性别员工的性别确认治疗买单，以支持他们“做真实的自己”。这项“性别焦虑福利”将于明年 1 月 1 日启动，允许其员工、ta 们的伴侣和 21 岁以下 (18 岁以上) 的子女申请支付性别确认手术的费用，以及心理健康治疗、激素咨询、语言治疗等。今年早些时候，该银行开始停止收集客户性别数据。2017 年该行曾表示，客户改变性别不需要证明。当时，为了“反映跨性别群体的经济需求”，该公司为顾客推出了十个新的中性 (gender-neutral) 称谓。

星巴克员工发起“红杯罢工”活动

上周四本应是星巴克一年之中最繁忙的日子之一，但一千多名员工在那天举行了罢工。星巴克工会的成员在全美 100 多家门店外活动，他们说这是该组织规模最大的单日罢工。这次罢工发生在“红杯日”，这一天品牌会分发限量版的可重复使用的红色杯子。它们被视为收藏品，顾客们在黎明时分就开始排队，只为得到一个装饰精美的杯子。

星巴克工人联合会的代表说，这次罢工是为了让星巴克在双方努力达成新合同时，与员工进行真诚的谈判。据工会称，该公司对工会领导人进行了报复，星巴克的律师在谈判会议上退出，或在最后一刻提出重新安排时间的要求，使会员难以参与。但星巴克负责沟通的执行副总裁 A.J. Jones 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说，最近谈判破裂的问题在于，参加谈判的工会领导人想在社交媒体上记录或播放谈判过程——这在法律上是不被

允许的。目前，双方在 12 月中旬之前将有大约 60 场新的谈判。

东京市民被呼吁穿高领毛衣以节省能源费用

东京都知事呼吁市民今年冬天穿高领毛衣保暖，减少能源消耗。“这是一起克服冬季能源危机的工具之一。”她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穿高领毛衣方面走在了前面”。目前尚不清楚马克龙穿高领毛衣是出于能源危机，还是为了时尚，但他对高领毛衣的喜爱已经引发了一段时间的讨论。

日本的目标是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长期以来，日本每年都会开展一项名为“cool biz”的活动，鼓励办公室员工在炎炎夏日穿休闲装，以节约能源。自俄罗斯 2 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日本和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能源供应的挤压。本月早些时候，日本政府要求人们在 1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关闭不必要的灯、在室内多穿衣，并调低暖气温度。由于能源价格飙升，欧洲也将面临一个艰难的冬天。法国推出了一项全国节能计划，呼吁市民关灯、调低恒温器，以避免断电。德国也出台了一系列规定来降低能源使用量，比如公共纪念碑不能被点亮等。

科罗拉多州刚刚将“迷幻蘑菇”合法化

在 11 月的中期选举中，美国科罗拉多州选民通过了一项投票议案，将两种迷幻蘑菇的使用合法化。这项投票使该州成为两年内第二个通过该议案的州。

[美联社报道](#)，该法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在超过 220 万张投票中，有 52% 的人支持迷幻蘑菇合法化。该倡议允许公众在有执照的辅导员的监督下体验迷幻蘑菇，还允许 21 岁以上的成年人个人私人使用、种植和分享它。但零售仍不被允许，并且禁止在公共场所、学校或驾驶车辆时使用。迷幻蘑菇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非法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种化学物质有治疗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和抗焦虑的用途，促使一些州考虑放松限制。

担心年轻人的健康风险，荷兰政府将禁止使用笑气

出于对健康和道路安全的担忧，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笑气的销售、进口和持有在荷兰将被禁止，医疗用途和食品工业除外。笑气，又称一氧化二氮，作为一种娱乐性毒品已经越来越普遍。在荷兰的俱乐部中，年轻人常将它与摇头丸一起使用。[据研究毒品和心理健康的特里姆博斯研究所称](#)，2020 年，每 50 个荷兰成年人中就有一人使用笑气。该研究所还强调，12 至 14 岁的青少年使用这种物质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不认为它是一种“真正的毒品”，也不知道其风险。荷兰警方也对这项禁令表示欢迎，因为近年与毒品有关的交通事故激增。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笑气与该国 60 多起致命车祸有关对这种毒品日益流行的担忧不仅限于荷兰。在英国，它是 16 到 24 岁人群中最常见的滥用药物（仅次于大麻）。上个月，英国内政部呼吁停止向消费者销售这种气体。

残障员工因马斯克禁止远程工作而起诉推特

在旧金山，一项新的诉讼称，推特公司 (Twitter Inc.) 新任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 要求员工停止远程工作，而是做好“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准备，这是对残障员工的歧视，导致他们被解雇或被迫辞职。前工程经理 Dmitry Borodaenko 告诉媒体，他就是这样的人。Dmitry 是癌症幸存者，他向老板表示想继续在家工作后不久就被解雇了。律师 Shannon Liss-Riordan 表示，在《美国身心障碍者法案》的规定下，远程工作何时被认定为一种合理的安排，几乎没有法律先例，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个案的实际情况。

在向同一法院提交的另一份起诉书中，推特被控在马斯克上任后突然裁员约 3700 名员工，相当于公司员工总数的一半。这些诉讼是马斯克收购推特后面临的最新挑战。事件发酵后，推特没有立即回应诸如[路透社](#)等媒体的置评请求。马斯克表示，被解雇的员工将获得三个月的遣散费。根据联邦法律，雇主可以向员工提供 60 天的遣散费，以代替提前通知。

埃博拉疫情在乌干达蔓延，医生短缺，学校关闭

乌干达于今年 9 月 20 日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自那以后，有记录的病例总数达到 141 例，其中 55 例死亡。这次埃博拉疫情与以往大多数疫情有所不同。它是由另一种埃博拉病毒——苏丹埃博拉病毒株引起的，目前刚刚推出三种经世卫组织工作组认证安全的试验疫苗。

[路透社的一篇报道文章称](#)，在疫情爆发初期，有 10 名医生立即前往波特尔堡地区的隔离病房工作，但现在只剩下 3 名医生。一名留下来的医生匿名说道，人们不愿意在这个病房工作，因为他们害怕感染致命的出血热，也因为疲惫和拖欠工资。乌干达是世界上医生与病人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每 25000 人只有一名医生，而世卫组织建议的比例是 1 比 1000。全国范围内，有 15 名卫生工作者在这轮疫情中检测呈阳性，6 人死亡。不断扩大的疫情也促使乌干达教育部长兼第一夫人 Janet Kataha Museveni 将今年的第三个学期[缩短了两周](#)。本月早些时候，卫生部长提出了关闭学校的建议，但遭到了全国教师工会的抵制。在缩短学年之前，由于新冠疫情，当地的学校已经前所未有地关闭了两年。

数据显示，英国的有色人种更有可能被罚款

根据[英国国家警察局长委员会发布的数据](#)，从 2020 年 3 月实行封锁规定到 2021 年 7 月取消限制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共有 441 人因参加涉及音乐活动而被罚款。尽管黑人、亚洲人和混血儿在英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 15%，但他们被罚款的比例却超过了三分之一。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警方记录的 342 张罚单中，18% 的人被列为黑人，11% 的人被列为亚洲人，6% 的人是混血。尽管白人占英国人口的 80% 以上，但只有 60% 的罚款是发给白人的。

另外一项[《卫报》发布的民意调查](#)则显示，黑人对警察的信任程度明显低于白人。长期以来，“拦截和搜查”一直是警察与少数族裔社区，尤其是黑人之间关系的导火索。大多

数的拦截都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但黑人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七倍，而警察局长也无法解释原因。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电影《华氏 451 度》(1966) 剧照

档案

马斯克入主推特，带来了什么？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新近发生的 13 条科技、环境和文化消息。

5 月的 newsletter 中, 我曾引用 [Reddit 前 CEO 黄易山](#) 的说法, 他认为马斯克接管 Twitter 是个错误的决定, 因为言论自由的意义在如今的社媒时代已经全然不同, “他将进入一个他从未知晓的痛苦世界。”

黄易山是出于善意了, 他预设马斯克真抱着某种崇高心态, 欲打造一个“自由的言论平台”。现在看来, [解雇发表异议言论的员工, 亲自散播假消息, 把认证蓝 V 奉送给任何一个愿意拿出 8 美金的人](#)……马斯克对打造一个好平台毫无兴趣, 他只是想“把火烧得更旺些”, 然后在旁边乐得拍掌。

人常说, 世界是个游乐场。而现实呢, 世界只是极少数人的游乐场, 他们肆无忌惮地将他人的命运玩弄于鼓掌之间。“如果你的钱比上帝——或者至少比任何其他人都多——对你来说, 没有什么比享受死前的有限时间更有价值。”连写了好一段时间马斯克的 [Steven Levy 也表示](#), 不要再猜了, 马斯克只是以此取乐, 一旦搞砸, 他也大可耸耸肩, 写张支票走开, 而毋需付出什么真正的代价。

网友说得好啊想象一下, 现在马斯克只是掌控了 Twitter, 等人类靠 SpaceX 移民火星了, 他可是要掌控你呼吸的空气哦! 反乌托邦小说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 越是艰难困苦、极端的情境, 穷富与阶级的差距就会被拉到极致。不要再问这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了, 他只想让火烧得更旺些。

这时一些员工主动选择离开就显得颇为合理。“人们不想牺牲心理健康和家庭生活来让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变得更富有。”[一位前雇员如此说](#)。

当然回到当前, 不能忽略的是, Twitter 本就[身负每年 10 亿美元的债务](#), 且营收下滑, 举步维艰。其近 90% 收入来自广告, 但论[用户体量](#), 不比新生蓬勃的 TikTok, 也远不比老态的 Facebook, 客户流失率[应声流失了超三分之一](#)。马斯克接手后, [仇恨言论激增](#), 也让它成为一个品牌难以信任的平台。[大裁员](#)和卖会员, 都是试图挽救滑坡财务问题的手段。

此时, 不少人笃信这就是 Twitter 的终局了。不同于许多默默死去的平台, 马斯克最后还给它炸了个响, 有个不体面但热闹的葬礼。

[更有责任心的, 则担心起了人类文明的断层](#)。毕竟从 2006 年起, 从阿拉伯之春到俄乌战争, 这个平台在大小政治历史事件中都扮演重要角色。这是美国政府最先宣布本·拉登之死的地方, 马航 MH17 航班的失联也是在这里开始为世人知晓……16 年的时间里, Twitter 用碎片化的信息堆出了一个富矿, 这段时期的历史被前所未有的地、视角丰富地记录了下来。但正由于海量且零碎, 这些信息几乎无法被存档——美国国会图书馆尝试过, 2018 年也宣告停止。

这其中尤为突出的是, 一旦 Twitter 删库跑路, 公共记录的消失可能让针对战争的事实

核查变得困难重重。讨论俄乌战争时, 我多次提到公开来源情报 (OSINT) 扮演的角色, 这些多见于社交媒体的照片、视频、卫星图, 不仅提供了前线的一手信息, 也有望出现于法庭之上, [用于调查具体的战争罪行](#)。

我们不该忽视, 多年来, Twitter 以 # 话题的方式推进了诸多社会运动的进程: 给从社科到医疗保健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观察人类群体行为的优质窗口; 鉴于在[无障碍方面的优秀设计](#), 它也是残障人群参与公共讨论的重要途径……[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Anjana Susarla 写道](#), “Twitter 的真正价值在于让人们能够实时联系彼此, 并作为集体行为的档案。”相信即便 Twitter 消失, 联结并行动, 这种需求仍会持续存在下去。

IN THE NEWS

加密世界又塌一个角。这次是一家叫 FTX 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这类交易所](#)允许人们进行不同加密币种的买进卖出, 从中得利, 让加密世界又变得平台化、中心化、满是中间商赚差价了起来。之中更为人所知的要属赵长鹏创立的币安 (Binance)。戏剧的是, 竞争对手币安也成为 FTX 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 11 月 9 日, [币安宣布放弃收购 FTX 之后](#), 后者滑向了无可避免的死亡, 申请破产, 并接受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就像马特·达蒙代言了 [crypto.com](#), 知名喜剧演员拉里·大卫也曾[在今年的超级碗上为 FTX 出演](#)。广告中大卫扮演了一个拒绝灯泡、洗碗机、马桶等新鲜事物的老顽固, 面对 FTX 也果不其然地表达了不屑。“别错过。”广告最后露出标语, 押中人们想要抓住时代机遇的心理。[据其破产申请](#), FTX 的无担保债权人数量可能超 100 万, 债权总额高达 31 亿美元。

FTX 的闪电溃败“凸显出整个加密体系的脆弱性”, [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 Eswar Prasad 表示](#)。这个行业监管松散, 几乎是抗风险的反义词, 而在这里, 风险和骗局又常常以同样的面目出现。

曾处理安然公司破产案的 John J. Ray III 赶来收拾残局, [一份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 他也表示大开眼界,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从未见过如此彻底的公司控制失败和如此不可信的财务信息。系统诚信受损, 海外监管失位 (为躲避强监管, 与很多加密公司一样, FTX 总部位于巴哈马群岛), 控制权集中在一小撮无经验、不成熟且可能腐败的个人手中。”

Z-lib 域名遭美国司法部查封。与此同时, FBI [还逮捕了两名俄罗斯人](#), 指控他们为 Z-Library 背后运营者。2009 年开始运营的 Z-Library, 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书图书馆”, 坐拥超 1100 万册盗版电子书和学术论文。但与高调的 Sci-hub 不同, Z-Library 的所有者一直身份成谜。此次 [被捕的俄罗斯夫妇](#)非常年轻, 是否为最初的创办者也仍不得而知。

网站下线的消息引得一阵骚动, 人们接力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愤怒和遗憾。尽管存在侵权问题, [科技媒体 Slate 指出](#), 对于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学生、研究者, 这样的网站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但对于作家和出版商, 它的存在却显然是一個坏消息。旷日持久的信息自由与版权保护之争看不到要结束的意思。

司法部门忙着封锁域名之时, 人们也在加班加点地另起炉灶。[一个名为 Anna's Archive 的搜索引擎迅速问世](#), 替代消失的 Z-Library, 它不自行进行内容托管, 而是通过搜索, 将用户导向拥有特定文件的网站 (比如 Library Genesis fork 和 Z-Library 的 Tor 版本)。

伊朗通过电信手段拦截抗议者手机。根据数据隐私媒体 The Intercept 获得的一份内部文件, 伊朗政府正使用一个名为“SIAM”的系统, 通过蜂窝网络, 监控人们如何使用他们的手机, 并生成详细的元数据摘要, 包括谁与谁通话、何时何地。

不仅如此, 这个工具还可以远程发送指令, 减慢特定用户数据连接的速度, 比如将原本的 4/5G 网络降级为 2G。这样一来能突破前者更高级的加密系统, 二来也让人们难以通过社交网络彼此联络。The Intercept 指出, 美国就曾使用过类似技术, 伪造一小块 2G 网络覆盖区域, 然后诱骗目标手机连接到该网络。

中国用户的手机也被盯上, 最新版 iOS 系统限制空投。11 月 9 日发布的苹果 iOS16.1.1 版本更新中, 对接收陌生人的 Airdrop 施加了十分钟的时间限制。过去, 这个功能并没有此类限制, 你可能在地铁上接到过类似的表情包空投, 站起来, 让我坐坐儿。但却无法得知是谁给你传了这张图。这种匿名性让 Airdrop 被视为一种传播信息的好方法, 只要打开, 约 10 米范围内的人都可以快速接收到。

报道显示, 中国大陆以外销售的苹果手机似乎没有受此次更新影响, 独独 [大陆销售的 iPhone 显示](#)了这个新的限制, 且不管用户的 App Store 账户是位于哪个国家。

意大利禁止打击犯罪之外的人脸识别技术使用。这被视为隐私权的一步胜利, 至少禁止了商业公司层面的滥用, 但“打击犯罪”在多大意义上会被泛化解读, 仍需谨慎观察。与此同时, 正欲通过全球首个《人工智能法案》(AI Act) 的欧盟, 则试图完全 [取缔对人群的大规模实时扫描](#)。因为一旦留下口子, 控制和问责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倡导者认为, 从根本上, 这就是一种错误的技术, “只要被允许用于特殊目的, 就意味着它将作为基础设施在那里, 作为一个公民, 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是否已经启动……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基本权利的社会里, 这种技术没有立足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 正如火如荼开展的世界杯充分拥抱了这项技术。在预计将接待 200 万名观众的会场, [设置了 1.5 万台人脸识别摄像头](#), 平均约 130 人就能享有一台。可谓, 你在看球时, 别人也在看着你。

早在赛事开始前, [卡塔尔要求所有到访者下载的新冠追踪软件 Ehteraz](#) 就受到广泛关注。它要求提供大量的手机权限, 比如后台定位始终打开, 访问系统文件, 还可以远程访问用户的图片和视频, 甚至自动拨打电话。法国数据保护机构 CNIL 在审查这款应用程序后, 建议人们带上一部一次性手机, 以保护个人信息不被窥探。

COP27 气候大会：终极策略，用钱解决。11月20日，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在埃及结束了长达两周的谈判。此次会议的核心进展在于建立了一项“损失与损害基金”，来补偿脆弱国家因气候变化遭受的创难。这背后是来自三十年前的一道许诺，富裕国家应承担更多减碳责任，帮助排放更少，却深受极端气候及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发展中国家和群岛国家。

根据协议，该基金将率先注入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捐款，援助最脆弱的一些国家。这并不简单，在灾害面前，上亿的资金也似杯水车薪——今夏巴基斯坦被洪灾淹没了三分之一，损失就达300亿；到2050年，非洲大陆的气候适应成本则预计将高达每年500亿美元。如此背景下，这项协议就如同“一个巨大伤口上的小创可贴”。而历史性的协议也并不能掩盖其他硬伤。此次大会上，化石燃料的说客们存在感超强。来自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600多名代表成员参加了会议，比去年增加了25%，让“拥挤的会场仿若一个化石燃料的推销会”（BBC）。最终，逐步淘汰所有化石燃料使用这个核心议题没能得到推进。明年的会议将在石油大国阿联酋举行，这让活动人士担忧，推动这一议程将变得更为困难。

卢拉胜选，巴西雨林有救了么？COP 27 上，再度当选巴西总统的卢拉也备受瞩目。卢拉立志停止森林砍伐和生物群落的退化。他还承诺要为巴西原住民单独设立一个部门，由原住民进行管理。

在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管理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滥砍滥伐事件达到了15年内的最高水平。WWF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地区大约13%的面积遭到破坏，17%严重退化，正逼近从雨林向热带草原过渡的“临界点”。这对全球气候将带来沉重打击。

因而，卢拉的上台被视为一个好征兆，人们密切关注他的总统权力能在任期内带来怎样的影响。为表支持，挪威于2019年中止的亚马逊保护补贴，也随着卢拉的胜选恢复。

全球人口跃过80亿，地球会撑不住么？很多人会感觉，这个数字跟自己上学时的记忆很不同。这是因为过去短短12年内地球就增加了10亿人。这是一条惊人的曲线。一直到1803年，地球人口经历漫长的增长才突破10亿大关。紧接着，随着生产力提升，这个数字一路飙升。

过去十年主要的增长来自于亚洲的中等收入国家——印度去年出生人口超2300万，比中国多了1300万，并有望在明年总人口超过中国成为第一。UN预测，全球人口将继续增长，并在2080年达到104亿的峰值，而这部分新增将主要来自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但一些人已经开始担忧人口的下降。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负增长已经出现了。中国的下降就格外突出，去年总生育率仅为1.15——美澳为1.6，老龄化的日本为1.3。据预测，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不及现在的一半。

许多观点认为，人口数量并不是最关键的。“我们已经承担了80亿，并仍可以负担90亿甚至100亿”，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Jack Goldstone表示，更应当关注的是这种增长的极度不平衡。在一些地区，资源无法匹配高速增长，将导致更多的贫困。而其余一些地区，老龄化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医疗系统和养老金体系都将面临重压。

这个话题下，《纽约时报》报道了一个很有趣的组织，“人类自愿灭绝”运动联盟。他们相信，人类帮助地球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停止生育。他们并非支持屠杀、计划生育或自杀这类人口控制手段，他们提倡顺其自然，座右铭是“愿我们长寿，然后不复存在”。

NASA利用卫星工具发现“巨大甲烷气团”。甲烷是重要的温室气体，虽然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造成了全球约30%的气候变暖。如今，利用类似热力图一样的卫星探测装置，NASA定位了全球范围内50多个“排放热点”。

它们大多为位于中亚、中东和美国的天然气井、油田或垃圾处理站。前者的主要甲烷来源为化石燃料泄漏，后者则为微生物排放。定位“超级排放者”给控制减排提供了更好的方向，以从源头减少排放；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认知——垃圾填埋看似比焚烧更为环保，但实际上，任何垃圾填埋场深度超过6米都有可能产生甲烷。填埋场着火时，也会在短时间造成严重的局部污染。

在法国，所有大型停车场都将覆盖太阳能板。这里的大型指的是任何可容纳超80辆车的停车场，不论为现有或新建。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可再生能源计划下，法国目标将太阳能发电量翻十倍。停车场被视为一个优质的铺设地点，它无需开荒，且通常位于城市，离电力的使用者很近。这项改造计划预计产生1100万千瓦的电力，相当于10个核反应堆，为数百万家庭提供电力。

美国为拯救鲑鱼拆除大坝。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坝拆除行动，包括了对四座横跨加州和俄勒冈州边境的大坝。这将改善克拉马斯河的生态状况，让在此溯游的鲑鱼能够至上游产卵，并重返大海。过去，大坝拦住了它们的去路，80到90%的幼鱼会在迁徙时死亡。

与此同时，密歇根五大湖地区也在与本地的原住民部落密切合作，拆除27座大坝以及其他河流屏障，以恢复本地鱼类和其他水生物种的自然通道。在消除河流中的屏障可以使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更好地移动，寻找食物、繁殖，躲避掠食者，并在恶劣条件下找到庇护所，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气候适应能力至关重要。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Dongsh on Unsplash

专栏

2020 街路笔记： 总算是唏嘘多于欢笑

伊险峰 |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并非不可能。

圣彼得堡

还是从约瑟夫·布罗茨基《大理石像》的那句话开始。

天气不错啊，各位长官！台伯河蜿蜒流淌，群山一片青蓝。罗马城，这条母狗，近在眼前。

布罗茨基最爱的城市是圣彼得堡。这个在沼泽中诞生的城市，出身不凡。我们习惯于说它与彼得大帝之间的关系，好像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画了一个圈一样就在波罗的海之滨对接了启蒙时代，实际发生的当然就如同白海运河、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样，以无数生命为代价完成——“它是暴君狂妄设想的产物，是专制君主的疯狂梦想”。专制者“平地抠饼对面拿贼”的事做了不少，圣彼得堡更多是幸存者效应，而那些在缺水缺交通缺资源缺人缺所有要素的什么地方搞的废弃的乌托邦是专制者的本职工作——“这个腐烂的、可厌恶的城市会随雾而升起，像烟一般消失”，陀思妥耶夫斯基恨圣彼得堡入骨，诅咒它如烟般消失，那些乌托邦最终命运大抵也就这样。

但在布罗茨基眼中，这个城市何止是美丽，因为诗歌，因为散文，它们构成了第二个圣彼得堡，“散文被一读再读，诗歌被背诵，原因之一是苏联学童如果想毕业就得背诵它们。正是这种背诵，确保了这座城市在未来的地位和位置——只要俄语依然存在——并把苏联学童转变成俄罗斯人民”。

学年一般结束于五月底白夜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这些白夜将在整个六月份持续。白夜是指太阳只离开天空一两个小时的夜晚，这种现象在北纬(高纬度)地区是很常见的。那是这座城市最神奇的时刻，你可以在凌晨两点读书写作而不需要灯光，建筑物没有阴影，屋顶环绕着金光，看上去就像一套脆弱的瓷器。周围是如此的安静，你几乎可以听见一支汤匙在芬兰掉落的叮当声。天空染上了透明的粉红色，亮得河流那浅蓝色的水彩几乎无法反映它。那些桥则被吊起，仿佛三角洲中的诸岛屿松开它们的手，并开始慢慢漂流，拐入主流，朝着波罗的海游去。在这样的夜晚，很难睡得着觉，因为光太猛，也因为任何梦都比不上这种现实。人不会投下阴影，像水。

布罗茨基出生于 1941 年，被称作“日瓦戈一代”，他们成年之路，最严酷的清洗和战争时期已经过去，社会停滞，未来渺茫，一切看起来都要变成永恒的样子。

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世界上最不公正的国家。那国家被一群生物统治，这群生物用所有的人类来看，应被视为退化的生物。但没人作如是想。还有一个城市。地球表面上最美丽的城市。有一条巨大的灰河，悬挂在其遥远的底部之上，如同巨大的灰天悬挂在那条灰河之上。那条灰河沿岸耸立着宏伟的宫殿，其正面的装饰是如此美丽，如果那个小男孩站在右岸，那左岸看上去就像一个叫作文的巨大软体动物的压印。那文明已不存在了。清晨，当天空还闪耀着群星时，那小男孩起床，在喝了一杯茶和吃了一个蛋之后，便沿着那条白雪覆盖的花岗岩河岸奔向学校，一路上陪伴他的，是收音机宣布的炼钢新纪录，紧跟他的，是军队合唱团向领袖高唱的赞歌，那领袖的画像就挂在小男孩还温暖着的睡床边的墙上。那条宽阔的河呈白色，冻结着，如同一个大陆的舌头伸入寂静，那座大桥向暗色的蓝天弓起，如同一个钢铁上颚。如果小男孩有额外的两分钟，他会在冰上滑行，再走二三十步，来到河面中央。这时候他只想着鱼在厚冰下干什么，接着，他会停下来，转身一百八十度，跑回去，一口气奔向学校入口。他会冲入大堂，把帽子和外衣扔到一个挂钩上，然后飞也似的跑上楼梯，进入教室。那是一间大教室，有三排桌子，教师座椅背后的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一张有两个半球的地图，只有一个半球是合法的。小男孩坐下来，打开公文包，把钢笔和笔记本摆在桌面上，抬起头，准备听胡说八道。

这个聪明的男孩后来成为诗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最多看过的是他的散文和他的回忆文章，不是他的诗。他最著名的经历甚至都不是写诗，而是成为苏联统治后期最著名的段子：1964 年，他因为写诗而被捕，列宁格勒官员以“邪恶的寄生生活”这个罪名把他送上法庭，这事本来就已经够丢人的了，偏偏法官又是一个“高级黑”一样的颟顸角色，问他：“谁承认你是诗人，又是谁批准你成为诗人？”布罗茨基拣到这个问题就像东方不败拣到葵花宝典，“没有人。又是谁批准我成为人类？”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茨维塔耶娃，献给勃洛克的诗的第五首。在布罗茨基写“白夜抵达这座城市”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茨维塔耶娃对勃洛克的爱。我们通常理解是爱的绝望，是“永难相聚”，但对于圣彼得堡的人来说，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并非不可能。

在我的莫斯科，圆屋顶熠熠生辉，
在我的莫斯科，正钟声长鸣，
这里，陵寝排成一列，
沙皇和皇后在其中长眠。

你可不知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朝霞里
呼吸多么顺畅，胜过世界的任何地方！
你可不知道，在克里姆林宫的朝霞里
我在向你祈祷，直至晚霞满天。

你在涅瓦河沿岸漫步
的时候，我正站在莫斯科河边，
把头低低地俯在胸前，
路灯闪着惺忪的倦眼。

我爱你，度过了不眠的长夜，
我思念你，度过了不眠的长夜——
这时，在克里姆林宫里
那些撞钟人正在醒来。

但是，我的河流与你的河流，
但是，我的手与你的手
永难相聚，亲爱的，除非
朝霞有一天赶上晚霞。

1916.5.7

只是单纯喜欢。茨维塔耶娃写过最美好的诗，和最简洁的自传。“从四岁起我最喜欢做的事是阅读，五岁起则最爱写作。我爱这一切爱到七岁，之后别无他爱。四十七岁这年，我说：我应当认知的一切，在七岁以前都已认知完毕，接下来的这四十年，我一直在醒悟。”寥寥几笔之后，大气磅礴地以“我所有的文章都是自传”作尾。再过两年，死于对生活和爱的绝望。

伊斯坦布尔

圣彼得堡在我阅读中的存在感特别强，超过纽约巴黎伦敦柏林这些更有“西方”概念的城市，原因可能与阿克梅派的诗人有关，跟以赛亚·伯林说的 20 世纪最大的政治就是苏联共产主义革命和实验有关，跟我们自己很多时候亦步亦趋的迷茫有关。奇怪的是，伊斯坦布尔也很有存在感，看起来更没有什么道理。有的时候会感觉，就跟它现在在中国的形象定位一样，它是一个网红。柯比西耶写《东方游记》到伊斯坦布尔一家咖啡馆，几个桌子之间，垒着三个坟堆，几米见方，与所有坟堆差不多，边坡砌着石块，有铁丝将其转起来，有灯照着坟墓，通宵不熄。

死者躺在无花果树的根柢之间，而高大的枝梢则像死者的灵魂，朝着天空伸展。当地的风俗，是让死者躺在活人中间，好让他们保持安宁。那些像孩子一样，穿着粉红、蓝色或白色袍子的善良老头，每天早晨都会来问候死者。他们透过满嘴的胡须，发着明显的齿音，急促地说“是啊，是啊，我们就来了，要不了多久了。我很高兴与你们重逢！……”

伊斯坦布尔总是有这股诡异的风格。就像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你陪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从琐碎而且猥亵的感情中走出来。那些铺张的让你怀疑是鸳鸯蝴蝶派一样的爱情，像泥浆一样从你的脚趾缝中被挤出来，有的时候还会有破裤子缠腿的感觉。那爱情古典，富家公子，还有点玛丽苏，六百来页，你读的过程当中也会思考，这是得了诺贝尔奖的帕慕克在放飞自己？有一个愤怒的读者在豆瓣说，这可真是一部让人看低诺贝尔奖和男人的作品。但看到最后，纯真博物馆升级为真正的主角，你就发现硕大的存在是伊斯坦布尔，无边无际地覆盖过来，就像帕斯捷尔纳克说福克纳《八月之光》，“一部奇书”：“年轻孕妇这个人物令人难以忘怀。当她从亚拉巴马州走向田纳西州时，美国南部的广袤、南部的精华，也让我们这些从未到过那里的人领略到了”。

香港

曾经香港市井市民文化厉害，歌是通俗歌曲，电影是黑帮搞笑之类来自民间善恶恩仇的价值观，经过历史淘洗，现在都有殿堂中的气魄了。七八年前的时候，让记者写香港，脑子里的旋律都是狮子山下。

人生中有欢喜
难免亦常有泪
我哋大家
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
难以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
且共济
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哋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作者是黄霑。听罗文或者其它人唱起来，就感觉这是香港人的能耐，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现在这歌下面也有一些评论，大都是内地人，把重点放在香港人你为什么不能放开彼此心中矛盾，好像即使怜惜香港今日，也要先把“乱港分子”指责成罪魁祸首。香港则是遍寻同舟人，唏嘘多于欢笑，这事就没法求共对了。

我看《吴宓日记续编》在西南师范那头几年，与现在看香港感觉近似。一场豪雨下来，先是窸窸窣窣，然后是土崩瓦解，最后是到了泥石流，再加上现代社会之后还有泄洪一说，最后不可收拾。

香港事态变化，大家喜欢用歌来比兴。《狮子山下》属于几年前，现在没有这豪气了。以一首歌来缅怀一个时代，没有什么不妥。有人喜欢东方之珠，有人喜欢皇后大道东，2020年底，有一天脑子里突然又出现了一段邓丽君，“Hong Kong, Hong Kong, 和你在一起，Hong Kong, Hong Kong, 我爱这个美丽晚上，有你在我身旁”。

没有比它更让人感伤的了。这歌的作者是林煌坤，台湾人，除了黄霑，上面提的这些歌都来自台湾，也是一个有趣的事，可能也并不太重要，但至少说明香港文化里不缺开放的那个维度。

夜幕低垂 红灯绿灯
霓虹多耀眼
那钟楼轻轻回响
迎接好夜晚
避风塘多风光
点点渔火叫人陶醉
在那美丽夜晚
那相爱人儿伴成双
他们拍拖
手拉手情话说不完
卿卿我我 情意绵绵
写下一首爱的诗篇
Hong Kong Hong Kong
和你在一起
Hong Kong Hong Kong
我爱这个美丽晚上

有你在我身旁

布罗茨基写他去雅典，赤膊坐在利卡贝托斯酒店里，汗流浃背，“在这座城市，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黄昏时分，当我出来想找个地方吃饭时，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密集的人群里，他们正在叫喊着，听不出他们在说什么。就我能推测的，选举在即。我穿梭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大街上，那里拥塞着人群和车辆，汽车喇叭在我耳中狂噪，由于一句话也听不懂，我突然觉得这其实就是死后生活——觉得生命已结束，但活动仍在继续着；觉得永生就是这个样子。”

对于没有任何语言天分的人，这种一切如常但与我无关的死后生活，倒是不难遇见。想象一下，在没有内地人的香港某个市井深处，或许可以藏起我的一点永生的冀望。这算是对一个城市最好的赞美吧。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

《消逝世界漫游指南》是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一本对即将消逝的动物的全球采访，整体上你可以看作一个漫长的告别。但你知道，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要告别的、已经告别的又何止这些。



小鸟文学出品
卷二十三，2022.11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